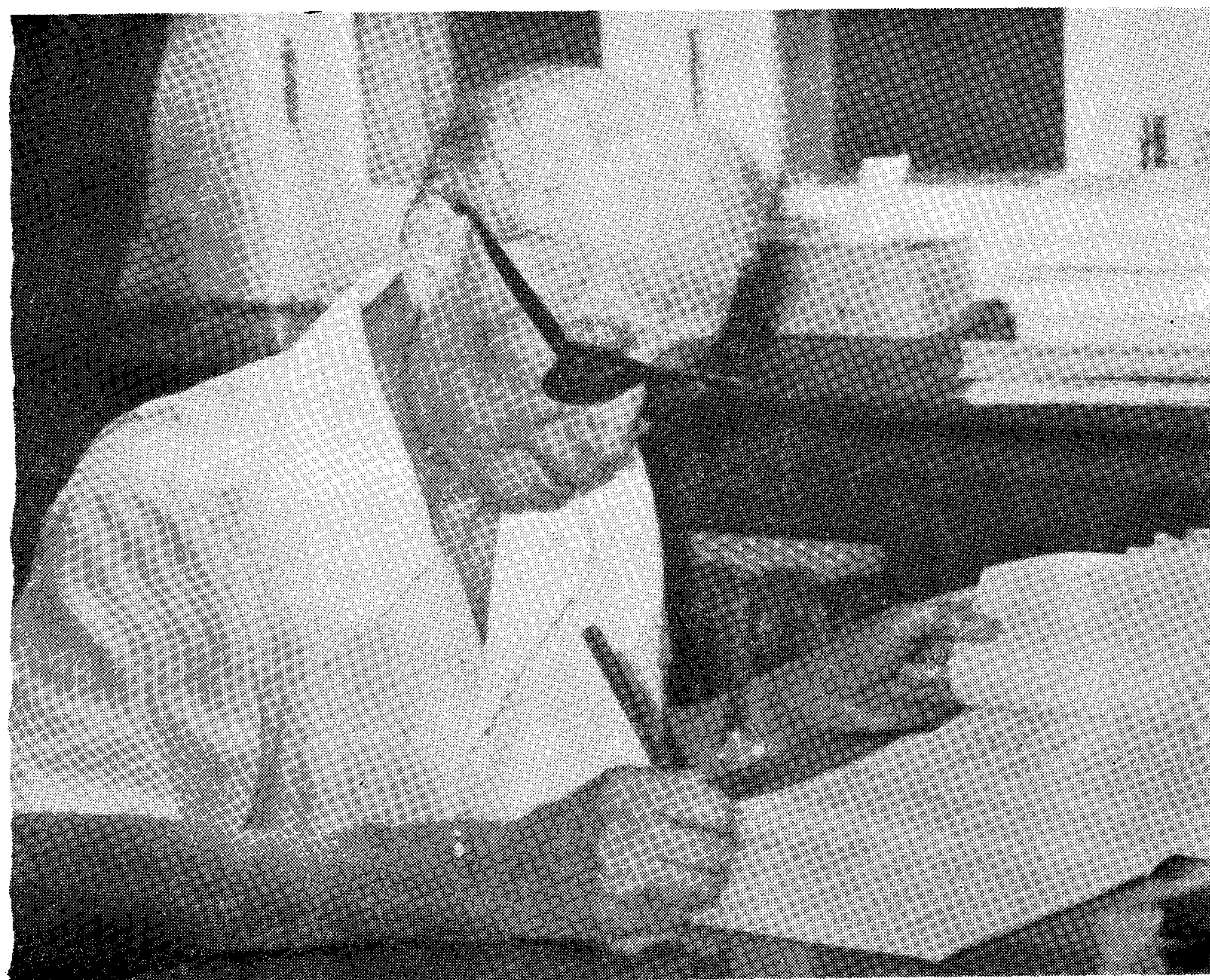


# 管文蔚回忆录

管文蔚 著

人民出版社

1985年3月



本书作者在写作



管文蔚同志出狱不久，1938年10月，  
与刚从江西前来的陈毅同志会师时合影



管文蔚同志与栗裕同志合影

# 目 录

<b>第一章 投入大革命洪流</b> .....	1
1. 这样的家庭和社会非彻底改造不可 .....	1
2. 从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	13
3. 恽代英、董亦湘引导我走向革命 .....	18
4. 在五卅运动中锻炼自己 .....	27
5. 党旗下宣誓 .....	36
6. 迎接北伐军 .....	43
7. 反革命逆流中脱险 .....	49
<b>第二章 战斗在京〔宁〕沪铁路沿线</b> .....	55
1. 白色恐怖下重整队伍 .....	55
2. 王若飞召我去上海 .....	64
3. 丹阳秋收暴动 .....	68
4. 担任特派员驻镇江 .....	78
5. 接替武进县委书记工作 .....	93
6. 白塔暴动 .....	98
7. 重回常州工作 .....	106
8. 陈云前来视察 .....	120
9. 领导天宁寺佃户抗租斗争 .....	129
10. 参加江苏省二次党代会 .....	138
11. 到无锡任中心县委书记 .....	153

<b>第三章 七年铁窗生涯</b> .....	167
1. 被捕入狱 .....	167
2. 苏州监狱的绝食斗争和暴动 .....	180
3. 镇江越狱前后 .....	191
4. 清扬路上一囚徒 .....	205
5. 乌烟瘴气的淮阴监狱 .....	216
6. 暗无天日的黑牢生活 .....	233
7. 苏州反省院真相 .....	242
<b>第四章 迎接抗日高潮</b> .....	255
1. 为准备抗战四处奔走 .....	255
2. 建立丹北抗日武装 .....	265
3. 在斗争中巩固和发展 .....	276
4. 陈毅率部来茅山 .....	288
5. “挺纵”北渡 .....	301
<b>后 记</b> .....	322

# 第一章 投入大革命洪流

## 1. 这样的家庭和社会非彻底改造不可

丹阳位于江苏南部，沪宁铁路的中段。丹阳县城东北三十六里处有一大镇——访仙桥。该镇往北不远的地方有一山村，叫倪山村，四面环山，离长江仅二十余里，一九〇四年我出生在这里。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天国的义军打到江南时，我祖父逃到金坛，另建立一个新家。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袁世凯依赖日本帝国主义支持而公然恢复帝制的丑剧垮台了。那年我祖父年已七十。除夕那天，他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觉得他创造一份大家业很不容易，就想利用祭祀的机会，向儿孙辈好好“开导”一番，叫大家不要忘记他的过去，好好守住他的这份家业。他叫父亲在厅堂里挂起我家祖宗五代世像图表，摆好供桌。正中供着管氏族谱，桌上摆满了猪头、全鸡、整鱼等各色各样的祭肴供果。古铜色的香炉中烧着檀香，一对尺把长的红蜡烛插在烛台上。五代世像列图上，一个个都是顶戴花翎，很象清朝一、二品官的模样。其实我家世代务农，并没有什么祖先当官为宦。这晚，我家子孙辈数十口团聚在我祖父身旁。先是我祖父、祖母向祖宗磕头，接着是我的父辈依次跪拜。最后轮到我们这一辈，我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磕了三个头。

祭祀结束后，全家吃团圆饭，守岁。守岁时，祖父先用一把小梳子梳理了一下长长的胡须，整整衣帽，拿了一根长烟筒，往供桌

旁的椅子上一坐。我的父亲和四个叔父也依次坐下，我们这一辈就乱七八糟地侍立在父辈的身后。我的眼睛老是盯着祖父手里那根长长的旱烟筒。烟筒约三尺多长，烟嘴是象牙的，装烟的是一个黄铜头。烟嘴下面吊着一块“镇邪”的玉珮，一把梳胡须的小梳和一个装黄烟的小袋。这杆长烟筒，我见了又怕又恨。平时，祖父见我们不如他意的时候，就常常拿这杆长烟筒敲我们的头。有一次他把我的头敲了一个大包。我很想偷偷地把这杆烟筒折断，但又不敢。祖父外出，这烟筒既当拐仗，又当防身武器，还可冒充绅士。今晚，他又拿起这杆长烟筒，抽了几口烟，慢慢地讲起他过去的事情。我当时还不大懂事，但由于祖父的封建家教向来甚严，只好也耐着性子听他讲。他说：

“……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长毛’<sup>①</sup>攻下了镇江、丹阳等几个州县。清军望风披靡。‘长毛’就乘胜由城及乡，向四处扩展，占领了访仙镇，接着就到了倪山东面约二里许的高桥。

“我们家所住的倪山，庄子比较小，一听‘长毛’来了，就纷纷逃难。我当时只有十一、二岁，与家人失散了。我在山洞里躲了七、八天，方回到倪山村上，找了几件破旧的衣服，匆匆地一个人向没有‘长毛’的地方走。”

祖父吸了几口烟，长烟管里的黄烟已烧完。他把烟筒头轻轻地在地上叩了几下。我父亲连忙站起来，上前替他把烟装好。他就着蜡烛火“噗嗤、噗嗤”地吸了几口，又慢慢地继续讲下去。我本来最不高兴听祖父唠叨，这回却听出味儿来了，就静下心来听他讲：

“我初次出远门，不辨东西南北。沿途遇到许多逃难的人，就跟着大伙一起走。听他们说‘长毛’每到一个村庄，先把村子四周

---

<sup>①</sup>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以红布包头，一律蓄发易服，以对抗清朝剃发留辮的律令。所以被称为“长毛”或“长毛军”。



包围，然后进村将青年壮丁编入队伍，粮食也尽数收去，统一管理。他们把清朝的地保等等一律废除，看村庄大小，每二十五家设一个‘两司马’统一管理。一天煮三顿饭，每家都去领。这办法不可能维持多久。开头吃干饭，十几天后吃稀饭，越往后粮食越匮乏，三顿变成两顿，两顿又减剩一顿。最后粮食吃光了，大家就开始流亡。

“我一路走着，看着，沿途都非常荒凉，田野里跑着兔子，经常看到有人饿死在道路旁。一般的村庄里都空无人烟，偶尔碰见几个人也大多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头子、老太婆。我跟着大伙儿继续往南走，路上几次遇到‘长毛’。他们头发全都披散到背上，头顶扎一块布巾，用铜匝或绳子匝着。手里拿着雪亮的大刀，见我是个小孩子，不打不杀，还给米团子吃。由于一路上几次遇见‘长毛’，逃难的人群被冲散，我又成了孤独一人。走了一个多月，到了一个叫道士桥的地方。那儿难民很多。我讨了点东西吃，歇了几天，又继续往南，走了几天，到了金坛。

“夕阳西沉时，我由北门穿过金坛城到了南门外，在城墙边找到一个破草棚。草棚的一边早已倾倒。我找了几根木棍把草棚撑了起来，又去找了一些干草来，铺在地上，人已饿，腿又肿，天色渐渐黑下来了，暂时住下再说。

“第二天，我又进城，想到倒塌的屋子里去找点东西吃。我在瓦砾堆上扒呀找呀，到处是残门破窗和烧焦了的衣服被褥，吃的东西却很难找到。饿得前胸贴后背，没法支撑了，只好到小河里去摸鱼。捡来一口破锅，在地上挖了一个坑，砖头一垒，端上锅，准备生火煮鱼。找到一块火石打火，好不容易生起火来，无油无盐，就那么煮煮吃了。我就这样在金坛住了下来，拣一些门板木条把棚子搭牢，搭大一些，空下来就进城去扒瓦砾堆。只要扒到一些稍微象样的东西，什么坛子、罐子啦，什么花瓶、杯碗啦，我都拾了带回自

己的棚子里。有一次运气不错，挖到一个陶罐，里面装着大半罐大麦面，抱回棚子里，每天抓一把面粉，和一点野菜，放水煮成糊糊，用以果腹。有时到乡下还可以挖到一些胡萝卜之类的东西，掺和着吃。总算熬过了这个酷寒的冬天。

“春天来了，大地回暖。我找来一些菜籽，种了点菜。到麦子成熟时，又到荒芜的田野里去，找那些零零星星的麦穗，积少成多，也收到两斗多麦子。我又找来一些农具，开始种地，打定主意在这块城墙附近的土地上生活下去。我就这样苦挣苦度，生活开始一天天好转。”

祖父舒了口气。

烟筒里的黄烟早就灭了。他又轻轻地磕去烟灰，自己装上烟丝，点了抽着，继续往下讲。

“随着岁月的推移，兵荒马乱的日子过去了。有少数百姓陆续回来，带回来一些种籽。那时我已经开垦了两亩多地，种麦、种稻。

“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我十八岁时，把家搬进城里，用人家遗留的破框残门椽柱等木料盖了一间房子。那年月，苏北逃荒到江南的人很多。一批一批地来到金坛。我看到城里空空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土地荒着，没有人种，就把荒芜无主的土地圈了十几亩，把原有的田埂扒掉，使旧主人回来，认不清哪里是他的地，而把这些地租给苏北来的灾民耕种。那时最难的是农具、种籽。我把这些问题也慢慢地逐步给他们解决了。

“我年龄大了，孤单地打光棍过日子终不是长久之计，盘算着，想找一个老婆。凑巧有一次，从苏北逃荒来的一个老太婆，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到我门口要饭，看我这样一个棒小伙子单身住着，就说：‘小官，我把女儿给你，你只要给我半升米或麦子就行了。’我看那姑娘长得还不错，就应允了，从此成了家。

“洋人帮助清军打‘长毛’，天朝内部又发生了大变乱，自相残

杀，结果垮台了。‘长毛’的失败，洋鬼子起了很大作用。洋鬼子使用象烧火棍似的家伙（洋枪），两三里路以外放銃就可以杀人。‘长毛’使的长矛大刀要碰到头才能杀洋人，法术差远哩，能不吃亏吗！洋人打到无锡一带，又汇合鞑子<sup>①</sup>一起向‘长毛’进攻，把常州、丹阳、镇江一带都占领了。‘长毛’杀戮惨重，丧失人心，老天爷要它灭了！”

我当时还年幼无知，听着这些话，觉得有点新奇有趣。后来，参加了革命，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这一客观规律，历史上早就存在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只要人民的革命斗争起来了，帝国主义者为其本身的利益，毫不犹豫地就要帮助封建势力镇压中国革命；同时，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也必然会倒向帝国主义者。当然，太平天国的失败，除了这一因素以外，更由于它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政策混乱，以及后期领袖人物权力争夺而互相猜忌，发展到相互火并，军队纪律废弛，滥杀无辜，激起民怨等，乃致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

我祖父讲那一番话，主要是想告诉儿孙们，他创立这份家业之艰辛，而我所感兴趣的却是他怎么把这个家发起来的。我趁着守岁，不能睡觉，好奇地问我父亲。

父亲告诉我：祖父成家以后，搞了些无主的土地，分租给佃户耕种，收租。粮多钱多，就添置农具，盖草房，给苏北来的灾民居住，收了粮食对半分。那时土地非常肥沃，每亩可收五、六百斤。祖父田多，收租所得，为数相当可观。战乱以后，恢复生产，缺乏耕牛，他觉得做耕牛生意有利可图，就雇可靠的人到高淳、郎溪、广德一带山区去贩牛。一条牛三、四十块龙洋，到了金坛就可以卖到

---

<sup>①</sup> 当时老百姓称呼清军为“鞑子”。

一百多块，几倍的利。贩牛赚钱很快，家产也就很快发了起来。祖父的钱财积攒多了，又买田、盖房、开米行。他先后开了两爿大米行，并把收租所得的粮食和从四乡农民家收购的粮食，运到常州、无锡去出售，每石也可赚块把钱。就这样，几年间，他就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新地主。他拥有田产八、九百亩。佃户七十多家，其住房、土地、农具、耕牛均是我祖父所赏给，实际上，他们成了依附于我家的农奴！城里街面上的房子也越盖越多，共有一百多间，除用作住房、仓库等等外，还有专门歇轿子的地方。当时，金坛城里，于、管、王、潘等几家著名的大财主中，我祖父是很显赫的一个，人称“管半城”。

那次除夕守岁的夜谈，留给我很深的印象。祖父在攫取资财方面是相当贪婪的。幼年时我常在牛行里玩耍。牛行里每天有一、二十个牛贩子住宿，每天连牛要收几块钱的膳宿费用。牛卖掉后又需缴纳佣金。买卖双方成交时，祖父叫小孩牵牛，由卖主手上牵到买主手上，几步路，过一下手，也要收三、五角钱，名曰“牛绳钱”。每天傍晚，牛贩子都来向祖父交钱，他的八仙桌上尽是擦擦银元，一天总有几百块。

每年庄稼成熟时，祖父就下乡去勘验收成情况。收租时，院子里百十来人，肩扛、担挑，熙熙攘攘，祖父把关甚严，潮的、不干净的粮食都不收。我和弟弟从小生活在农村，常看到农民终年辛辛苦苦，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原来他们的血汗都流进了东家的大仓库里。当时我还不懂得“剥削”的含义。中国这个几千年的封建国家，它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性质不易改变。农民起来了，一部份地主被消灭，但新的地主又产生了。这样周而复始，朝代更迭，土地易主，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所以拖得很长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在我的印象中，祖父是一个很凶的人。他反对“长毛”，更欺压

穷人；反对我们读书。他常常责备我父亲：“小孩上什么学！十只黄猫九只公，十个秀才九个穷！读了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有什么出息？”他非常固执，动辄骂人。讲话时，别人如插嘴，他就两眼一瞪，举起长烟筒打头，一打一个包。我和弟弟文彬总离他远远的，心里非常恨他。

我祖父的前妻生育四男二女。前妻死后，续了弦，又生一男。他成了金坛有名的大地主后，家业越来越大，就命我父亲回到丹阳倪山，把老家原有的土地和宅基恢复起来。他自己和四个儿子仍住在金坛，只是逢年过节，有时返回故里逗留一段时日。

我父亲虽然知书识字，却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图安逸，好享乐，每天早上跑十二里路到访仙桥，茶馆里一坐，从朝到晚吃吃玩玩，打打麻将。我母亲是个农民家的女儿，很勤俭，又很精明。我家在倪山原先只有三间屋，后来砌成了四进，共十几间，也都是剥削来的。我哥哥读书读到十七、八岁。那时科举已经废除，他就在家务农。家里的田地发展到六、七十亩。

我五岁开始上私塾念书。每天天不亮，总是由雇工老王把我背到东头的刘家祠堂。那祠堂两进六间。请了一位塾师，一共十几个学生，两个年龄大的已经十八、九岁。老师有两张桌子，一张作书案，一张用以会客。会客的那张桌子上，供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字。辛亥革命后两三年光景，塾师又把这五个字改成了“天地国亲师”。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念“四书”“五经”，学写八股文；我年纪小，刚进学，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

私塾老师是位满脑子封建思想的人。他每天都唠叨什么“孝”呀、“悌”呀，什么“礼、义、廉、耻”呀，我什么也不懂。他为人也极凶，手握一根一尺半长的戒尺，学生背不出书，就用戒尺打手心；说话不听，就拧耳朵。学生恨透了他，就暗地里毁坏私塾里的东西以

泄忿。有些年岁稍长的学生，常常恶作剧，冬天把他的夜壶底弄裂，夏天又在他的夜壶里放只青蛙，弄出许多笑话。

我年纪很小，每天天不亮就被从热烘烘的被窝里拽起来，由雇工背我去上学。到了私塾，坐在课桌前，还看不清书本，有时就睡着了，常受风寒。老师每隔十天左右要上一次街。老师不在私塾，我们就象雀子出了笼，快活极了。秋天，常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到山脚边去挖山芋。生了病，我父母把我送到孟河就医。孟河这地方，南宋名将韩世忠曾筑城于此，带兵驻守过。孟河的中医是比较出名的，“孟河派”是中医中相当有影响的医派。给我治病的医生姓马。他家由于医术高明而求医者众多，门庭若市，有百万家产，人称“马百万”。我的病经他诊治，果然药到病除，痊愈了。我家那一带林木很多，经常有狼出没，尤其到了深秋，更不安全。父母不想再让我蹲在乡下念书。那时丹阳县城里已经办起了“洋学堂”，有两三所完全小学，我要求到丹阳城里去上学。父母没有同意，因为食宿均成问题。结果是送我去金坛家里，上一所七年制的小学。

金坛这个家，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家业大，人口多。厅堂上高悬着“五世同堂”、“德劭高照”等几块大匾。几房叔叔，妻儿成群，合起来共有几十口子。颓败的大家族里，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现象层出不穷，非常厉害。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就成天搬弄口舌，招惹是非，家里一天总有三、四起争吵打架。大家庭中有小家庭，各自只顾经营自己的小家。偷东西，闹分家，自私自利，你争我夺，无非是为了那点财产。老头子在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常发脾气说：“我放把火，把个家一烧了事，看你们还分不分！”我在金坛上学的两三年间，几乎每天都听到骂娘声，没有一天安宁过。对这样一个乌烟瘴气的封建家庭，真是恨透了，心想我将来非把这个家拆毁不可！

我父亲每月到金坛城里来一次，一方面办点事，另一方面也是看望看望我们。我实在看不惯这个腐朽的家庭，总跟父亲吵着要回丹阳。

我祖父千方百计总想维护这个封建大家庭的秩序，然而事实上却维持不住。有一次祖父不知为了什么跟他的二房儿媳争吵起来，他被媳妇用力一推，背后正好是个高门槛，绊跌了一大跤。这一跤把祖父活活跌死了。祖父一死，我在这个家里更蹲不下去了。当时，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反封建，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封建大家庭的腐朽颓败是有切肤之感的。我再也不肯住在金坛了，就带了弟弟回到丹阳县城。寄宿在学校里，与康年、魏雅芳等几位同学合伙请了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替我们买菜烧饭，每月给他两块银洋。一年后，发现他克扣我们的伙食，烧好饭菜，他尽拣好的先吃，剩下差的留给我们。我们把他辞掉，改为吃学校食堂，每月三元二角。我父亲请一位我家乡的林科书<sup>①</sup>照应我。

我祖父死后，几房兄弟分了家。各家都分到百多亩地，我父亲也分到一百多亩地。

一个大地主家，一分，又变成了五个中等地主。过去每个封建家族，都有自己的祠堂和“族谱”。我们管家祠堂在丹阳县管山村，离倪山村七、八里路。每逢春分和冬至，同族的男性就要到祠堂去聚餐，我也去吃过。女性是没有资格上祠堂去的。祠堂有自己的地产，由族长收租，名为“堂中”，归祠堂公用，实为族长独占，别人管不着。族长一般是族中辈份最大的有影响人物，权力很大，出来时拿着烟筒，踱着方步，威严得很。晚辈见了都要侧身而立，恭谨行礼，有的还要跪下磕头。当时的封建宗法统治非常厉害。

---

<sup>①</sup> 科书，当时管收钱粮的人。县下设图（相当于后来的区或乡），每个图都由县里委派科书，专管征收图里的钱粮，不发薪金，而在田亩税里附加若干，充作科书的薪金。每年科书将钱粮收起后，到县里统一缴纳。

我曾经翻阅过我们姓管的这一族的“族谱”。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老祖宗是春秋时代的管仲。族谱上还满本记载着我们这一家族中出了多少忠臣、孝子、烈女，出了多少进士、举人、秀才等等。从族谱中可以窥见封建家族的历来的重大变化。这些实际上完全是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我亲眼看到一个媳妇被指控为忤逆婆婆，开了祠堂门，被拖进去打屁股。棍棒齐下，爬都爬不起来。还有一次，一个男的由于骂了父母，也被痛打。如果族中有人为“匪”，则更是大不孝，吊死、打死，谁也不能去过问。

我在乡村还经常看到械斗，这一族与那一族都动员到几千之众。政府视若无睹，不闻不问。打死了人，就算活该。

乡间的土豪劣绅在地方上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最凶的往往是这样两种人：一种是恶霸地主，重利盘剥，敲榨勒索，鱼肉百姓，横行乡间；另一种是劣绅而兼讼棍，这种人有权有势，与官府衙门里的人勾结，挑拨是非，兴风作浪，从中渔利。我在家乡看到几个讼棍，其中有一个叫吴本泉的劣绅，在丹阳东北乡很有势力，农民间的纠纷非找他不行。不管上头政局如何动荡，如何改朝换代，他在下面统治一方，一般都稳当笃定的。

有一次，我庄上有两家姓秦的为墙脚发生了争执。甲家说乙家侵占了他家五寸地，乙家不让，先发生争吵，接着动起手来。我父亲在村里有点威信，开始姓秦的两家都来找我父亲评理。我父亲向来就是不管闲事的和事佬，不管谁有理谁无理，总是采取劝说调解态度。他劝两家互谅互让，不要惹出大祸。简单说了几句就打发他们走了。两家互相不服气，回去继续争打，村人劝也无用。这时吴本泉的一个走狗叫秦富春，有意从中挑拨是非。他对甲家说：“那地本来就是你家的，你有理！”怂恿其到吴本泉那里评理。甲家仗着有秦富春撑腰，气势更凶，又找乙家打了起来，甲把乙的一个儿子打得头破血流。秦富春又悄悄到乙家去，趁他家火气头上，又



唆使其发帖子，到访仙桥茶馆里，请吴本泉主持评理。乙家总共发了几十张帖子，我父亲也收到一张红帖子。评理的那天，访仙桥茶馆里到了七、八十人。张三帮甲家说话，李四帮乙家说话，骨子里都是煽动两家打官司，他们可以有吃有喝。喝了半天茶，没有结果。吴大人阴险毒辣，表面上劝两家消口气，谁是谁非，以后再说。我父亲一言未发。按照惯例，评理的结果，谁家输了，所有的茶钱由谁付。七、八十人的茶钱为数虽有限，但理输的人回去将遭人非议。第二天两家都私下请这位吴大人到馆子吃饭。宴请之后，吴本泉还是不判定谁是谁非。接着，两家又分别请他到大烟馆抽鸦片。这就是所谓茶馆、饭馆、烟馆缺一不可。茶、酒、烟之外，还得送礼，一般要二、三十块现大洋。两家都花钱、送钱。他看哪家花钱、送钱多，就帮那家说话。钱多就理足，钱少就理亏。被侵占土地的那家本来就不富裕，没有多少钱可以孝敬这位吴大人，只好卖地。三番两次，五六亩地卖得精光，房屋也典给别人，最后还是输了。无处栖身，只好住在西头的秦家祠堂里，无法生活下去，老婆上吊自尽了，男的只好带着小孩外出去讨饭。

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很不服气，对父亲说：“你不能说说公道话吗？”父亲说：“你小孩子懂什么！这些事你能问得吗！”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家乡每年总要发生几起。我看不惯，忍不住！我父亲每每告诫我们“能忍自安”。还讲了个故事，说从前有个人在外做官，邻居砌墙占了他家的地，家里写信要他回来说理，他回信说：“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这家人家能宽容、积德，后来发了起来；而占他家地的那家却没有好结果。我听了很不高兴，我恨这社会黑暗到如此程度，没有一点道理可讲。

压在我心头的重负，还有帝国主义的魔影。一九一九年发生五四运动，学校里几位思想进步的老师，向我们进行爱国教育。

有位叫谭醒吾的老师，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向我们讲：“日本

帝国主义要蚕食我们祖国，许多地方被他们侵占了！如今又要签订‘二十一条’，想再霸占我们的青岛、济南……朝鲜的老百姓做了亡国奴，七家人家合用一把菜刀。菜刀锁在井边，每天限定时间大家轮流使用，旁边站着一个人日本兵监视。晚上查夜，打人抓人。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决不能做亡国奴！反对日本人侵占我国领土，反对‘二十一条’！”

谭老师讲得激愤时声泪俱下，我们这些学生大多哭了。

我们做了许多小旗，旗上写着“废除‘二十一条’”，“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等等，由老师带队，上街游行示威。从南门到北门，老师不懂喊口号，大家默默地进行着，围观的群众也都义愤填膺。

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深极了。我看着地图想，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为什么会被一个小国欺侮？日本国为什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欺侮我们？我苦苦思索，自己得不到解答。

有一次我去镇江。我爱眺望那浩浩荡荡奔流不息的长江。我沿着江边走，到了英租界地段，英国的海军荷枪实弹地站着，不准我进入。我心中非常愤慨。为什么我们中国土地上却不准我们中国人自由来往？愤恨象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我心头。

我在丹阳县城里住了两年。那时我倪山的家里还有兄弟四、五个人。我的大哥和一个弟弟已先后结婚。婆媳之间也是三头两天争吵打架。我父亲又走上我祖父的老路，家庭人多嘴杂，播弄是非，不得安宁，我打听金坛的几个叔叔家庭情况，也是自私争夺，吵闹不休。我心里烦透了，也恨透了，决定少回家，而丹阳学校里，同学师生之间，相处觉得温暖。老师夏霖、钱正表等，思想很进步。我存有一些不理解的问题，向他们请教，他们都肯告诉给我听。

他们对我讲租界的由来，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们说，“中国的租界是清政府出卖给外国的。”“象这样的租界多得很罗！上海、南京、天津、北京、九江、汉口、九龙、……那些地方都有，数都数

不过来。外国人在各地租界里简直不把中国人当人！他们犯了罪，我国政府不能干涉，就是打死了中国人，我们也没有一点办法……”夏霖、钱正表等老师还常给我们讲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中法战争、甲午之战……，讲五口通商、关税条约、治外法权……等等。中国处于灭亡的边缘。

“英国在欧洲，也是几个小岛，离我们那么遥远。我们祖国幅员如此广大，拥有四万万同胞，为什么老是受他们欺侮呢？”问题萦回在心里，一时理解不透，找不到答案。然而，如此家庭，如此社会，我深深感到它的黑暗和腐败，内心的厌恶和积愤，终于发展成强烈的反抗。这样的家庭非拆散不可！这样的社会非彻底改造不可！拯救祖国的思想，开始在我心里孕育、激荡、萌发了。

## 2. 从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不久，我离开丹阳，到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求学。那时，不少著名的学者如钱穆、钱基博、顾卓之等先生均在该校执教。这是许多青年非常向往的地方。学校里的各种教学设施都比较齐备，大礼堂、图书馆、实验室、风雨操场等等，当时在这一带堪称是第一流的。校内的学习空气很浓，课程很重，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

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大罢工。这在我们青年学生思想上也引起很大的震动。

这次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起来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高度的革命坚决性、彻底性和组织纪律性。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在汉口、长辛店、郑州、信阳、广水、驻马店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的消息传来，我们气愤极了。林祥谦、施洋等英勇斗争和自我牺牲的动人事迹，又

大大激励了全国青年。我们不少同学思想上是激动的，认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大敌。

这几年，我渐渐意识到要救国救民就必须起来斗争，就必须要有实际行动。然而，这个国家怎样救法？有志于救国救民的青年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究竟应该从何着手做起呢？这一连串的问题，我思想上还是朦朦胧胧的。一个人要摸索一条生活道路、革命道路，可实在难呵！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也是这样。各种各样的报纸上，提出五花八门的主张。其实说说空话容易，真正做起来就难了。这些主张，经过实践都成了泡影。如今工人阶级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为我们展现了崭新的希望。

在工人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这年三、四月间，江苏学界掀起了主张对日本拒绝交还旅顺、大连进行强烈抗议的群众运动。首先是南京中等以上学校集会，讨论关于撤销“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等问题。接着，苏州、嘉定、常州、无锡、镇江、徐州、丹阳等地的学生都纷纷行动起来了。朱季恂、侯绍裘<sup>①</sup>等在松江到处发表爱国讲演。南京成立了国民对日外交大会。工、商、学各界代表找江苏督军齐燮元、省长韩国钧<sup>②</sup>请愿，要求他们打电报给北京的政府反映民意。其实这个政府和各省的军阀没有一个不与帝国主义勾结的，请愿和通电之类明知其无用，但对动员、教育群众是极好的办法。江苏各地群众均示威游行，并提出要求抵制日货，禁止将谷米运往日本，对日实行经济绝交。上海一家很

---

<sup>①</sup> 侯绍裘(1896—1927)，江苏松江人(现属上海)，五四运动活动分子，一九二〇年主编《?周刊》(即问题周刊)，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并主编《松江评论》。一九二五年八月当选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委会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十月任中共上海区委驻国民党党团江苏书记。积极参加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事变时，为国民党右派杀害于南京。

<sup>②</sup> 韩国钧(1857—1942)，江苏泰州人，二十年代曾任江苏省省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民族气节，与新四军合作抗日，受日寇迫害，不屈而死。

有影响的报纸——《申报》，连续报道了这些消息。在我们无锡，省立第三师范、辅仁中学、实业中学、县立女师、济阳女校等四十多所学校的学生都上了街，沿途讲演，分发传单，群情激愤。

那些天，我也不分昼夜地奔走呼号，不知疲倦地到处活动。实际斗争锻炼了青年一代，提高了青年对卖国政府的认识。靠这个腐败政府和各省军阀是救不了国的，只有全国人民起来打倒军阀，中国才有希望。然而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掀起之后，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当时，我们心里还没有底。

一九二四年初，《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开始陆续报道广东方面的消息。《孙文越飞宣言》、“国共两党实行合作”、“追悼世界革命伟人列宁”等等，都先后一一见诸报端。我贪婪地阅读着这方面的每一条新闻，认真地思索着，并常常与几位志气相投的同学热烈地议论着。我们依稀看到了前进道路上的一线光明，感觉到东方地平线上一轮旭日正在升起，它将驱散那盘踞在中国大地上的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变黑暗的中国为光明的中国。我们这些青年对此寄予很大的希望。

暑假，我回到老家，和父亲谈起广东革命政府的事情，无形中我父亲说到了苏俄的“劳农政府”。这消息他是从访仙桥的茶馆里听来的。乡间茶馆里谈天说地什么都有。真的，假的，流言蜚语，无所不有。父亲的消息似是而非，但讲得很认真，因为他觉得这与他有些利害关系。我父亲告诉我说：“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苏俄的劳农就造反了。他们打倒了皇帝，又打倒了地主。土地也分掉了，成立了劳农政府。劳农党坐天下了！”说时略现愁容。

我听到这消息，心情正与我父亲相反，很兴奋，连忙问：“这消息确实吗？”

父亲回答说：“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劳农不识字，没有知识，又怎么能坐天下呢？还不是和‘长毛’一样，恐怕长不

了。”

我父亲并不真正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和意义，更不会赞扬和拥护这样的革命，他不过当作一件“新闻”随口说说罢了，但却给了我启示。我想，象吴本泉这样一类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如此欺压农民，农民非起来推翻他们不可！俄国成立劳农政府这件事，宛若在我心头点亮了一盏明灯。俄国的劳农能够这样干，我们中国的劳农不也可以这样干吗？我早就恨透了封建家庭、家族，恨透了那些横行乡间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恨透了那些霸占我国领土、欺凌同胞的洋人，以及那些为洋人作伥的军阀！如今，从报纸上，从茶馆里，传来了这些令人振奋的消息，我想这是一条很好的道路。全国工人、农民一起来，势必可以把那些肮脏东西一扫而光。

秋季开学，我又回到学校。九月，作为江苏督军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为夺取盘踞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控制下的上海，而挑起了战争。导火线是双方争夺上海鸦片烟土进口保险费，分赃不匀，构成仇隙。齐燮元派驻淞沪的警察厅长徐国良，被卢永祥手下的人狙击毙命。继任厅长申振纲又被拒绝上任。旧怨新仇，一时并作，遂掀起这场战乱。双方的军队在嘉定黄渡、太仓浏河一带相持。后因在福建的直系军阀孙传芳率兵入浙，浙江警务处处长夏超等为内应，形势急转直下，齐燮元获胜，卢永祥被逼下台，而告结束。这在历史上称之为江浙战争或齐卢之战。

在齐卢之战进行过程中，齐燮元的军队突然侵占了我们全部校舍。那时我们刚回校上课不久，齐燮元部下的一个师长马玉仁，耀武扬威地带了副官、护兵等一群人闯进我们学校，什么原因都不说，就勒令我们全校师生员工在三天内统统搬走，把学校的房子全部让给他驻扎部队。如到期还有人未走，就派兵来赶！真是蛮横粗暴到极点！我们师生员工无不气忿，但事情来得这样突然，一时

都想不出对付的好办法。马玉仁是个有名的土匪头子，骄横残暴，无法无天，跟这样的家伙说理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等这伙盛气凌人的暴徒走后，校长就召集全体教师开会，决定第二天就疏散，撤离学校，以免学生与军队发生冲突。

学校的决定公布了。同学们虽然愤愤不平，但也束手无策，只好纷纷收拾东西回家。我也整理好自己的东西，拎了箱子走了。哪知道兵荒马乱之际，火车、汽车、轮船均已中断。没有办法，只好离校步行回家。起早上路，一直走到中午，手里拎的箱子越来越沉重。刚到洛社附近，我遇到了齐燮元部下的几个兵痞。他们看到我手里拎着的皮箱，以为一定有值钱的东西，就把我截住了。他们把我全身搜查后，说我是“奸细”，抢走了我的皮箱。我的衣服、路费都在这箱子里，全部被抢走了。

我不敢再在洛社逗留，继续赶路，走了三、四里路，向农家要了一点东西吃吃，又往前走。天黑了，向人家借宿。老百姓看我是个学生，留我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上路，到达常州已近黄昏。找亲戚，没有找到，宿在人家屋檐下。第三天，走到新闸，又遇到齐燮元部下的几个兵痞，又是搜身。他们见我囊橐空空，有点失望。我们那时的学生制服是呢子的，还值一点钱，兵痞就把我上身的呢制服剥走了。一路上，我还不断看到兵痞们抢掠老百姓的东西，捉鸡、牵牛、打人……，我恨极了，心想，这些野兽们的暴行，何时了结。

过了奔牛，再向北走就比较安宁了，路上不再见到散兵游勇。到了孟河，离家还有十几里路，实在疲惫不堪，一步也怕走了，就决定在孟河休息。那里有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姓丁，留我住了一夜。第四天才到家。路上走了四天，双脚都打起了血泡，真是狼狈极了。这段经历留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我恨军阀！要想救国而不建立自己的军队，是打不倒军阀的，想当军事家的志愿，开始在我思想上萌芽了。

我回家后，母亲产生了一种想法：“兵荒马乱的时代，还是安安逸逸蹲在家里好，不要再去上学了。”她劝我在家种种田地，娶个媳妇，安稳地在家生活，想把我拴在家里，象我大哥一样。母亲的想  
法，我坚决反对。金坛那个家的种种丑态又呈现在我脑际。我决  
不走祖父生前那样的老路，靠别人的血汗来养肥自己。要有自己的  
志向，走自己的路。

这个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就这样，天天和母亲吵嘴。母亲要父  
亲劝我，父亲不想多事。老两口也在家里常常“嘀嘀咕咕”发生口  
角。我下定了决心，离开这个家。我对母亲说：“只要学校通知一  
来，我还是要上学去的！”这件事就这样被搁置起来了。

齐卢之战结束后，十月初，我在《东方杂志》上看到上海苏俄领  
事署在旧领事馆举行升旗仪式的消息。杂志上还刊载了缀有镰刀  
斧头和五角星旗帜图样。我第一次看到苏俄的旗帜，觉得非常新  
鲜。同时，杂志上还发表了孙中山到达上海等新闻。许多新事物  
吸引着我。我在家里实在蹲不下去了，于是我又回到学校。

国共合作的革命形势一天天发展，我的思想也受其影响而越  
来越向前变化。

### 3. 恽代英、董亦湘引导我走向革命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的一天上午，第二堂课后休息时，我的要  
好同学黄祥宾悄悄地把我拉到操场的一角。

他望望四周，见没有旁人，略带点神秘的神色对我说：“上海来  
了个革命同志，是秘密来的，你想不想见见他？”

“谁？”

“姓恽的，国民党！”

那个时候，“国民党”三字在进步青年中好象就意味着“革命”，



有很大的魅力。我听了喜出望外地说：“真的？那我一定要去见见他。”

“好，下午上完课，我带你到他那儿去。你先别声张出去。”

黄祥宾，常州人，和我都是三师学生会的执行委员。我是副会长。我们两人由于志气相投，观点一致，平素相当亲近。不过，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已经是共产党员。

下午，一下课，我和黄祥宾就匆匆出了校门，在学前街叫了两部黄包车。黄祥宾向拉车工人讲了个地点，我们乘车到惠通桥附近停下了。下了车，黄祥宾带我进了惠通旅社。他很熟门熟路，领着我径直上楼，走到一间靠街面的客房门口，轻轻扣了几下门。

门开了，出现一位书生模样的人，光头，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脸颊瘦削，一身青布长衫，一双破旧的黑皮鞋上打了个大补丁。我想，这双皮鞋也许是从哪个地摊上拣来的吧。他见是我们，脸上露出了真诚的笑容，先和黄祥宾握了握手。

黄祥宾向他介绍说：“这位就是管文蔚。”

他连忙跨前半步，主动拉起我的手，热情地摇晃了几下，说：“我早就听说了，你们这里的活动开展得很好。”

我原听黄祥宾告诉我，恽先生是常州人，但是听他一出口的口音，却是汉口一带的湖北官话。

他热情地把我们让进房间，眉宇间洋溢着一种兴奋的神采。

房间里，窗明几净，内侧设着一张床，靠墙放着一张八仙桌，几把椅子。我们三人正好一人一面，围着八仙桌坐了下来。

他就是恽代英同志。这次到无锡来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大学教授，实际上却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宣传部负责人，还担任着社会主义青年团团中央的宣传部长和《中国青年》杂志的主编。

恽代英对黄祥宾说：“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对齐卢之战有什么看法？”

黄祥宾回答说：“恨透了！老师、同学、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恨的！”

恽代英又问：“有什么表示没有？你们学生会没有开会反对？”

“事情来得太突然，仓猝间，思想没有准备，校方又怕我们学生与军队发生冲突，决定很快疏散，我们来不及开会反对。”

恽代英略略思考了一下，脸转向我说：“你的想法呢？管文蔚同志。”

“我是坚决反对的！”我听他称我为“同志”，感到很新鲜，又很亲切，就详细地讲述了我回家路上的所见、所闻、所受、所感。

恽代英认真地听着，最后感叹地说：“中国就是给这些土匪式的军阀搞糟了。”

他停顿了片刻，说：“我们这个国家正处在半沦亡的状态！列强肆意侵略，军阀连年混战，受苦受难的是老百姓！对于这伙军阀，我们不抱任何希望。只有全国的老百姓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除尽军阀，中国才能得救，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恽代英跟我们谈到了“帝国主义”，可我还不不懂什么叫帝国主义，两眼望着他。他就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等说起，讲了英国、日本等统治阶级，杀戮我们多少人，割去我们多少领土，索取了我们多少“赔款”，又怎样控制我们的关税，掠夺我们的资源，怎样策动军阀混战……大量事实，一件件，一桩桩，讲得有根有据，头头是道。我已有不少感性知识，听起来感到十分亲切。

“中国只有千百万民众起来，尤其是我们青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才能有希望！”他讲话时非常激动，又十分深刻生动，深深感染了我。

“我们现在有了孙中山、陈独秀等先生领导我们。在广东已经有了我们的新政府。”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说，“我们已和苏俄结成朋友。列宁宣布废除了沙俄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先生提

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俄国革命的成功，就是发动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士兵起来，推翻了沙皇的统治，才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我们也要起来，建立这样的理想社会。我们有苏俄的支持，我们把工人、农民、士兵统统发动起来，是一定能把军阀打倒的，是一定能够把帝国主义赶走的，一定的！”

我当时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实感。然而，我还不了解革命起来以后，对象我家那样的地主，对吴本泉那样的恶霸讼棍，将会怎样处置。我介绍了一些我家乡的情况，并提出问题说：“恽先生，军阀打倒了，我们乡下还有那样的大地主，还有那样的恶霸讼棍，怎么办呢？”

“这是全国到处都类似的！有些地方的恶霸地主劣绅讼棍比你那里更凶恶！”他又耐心地给我讲了无锡的秦家、孙家、钱家那几家大地主的情况，讲了常州天宁寺占有几万亩良田、上千佃户的情况，接着又说，“这些大地主不打倒，劳苦大众就不可能过好日子。孙中山先生有个办法，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平均地权！”

恽代英所讲的事情，阐述的道理，有不少为我闻所未闻，听了受到很大很深的启发和教益，我看到了自己前进的道路，非常兴奋，谈着，谈着，不知不觉两三个小时过去了。

时近黄昏，恽代英留黄祥宾和我在他房里吃了晚饭。当时学校有请名人讲演的传统。吃晚饭时，我与黄祥宾商量，准备邀请恽先生到学校去讲演。于是我们用学生会的名义向恽代英提出邀请，他考虑了一下，同意去讲。

我和黄祥宾回到学校，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我们俩分头到几个宿舍把学生会的其他执委找来，商量邀请恽代英教授讲演的事情。其中，朱士能的思想也非常激进，平时和我、黄祥宾都很志趣相投。他听黄祥宾一说，当然积极赞成。学生会会长姓潘，一脸大麻子，国民党员，这个人后来是很坏的。他听说恽代英是国民党

上海执行部的重要人物，也很赞成。当时，国民党在一般人心目中颇有好感。军阀、地主、资本家把国民党、共产党都称为“赤色分子”、“过激分子”，但群众是很尊敬他们的。我们学生会的几个执委研究结果，一致同意次日下午二时请恽代英来校讲演。

次日一清早，我们就在校务处的布告板上贴出了一张非常醒目的通知，并且和老师协商后把当天下午的课也停了。同学们看到通知，知道有上海大学的教授来校演讲，非常兴奋，尽管大部分同学还从未听到过这位“名人”的大名。

午饭后，礼堂的布置等工作一切就绪。一点半钟，我们几个就到校门口去迎候。

恽代英来了，还是昨天那副打扮，只是戴上了一顶旧礼帽。他下了黄包车，和我们几个一一握手，我与黄祥宾向他作了简单介绍，大家就热情地将他引到学校的大礼堂。

大礼堂里，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我们到了讲台前，我看到校长和一些守旧派的老师也都来了。潘、黄两人就向恽代英教授一一作了介绍。

我说：“这位就是上海大学教授，恽先生。”

“欢迎，欢迎，请多多指教。”校长虽然也未闻其名，然而听说是上海大学教授，对他也很敬重。

恽代英与几位教师也略略寒暄了几句。我们就请他上讲台就坐。陪同恽代英坐在台上的有姓潘的会长和我。另外我们还请了两位同学作记录，他俩坐在主席台的一侧。

恽代英讲演之前，由我代表学生会致了极简略的几句欢迎词，同学们鼓掌欢迎，都很起劲。不过，恽代英年龄不大，衣着极朴素，这样二十多岁的教授又没有一点名士架子，有人感到有点奇怪。

在热烈的掌声中，恽代英站了起来，开始讲演。他很善于辞令，一开始就恭维了学校，说：“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是非常有名的学

校，群贤咸集，英才辈出，做了很多工作，成绩卓著，校誉斐然”。这番话说得校长教师们心里热乎乎的，说不出的高兴。

接着，他就从齐卢之战说起，历数军阀混战给江浙两省带来的灾难：交通停顿，校舍被强占，商界有生意不能做，学生被耽误了大好的光阴，老百姓被敲榨勒索，抢劫，甚至有多少人无辜被杀……。他言必有据，侃侃而谈，慷慨激昂之处配合以有力的手势。他的讲演，一下子就抓住了听众的心。

他的话题转到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说现在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支离破碎，炎黄子孙备受欺凌。我们必须把全国各民族统一起来，团结起来，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去！租界、关税必须收回，铁路要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管理。

他又讲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对民族、民权、民生，作了深入浅出的具体解释。说我们一定要奋起救国，赶走外国侵略者，打倒封建军阀。这就是为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使普天下的人都有好日子过。

最后，他热切地希望学生要关心国家大事。他说，你不问它，它就要来问你。齐卢之战不是迫使大家不得不停课了吗？

他的讲演鼓动性很大。学生们常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一些守旧派的教师听了只是连连摇头。

散会后，我和黄祥宾等送恽代英回客栈。恽代英对我们说：“我今天的讲话，你们多听听老师、同学们有什么意见，以后告诉我。我们还要来做工作。”他又叮嘱我们说：“做群众工作要注意工作方法，特别是秘密工作。目前反动势力十分嚣张，要小心。现在我们人数不多，要多发展国民党员，骨干要精。你们要走出学校，到别的中学去开展工作，也可以到工厂去找年轻工人，讲讲革命道理。你们要印发《三民主义》，尽量宣传。以后我们经常派人来，带一些资料给你们。”

临分手时，恽代英对我们说：“我马上要离开这里，不留你们了。今天讲演以后，恐怕会来抓人。”

他的估计是对的。据说隔了一天之后，县公署和警察局确实到惠通旅社搜查了一次，并向我们学校查问了情况。那时恽代英早就离开无锡了。

这次请恽代英来校讲演，校方对我们的做法大为不满。校长专门召开了级主任会议，通知“以后不准这样做”！朝会时，校长还进行了训话：“国是要救的，但靠我们救国是救不了的。我们要好好读书，才能救国，出去游行示威是救不了国的！”钱穆事后也对我们说：“上海大学那个姓恽的，肯定是过激派，你们不能相信他的话。请这种人来讲演，对学校是不利的。”

我对校方和守旧派教师这种态度非常忿忿不满。

恽代英走后，随后董亦湘也来了。董曾与沈雁冰同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研究文学，有相当成就。我记得那时我们学习用的工具书《辞源》上就说他是主要的编纂者之一。他参加革命后，经常在沪宁线上苏、锡、常一带搞秘密工作。董到无锡时，通知黄祥宾、朱士能和我，叫我们到北塘一家小客栈里去见他。他给我们带来了《中国青年》、《前锋》、《向导》，还有国民党的一些宣传品。董当时还不到三十岁，稳健坚实，讲起话来也很有鼓动性。他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问题谈得很多，并向我们宣传马列主义理论。我水平很低，听了理解不深，就问他要些书看一看，他说马列主义的书，现在译本很少，大多是英文本、俄文本。他是自学英文、俄文，才读了这些书的。他说着从小皮箱中找出一本小册子，递给我说：“这本书已经翻译过来了，还比较通俗易懂，送给你吧。”我接过书来，是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 ABC》，译者是郑超麟。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介绍共产主义理论的著作。

恽代英、董亦湘介绍我参加革命，我先加入的是国民党。当时

我学校里共有了七个国民党员，其中黄祥宾、朱士能和我思想比较一致，是左派。当时学校里国民党人数不多，左派更少些。

恽代英是我党早期的杰出革命家，他的情况人们比较熟悉。董亦湘也是我党早期的著名党员，他于一九二二年由沈雁冰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二三年，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委会决定设立国民运动委员会，他与沈雁冰、林伯渠、张太雷、张国焘、杨贤江<sup>①</sup>等任委员。他为促进国共合作的迅速实现，为动员和组织江浙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曾发展张闻天、薛萼果(孙冶芳)等入党，为苏州、无锡等地的建党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我初次见到他的那一次，他是和糜文溶<sup>②</sup>一起到无锡来参加无锡各团体、学校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同来的还有刘重民<sup>③</sup>。董亦湘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表的身份作了讲演，宣传国民会议的前途。以后他还同侯绍裘、刘重民等到丹阳，在正则女校礼堂向数百民众演讲，宣传国共合作，打倒军阀统治等主张。“五卅”运动时，他和侯绍裘等密切配合，领导群众反帝斗争，并与沈雁冰、杨贤江等发起成立了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一九二五年党派他和俞秀松<sup>④</sup>等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同校学生中威

---

① 杨贤江(1895—1931)，浙江余姚人，一九二二年入党，一九二四年任中共上海地委候补委员，一九三一年秋于日本东京病逝。

② 糜文溶，一九二三年任中共上海地委委员，派往无锡开辟工作。

③ 刘重民，江苏江都人，中共党员，从事统战工作，为中共南京地委和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为国民党右派逮捕，十五日被杀害于南京。

④ 俞秀松(1899—1938)，浙江诸暨人，五四运动时领导过浙江第一师范学生运动，一九二〇年在上海参加《星期评论》社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之一。一九二一年赴苏联参加少共国际二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和浙江的建党建团工作。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做军运工作，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三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并任教。后被派往伯力，担任中国报纸《工人之路》总编辑。一九三五年被派往新疆，担任反帝总会秘书长。一九三七年被捕，次年遇害。

信很高，参加中大教务处工作，后受王明宗派集团的诬陷迫害。一九二八年瞿秋白、周恩来参加由第三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三方联合审查，推翻了王明等妄加于董亦湘等人的诬陷不实之辞。后王明等在联共清党中又散布流言，说董亦湘是“托派嫌疑分子”。联共中央监委主席亚洛斯拉夫斯基根本不信任王明等的一套，保送董亦湘进列宁学院学习并担任翻译工作。王明窃取党中央的领导权后，一九三一年秋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回到莫斯科，进一步迫害董亦湘等同志。一九三三年初，董亦湘被联共派往远东边疆地区工作。一九三七年联共进行又一次大清党，当时董亦湘任远东苏联内务部政治保卫局军事全权代表，因王明之流在斯大林面前谗言陷害，而在远东伯力被捕入狱，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含冤而死，据考查当时董亦湘在苏联的名字是奥林斯基列夫·米哈依洛维奇。

康生与王明原系一伙。董亦湘等在苏联蒙冤被捕后，康生立即炮制了一篇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的文章，公开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出版的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二十九期和三十期上，诬陷董亦湘同志为“在苏联的中国托洛斯基匪徒”。接着，苏联的《真理报》和巴黎的《救国时报》上，也发表文章随声附和，谬种流传，影响极坏。董亦湘沉冤二十余年。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由苏联远东军区军事法院复查完毕，认为董亦湘“没有罪行”，“死后亦应完全恢复声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检察院中央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司法中校巴搜金、苏联远东军区法院院长司法少将克拉夫钦柯，均为董亦湘同志家属出具证明。然而康生在那时还大权在握，董亦湘仍然被认为是“托派”，而长期未能得到昭雪。现在应该是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为董亦湘平反的时候了。董亦湘同志一生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工作积极热情，态度平易近人。早期在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觉悟，发展党



的组织，推动国共合作等方面卓有贡献。后来为维护党的正确路线在诬蔑与迫害面前坚贞不屈，坚持和王明、康生作斗争，乃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恽代英、董亦湘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对我的教育和鼓励，是我永志不忘的。

#### 4. 在五卅运动中锻炼自己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被打败，奉系军阀挟战胜之威，向东南扩张，企图实现其控制长江中下游的野心。张宗昌的部队长驱南下，直抵淞沪，逼近浙江边境。张宗昌本人盘踞上海。他手下的一个旅，旅长名叫毕庶澄，下辖三个团，驻扎在无锡至宜兴一线。毕庶澄这家伙非常残暴，对革命更为仇恨。凡抓住革命者，他不问三七二十一，就活活吊死。那时被他吊死的人很不少。尸体吊在电线杆上示众，好几天还没有人敢去收殓。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江苏省长韩国钧辞职，张作霖的秘书长郑谦出任江苏省长。奉系军阀的一文一武两员干将，给江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

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日益发展。中国共产党公开组织领导工农运动，广州沙面数千名工人反对英法帝国主义的政治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也迅猛发展。广东革命军在广州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和黄埔学生军的支持和协助下，平定了地主买办阶级的商团军发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政府，并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江苏的群众斗争也开始趋向高涨。苏州万余铣木机织工人罢工；南京下关人民抗议日本水手无辜殴伤并淹死水果商贩杨家寿的暴行；如皋数千农民反对

强征苛捐杂税举行暴动；徐州红枪会反对奉军南下，攻打徐州城；泰兴农民反对县署强征猪捐……。军警到处忙于镇压群众运动，捉襟见肘，穷于应付。毕庶澄之流见各地群众纷纷起来，其嚣张气焰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一九二四年底，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发起召开国民议会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南京学生总会很快响应，发出快电，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要求实行地方自治，确定民权，改善民生，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无锡一带，国民党的活动也逐渐由秘密转向半公开状态。我记得这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董亦湘、刘重民、糜文溶来无锡时，我们就召开了无锡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成立大会。董、糜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代表身份，刘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名义，出席了大会，并作了演讲。会议还公推杨锡类为筹备主任。由此足见形势有了较大的变化。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溘然逝世。消息传来，我们少数几个人私下先开了个小型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我们诵读了孙中山的遗嘱，并讨论了今后的工作。我对孙中山所说的中国革命“必须唤起民众”的观点很赞成，但是如何唤起民众呢？始终找不到一条路。光有口号，没有措施，还是一句空话。当时我不懂得社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等实际情况，因之，这个问题我就得不到明确的答案。

四月初，恽代英再次来到无锡。他这次来，已不象几个月前那样需要秘密了。张宗昌部由于军纪败坏，声名狼藉，他所带的白俄兵更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受到江苏人民强烈反对，连江浙财团及地方士绅也纷纷不满。张作霖不得不调他去担任苏鲁皖豫四省“剿匪司令”，命他由上海移驻徐州，其所节制的部队也陆续北调。军阀在江苏的统治势力更形单薄，加上非奉系的军队如陈调元、

卢永祥等所属的军队与张宗昌矛盾甚深，孙传芳部自江浙和约签订后，仍陈兵浙境，随时有进入江苏的威胁。封建军阀内部的斗争，使他们自顾不暇，大大削弱了对革命的防范与镇压。四月五日，我们在第三师范公开召开了追悼孙中山的大会，各界群众到了五千余人。恽代英以上海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在大会上讲演。他讲了孙中山的生平事迹和历史功勋，讲了三民主义的真谛和国共合作的意义。他的声音非常清晰，感情奔放，时常挥动着有力的手臂。这次演讲收效很大。

追悼大会后，我和黄祥宾、朱士能等商量，怎么把“唤起民众”变为实际行动。他们说：“我们先从宣传三民主义开始，然后再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时正好《三民主义》这本书到了。它是由孙中山的若干演讲汇辑而成的。什么叫民族主义？什么叫民权主义？什么叫民生主义？都是孙中山生前多次讲话整理出来的。我们就把这本书上的内容向群众宣讲。

当时，我的政治知识是很有限的，虽有满腔热情，却讲不出多少道理来，然而群众听了已经觉得很新鲜了。这种宣讲，确实对群众的救国思想是大大提高一步。我那时对三民主义中的一些问题还是一知半解。民族怎么独立？政府怎么民选？地权怎么平均？资本怎么节制？心里没有底。说是由国家出钱把地主的土地买下来，分给农民，而国家又从哪里来这么多钱呢？土地由谁来分呢？地主是不是肯呢？这些问题自己思想上就不清楚，讲起来也就只能干巴巴的，说不出多少生动、丰富的内容。“谁反对三民主义，就打倒谁！”口号喊得怪响亮，而切实可行的办法却不多。不过，在那个年月，就是这样的宣传，一般的群众——工人、农民、学生、小商人等等，听了也很兴奋。

当时国民党无锡县党部尚未成立，国民党的工作主要由薛萼果（孙冶芳）、周启邦（周愚人）、董星五、杨锡类等人在负责。我后来

才知道，这些人当时均已是共产党员。我通过黄祥宾从他们那里弄来了几百本《三民主义》。我就在学校的校园里摆了个摊子卖书，几天之内所有的书就被购一空。我原以为在学校里摆个书摊卖书，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哪知却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反响。

训导主任亲自把我找去谈话。他气势汹汹地指责我说：“你这是宣传‘赤化’！县政府要是知道了，我们不好办！”从此，他常常监视我们的行动。有时象耗子似的躲在外面偷听我们的谈话。回头又把我找去狠狠地训斥一番。他说：“你们这样搞法，学校是不允许的！”我外出，他也总要问：“到哪儿去了？去干什么的？”

那时，人们对国民党、共产党不大分得清楚，笼而统之，都叫“过激党”、“赤化分子”。我们校内有了十来个国民党员了，就建立了一个区分部。每周总要开一次会，研究学校里的宣传工作和准备发展哪些党员等问题。我们这个区分部的负责人是黄祥宾和那个姓潘的。他们常与杨锡类等联系，得了指示，回来就向我们传达。恽代英、董亦湘来过后，我们的活动逐步扩展到校外。第三师范是无锡的“最高学府”，我们这个区分部负责工商中学、竞志女中等六、七所学校的工作，任务比较重。

自从我们受到训导主任的多次警告后，我们不敢再在学校开会。每逢开会，往往以远足的名义，到惠山去。前后分成几批，每批两三人，陆续前往，到指定地点集中，会议大多在黄公涧一带比较僻静的地方秘密举行。决定了什么事情，我们回头就分别到各校去贯彻。

悼念孙中山的活动过后不久，就发生了上海五卅惨案。无锡素有“小上海”之称，棉纺、缫丝、面粉等近代工业发达，产业工人集中，而且离上海近，消息来得很快，一下子轰起来了。我们商量决定以第三师范为核心，动员在锡三十几所学校学生，六月二日在辅仁中学召集各校代表会议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斗争。

这一天，黄祥宾、朱士能和我等人外出联系，奔走一天。傍晚五点多钟，各校学生和教职工代表集会，商量办法。三日继续开会，成立了“沪案后援会”，下设文牍、通讯、募捐、讲演四种。下午，我们即开始分头外出讲演和募捐。七日，我们发动并组织了集会游行，三师、县女师、代用女中、实中、辅仁、马可、辅西平民学校、泰隆厂、锡社以及店员组织“五七团”等十七个公私团体，共三、四千人参加。午后一时光景，我们将人群集合在公花园多寿楼前的大草坪上，学生代表向大家报告沪案经过时，沉痛处声泪俱下，激昂处振臂高呼。群众的口号声犹如暴风骤雨来临之前的阵阵惊雷。二时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大街进发，各人手执小旗，一路上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群众同仇敌忾的情绪高涨极了。

游行示威归来，人虽疲惫，但爱国热情之火仍在心头燃烧。夜深人静还是久久不能成寐。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很多。

不久前，我曾和一批同学到上海去参观。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公共租界……东一块，西一块。我们到了大马路（现南京路）上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一带看看，那里属于公共租界。十字路口人群象潮水般涌来涌去，洋人昂首阔步，神气得很，中国人中却大多是面黄肌瘦，破衣烂衫，来去匆匆。印度阿三（英帝国主义者雇佣的印度巡捕）趾高气扬地挥舞着警棍，乱打中国人。把一位黄包车夫打倒在地，巡捕根本不当一回事，看也不看一眼，又去打别人了。我们又去法租界看看，那里的马路大多以法国殖民者的名字命名，什么霞飞路、辣斐德路等等，给人一种殖民地的强烈印象。我们来到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见到公园门口竖着一块牌子，牌上赫然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怎么华人与狗摆在一起？中国人不算人吗？乍看之下，我简直惊呆了！面对这现象，我们几个同学都痛心

落泪，攥紧了拳头，恨不得将那块牌子砸个粉碎！回校后有好多天我心里仍很不舒服。中国能这样下去吗？总得找个救国之道呀！

我又想起了恽代英、董亦湘跟我的几次谈话。他们对我讲了许多爱国、救国的道理。他们讲了一、二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之战、八国联军之役，列强强迫我国割地赔款的情况。例如甲午之战，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如此巨大的摧残，结果还要我国割地赔款。仅“赔偿”日本军费一项即达两万万两白银。八国联军一直打到北京，侵略军到处烧杀，还进入紫禁城劫掠珍宝，焚毁了圆明园和中南海的仪鸾殿，结果《辛丑条约》却要我国“赔偿”他们出兵费用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在四十年内付清，还要加上利息，本利共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银子。此外，再加上各地的地方赔款，总数达十万万两以上，并且要以海关税、盐税和常关税（内地关税）作保证。他们又讲了帝国主义伴随政治特权的取得，向我国大量资本输出，直接利用我国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攫取超额利润的情况；讲了帝国主义者怎样控制我国的铁路、航海、内河航行等交通命脉的情况；讲了如何在我国倾销商品的情况。这对我的教育太深刻了。

我在恽代英、董亦湘的指导下，也和黄祥宾等一起作了一些初步的社会调查。例如，帝国主义在我国加紧经济掠夺的情况：他们开设的银行即有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等等；他们开设的轮船公司就有旗昌、太古、怡和等等；他们控制的铁路就有港九、京浦、宁沪、芦汉等等。至于在华倾销的商品更是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如洋布、洋纱、洋巾、洋花边、洋烛、洋火、洋油、洋漆、洋铁、洋钉……什么都带个“洋”字，可见是怎样充斥了江苏的城乡，垄断了贸易市场。以煤油来说，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商美孚火油公司、德士古油公司等，总公司设在上海，下面均有庞大的分支机构和销售网。美孚油公司下设上海、南京、青岛、天津、汉口、奉天（沈阳）六

个分公司。南京分公司下又设镇江、芜湖两个支公司。美孚镇江油公司经营范围：镇江、丹阳、金坛、扬州、泰州、淮阴等二十几个县，他们又在每县设一、二家经销店。他们在镇江还拥有自己专用的码头、趸船、储油罐，设置了大班室、营业部、账务部、运输部、栈房部。当时我们所用的煤油、汽油、柴油、机器油、沥青、白腊、矿烛等无一不是外国产品。据说煤油在镇扬地区的销售额平均每年为四百十五万至四百五十七万银元。这样老百姓的钱就不断地流进了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荷包。中国怎么能不穷？怎么能不弱？

我越想越激愤！我们非把这些外国强盗赶出中国去不可！我又想到，如今中国人民反帝的怒火终于烧起来了。听黄祥宾悄悄告诉我说，这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恽代英、董亦湘这样一些为我所仰慕的同志都是共产党员。我相信我们的斗争必定会胜利，我一定要振奋起来，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我个人的力量即使很菲薄，但是千千万万的人都起来了，这力量该有多大！

反帝斗争继续深入。六月九日，由锡社安剑平主编的《血泪潮》小报出刊了，人们争相传阅。锡社是无锡的一个进步团体，由陆定一等人发起于一九二四年成立。它这时出版的《血泪潮》，宣传反帝爱国，动员民众投入五卅运动，很受群众欢迎。十日，我们沪案后援会又开会，薛萼果、秦邦宪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调查仇货与国货团，并致函无锡县商会，要求通知各业勿进英货与日货。十一日下午讨论查禁仇货问题，连当时无锡的资本家、市公所总董事钱孙卿、县商会会长王克循等也出席参加了。

我们在抵制仇货的同时，又决定赴四乡讲演。六月中旬，锡社到了石塘湾一带；我校宣传队到南方泉等地，深入农村宣传。运动很快蔓延到农村。

罢工、罢课、罢市在无锡也展开了。六月二十五日，端午节的

那天，我们在公园内召开反帝市民大会。各机关、学校均下半旗为沪汉被害同胞志哀。秦邦宪、陈叔泉、徐萼芳、朱士能等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会议通过决议，除维持工、商、学界联合会所提出的提案外，强烈要求撤回英、日的大使和领事，与英、日绝交；抵制英、日货，如继续进仇货，将来查出即充公焚毁。六月三十日，沪案发生整整一个月了。我们在无锡举行了追悼大会，到了四、五百人。那时南门外的成志女校校长陈少云、教员虞娴清等人，还发起了制作爱国扇，分售各界同胞，借以促进国人的觉醒，并以盈余支援上海的罢工工人。省议员钱基厚也以个人的名义发表通电，声援上海同胞。这说明知识界的上层代表人物也参加了反帝统一战线。在此期间，秦邦宪、陆定一等人负责的《无锡评论》也出版了。民众的舆论形成了激动人心的热潮。

七月上旬，上海《申报》等刊登消息说，上海总工会因款项缺乏，通电告急。我们无锡后援会看到这消息后，马上在县教育会楼上召开委员会，商量具体办法。秦邦宪提议一方面举行第二次募捐，支援上海总工会；另一方面将调查所获英货、日货悉数充公拍卖，卖得的钱用以救济上海失业工人。经过讨论，拍卖仇货问题获一致通过，二次募捐问题暂时保留。秦邦宪又提议，广州、香港工人为支援上海斗争举行十万人的示威大游行，英法军队向群众开枪射击，发生沙基惨案，当场打死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七十余人，轻伤无数，我们无锡后援会对此也应有所表示，结果大家的意见是发通电表示声援，并将拍卖仇货所得款项的五分之二救济香港工人。秦邦宪也是我们学校的同学，他在沪案后援会中非常活跃。第三师范的学生会主席已换成巫恒通。他比较靠拢我和黄祥宾，在援助上海工人、学生的斗争中很积极，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五卅”反帝国主义的风暴，席卷了江苏和全国各地。南京、镇江、松江、昆山、常州、苏州、徐州、扬州、南通、常熟、太仓、泰县、淮



阴等地都开展了类似的广大群众救国斗争。从全国来说，广州、杭州、汉口、天津、郑州、太原、西安、开封、兰州等许多大中城市，也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斗争，海外华侨也纷纷集会，募捐，进行声援，形成了一个空前伟大的爱国运动。当时，勾结帝国主义的段祺瑞，在这样伟大的群众反帝运动的压力下吓坏了，不得不就此事假惺惺地向帝国主义使团提出了所谓“抗议”，帝国主义见如此众多的群众起来反对，被迫同意了抚恤顾正红家属，补偿工人罢工损失、各厂酌情增加工资和不得无理开除工人等条件。

这次运动给了群众以极大教育，黄祥宾等即加入共青团，不久又转为共产党员。五卅运动给党也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有利的条件。从此党开始认识到革命的统一战线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总结并发展这方面的经验，上升到更高的理论阶段，把革命的统一战线列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这就保证了我们党逐步走上胜利的道路。可惜这次运动，农民参加很少，这主要是我们对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从而工作上也疏忽了。

五卅运动引起了形势的大变化，成了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奏。我们在那几个月中，几乎终日在外奔走。我缺课很多。当时无锡毕竟仍然处在封建军阀的淫威统治底下，封建军阀又无不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校方对我的活动颇为耽心。次年暑假即将到来，校长找我谈话，意思是我这样在外活动会影响学校和我个人的安全，他决定让我提前毕业。我同意了。

我经过五卅运动的实际锻炼，深知投身救国必须抛弃家庭，如果留恋家庭舒服的物质生活，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只有使自己堕落成社会的一个寄生虫，那是多么可耻，我决不过这种生活，坚决离开那种封建的腐败的家庭，专门去从事革命活动。

然而，离开家庭最大的问题是生活没有着落。家里由于我不顺

着他们心意，不会给我经济援助的。但不管怎样一定要离开家，万不得已时，决定去干苦力或当兵，一面混饭吃，一面干革命。我就这样离开了家，走上革命的征途。

## 5. 党旗下宣誓

五卅运动前后，省立第三师范的国民党区分部里，就有黄祥宾、朱士能等组成的一个共产党小组。他们告诉我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有区别的，要我创造条件，争取加入共产党。

我问他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在哪里？”

黄祥宾告诉我：国民党只承认中国有“大贫”、“小贫”之分，而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他还对我讲了不少资本家阶级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必然要起来斗争，最后打倒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道理。至于更深刻的一些道理，他们一时也说不清楚。

我是来自农村的，有一些切身的体会和实践经验。在无锡这几年又常到工商中学等处去活动，工人经常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虽然对这些问题尚不能提高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上认识，但对资本家与工人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后来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董亦湘从上海带来给我的几本《中国青年》杂志和《共产主义ABC》等理论著作，又在五卅运动过程中经常和工人接触，对阶级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黄祥宾他们对我讲的道理，很容易理解。

他们告诉我说，共产党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政党。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起来，把代表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推翻。

我对共产党的主张非常赞成，就问黄祥宾：“哪里有共产党？什

么样的人才能加入共产党？我很想加入这样的党。”

他笑笑，回答说：“你好好工作，稍等一下。过一段时间，共产党一定会来找你的。”

从那以后，我一直想加入共产党，黄祥宾等本来也已经考虑准备介绍我入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学校又决定让我提前毕业，此事就暂时耽搁下来。

一九二六年暑假，我离开第三师范，回到我少年时代的母校——丹阳县第二高等小学。一般人简称它为丹阳“二高”。那是一所七年制小学校。当时全县象这样的学校只有三所。“二高”的校址在丹阳西门的城隍庙内。这所学校里有几位老师思想很激进，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夏霖。

夏霖比我年长十来岁，是我的老师。他自幼就读于丹阳南堂公立小学，不久转入鸣凤书院读书，后考上在镇江的江苏省立第六中学，毕业后在陵口留墅乡三村巷东小学担任教学工作两年，又考入南京暨南大学。他大学毕业仍回丹阳，在“二高”任教并兼授正则女校的国语和英文课。他爱国，有正义感，以助人为乐，对自己要求严格，待人热情诚恳，在学校内和社会上都很有威望。

夏霖的家庭并不富裕，但他家祖上传下来一份都图。都图，是一种地亩测绘图，这家那家有多少土地，地界在什么地方等等，均详细标列在图上。如因土地发生纠纷，则以查对都图为准，判定是非。按传统惯例，持有都图的人，每年可以从土地所有者那里，收取少量的费用。夏霖家所持有的都图，包括三十几个都的土地情况，也是每年可得的一笔收入。夏霖认为这是一种封建残余，一种变相的剥削，因而力劝家里将图交出，放弃这笔不劳而获的收入，靠自食其力维持生活。夏霖心向着穷苦的劳动人民。他自筹经费在自己家里创办了识字夜校，不收学费，让穷苦的孩子上学念书。有一次为了救济穷人度过年关，他当掉了身上御寒的新棉袄。这样

的事情不少。我在丹阳“二高”上学时，常在夏霖等老师指导下，做一些青少年工作，很为夏霖老师那种不顾私利、不顾家庭而一心为民众谋利益的精神所感动。

一九二二年，夏霖就在丹阳发起组织通俗讲演团，创办了《觉悟民权报副刊》，宣传救国救民等进步思想。他家住在丹阳小东门内。他与邻居黄竞西友好。黄竞西原籍江都，父亲黄德明在丹阳开设了一月“种德堂”中药店。黄竞西于一九一七年继承父业，主持店务。他目睹当时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内心非常愤懑，常与夏霖等三、五知己商谈，寻求救国之道。一九二三年，黄竞西与上海的国民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担任了上海《民国日报》在丹阳的经销人。夏霖遂去上海加入了国民党，又被派回丹阳秘密成立县党部，组织农民协会，进行革命活动。从一九二四年起，他经常与黄竞西、钱正表、戴盆天等奔波于江阴、无锡、镇江等地，宣传革命道理，发展革命组织。这些情况我是有所了解的。我还听说，由于丹阳农民运动的迅速展开，当地封建势力对他切齿痛恨，三番五次上书诬告，并逼迫学校要他少参加社会活动，但他丝毫没有动摇。

我从夏霖老师这些所作所为以及过去对我说过的许多话推测，他可能是共产党员而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员。我之所以回丹阳“二高”，主要也就是为了想找到党的组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见到夏霖老师后，他详细地询问我在无锡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打算。我非常坦率地对他讲了我的一切。他听了很高兴，安排我在学校里住下。他说：“你不要着急，暂时住在这里。我这一向很忙，你先帮我做点社会工作。”

这时，广东国民革命军已大举北伐。直系军阀孙传芳正在集中江浙两省兵力，准备顽抗。孙传芳怕自己兵力不足，又与奉系军阀相勾结。于是，在鲁西的军阀张宗昌所部拟从徐州再度南下，以

援助孙传芳对付国民革命军。正当我回丹阳的前几天，黄竞西也从上海到了丹阳。他那时已出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商人部部长。这次是奉党的指示回来，与夏霖等一起开展揭露孙传芳的罪行，反对张宗昌军队南下的宣传运动的。他们正忙得很，因此我一到就立即参加了这一工作。我们写标语，印传单，外出宣传、联络。全县举行群众大会的那天，到的人数真不少，连乡下的人也进城了。夏霖、黄竞西等在大会上慷慨演讲，历数江浙人民的苦痛，控诉孙传芳、张宗昌等军阀的罪恶，号召群众奋起反抗，不缴苛捐杂税，不供应军粮，阻止军阀的倒行逆施。在这运动中，我又一次受到了革命实践的教育和锻炼。

在那紧张斗争的日子里，夏霖、黄竞西曾挤时间跟我深谈过几次。果然，不出我原先所料，夏霖、黄竞西等的确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员。早在一九二五年四、五月间，恽代英、侯绍裘、刘重民来丹阳开展活动时，他们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成立了中共丹阳独立支部，属上海地委兼区执委会直接领导。一九二六年四月，正式任命夏霖为丹阳独支书记。丹阳“二高”实际上成了党的秘密机关。党组织详细考察我，认为我具备了入党的条件，而我又一再要求入党。九月中旬，夏霖、黄竞西两人找我正式谈话。夏霖对我说：“你要求加入共产党，就应该懂得中国共产党到底是干什么的？懂得一个人加入共产党究竟为了什么？”他们告诉我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自己的政权，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呢？共产党就是把工人、农民、士兵组织起来，进行这样的社会革命，就是为了实现没有阶级，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大家都过幸福生活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革命一直要到阶级消灭的时候为止。

讲到这里，夏霖稍稍停顿了一下，望着我说：“马克思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讲了，‘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私有制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总根子！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究竟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把私有制这万恶的总根子彻底刨掉！把阶级消灭掉！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为着这个目的和理想而奋斗终身。希望你牢牢记住这一点，争取做一个忠实的好党员。”

我凝视着夏霖，点了点头，继续认真仔细地聆听他庄严而亲切的教导。

夏霖说：“要做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就一定要有有很大的决心。要奋斗，总会有牺牲。没有牺牲个人的决心，革命怎么能成功？共产主义怎么能实现？一个人加入了共产党，从此就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于度外了，一切都是为了党的事业！你要求加入共产党，你就要有随时牺牲自己个人利益的准备。”

夏霖望了望黄竞西，似乎是征求他的意见。黄竞西接着他的话说：“还有，共产党的纪律是很严格的。没有铁一样的纪律，就不会有强大的战斗力。入党以后一定要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品质。特别是现在党在这个地方基本上还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工作、意见和党员身份等等，都要严守秘密。”

接着，他又具体地讲了党的纪律和缴纳党费等问题。我都默默地铭记在心里。最后，他们发给我一份学校油印的入党申请表，让我填写了。夏霖、黄竞西两同志便是我入党的介绍人。

隔了一天，夏霖通知我说，独支已经开会研究，同意了我的入党要求。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正巧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

丹阳家家户户供月，吃月饼。晚上，我在丹阳“二高”的一间屋子里宣誓。墙上挂着一面很小的党旗。参加我的入党宣誓仪式的人，有夏霖、黄竞西、姜寄生、戴盆天四人，其中除黄竞西外，都是我过去的老师。一开始，夏霖宣布开会。我们五个人全体起立向党旗致敬一分钟。接着，夏霖、黄竞西作为介绍人，说明介绍我参加党的理由，并叫我讲了自己的历史和入党的志愿。最后是我向党宣誓：

实行革命，严守秘密，牺牲个人，  
阶级斗争，服从纪律，誓不背党。

宣誓仪式结束后，我第一次参加了党的支部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我们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

黄竞西在党内是分工搞江苏“民校”的党团工作的。所谓“民校”就是国民党的代用语。当时江苏国民党省党部内的中共党团书记是侯绍裘。黄竞西跟侯绍裘一起搞江苏“民校”工作。因此，他知晓国民党方面的情况较多。他向我们介绍了国共两党最近情况，说：“三月中山舰事件后，我们党内意见有分歧，有人主张反击，有人主张退让。从当时形势看，我们在广东的力量不小，国民党内象汪精卫、邓演达、谭延闿、程潜、李济深、朱培德这些人，都对蒋介石那样干很不满意。如果我们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对蒋介石采取坚决反击的政策，情况可能就不会象今天这样。可是苏联顾问和陈独秀害怕统一战线破裂，主张让步，撤出了有关政治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自行解散了党领导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这样蒋介石才攫取了军权。他得寸进尺，五月又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限制我们党的活动，以夺取国民党的党权。对这件事，我们党内的意见也很分歧：有人主张武装工农，争取国民党左派，孤立蒋介石；有人主

张与蒋介石妥协；还有人主张退出国民党。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我们党与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也很大，要否决蒋介石的提案是办得到的。可是，陈独秀还是主张让步。结果，林祖涵、谭平山、毛泽东等同志只好辞去在国民党中央的重要职务，让蒋介石当了组织部长，张静江当了中央常委会主席，叶楚伦当了常委会秘书，邵元冲当了青年部长，甘乃光当了农民部长，顾孟余当了宣传部代部长。国民党的党权也被蒋介石夺去了。不久，蒋介石又兼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央党部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委员。眼下，北伐军已打到湖北、连克汉口、汉阳，武昌也指日可下。江西战场，前天也攻下了南昌。估计北伐军很快能打到我们这里，孙传芳肯定要失败了。蒋介石到了这里，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

夏霖说：我看中国革命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国民党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无法唤起民众的。国民党内的右派又如此嚣张，去年阴谋暗杀了廖仲恺先生。接着又在北京西山开会反共。你们看，今年春天发生中山舰事件时，他们又从上海打电报给蒋介石，说蒋介石“以迅速手段，戡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并怂恿他反共要“祛恶必须彻底”。这说明了什么！蒋介石这个人，我原先认为还不错。革命的高调挂在嘴上，还把儿子送到苏联去留学。现在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我看，他已经靠到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一边去了。他已经成了新右派、新军阀了！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靠国民党、三民主义，救不了中国；要救国，要革命，只有靠我们共产党！我们如果对国民党右派，对蒋介石这样的人，在思想上没有警惕，总有一天要吃大亏的。

会上每个同志都发表了意见，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大家对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感到忧虑。夏霖对国民党的分析，大家很有同感，但是，苏联顾问和党中央为什么要采取退让的政策呢？很不理解。戴盆天认为国际和中央的决策总是有道理的。国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不准共产党员担任中央机关的部长，但我们还有相当的人可以在他的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担任执行委员嘛，县党部就更不用说了。当前北伐的形势很好，我们的主要敌人还是孙传芳。上海地委最近指示我们要抓紧做好瓦解孙传芳部队的军心和扰乱其后方等工作，我们还是要全力反对孙传芳。他还讲了不少下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和宣传中央所定的政策，不得自定政策等等。我是一个刚刚进党的新党员，只觉得大家意见很新奇，从来没有听过国共两党还有这么多矛盾，我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表意见。对戴盆天的讲话，隐隐觉得他有些要做官的思想。他进国民党较早，而且介绍人是胡汉民、毛泽东。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一成立，他就是农民部长。因此，如果北伐军到了江苏，国民党掌握政权，他估计自己必将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这种想法，他平时也有所流露。

这次支部会上，还对封建军阀如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一个个进行了分析。夏霖等同志指出：中国的封建势力没有不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目前，黄河以北主要是日本的势力范围，长江中下游主要是英美的势力范围。蒋介石要反共，就必然会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今天我们分析形势，讨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是在党内会议上讲的，不得外传。我们的工作仍然应该按照中央和地委的指示去做。

这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他为我以后的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 6. 迎接北伐军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节节胜利。为了进一步开展反对孙传芳的斗争，准备迎接国民革命军的胜利进军，党加强了沪宁线上几个

较大城市的工作。无锡的地位当时仅次于上海，是工作的重点之一。“山雨欲来风满楼”，反动势力也加紧了对革命的压迫。无锡军政当局悍然查封了国民党县党部。上级党组织考虑无锡方面亟须加强力量。我原有的国民党关系还在无锡，因此入党后又派我回无锡工作。

我回到无锡就去找黄祥宾。他告诉我说：“你的组织关系已经转过来了。”黄祥宾、朱士能、我组成一个党的小组，继续控制第三师范那个国民党区分部。这时，共青团的工作也发展了，无锡有了三个支部。实业中学为第一支部，书记吴云松；工商中学为第二支部，书记顾凤城；艺芳小学为第三支部，书记吉菊谭。严朴受上海地委派遣回无锡工作后，即在南门上坊街十三号创办了一所江苏中学，那里也发展了我们的同志。由于黄祥宾和我们几个人主要是搞学运的，因而与他们均有联系。

无锡独立支部书记是张佐臣，我们都在他领导下开展工作。成衣业工人、铁路小工、嫁妆木匠、丽华布厂工人等等，接二连三地罢工。安友石、杭果人都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毕业的学员，也回到无锡。他们以东北乡安镇为中心，在怀上、怀下、北上、北下、泰伯等处先后建立了农民协会。无锡县妇女会、总工会等也相继成立。总工会以秦起为委员长。他曾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回无锡后领导了无锡二十一家丝厂两万余女工的总同盟罢工，并取得了胜利，他在工人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副委员长是张中元。张佐臣、刘群仙、严朴、周愚人等都是委员。它下辖五十五个工会，在当时沪宁铁路沿线各城市中，力量是相当雄厚的。

一九二七年初，申新、振新、广勤、业勤、庆丰、豫康等六家大纱厂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会场设在惠山，张佐臣亲自主持大会并作了报告。我们学界也派代表到会祝贺。那次大会气氛非常热烈。

大会宣布成立了纱厂工会，同时选出了申新三厂工人章宗源为委员长、刘群仙为副委员长。

这时，北伐军正势如破竹地向前挺进。第一路，两湖战场，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的第四军已攻克武汉三镇；第二路，第二、三、六军已占领南昌；第三路，闽浙战场，第一军已占领福州。北方的冯玉祥部，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也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加入革命阵营。我少年时期在丹阳“二高”的老师钱正表，当时也由党派往冯玉祥部搞政治工作去了。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急骤变化。无锡的有些地主、资本家看风驶舵，把其大批子弟悄悄地派进国民党内，以备将来革命胜利后夺取政权。我们在国民党内部的斗争，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尖锐。

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左右，我们就听到党组织传达，江浙区委已正式组成军事委员会，赵世炎为主任，区党委书记罗亦农等为委员。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指示各地要抓紧大好时机，大力发动群众，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北伐军进入江苏。一九二七年一月中旬，江浙区委又指示南京和无锡要特别注意这一工作。无锡重点是工人运动，南京重点是政治暴动。一俟北伐军到来，立即行动。上海即以总罢工将孙传芳派驻在上海的防守司令李宝章轰掉。要我们加紧破坏铁路。为了加强领导，二月十六日又将无锡、江阴、常州、苏州等地合组成无锡地委，由张佐臣担任书记，统一领导。共青团方面则派匡梦苏（匡亚明）来担任无锡的团县委书记。

我们那时都是“跨党分子”。国民党无锡县党部也分区召集我们部分活动分子开会，布置我们加强宣传队伍，到处宣传三民主义，整天搞游行示威。

我们在张佐臣等的具体领导下，很快地落实了江浙区委的指示。在短期内组成了铁路工人运动委员会，并在火车站建立了党

支部。我和黄祥宾等组织学生三天两头上街贴标语，散传单，宣传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消息，鼓动军阀部队起义。这一段时间，我们工作十分紧张，常常夜以继日地干。工人纠察队也组织起来了，接着又暗中筹备组织新的县政府、警察局。黄祥宾、朱士能和我的具体任务是把整个无锡县的学生组织起来。我们天天到几所大的中学去，做发动和组织学生的工作。

三月初，北伐军进至苏州附近之平望，另一支部队也向长兴发展。苏浙战事的重心移到了太湖沿岸。我们看到革命形势发展如此之快，群众情绪如此之高，一个个心里都有说不出的快活。党组织又召集紧急会议，要求我们立即行动起来，等北伐军一靠近无锡，就不犹豫地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暴动起来，把旧政府推倒，把政权夺过来，建立起我们领导的国民党县党部，把商团、厂警、警察、地主保安团的枪统统缴下来，武装工人和农民。后来，我常可惜，我们当时不知道抓军队的重要性，对武装工农的重要意义也不大懂得，既没有这方面的干部，又缺乏具体切实的办法。武装工农流于形式，没有能把工作做好。

党组织分配我们的战斗任务：第三师范、辅仁中学等学校，负责收缴附近警察所的枪械；总工会负责收缴商团的枪械；农民协会收缴地主家的枪械；工商中学校址在梅园附近，这所学校是大资本家私人办的，主要是培养他工厂里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因此，该校的学生和资本家的几处工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到时就负责收缴厂警的枪械。

三月中旬，听说北伐军到了宜兴一带。无锡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由总工会具体组织了一批党员和工人，分头到周泾巷、南门旗站、皋桥等处破坏铁路，阻止孙传芳军运。十六日晚上，一列军车出轨，使沪宁铁路陷于瘫痪。十七日，北伐军何应钦部攻入宜兴。敌方直鲁联军白宝山、冯绍闵、郑俊彦等共三个师退集常

州。常芝英奉张宗昌电召，率部离开上海开到无锡。党组织通知我们，北伐军两、三天内可以到达无锡，要我们马上采取大的行动。于是，全无锡的工人、学生都纷纷组织起来上街游行示威。顷刻之间，我们又按事先的部署，把巡警、商团、厂警等的枪械都缴了。我们白天在街上散传单，呼口号。夜里就拿鞭炮放在洋油箱里，拿到比较隐蔽的地方燃放，声音活象机关枪，造成敌人心理上的恐怖。民众的情绪高涨极了。常芝英的军队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非常恐慌。在北伐军到达前两、三天就陆续自行撤退，匆匆忙忙地从江阴一带渡江向苏北逃窜。

三月二十日，北伐军赖世璜、曹万顺两军占领常州。当晚，中共无锡地委再次召集紧急会议，决定第二天晨起，无锡县全县工人、学生实行总同盟罢工、罢课，以声援并迎接北伐军。这时，无锡整个城市实际上已为我们占领。市面上秩序相当混乱。无锡县政府和市政局的班子也搭起来了。国民党拚命和我们争夺政权，资产阶级又站在国民党右派一边，我们共产党的力量相对说来还比较小，县政府和市政厅的主要位子都被国民党占去了。国民党县党部中有我们党的高大成等同志，还能起相当大的作用。国民党无锡县市党部即将创办的《无锡民国日报》，则由我党的同志担任主编。我们主要的力量是依靠工会、学生会。

三月二十一日，我们得到确实的消息，北伐军已接近无锡。我们各群众团体就在公园里开了市民大会。无锡市总工会委员长秦起担任宣传队总指挥。会后，数万群众分为两路，一路至梅园，一路至火车站，迎接北伐军进入无锡。当天无锡所有的工厂、学校都停了工，停了课。我们迎接到的部队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叫赖世璜。这支部队是蒋介石刚在江西收编的，其中不少是土匪，但政治系统的人则大部分是我们派进去的，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左派。驻无锡的一个师，师政治部主任姓车，是共产党员。

第十四军的军政治部主任陈斯白，是国民党左派。他们的态度比较明朗，是支持无锡的左派的，我们跟他们有较多的接触。不过那个姓车的后来也很糟糕。军事上的人，我们接触不多。他们支持无锡的资本家和国民党右派。

三月二十二日，在中共无锡地委的领导下，我们十万群众在北门外火车站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会。秦起、安友石、徐梦影等先后在会上讲了话。群众的情绪非常热烈。工会、农会、学生会是我们的群众基础。那时无锡县总工会已对外办公，办公地点设在城里崇安寺的大雄宝殿。工人纠察队的枪械集中起来有五六百支之多，徒手群众则号称万人，实际上也有好几千。无锡县农民协会也正式组织起来，主席是安友石。他们在四乡发动农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但无锡的大地主盘根错节，势力很大，要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无锡的学生绝大部分是爱国的，要革命的，而且组织得也比较好，在五卅运动时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斗争中，总是冲在前面，是一支比较有战斗力的突击力量。

我们有这么广泛的群众基础，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又很快地成了革命的中坚，然而我们那时还非常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路。群众起来了，枪也有了，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但是我们不懂得抓军队的重要性，没有把工人、农民、学生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一支坚强有力的军队。成立了工人纠察队，但工人要吃饭，不做工不行，我们也没有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欢乐变了苦恼。但是，在这大好形势下，党有了大发展，在斗争中也确实起了核心作用，但是不懂得抓政权的重要性；不懂得组织军队；不懂得筹款，又不敢和国民党右派作坚决的斗争，结果无锡县政府和市政局的县长和局长均为国民党右派分子秦效鲁和赵子新分别窃据。他们利用政权来压制我们，我们只有群众，其它一无所有。以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我们陷入非常被动的困

境。

这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 7. 反革命逆流中脱险

北伐军虽然到了无锡，但是国民党对民众许下的诺言几乎无一实现。赖世璜的军队很快跟无锡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起来，每事均与国民党右派商量决定，千方百计阻碍群众的正义斗争，使广大群众大失所望。

三月底，我们在中共无锡地委的领导下，发动、组织了五、六千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惩办土豪劣绅。示威群众将无锡县政府、无锡市政局围得水泄不通，高呼口号，强烈要求县长秦效鲁、市政局长赵子新亲自出来答复。群众的要求声势很大，国民党右派向赖世璜的部队求救。赖世璜的军队一则是才挂上革命军的招牌不久，没有上峰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二则我们曾与陈斯白等取得联系，部队的政工人员比较倾向于我们，因此迟迟未派兵干预。

《无锡民国日报》名为国民党无锡县党部主办，实际上是由我们共产党人主编，当然舆论也明显支持群众的正义要求。国民党无锡县党部中的我党同志高大成等也据理力争。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无锡县政府被迫捉了土豪杨益山，并宣布没收他的家产。同时，万安市附近的西北乡几十个村镇的农民三、四千人，也在党的领导下起来斗争了。他们荷锄执棍，聚集在开利市前的广场上开会，一致要求接收石圻湾万安市公所，斗争孙姓地主集团。当时一呼百应，愤怒的群众象潮水般涌向万安市总董孙霖甫、孙屏东等大地主家，打开住宅大门，捣毁了他们剥削得来的家具衣物，焚烧了田租单契。四月一日，三千余人进城，向县政府请愿，要求公审孙霖甫。我们组织了学生去欢迎农民队伍。县总工会也组织了不少

工人列队欢迎，表示积极支持。工人纠察队也到场维持秩序，给农民兄弟撑腰。县长秦效鲁出于无奈，又只好被迫接受了群众的要求。

无锡申新三厂有个总管车叫李跃东，一贯欺压、剥削工人。纱厂大部分是女工，李跃东经常用搜身等手段，对女工进行人身侮辱。工人们行动起来，狠狠地斗了他，捆捆扎扎将他送到总工会请求惩处。这事大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其他各厂也纷纷起来斗争本厂的霸头。

无锡的人力车工人不少，车租太高，无法生活。他们到总工会请求为他们降低车租。他们就在总工会开了代表大会，派出代表与资方谈判。人力车行资方大多是些流氓头子，帮会骨干，傲慢得很，不同意工人的要求。总工会立即组织全无锡的人力车工人罢工。资方企图利用流氓地痞的势力进行捣乱和压迫，但惮于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力量，终于不敢动手。最后还是乖乖地到总工会与工人签订了降低车租的协议。

无锡各丝厂女工，要求改善待遇而举行罢工。厂工会提出了要求增加工资、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缩短工作时间等条款。罢工斗争也取得了胜利。

这段时间，我们在无锡的工农群众斗争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整个形势的发展对我们却越来越不利了。

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的政治野心，积极寻求帝国主义作靠山。各帝国主义为了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一方面以金钱收买和通过其报刊公开鼓励煽动；另一方面增兵上海和长江下游，用武装干涉和施加军事压力，促使国民党右派举行反革命政变，他们一再派遣密使与蒋介石谈判。这样，蒋介石占领南昌后，就召集了国民党右派和一部分北洋军阀政客和买办阶级代表，策划布置反革命阴谋。



三月六日，他阴谋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十六日，以武力胁迫解散了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十七日和二十三日，先后利用青洪帮和地痞流氓，制造了流血的九江事件和安庆事件。郭沫若当时是亲历的目击者，他很快就写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离开蒋介石之后》两篇洋洋万言的檄文，具体揭露蒋的叛变事实，在《国民军报》上登了出来，全国大为震惊。

蒋介石到了南京之后，帝国主义者又进一步对蒋进行恫吓，将军舰开到浦口进行威逼。三月二十四日，英、美、日、德、意等帝国主义驻南京的领事，借口其侨民及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命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舰“良美拉尔特号”和美舰 343、345 号，联合炮击南京，造成死伤两千多人、毁坏房屋财产不计其数的下关大惨案。帝国主义扬言只要你蒋介石反共，我们就支持你；否则，我们将采取别的措施！蒋介石被这一吓，随即公开叛变。再加上我们党内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终于酿成了反革命“四·一二”大屠杀。

蒋介石的反共、反革命趋向，我们党并不是没有觉察的。张佐臣曾在党内分析过当时的局势变化，及时指出过潜在的危险性。我们讨论这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时，许多同志也深为忧虑。我那几天常会回想起我入党后参加的第一次支部会的情况。夏霖、黄竞西等对国民党的精辟分析，到这时仍然言犹在耳。实践进一步证明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

无锡的国民党右派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感到了这种政治气候，正在蠢蠢欲动。右派头子邹广恒整天鬼鬼祟祟与青洪帮的几个骨干分子策划于密室，并经常与米业商团头子杨祖钰等反动分子到下面去搞阴谋活动。由于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中均有我们的同志，因此这些情报党组织知道得比较清楚。

为了以积极的行动来对付这严峻的局面，地委领导布置我们

发动组织了十万群众，四月四日在无锡火车站广场举行了一次追悼北伐军阵亡将士暨反英讨奉市民大会。这次大会组织得特别好，各路队伍非常严整。工人纠察队全副武装，雄赳赳气昂昂的，威武得很。中共无锡地委发表了《告无锡民众书》，号召人民进一步行动起来，继续努力，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继续北伐，以夺取革命的彻底胜利。这实际上是对帝国主义、新老军阀、国民党右派以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

大会结束后，我们整队沿着无锡的主要大街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经过市政局时，激于义愤，部分群众冲了进去，捣毁了为国民党右派分子所控制的无锡市政局。赖世璜本人在第十四军进驻无锡后即以治病为名去上海。这时，他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匆匆赶回无锡。正巧我们发动这次大规模斗争。他就以“维持地方治安有责”为借口，派兵镇压，我们的群众被抓去二十九人，矛盾激化了。

隔了一天，邹广恒又从上海带回蒋介石给赖世璜的一封密信。赖世璜立即召集无锡的反动势力举行紧急会议，当晚就成立了国民党无锡清党委员会。他根据蒋介石的秘密指令，指定邹广恒为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责成其抓紧时机作具体部署。蒋介石对无锡的反共工作非常重视，紧接着又特派他的第一军党代表缪斌亲自到无锡面授机宜。缪斌是无锡人，一九二四年一月陆定一等发起组织进步团体锡社时，缪斌也曾参加，并被推为干事。他投靠蒋介石，成了蒋的心腹。缪斌到无锡后，即与赖世璜密谈反共计划，赖即公开发出了“制止暴动”的反动布告。我们得到缪斌到了第十四军的情报，立即由国民党无锡县党部中的高大成等发起，以无锡县党部、无锡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负责人三十余人联名向十四军军部发出请愿书，要求立即释放四日被捕工人。赖世璜接到请愿书，不仅不释放工人，反而命令十四

军军部通知县党部，交出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所有人员，并扬言要对这些人进行审判。县党部、总工会等团体决定派王志昌、邹定良、石天民三人为群众代表，到十四军军部交涉。十日下午，赖世璜蛮横无理地扣留了三代表。当天，我们在县委的领导下，发动各群众团体集会游行，坚决抗议军方的非法行为，要求立即释放群众团体代表以及其他被捕人员。

南京发生反革命事变是四月十日。上海发生反革命事变是十二日，无锡地委已得知蒋介石叛变的消息，决定四月十三日在公园召开市民大会，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强烈要求军方释放被捕三代表。这次大会主要由无锡总工会发起的，参加者有几万人。当晚，赖世璜、邹广恒等秘密策划对我们采取大的行动。我们事先没有得到情报，预防不及。四月十四日晚，赖世璜、邹广恒等按照蒋介石、吴稚晖等的指令，事先采取行动，由米业商团头子杨祖钰等反动分子为急先锋，率领商团武装和一批青洪帮流氓打手，突然袭击设在城中崇安寺的无锡总工会。赖世璜则派部队积极配合，把无锡城团团围住，封锁了内外交通。

事变来得太突然。地委书记张佐臣被阻于城外。当时工人纠察队分散在各地，郊区各工会救援的队伍也不得进城。总工会委员长秦起带了几十个人奋起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分同志牺牲。秦起弹尽援绝，被敌人逮捕，英勇不屈，惨遭杀害。同时，《无锡民国日报》社和设在城里八儿巷的县农民协会也均被捣毁。严朴在无锡南门上坊街办的江苏中学也被查封。军政当局悬赏通缉一大批共产党员，杀气腾腾地实行全面反共。我们工人和学生，一部分倒在血泊中，大部分被打散。我们被打散后，黄祥宾转移到南京，考进了中央大学，担任中共中大党支部书记，一九三〇年被反动派杀害。我开始躲在学前街一位姓顾的老师家里，藏了几天。风声越来越紧，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捕杀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顾老

师劝我从速离开无锡，到外地避一避再说。当时无锡一片白色恐怖。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到处是敌人把守着，稍一不慎，即遭逮捕。顾老师想了不少办法，送我去宜兴，再转到丹阳。

## 第二章 战斗在京〔宁〕沪铁路沿线

### 1. 白色恐怖下重整队伍

我离开无锡，回到丹阳。丹阳在这段时间内，情况比各地好一些。国民党县党部和群众团体为我们党所控制，县政府被国民党右派所把持。丹阳和上海、苏州、无锡、南京等城市是不大相同的，那就是由于丹阳没有工人、学生武装，城市比较小，国民党反动派一时还顾不上这些小地方，暂时还没有向我们的同志开刀，局面还没有发生急剧的大变化。

我回到丹阳第二高等小学，很快与县党部的姜寄生联系上了。

由于大革命时期形势的发展，我们党在丹阳的组织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动。一九二六年十月，当地劣绅张翰臣、贡常珍等向反动军阀孙传芳控告，说丹阳县的农民协会是赤化团体，敌人就悬赏通缉戴盆天、夏霖、叶静三人。适值他们三人外出，敌人只抓到袁永（时为农民协会常委）、颜辉（时为农校教师）等四人。后反动当局慑于群众的压力，又将四人释放。是年底，夏霖调江浙区委任巡视员，离开了丹阳。黄竞西回上海继续搞“民校”党团工作。他参加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钱正表于一九二五年夏，由李大钊派遣，去张家口，和宣侠父一起任中共特派员，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工作。同年，钱与宣去甘肃，钱以甘肃省军务督办公署政治处副处长的身份作掩护，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他与宣侠父、张一悟等创建了中央甘肃特别支部，并发展了秦义

贞<sup>①</sup>等一百多人入党。听说“四·一二”事变后他在甘肃被捕了。戴盆天、张连生也先后调走了，留下的党员还有姜寄生等人。我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就在丹阳住了下来。

我回顾这几个月的斗争，觉得过去夏霖、黄竞西对国民党的分析有道理。蒋介石走向反共、反革命的道路，冰冻三尺，决非一日之寒。夏霖、黄竞西等同志早就有了那样的认识。为什么党中央一再退让？如果坚决斗争，早作充分准备，何至于今天受到如此严重的挫折？我那时在基层工作，对党内斗争的情况知之甚少，理论水平又很低，对这些重大问题很难想清楚，很想再见到夏霖，听听他的意见。

我打听夏霖的下落。据姜寄生告诉我，夏霖到区委担任巡视员后，多次往来于大江南北，组织农民运动。他到过南通、如皋、海安、泰兴、武进、江阴、苏州、无锡、常熟以及上海周围各县。北伐军进抵江苏，南汇地方各公团组织合法选举，夏霖曾一度当选为南汇县县长，但新军阀白崇禧却另行委派他的小舅子钟汉瑛去南汇当县长，并率两团军队围攻县城。夏霖为免得地方人民受伤害，乃召集地方人民各公团会议卸任赴沪。途中新军阀部队竟向他开枪，他险遭暗杀。他脱险到了上海，组织上派他为丹阳特派员，随北伐军回来过一次。当时丹阳各界人民高挂横幅表示热烈欢迎。在丹阳时间很短，他又奉命到别处去了。

没有几天，夏霖回来了。他这次回来，负有重新恢复和整顿丹阳一带党组织的使命。陆续回来的人中，还有张连生、庞森、贺一民等。他们这几个人大多是黄埔军官学校出身，在军队里搞党的工作。戴盆天也回来了，情绪沮丧，心灰意懒的样子，令人感到他

---

<sup>①</sup> 秦义贞(1889—1966)，四川忠县人，一九二六年春，由钱正表、王一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担任过甘肃省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政协甘肃省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等职。

这个人变化太大了。

一批在外地的党员陆续归来，大家先交流了各地的情况。南京方面，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遭到彻底破坏，是蒋介石亲临坐镇，唆使流氓打手向革命开刀的。四月九日那天，省市党部被捣毁，张曙时、黄竞西、高尔柏以及侯绍裘的爱人范志超等三十多人被捕。第二天，侯绍裘、刘重民等组织了三、四万名群众到蒋介石的北伐军司令部请愿，抗议国民党右派镇压革命，要求释放被捕同志，惩办凶手。蒋介石在群众的压力下虽不得不出来虚伪应付，但不肯正面回答群众的正当要求。这时蒋介石一手豢养的鹰犬温建刚指使事先布置好的数百名流氓打手，手持棍棒等武器，冲进群众队伍殴打示威者，当时被打死数十人，伤以千计。当晚，中共南京地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地委委员、国民党省、市党部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四十多人到会，会议由侯绍裘主持，主要商讨反击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策略和办法。由于叛徒告密，公安局长派侦缉队包围了莲花桥附近的会场，除刘少猷翻墙脱险外，余者皆被逮捕。侯绍裘严辞斥责敌人的罪行。四月十五日，侯绍裘、刘重民、谢文锦<sup>①</sup>、陈起金<sup>②</sup>、梁永<sup>③</sup>、文化震<sup>④</sup>、张应春<sup>⑤</sup>等英勇殉难。上海方面，反革命政变的头三天，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群众领袖即有三百多人，另外有五百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或流亡。江浙区委的负责干部被捕、谋杀的不少。沪宁线上的其它主要城市，常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王寿生被诱捕，总工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缴械；苏州中共独立支部的顾容川等也被捕，国民党苏州市党部被捣

---

① 谢文锦，一九二六年任中共江浙区委委员，牺牲时为中共南京地委书记。

② 陈起金，当时系中共南京地委委员。

③ 梁永，当时系南京市总工会干部。

④ 文化震，当时系中共南京地委委员。

⑤ 张应春（1901—1927），江苏吴江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妇女部长。

毁，总工会被封闭；驻常熟的国民革命军师长刘峙公开宣布反共。在李明扬部的共产党员策动起义，事泄未成，多人被捕。同时，广东、浙江等省也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许多工会组织和进步机关、团体都被反动派查封，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流血牺牲。原先，我们沪宁线一带有党员三、四千人，此时大部分被打散。党的组织也大多被搞垮或陷于停顿，亟待有人出来恢复和重建。国民党右派在疯狂屠杀共产党人以后，又搞起什么国民党党员登记的花招。凡“跨党分子”只要放弃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脱离共产党的组织，去登记国民党党员，当局即可不予追究。

现实放在我们这些人面前的有三条道路：投降、逃跑，或者继续干下去。夏霖征询了各人的想法。庞森思想有点消极了，准备在家里蹲蹲算了。戴盆天说他是省委委员，目标太大，准备到外地躲躲风头再说。贺一民有点犹豫不决，做了一番工作后，决心继续干。其他的同志既不愿投降，又不想逃跑，都决心继续干下去。

摸清了各人的情况，夏霖就召集张连生、姜寄生、何霖、颜辉、我这几个人，在姜寄生家里开了一次临时性质的党的会议，时间是在五月左右。姜寄生那时还是国民党丹阳县党部的执行委员。会上，我们又一次分析了形势。当时社会上各种传闻很多，我们的消息很不灵通，也不知这些消息是真是假，不少同志都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才好。

夏霖说：“我们和江浙区委暂时失去了联系，党又受到了这么大的损失，局势是很严峻的。但是，我们的党中央还在，在上海的区委也还没有被完全搞垮，各地也还有我们不少的同志在活动，我们这些人也还在，革命是不会停止的。革命总不可能一帆风顺，跌一个大跤，爬起来再干，只要我们能坚毅不拔地奋斗下去，我相信革命总有成功的一天！眼下最要紧的事是要把我们的党组织重新整顿一下，动摇分子、叛变分子都不能要了。组织整顿好以后，



还必须尽快想方设法跟附近的金坛、江阴、常州、镇江等地的同志们联络上。只要和我们有关系的，都要尽可能联络上。革命不能中断，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继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地搞了一阵，现在蒋介石叛变，中国革命暂时又失败了，人民依然没有得到解放，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依然骑在我们头上，只是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那些豪绅地主不又纷纷回来拜天拜地拜祖宗了吗？象胡荫介这样一个大恶霸又神气活现地回丹阳了！我们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我们一定要继续干下去！”

我们将丹阳的共产党员排了排队，这时城区还有二十几人。根据现实情况，大家认为党必须转入地下。然而，今后开展工作是以共产党的名义还是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呢？夏霖认为暂时还是打国民党左派的招牌比较稳妥些。有的同志却指出：“这样搞法，有些事情对群众又怎么个说法呢？”想想确实有些问题解释不通。第一次会议未能解决这个问题，过了几天，又举行第二次会议。夏霖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干脆以共产党的名义，不再同国民党搞在一起，鲜明地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大计已定，我们就重新组织了中共丹阳临时县委。夏霖为书记，张连生、姜寄生、何霖、颜辉和我为委员。我们分头进行各项工作。

这期间，黄竞西曾回过丹阳一次。他在南京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南京事变后即回上海工作。他告诉我们：据江浙区委了解，沪宁线一带，除丹阳外，南京、无锡、苏州、宜兴、江阴等地的党组织也已恢复。张佐臣同志也已回上海工作。他还告诉我们：最近无锡城厢出现了大量反蒋标语，例如：“打倒卖国叛党的蒋介石！”“打倒资本家、流氓、土匪、党棍、工贼所组织的工联总会！”“继续秦起精神奋斗！”等等，不下数十种之多。苏州铁机工人又开始发动斗争。青浦农民和职工示威，捣毁了国民党右派的“清党委员

会”，迫使县政府释放了夏采晞<sup>①</sup>等共产党员。金陵兵工厂工人要求南京市公安局释放被扣押的工会负责人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我们听到这些消息，大为振奋。

黄竞西在丹阳未耽搁多久，由于工作关系，又匆匆忙忙赶到上海去了。夏霖请他将丹阳情况向江浙区委报告，从此我们接上了组织关系。

六月二十六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江浙区委改组为浙江、江苏两个省委。当天下午，由于叛徒出卖，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被破坏。黄竞西在上海史高德路恒丰里参加党的会议，他与省委书记陈延年、省委组织部长郭伯和等同时被捕。过了几天，我们才从上海的《新闻报》、《申报》上，看到关于“捕获共党重要分子陈延年、吴福民等”的消息，我心里难受极了。吴福民就是黄竞西的化名。我们后来得知，他被捕后第八天，即七月四日，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在临刑前，他挥笔疾书，在给他妻子楚云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死于今，比死于昔，使人们可觉悟中国是需要继续革命的……，死者已矣，惟望生者努力。”既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又渗透了他对我们的殷切希望。黄竞西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之一，虽然只比我年长六、七岁，但政治上的坚定和工作上的干练，给我很深的教育。

丹阳的国民党县党部虽然还在左派手里，但是并没有多少实权。要开展工作，就需要活动经费，党组织决定：在没有得党中央和省委指示的情况下，所有问题都由我们自己解决，不能等待。第一步就是大家找职业，为党筹集经费。

丹阳的正则女校是一所女子职业中学。这所学校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画家吕凤子先生创办的。我被派到这所学校去做代课

---

<sup>①</sup> 夏采晞(1906—1939)，江苏嘉定(现属上海市)人，一九二七年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后任省委巡视员、扬州特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九年病死在苏联。

教师，并做党的工作。代课教师的薪金是每月十六块大洋。我自己留三块钱作为基本生活费，主要解决吃饭问题。余下的十三块钱，全部交给党作活动经费。夏霖是个运动员，曾做过体育教师，就到县里体育场当了场长，薪金比我高，每月有三十块大洋的收入。他家里有家眷靠他生活，留下十几块钱养家糊口，其余的也全部交党。其他还有几个同志。这样七七八八，凑起来每月有五、六十块大洋的活动经费。

我在正则女校代了两个月课，到七月份，临时县委准备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把农民协会牢牢控制住，我就被派到县农民协会当副会长兼秘书长。每月薪金有了三十六块钱，我还是只留三块钱生活费。我们又介绍了几个人到县政府，安插一事些做，每月经费就有八、九十块钱了。我们陆续派人到外地去活动。无锡县委恢复后，六月初又遭到过一次破坏，县委书记江源清和他的妻子宋三妹等人被捕，后被保出来。常州先由恽长安（恽逸群）等恢复了独立支部，还在电话公司等处发展了组织，后也成立了临时县委。宜兴、江阴等地党、团组织也有了恢复和发展。我们都先后联系上了。

中共江苏省委建立后，丹阳的党组织又作了调整，正式成立了中共丹阳县委。夏霖仍担任书记，我、姜寄生、汤醒白、何霖为委员。五个人中除姜寄生外，我们都不参加国民党县党部，国民党党员的招牌暂时还挂着，因有时采取合法斗争方式时还有用处。

县委交给我的任务是转移到农村去，大刀阔斧地开展农村工作。夏霖对我说：“丹阳县城小，没有工厂，手工业也寥寥无几。我们应该把主要力量转移到农村去，把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我估计现在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我们要主动作好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我接受任务后，就选了十几位同志，以县农民协会的名义派到

四乡,进行活动。那时,国民党还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到象丹阳这样的小县。我们抓紧这个时机,把各乡的农民协会基本上都组织起来了。我们在乡下秘密宣传革命的道理,揭露国民党叛变革命投靠帝国主义等罪行。公开的场合,我们就讲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组织农民协会。乘国民党反动势力一时还达不到农村的时间,我们就大力发展党的秘密组织,把农村政权,慢慢地悄悄地夺取过来。

这时,别的地方白色恐怖严重,而我们丹阳四乡的形势却比较好。过去只有吕城几个党员,现在象道士桥、陵口、香草河、顾家桥、访仙桥、孟河等地方,都有了党员。全丹阳县各乡建立了二十多个支部,共有党员二百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是贫雇农,主要是经过阶级教育后吸收的;一部分是小知识分子。所谓小知识分子,一般也不过小学程度,大学生、中学生当时在乡下是很少的。这些党员虽然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但阶级成份是好的,斗争性也还不错。暂时,土豪劣绅的威风被压下去,群众对打倒土豪劣绅是最积极的。

这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公开与共产党决裂。接着,宁汉合流,又是大批革命者和共产党员被逮捕,被惨杀!形势进一步急转直下。

从武汉方面又逃回来两三个人,其中有胡洪涛。此人是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毕业生,丹阳人。胡回来后,找到县委。他讲了那边的情况,说党中央已转入地下,许多党员被打散,有的去上海,有的去江西,有的去湖南,还谈到汪精卫在武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也实行大屠杀等情况,说与“四·一二”政变时的情况差不多。我们问他党中央的情况,他说:他只知道已转入地下,具体情况不知道。实际上他是仓惶出走的,并不知道情况。

夏霖认真地找他谈话,问他愿不愿意继续干。胡洪涛说:“干!

一定要干！国民党杀我们，我们也不客气，杀国民党！”夏霖说：“这样也不行。我们要看具体情况，坚决反共的，我们对他不客气。不反共的，我们还要争取他们。”胡洪涛听夏霖说得有理，也就接受了他的意见。

胡洪涛与我是初次相识。他在武汉时，是国民革命军某部的党代表。因此，回来之后也参加了县委。

“四·一二”政变与“七·一五”以后的宁汉合流，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不小。“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说是中国大资产阶级叛变了。这一政治判断的错误，理论上发展到以后李立三同志和王明的所谓“两次革命一次完成”的严重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极大的损失。“七·一五”后，共产国际又说是中国小资产阶级叛变了。这一错误的政治判断，以后发展到苏区广泛的对小资产阶级的歧视。其中特别是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在鄂豫皖边区极端反对知识分子的恶劣倾向为最甚。张国焘在《在鄂豫皖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结论》（一九三一年六月）中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此后又对许多经过长期锻炼与考验已成为党和红军领导骨干的知识分子干部，妄加什么“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莫须有的罪名，横加摧残，并在《鄂豫皖分局给陂孝北县委的指示信》（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中提出要“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最后甚至发展到凡学生出身的人都要杀掉。张国焘炮制了这样一个荒谬的公式：“知识分子都是出身地主、富农，而地主、富农都是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必须杀掉，因此知识分子应该杀掉。”结果数以千百计的过去在白区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均遭惨杀，很少能够幸免。这种排斥、仇视、迫害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给根据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困难。鄂豫皖省委和全苏区都没有一个文句清楚的秘书。一张简单的便条都须书记自写。有的游击队和区委无一

人识字，连记个帐的人都没有。事实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绝大部分是要求革命的，许多投身革命并经过锻炼和考验的知识分子干部，则更是党的宝贵财富，说他们“叛变”、“反革命”，是太武断了。这种思想方法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得以纠正。可是，十年内乱中，这种“左”的东西又沉渣泛起，将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加以歧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首先抓的大事之一就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阐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中央对此问题也十分重视，一次一次讲，一次一次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然而要在这问题上拨乱反正很难。“左”的顽固症危害很深，很广，至今尚未肃清！

## 2. 王若飞召我去上海

丹阳农村的群众斗争，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他们得知共产党在这一带异常活跃，然而一时又腾不出手来加以镇压。他们刚刚叛变，脚跟还没有站稳。对他们来说，最紧迫的是要建立一套统治系统，训练一批反共干部。

大革命前沪宁一带的工作主要是由共产党人开辟的，所以基层干部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分子。国民党反动派根本没有群众基础，因此，他们要在较短时期内建立一套统治机构困难很大，不得不依靠军阀时代的官僚和土豪劣绅作基础。这些人一上台就抢县党部、县政府和公安局的权，从而就大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

国民党右派把江苏省党部抢到手，接着派出土劣子弟当清党委员到各县去抢基层政权，造成各个派系争权夺利，争得不可开交。国民党江苏省政府虽在镇江成立，各派系也是争权夺利，争了

几个月，还没有稳定下来。这样，就根本没有余力和时间对付这些偏僻乡村的问题。国民党的叛变激起了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愤恨，到处起来反抗。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不仅是丹阳一地，如宜兴的万镒、史耀宾、潘梓年等人把党的县委也组织起来了，农民协会成立了，会员有七、八千人。江阴的农民也起来了，农民协会的会员已达万余人，并掌握了少量的农民武装。这些情况，对国民党反动派是极大的威胁。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消息传来，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党中央的“八七”会议也召开了。会议精神虽然还没有听到具体传达，但是大约在八月中旬，我们接到了江苏省委发来的《关于组织行动委员会》的第二号通告，省委决定组织暴动行动委员会，加强对秋收暴动的领导。行委成员除省委常委外，还增加了袁达时、吴雨铭、万杰等。名义仍用省委。要求我们完全接受行委的领导和指挥。省委还派了农运特派员到下面具体指导工作。江阴、崇明的农民抗租斗争也开始兴起。我们丹阳的同志也准备行动。

八月下旬，省委派人来找夏霖和戴盆天。这时省委书记已由邓中夏担任。王若飞是省委常委，负责领导农运工作。他们为了加强省委对外县工作的领导，决定调夏霖、戴盆天回省委工作。戴盆天逃走之后，一直蛰居溧阳。夏霖命我去溧阳做做戴盆天的工作。我三次去溧阳找他谈了。他总坚持说：“我身体一直不好，暂时还需要休养。”实际上，他是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不想再参加革命了，至少是想看看风头再说。

我左说右说，他总推托，不肯去上海。我想，干革命不可勉强，象戴盆天如今这样的思想状态，即使去了，也未必是好事。我回丹阳向夏霖汇报戴的情况，夏霖只好一个人去省委。戴盆天后来果然叛变了。

夏霖到上海后，省委命他担任省委巡视员，决定由我担任中共丹阳县委书记。姜寄生很不服气。省委考虑他为人懦弱，又不肯离开家，估计他不可能完成新的任务，因此决定不要他担任这一工作。

夏霖走后不久，省委通知我赶到上海谈工作。我到了上海，由王若飞代表省委和我谈话。他详细询问了丹阳一带的地方情况和我们当前的工作情况，然后就向我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的精神。他说：“八七”会议是党中央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中央开这次会，主要是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我们今后怎么办。他告诉我：这次会议清算了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陈独秀、刘仁静、彭述之他们一是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二是不做军事运动，不抓枪杆子；三是压制农民运动，党的“五大”作出要把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上来的决议，会后他们却不执行；四是搞封建家长式的领导作风。他们这样搞，结果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搞垮了。

王若飞对我说：陈独秀、刘仁静、彭述之他们几个人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民主革命要由资产阶级领导。大革命已经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基本上打倒了。今后应该发展资本主义，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理论是荒谬的。我们一定要在党内加以彻底肃清。陈独秀又主张我们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进行议会斗争，不要搞暴动。这就是投降主义的理论。我们要批判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论调！

王若飞说：现在党中央决定的总方针，是要搞武装起义，搞土地革命。刀对刀，枪对枪，坚决反抗国民党右派的屠杀政策。我们要有系统、有计划地在全国各地准备搞农民总暴动，推翻蒋介石的反革命政权。我们一定要搞我们自己的军队。蒋介石、唐生智这些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如果我们不做军事工作，手里没有枪杆



子，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一叛变革命，我们怎么能不吃大亏！今后我们要非常注意军事，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总的说来，我们要强调革命进攻，组织武装暴动。党中央已经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限，我们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我们要搞“直接革命”，从东到西都暴动起来，搞土地革命，以贫农为主建立乡村政权，没收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没收大、中地主和一切公有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对小地主也一定要实行减租，不能客气。

我仔细听着王若飞的讲话，也不知他参加了“八七”会议没有，只觉得他说的话很有道理，听了心里热乎乎的。现在看来，当时有些内容，如革命不间断性、要不断进攻等等，是比较“左”的。那时我水平很低，分不清他的讲话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只知服从。

王若飞交给我一份材料。我打开一看，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王若飞对我说：这是“八七”会议通过的材料，回去以后要大力宣传和贯彻。

接着他和我研究县委的成员问题，我说：“县委成员大多是中、小知识分子，只有汤醒白是店员工人。”

他说：“那不行，你要吸收产业工人。”

我说：“我那里县城很小，没有工厂，找不到产业工人。”

他对我说的话似乎不大相信，说：“丹阳在京沪线上，还能没有工厂吗？”

我说：“作坊有几个，也很小。工厂确实没有。”

他侧着头想了想说：“那，你要尽量吸收贫雇农参加县委，要改变县委的成份。”

最后，王若飞郑重地向我交代任务说：“你回去赶紧准备，丹阳这个地方必须暴动起来！暴动起来，搞一支农民武装，没收地主的

土地，分给农民，在乡间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你赶紧回去，时间很紧，不能拖！”

我向他反映，我们的活动经费很困难。

王若飞说：“经费问题，目前省委很困难，中央也没有经费，你们自己先设法解决。等各地都暴动起来后，问题就好解决了。”

接受任务完毕，我就回丹阳去了。

这次，听了省委对“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对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比较明确了，我心中很愉快。

火车在风驰电掣般地奔跑着，我坐在火车上默默沉思：蒋介石杀了我们这么多同志，我们不给以更加厉害的打击是不行的。回去一定要把秋收暴动搞起来，狠狠打击敌人！然而如何暴动呢？我毫无一点经验。暴动需要经费，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又象一块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时间这么仓促，怎么办？自己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很低，不懂的事情很多，必须从实践中慢慢地去解决，空想是没有用的。

### 3. 丹阳秋收暴动

我一回到丹阳，就召开县委会议，传达了省委的意见，积极布置暴动。这一下把姜寄生、姜育生、何霖等吓坏了。他们的家都在城内，自己又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拿高薪，生活很舒服。在县委开会研究组织暴动的计划时，他们坚决反对暴动的方针，争论非常激烈。实际上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暴动起来对他们自己非常不利，因此才找种种“理由”来反对暴动。

我看这样下去，县委机关非常危险，不但不能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反而有被出卖的可能。于是，就和汤醒白、胡洪涛商量决定，把县委机关秘密移下乡去，又把城里的支部重新调整了一

下。暴动方针决定暂时不下达，动摇分子暂时不让他们参加会议。为了适应新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必须大大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尤其是秘密工作，一定要建立起坚固的能领导斗争的秘密领导机构。这也是“八七”会议的精神之一。王若飞曾反复强调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对国内外都必须提高警惕，特别要防止党内动摇分子的叛变。我决不能掉以轻心。

为了稳定一下党内的情绪，我和汤醒白商量决定把县委机关迅速移到吴家桥地区，我和汤醒白暂时留在城里，但要随时准备下乡。

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分裂，从合法斗争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政治上的一个大转折。在许多党员中缺乏思想准备，思想一时跟不上，需要做很多工作。有一部分动摇分子，必然要从革命队伍中逃跑。

为了改变领导成员中的成分，决定在第二次县委会议上，增加两名农村的委员，陈作范和姚润生。会议地点移到吕城乡下去开，重新把省委指示精神传达了一下。会议决定坚决贯彻执行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指示，决议丹阳的所有跨党分子坚决退出国民党，不准去登记。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暴动起来，组织武装，夺取县城。县委要求先在各支部做好思想准备工作，俟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命令到达时，即部署行动。

会后，我们县委委员分别到各乡去做宣传组织工作。那时农村长期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农民的生活实在太苦了，对于我们的主张很能接受。前一段时间我们已做了不少工作，在农村有了不少党员、党的组织以及更多的基本群众。因此，火种点到哪里，那里就开始燃烧起来。工作的进展比较快。

我当时却相当幼稚，想法也很天真，认为暴动起来，第一步是

杀土豪劣绅，第二步是杀国民党员，第三步就是把广大农民武装起来，成立苏维埃政权。至于许多对我们不利的因素，例如农民还非常缺乏教育与训练，丹阳地处沪宁线上，江苏又是蒋介石的心腹要地，暴动后必然会遭到反动派军队的疯狂镇压等等，考虑较少，特别对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

九月底，中共江苏省委作出了《江苏农民运动的计划》。这个计划分析了组织农民暴动的重要意义和有利条件，将江苏分为沪郊、松江、无锡、宜兴、丹阳、南京、崇明、扬州、盐城、淮阴、徐州、东海、蚌埠十三个区，对各个区的情况和特点作了简明扼要的分析。对我们丹阳区，指出此地系江南江北交通之枢纽，搞起来后可以影响沪宁线交通，并连结大江南北的农运为一气。因此应立即准备暴动。省委指示我们：农民暴动的总策略，必须根据中央决议案：一、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二、肃清土豪劣绅与一切反革命，没收他们的财产。三、没收重利盘剥者的财产，改良农村中贫民生活。四、没收小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佃农雇农。五、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族祠庙宇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六、解除民团团防的武装与其它地主的武装，武装农民。七、拒绝交纳租税等等。此外，省委还依照江苏的特殊情况，规定了若干地方性的特殊政策，如江苏农运应与上海、无锡、南通等处的工运相呼应等等。省委决定以无锡、崇明、淮阴、盐城四个区域为重点，发动农民抗租暴动。

我们为了准备农村暴动，就想对反动县知事施加压力，迫使他把有几个区的区长职位让出来，换上我们的人。有一次，利用县政府开会的机会，我们去了。那时我以公开身份县农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名义参加会议。县知事原是常州的一个土豪劣绅，清末考过秀才，名落孙山，后来做过官，国民党吸收他为党员。在会上我们为了争几个区的区长位置，以便暴动时可得到支持，对县知事施加压力。那人态度非常顽固，说什么也不肯让步。我将他臭骂

了一顿。他恼羞成怒，站起来，拂袖而去。我想，我们马上要暴动了。暴动起来，先把他杀掉！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我考虑得太简单了，以为他不敢对我翻眼，一翻眼我就可以发动群众把他掀掉。我把事情估计错了，哪知他回去后立即秘密策划对我下毒手了。

十月下旬，我接到省委派交通专程送来的紧急指示，这是一份关于组织全省暴动计划的紧急决议案。省委指出：江苏党自从遭到大破坏后，经几个月的恢复整顿，工作发展很快，已经进入领导暴动的时期，自今日起党的工作都应以准备或发展暴动为其重心。省委一是要求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中以蒋介石、胡汉民为代表的南京派和以汪精卫、唐生智为代表的武汉派之间，因分赃不匀在安徽境内发生武装冲突（即宁汉战争）的机会，立即开展暴动，总的口号是“变军阀战争为民众反军阀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二是要求我们各地暴动一定要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开始发动，具体时机可由各地单独决定，不必等待别地，也不必请示省委，以免稽延时日。暴动起来，要杀土豪劣绅，抄灭其家产，并尽可能地统率四乡广大农民群众占领县城，杀县知事及政府官吏，并由群众推举县政府委员。三是要求我们暴动起来，立即发起攻势，不得有丝毫准备后退或准备失败的心理，如暴动起时只有一千人，第二天至少要增为五千人，第三天至少要增为二、三万人，一定要使群众如潮水般增加，万不得已须退出县城时，亦要使敌人不敢下乡。四是要求我们尽可能破坏敌人的交通，建立我们自己的交通。我接到这指示之后，感到时间太紧迫了，就马上找汤醒白、陈作范等几个县委委员碰头，研究贯彻。

十一月一日，宜兴打响了江苏农民秋收起义的第一枪。四、五千农民进城，聚集在宜兴县立中学大操场开会，决议即日举行暴动，打倒反动的国民党县政府，建立革命的农民县政府；枪毙著名

的土豪劣绅地主等反动派；没收地主豪绅等反动派土地，分给无地农民；政治由县农民革命委员会管理，军事、治安由县农民革命总司令部管理，并当场推举万镒为农民革命军总司令。开会后，暴动群众手持手枪、盒子炮和铁尺、木棍等武器，一下子占领了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进而攻占了县公安局和商团卫队驻地。县知事和公安局长闻风逃窜，群众逮捕了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共三、四十人，当众公审并处决了其中七人。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慌忙调集军队往宜兴镇压。二日，宜兴县委万镒、宗益寿等分析形势后，果断地决定撤离了县城，小部分武装转入宜兴南部山区。

紧接着，十一月九日，无锡东北乡十三个村镇又同时举行农民暴动。三、四千农民颈系红布领带，手持鸟枪火铳刀棍矛叉等武器，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勇猛进攻，顷刻间占领了安镇、泽上、西仓、成家桥、东亭、南桥头、塘头桥、上山、东湖塘、查家桥、石埭桥、堰下、乔巷、陈四房、秦家水渠等村镇。他们收缴地主武装和当地警察的枪械，镇压恶霸地主，焚烧田契、借据，开仓分粮。戚墅堰电厂也停电，散发传单，配合暴动。声势很大。这次暴动是由省委农委书记王若飞和省委特派员夏霖亲自到无锡领导的。无锡县农民革命委员会委员长严朴，无锡农民革命军总司令杭果人，他们原计划准备切断沪宁铁路，并分南北西路向无锡城区进攻。国民党反动派立即派驻在常熟的李明扬、李长江率保安团开往无锡镇压。暴动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了两三天，由于缺少领导农民暴动的经验，终于被镇压下去。

十一月十七日清早，我翻开刚到的《申报》，“无锡共党七名昨日梟首”的黑字标题跳进我的眼帘。我大吃一惊，内载：

无锡：县政府奉省政府令，将所获共党情节较重之王津民、张杏春、严鹤寿、邵杏泉、蔡大炘、夏霖、张子庭等七名，梟首示众。当局奉令后，

即于今日午后三时执行。

“夏霖！”我禁不住低声惊叫起来，赶紧再看那张《申报》的出版日期，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当天同时到达的还有十五日的报纸，我翻开一看，报上又有一则《无锡关于共案之消息》：

共党斩决后消息。县政府俞县长，水警区黄区长，公安局宋局长，准地方各团体的紧急处置，即将情节较重之共犯，于昨（十三日）下午三时，执行斩决，当晚并将首级分别示众，计王津民、张杏春、邵杏泉、夏霖、张子庭五首级，分挂东南西北光复五城门。

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把我惊呆了！

我丢下报纸，就急急忙忙奔到火车站，买了张车票，赶往无锡。我坐在火车上思绪很乱，心急如焚。看形势的发展，敌人下决心又要进行大屠杀。实际上，丹阳的情况也已开始紧张起来，不能不速作准备。按当时情况，我是不应该到无锡去的，但是一种强烈的感情冲激着我，驱使着我，我无法控制自己，终于莽莽撞撞地赶去了。

我在人流中挤出火车站，车站广场上围着一大堆人，神情肃穆地在看着一个高挂的小铁丝笼，里面盛放着一颗人头。我挤进人堆，看了布告，才知道是张杏春的头颅。心里想着夏霖，无锡火车站离北门很近，我就先去北门，竟然看到了夏霖的头颅，内心悲痛极了，真想哭。“勇者不流泪！”忍着悲痛，仔细地看看，夏霖眼睛已闭，脸色灰白。他的尸体又在哪里呢？他的妻子情况如何呢？有没有敢来收殓呢？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

我拖着沉重的步伐，到其它四城门看了看。王津民的头挂在光复门，严鹤寿的头挂在东门，邵吉泉的头挂在南门，张子庭的头

挂在西门，一颗颗烈士的头颅都用铁丝笼装了，悬挂在那里的是人民的“血海深仇”啊！

蔡大炘的头颅，我没有找到。向围观的人打听，据说被挂到暴动最烈的东北乡去了。我回到北门，几度回首望着夏霖的头颅，暗暗发誓：“夏霖同志，我一定要继承您的遗志，打倒国民党右派！我一定要为您报这个仇！”

这七位烈士中，王津民又名孙选，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曾任中共江阴县委书记，牺牲时是无锡县委书记。张子庭又名乔心泉。我在无锡打听到他们被捕和牺牲的情况。听说孙选和县委工运部长张杏春，是十月下旬在惠农桥地下工会机关被捕的。夏霖、张子庭则是在无锡农民暴动的第三天（即十一月十一日），在堵家弄一号县委秘密机关被捕的。七烈士于十三日下午在南校场就义。他们表现得都很英勇，其中夏霖、张子庭态度尤为从容，一路上高呼“共产主义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就刑时挺身伸颈，毫无畏色，死得极其壮烈。这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精神与临难不苟的革命气节，万古不朽！

我连夜赶回丹阳，哪知丹阳县长已向省政府送了呈文，要求逮捕“共党要员”管文蔚，省政府接到呈文当即批了下来。在我去无锡的时候，县里已经在准备采取行动。我们在县政府里是有内线的。我一到丹阳，内线就把消息告诉了我。形势已经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其实我应该当天就撤走，但是我警惕性还不高，还以为不会立即发生事情，加之城里还有不少事要处理，打算耽搁一两天再下乡。

我那时住在胡洪涛家里。他家里开肥皂作坊的，房子比较大。我秘密住在他家柴房里，这里一般没有人到。我公开住的地方是在另一处，晚间则秘密地住在这里。第二天，我正在那里处理有关党的文件，保安队突然把胡洪涛家住宅团团围住，一间一间地搜



索。我所住的柴房门口也站了一个保安队员。这时我早已将柴草把门旁堵塞好，门敞开着。我躲在柴堆里，静听外面的动静。我身上还有一支手枪，十几发子弹。如果敌人搜进来，我就开枪，打死他几个，冲出去，横竖横，拚条命。

丹阳县保安队队长姓毛，一脸大胡子，人称毛胡子。毛胡子带了一批保安队员，抄了胡洪涛的家，里里外外搜查了个把钟头，没有查到我，就集合队伍到别处去搜查了。

我听见保安队撤走的声音。又过了好一会儿，我拎了个布包出来。事有凑巧，我刚拐过一条僻静的小巷子，正好迎面碰上了毛胡子，他是一个人，退避已经来不及了，就准备豁出去干。附近没有别人，我也是一个人。一对一，我年轻，他年大，估量他是打不过我的，况且我身边有手枪，我一点不怕他。他突然见到我，吓楞了。

我一下冲到他跟前，厉声说：“毛队长，够朋友一点！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掏出口袋里的手枪，向他晃了晃。

他吓得直发抖，站在路边连连说：“会长，会长，这事不能怪我，对不起，你赶快走吧……”他深深地打了个躬。

我说：“你站在那里，不许动。”

“是，是，好，好……”他乖乖地退到墙边，老老实实站着，不敢动弹。

我从他面前过去，一直走到巷子口，回头望去，他还呆呆地站在那里发楞。

我对城里小路很熟，三拐两转就到了城外。我出城不久，城门就关上了，挨户进行搜查。

我安然转移到西南乡香草河王骏声家里，当晚召集附近几个支部书记开了个会，把工作布置一下，要各乡提高警惕，白色恐怖到来，平时暴露的同志要暂避一下。我又叫王骏声把我的意见通知汤醒白，要他从速离开城区并暂代我的工作。

第二天，四乡到处贴出了通缉、追捕“共党要犯管文蔚”的布告，各乡又紧张起来。王骏声将我转移到宝堰镇上他的亲戚家里。他亲戚叫孙竹轩，开了一爿布店。宝堰已不属丹阳管辖，但街上也贴了几张捉拿我的布告。孙竹轩是个商人，有点害怕。他把我藏在阁楼上，因我是晚上去的，他店里无人知晓。孙竹轩警告我千万不要下楼，每顿饭由他送给我吃。楼下是他的卧室，外人是不能进来的，所以能保密。我吃饭、解溲都在楼上，真闷煞人。想来想去，工作逼着我，不得不从速离开这里。于是就化装成一个农民，戴一顶破草帽，踏着朦胧的月色，离开了宝堰。为了安全，我不走丹阳境内，而从金坛丹阳边界赶往奔牛，拟乘车去上海向省委报告情况并请示工作。到奔牛已是翌日上午八点多。深秋时节，赶了一夜路，浑身均被露水打湿，计算行程约有百二十里。身体非常疲乏。客车刚过去不久，一间小候车室里空无一人。我就乘等车之际在一张长凳上躺下来休息。哪知醒来时天色已晚，我大吃一惊。我怎么好来这里沉睡！假如被人认出，那就糟了！幸亏这里是属常州管辖，熟人很少。我肚子很饿，出站买了几块饼充一充饥。当晚已没有去上海的慢车，要等次日上午八点，只好跑到一里路外一家农民家借宿一夜，第二天早上去上海。

我在上海和省委的联络点是商务印书馆办的尚公小学，校址在闸北宝山路，跟我联络的同志是束云逵。我到上海后很快找到了他，请他立即告诉省委，我就在附近找了一个小客栈住下。不久，省委王若飞就来小客栈找我。我把丹阳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指示我立即回去，把胡桥和里庄两处农民发动起来，进行抗租抗税，走向暴动，组织苏维埃，搜缴地主枪支，向附近区公所进攻，到山里建立根据地。至于暴动起来的许多问题，省委没有很好考虑，我自己更没有想到如何对付敌人的镇压问题。一味从好的、有利的一面盲目乐观地思考问题。

我接受省委指示后，即匆匆潜回丹阳北乡之胡桥朱梦莲家。朱梦莲是胡桥的支部书记。胡桥是一丘陵山区，南北跨度仅四、五里，东西较长。当时我毫无经验，以为暴动起来就可组织武装向山里流动。我想得实在太幼稚太简单了。

我到胡桥后立即召开县委会议，汤醒白、陈作范等均赶来参加。我将省委决定要我们在胡桥和里庄暴动的计划传达了。大家就商量部署行动。我们将附近的几个支部书记分配到各乡秘密活动，定期一致行动。暴动的那天，事机不密，区公所的主要人员逃遁一空，只抓住几个国民党乡长，开了个两三千人的斗争大会。大会宣布抗租抗税，成立苏维埃，群众情绪高涨。然而，胡桥离丹阳城只有三十华里，离镇江也只有七、八十里。暴动刚起来，丹阳的保安队和镇江的驻军立即向我们扑来。暴动的农民既缺乏思想教育，又缺乏组织训练，一听说大兵下来了，就老婆拖，儿女拽，几个小时就跑散光了。

我们在暴动时缴到二十支枪。敌人一来，还是众寡悬殊，不能对抗。敌人追击很紧，我们只好带了二、三十人夜行昼伏。虽然农村回旋余地大，但是没有经费，没有饭吃，还是站不住脚。经过这次较量，县委中汤醒白等在城里也蹲不住了。姜寄生、何霖等则进一步向国民党靠拢，对我们威胁很大。

胡桥暴动失败了。我们转到金、丹边境之里庄桥一带。接受胡桥暴动的经验教训，我们想暂时停止发起暴动，待准备工作做好后行动。我将这意见报告省委，省委不同意。我们只好匆匆忙忙地又搞了一次千余人的暴动，还是很快失败了。

丹阳的两次农民暴动，规模虽不如宜兴、无锡暴动那样大，但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党所办的刊物《江左农民》创刊号社评《江南的农民暴动纪实》讲到了丹阳农暴，并指出暴动“使得反动派寝食不安，手足无措”。《布尔什维克》第四期《江南农民大暴动之开

始》一文，讲江南农民大暴动本身也是全国农民大暴动之一部份。这些暴动发生在“中国最强有力的豪绅资产阶级的大本营、发祥地——这就是江南”，更有其“特殊的意义”。这样估计是对的，但没有从自己方面作充分的估计。

这两次暴动给我教训是深刻的，每次暴动失败后，都要损失一批同志和群众，如果继续这样不断地暴动下去，党组织可能破坏光了，在敌人心脏内进行暴动，胜利的可能性很小，无锡、宜兴两地的暴动不都是这样吗。“暴动是不是要讲条件？”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开始提出来了，但尚没有勇气说出，埋在肚里再看看。

我在丹阳已站不住脚。省委决定派我去镇江担任省委特派员，负责镇江、金坛、句容、丹阳和扬中五个县的工作。由于当时党的干部太少。“四·一二”事变后干部损失太大，消极、叛变、被关、被杀的很多。据当时全省的统计，党员人数除上海外，已由九千余人减少到不足千人。以后经整理又逐步地恢复一部分，但经过几次暴动的失败，党又遭到大的破坏，群众情绪开始低落了。而敌人的政权开始稳定，因之党的领导机关无法在城市立足。敌人又开始向农村追剿我们。如此境况，党应该及时转变工作方针，但可惜省委不愿考虑这个问题。

我接到省委通知，和汤醒白、陈作范等商量，把枪械藏了起来，留下的同志分散隐蔽，坚持斗争。丹阳县委的工作，由汤醒白负责。我去上海接受新的任务。

#### 4. 担任特派员驻镇江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我又到了上海。当时省委有这样一个观点：“四·一二”蒋介石反共，是中国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七·一五”汪精卫分共，是中国小资产阶级叛变。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都叛变了革命，当然就成了我们革命的对象。

对于这个问题，我从理论上到具体工作上都实在搞不清楚。说蒋介石这些人代表大资产阶级，比较容易理解；说汪精卫那些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就很难想得通。中、小学教师既是小资产阶级，就应该打倒，但是他们并没有叛变革命呀。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也属小资产阶级，他们也没有叛变革命，其中许多人很同情、支持革命。这些人也要打倒，那怎么行呢？我不懂，只能看一看再说。省委指示我今后工作中只有抓工人和贫雇农为对象。然而，我们在农村的实际情况，中农数量很大，党的基层组织的骨干有不少是小知识分子，如果把这批人排除在外，开展农村工作是十分困难的。

我带着这些弄不清楚的问题去镇江，担任党的特派员，负责开辟和发展镇（江）、丹（阳）、金（坛）、句（容）、扬（中）五个县的工作。临离开上海的那一晚，是我很难忘怀的。那一夜，我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到一个新地方去开辟工作，亟须解决的问题很多。经费如何筹措？落脚点如何寻找？机关如何组织？群众如何发动？党、团的力量如何发展？这几个主要问题老是在我头脑里窜来窜去，得不到解决。思考了一夜，我决定首先解决经费问题。

主意一定，第二天乘火车途经奔牛站时，我就悄悄地下了火车，连夜赶到小汪庄一个亲戚家。这门亲戚是我母亲代我定了亲的岳父。他一开门见是我到了，大吃一惊，让我走进他家门后，连忙轻轻把门关上，上了门闩，回过头来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我从上海来。他让我坐下，就不再说话，象是在揣摩我的来意。此人是富农，放印子钱的，家里比较有钱。往常我很讨厌他，但到这时候也就不顾三七二十一，硬着头皮向他开口了。我说：“如今国民党通缉我，我决定到上海去做生意，避避风。你借给我二百块钱，我父亲会还你的，你放心好了。”他吝啬得很，说给你一百块钱，你将

来通缉撤销后，就回来。他的女儿听说我到了，也悄悄起床在门缝里张望一下，叫她母亲出来问我要吃点什么。她母亲煮了几个鸡蛋给我吃。我跟那富农商量了个把小时。他答应借给我一百五十块钱。我写了张借据，注明由我父亲偿还。

我吃完鸡蛋，拿了一百五十块钱，到童家桥附近一位姓朱的支部书记家里。天已将明，我实在疲惫不堪，就在他家舒舒服服睡了一天。傍晚，化装成一个做小生意的人，去镇江。整整走了一夜。

翌日早晨，到了镇江南门，城门已开，许多农民和小贩正纷纷进城，我就随着人群到了城里。

镇江我没有熟人，只有黄包车工会主席闵春华，九月间曾通过在上海的共青团江苏省委一个关系介绍到丹阳来找过党的组织，我和他谈过话。据他说大革命时参加过 C·Y·，要找党的关系。我因情况不明，表面上允许代他转告省委，实际上是准备加以考察。他回去后就没有再来过。听说他女人管他管得很严，不准他再参加革命。当时，凡是跨党的本地党、团员，不脱离国民党的，都必须对他提高警惕。因此，我决定等待在镇江安下身后慢慢打听他的政治态度，把情况弄清楚了，再决定是否去找他。我先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客栈——京口旅馆，想租一间整脚的房间暂住。旅馆的账房先生问我姓名，准备登记。我说：“我叫夏继尘。”夏继尘者，即继承夏霖革命遗志的意思。

镇江一带的工作从何处着手做起？我考虑先对车站、渡船码头、电厂、几个手工业作坊等有苦力和工人的地方情况进行调查。按照省委指示，我最好能在工厂或码头找一个工作做掩护。我在这里工作，必须将自己化装成一个苦力或小本经营者，才能与工人群众接近，否则是危险的，因为这里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白色恐怖与别处一样严重，地域紧靠丹阳，如果我不改变原来的学生腔，很容易被人识破。只有彻底把知识分子的架子丢掉，到工人

中间去，到农村去，开始过一种跟往昔截然不同的生活。现在住在客栈里也不是办法，必须找一间房子住下，并想点谋生之道，才能在这地方站住脚跟。

镇江系大江南北的交通枢纽。水陆码头，人员流动性很大，南来北往的人大多都要在这里歇脚，因此开小客栈的和做小生意的人特别多。有的人就将破旧草房出租给别人开小客栈。我很快在现伯先公园南面租到一间小草房，每月房租只要两元。这里比较偏僻，室内空空，一无所有，雨天房顶还漏水。我花了一块多钱，买了块小铺板，两张旧长凳，支起一张床铺，暂作栖身之处。每日三餐都上小饭摊，每天也得花两三角钱。

住房解决了，职业还是个问题。当工人或苦力一时还找不到门路，于是就决定去做小生意。我买了个大篮子，里面装了些香烟、瓜子和各种糖、饼等。全部资本约七、八块钱。我戴上一顶破草帽，每天都到铁路边道班工棚和轮船码头去叫卖，所赚的钱可以糊口，更重要的在那里结识了一些工人，交了一些朋友。

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听，闵春华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我决定去找他。他一直想与党发生关系，见到我很高兴，谈得也比较好，我答应解决他的党籍问题，并约定每周与他见一次面。

工作进展还比较顺利，在道班工人间已建立一个小组；火车站上也发展了几个运输工人；码头工人中间，也有了组织。我把这些情况报告了省委。

省委见镇江工作已经展开，决定再派几个同志来镇江工作。先派来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同志，名叫苏瑾，她的丈夫在杭州牺牲。省委派她来镇江做 C·Y· 工作。她人地生疏，吃饭住宿均成问题。我开始介绍她给闵春华那里做做杂工，混口饭吃，但不是长久之计。苏瑾很爱打扮，我叫她装成一个劳动妇女，她怕难看，口头答应我而行动上就是不肯改装。

不久，省委又介绍陆钧来镇江搞兵运工作。我们有了三个人，就组成一个临时县委，由我担任书记。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我和陆钧不能住在一起，必须分开。但他初来乍到，只好暂时在我这里先住几天，这样还是不够妥善。晚上，我和他商量找房子的事情。

我说：“你能不能找个孤寡的穷老太婆，认她做干娘，住下来；或者找个把可靠的工人，结成把兄弟，住到他家去？”

陆钧是个很好的同志。这样商量过以后，他就留心了，利用做小生意的机会，他在火车站西边的棚户区找到了一个孤身老太婆，谈得很热乎，就认老太婆做了干娘，天天去帮她做事干活。那老太婆高兴得不得了，主动劝他搬到她家去住。这样，陆钧就搬了过去。

闵春华的党籍解决后，他又介绍两个失业青年入党，一个叫刘治昌，一个叫杨义宣。这两人入党的动机很不纯，我不大放心，闵春华说没有问题。刘、杨入了党，县委决定让苏瑾设法住到刘治昌家去，免得住客栈多一些开支。那时我们用钱真是一分一分地计算。尽管我和陆钧都做小生意，他专跑兵营，我专跑工人聚集的地方，我们两人每天各自能赚八角块把钱，勉强可以糊口。但党的活动费逐步增大，经费困难一天天逼来，县委经费几乎用光了。我又回了一次金坛，找到我的一个堂兄管小同。我这位堂兄是个官迷。他中学毕业后一心想走仕途，弄个一官半职，以求飞黄腾达，荣宗耀祖。分家时，他家分到二百七十多亩地，他一下子卖掉七十亩，得一千数百元。他带了这些钱到北京，找段祺瑞政府去谋官做。结果受人之骗，带去的钱花得精光，连个官边都未沾到，狼狈不堪地回到家乡。他种了一片果树，从此在林泉岩下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他心灰意懒，但又有点不太死心。我找到他，说：“我要在外谋事做，能不能借给我一百块钱做活动费？”他倒挺爽快，说：“借可以，你以后要还我的。”我说：“当然，还你就是。”弄来一百块钱，还是经



费紧绌，我和陆钧有时每天只吃两根油条就撑过一天。

苏瑾挨不过这种艰苦的生活。她和刘治昌谈上恋爱，他俩逃掉了。我和陆钧非常紧张。陆钧的住址，他俩是不知道的。我的住址，苏瑾知晓。因此，我们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我赶快转移到别的地方。县委要闵春华仍到总工会去办公，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并托人到刘治昌家打听消息。刘的父亲讲，治昌借了一笔钱，带了家里那个女孩子到外地去谋事去了。这下我们才放心一些。

为此县委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专门研究刘治昌和苏瑾的问题，要弄清他们究竟为什么要逃跑？是不是去投降敌人，还是有别的原因？投敌的问题，根据多方面的迹象和材料，证实可能性不大，因恋爱而逃跑可能性很大。这样，讨论转移到党员是否可以恋爱？大家的一致意见是党员当然可以恋爱，但必须得到党的批准。即使结了婚的，男女双方也必须服从党组织的纪律制约。不能因恋爱、婚姻而不服从党组织的分配。县委决定党员不准与非党员恋爱，党员间的恋爱也必须经党委批准。如果因恋爱而不顾党的利益逃跑了，作叛党论处。县委决定开除刘治昌、苏瑾两人党籍。这个问题，以后丹阳也发生了一起，也开除了党籍。

镇江工作开展以后，我就到金坛、句容、丹阳几个县去视察工作。

金坛负责人是邓严、蒋铁如，党员有数十人，但县委内部的思想问题很严重。邓、蒋等几个主要负责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国共合作时代的那一套右倾思想，他们都是跨党分子，本地人不肯脱离国民党，党员大多去国民党登了记。叫他退出国民党，无论如何不愿意，特别是邓最严重，他坚决反对暴动，如果一定要暴动，宁可脱离共产党。他们坚持个人既得利益。我说不服他们，只好决定由蒋暂代县委书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白塔桥和西旻一带去。

金坛问题解决后，我就转到句容去。句容那里开始只有党员

六人，建立了一个党的小组。后来发展到十七人，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建立了支部，负责人陈剑平。那里的同志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也不敢大胆开展工作。省委从上海派陈剑平来后，工作才有了起色。我参加了他们的一次支部会，决议是迅速发展组织，限五天内各小组将邻近的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实力调查清楚，报告支部；各小组同志在农民日常生活中自动领导他们起来斗争，但要禁止土匪式的行动。会后，我又到茅山一带作了较详细的调查，那里沿山一带数千农民的生活极其困苦。他们僻居山中，虽不太感到受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压迫，但匪患甚剧。土匪下山来，不问贫富，一抢而光。当地农民视土匪为最大仇敌，人人切齿痛恨。我了解到一个新的情况：这一带农民因防御土匪而自备的枪械不少。我觉得这地区如能多派几个得力的人员来工作，则前途是很有希望的。

丹阳的情况是由陈作范到镇江来向我汇报的。我在丹阳任县委书记时，陈作范在吕城当小学教员，是他家乡的党支部书记，后增补进县委。我离开丹阳，即由汤醒白接替我的职务。不久，汤醒白又被省委调走了，就由陈作范担任丹阳县委书记。他来镇江向我汇报工作，他告诉我：丹阳的白色恐怖相当严重，党的不少基层组织被破坏。吕城有个张官宝，国共合作时曾和我们党有过联系，后参加了共产党。此人官迷心窍，妄想我们推他当区长，此事未果，便对我们怀恨在心。形势一变，他竭智殚虑进行反共活动。五月份，卢子模等在那里秘密开会，由于他告密，卢子模、贺桐芳、臧大保、邵正南、邓裕庚、蔡和尚等均被敌人抓去。枪支、弹药、名册、入党表格等也尽落敌手。这对我们形成了很大威胁。我们党决定铲除张官宝，他得到消息，一吓就跑了。

我问：“现在丹阳城里还能不能活动。”

他说：“不要说县城了，现在连大一点的镇上都没有活动余地

了。只有偏僻农村党的组织还有一些发展。”

我对丹阳工作，又作了一些调整。陈作范将工作情况汇报结束后，我很严肃地交代他，负责同志一定要做模范，特别是在生活作风上更要小心谨慎，群众看我们党好不好，主要是看我们的负责同志好不好。因为我已听到他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怕他出事，秘密工作如果一不小心，就会使党遭到很大损失。

扬中我没有去，在离开镇江前，一直没有去过。

关于这几个县的情况和工作打算，我随即向省委写了报告。

省委为了加强镇江工作，特派巡视员夏采晞来帮助工作。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开了一次全县党员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党员代表共十一人。我主持会议，夏采晞也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要求县委在城区积极组织经济领域的罢工斗争，在乡下更应广泛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他认为全国形势很好，国民党已逐渐走向崩溃，革命高潮必然要很快到来。我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也没表示反对他的意见，只汇报镇江工作基础还很薄弱。

会议选出了县委委员。第二天县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又推选出三名常委。因我兼顾五个县的工作，头绪较多，由闵春华担任中共镇江县委书记。县委对组织、宣传、工运、农运、妇运、兵运等工作，一一作了研究和分工，并重新整顿了组织，将市区划为江边区、小码头区、城区、城西区 and 城北区，将农村划为高资区、宝堰区、辛丰区、黄墟区、魏里区、江边区。

会刚开过四、五天，交通送来了省委七月八日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和党的总策略的通告。省委向我们指出：革命形势和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进展。党的总策略是扩大反帝国主义运动和民权运动，并通过这一运动扩大工人和农民的斗争，加强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省委还根据这个总策略规定了我们的具体行动大纲和行动

口号。过了几天，我们又收到省委《关于江苏农民秋收斗争决议案》。省委为了加强秋收斗争的领导，特决定成立淞浦、沪宁、南通、淮盐、徐海、扬州等六个特委。淞浦特委领导金山、松江、青浦、南汇、川沙、奉贤、嘉定、太仓、宝山、上海、嘉兴、崇明等县；沪宁特委，又称苏常特委，领导昆山、吴县、宜兴、苏州、无锡、常熟、常州、江阴、丹阳、镇江、扬中、句容、金坛、溧阳等县；南通特委领导南通、如皋、靖江、泰兴、海门、启东等县；淮盐特委领导淮属四县及盐城、阜宁、沐阳等县；徐海特委领导蚌埠地区各县和徐海八县等；扬州特委领导扬州、泰州、宝应、高邮、东台、兴化、六合、仪征等县。同时，省委明确指示了我们斗争的目的、策略和任务。沪宁特委布置我们在丹阳马上发动抗租的宣传，尤其要用传单标语等形式将影响扩大到周围各县去。镇江则抓紧发动工人斗争。一直发展到广大群众走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这时，夏采晞就提出意见，要发动镇江暴动。他是上海附近的嘉定县人，曾担任过中共青浦县委书记，这次以省委巡视员身份来镇江。我们是应该听从他的指导的。他要求我们在城市先搞增加工资，如不成，接着就罢工，最后走向暴动；同时在乡村搞抗租抗税，接着也走向暴动，杀土豪劣绅。以城市为主，农村配合，夺取政权。

我经过无锡、宜兴等暴动借鉴的经验，又亲自领导过丹阳胡桥、里庄暴动失败的教训，深知暴动过程中的问题很多，不是凭空想，说说空话就可解决问题的。我又分析了镇江当前的实际情况，认为暴动不是时候，于是我提出我的意见：“当前，镇江这地方是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驻有重兵，敌人控制很严。罢工斗争是不是适宜，应仔细考虑，农村党基础很薄弱，领导不起暴动，是不是可以等一等，我们努力工作，待条件成熟时，再开始暴动，现在看看情况……”

夏采晞性子很急，就跳了起来说：“你这种意见，完全是机会主

义论调。暴动是中央和省委的既定决策。不想搞暴动就是反对中央和省委的路线！怕死，还能干革命？”

我并不怕死，也从来不在困难面前低头，我只是表明当前暴动没有胜利的希望，为什么硬要作无谓的牺牲。他给我扣了不少帽子，我思想上接受不了，就说：“让我跟下面的同志商量商量。”

我跟闵春华等县委的同志商量了好几次，然后又到几个支部去征求意见。

北门的一家织布厂中，有我们一个支部，八个同志，比较靠拢我们的群众有十余人，余者大多是资方的亲友或同乡，因此工作很难做。我们到布厂向支部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工人不同意罢工。他们说：“我们厂小，就织这样一两尺宽的小布，月月亏本，资方一直想关门，是我们要老板维持着的。一罢工，关了厂，我们怎么生活呢？”

湖丝厂规模较大，有六百多人，绝大部分是女工和童工。但是，厂主和工头对工人的控制比任何厂都厉害。外人不能入厂，不准与工人谈话。我们正在做接近工人的工作，决定一个同志先培养他嫂子入党，再打入厂里做工作。我们调查了该厂的情况，这个厂不久前因劳资两方有过剧烈冲突，资方曾短期关闭工厂，胁迫工人。工人无法维持生活，不得不就范。所以要在短期内发动罢工，也非常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动大的罢工并积极走向暴动，条件确实尚未具备。但是，为了贯彻省委的指示，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县委决定采取重点突破的办法。一是派陆钧打入火柴厂开展工作。火柴厂有近千工人，其中男工五百，女工四百。厂里有我们的一个支部。我们研究的工作步骤，先是调查工人生活状况和痛苦；次是通过支部向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作宣传，用调查得来的具体材料控诉厂主和工头压迫工人的罪行；再次是组织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秘

密成立小组；再提出加薪，发动斗争。二是决定驳船帮支部罢工，先向船主申明如不达到增加水脚三成之目的决不复工，次是发表宣言说明罢工理由并派代表向政府请愿。

夏采晞又建议说，我们是否可以组织铁路工人挖掉铁路，以造成巨大的政治影响。我到道班工支部做工作。道班工人说，我们是护路的，现在去挖路，不是自己杀自己的头？他们不同意这样干。夏采晞又问到电厂能不能行动起来。电厂的情况与织布厂也差不多。夏采晞非常着急。他一再强调秋收暴动是省委的决定。镇江是江苏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县份，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我们在这里暴动起来，对全省的斗争影响将会非常巨大。我们在暴动中可以狠狠打击敌人的气焰。总之，夏的意见是镇江一定要暴动起来。

我很理解夏采晞这种思想。实际上这是我们党在“八七”会议以后，就有一种“左”倾情绪在继续滋长，其中包含有盲动主义的因素。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在上海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曾由罗米那兹起草一个决议，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因此必须领导农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决议贯彻下来，一层一层，越变越“左”，变成不论具体条件，全国各地都要搞暴动，连上海、南京这样一些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极严的大城市也是一样，都要暴动，即使是只有一个党员的地方，也不能例外。我们当时的理论水平很低，认识不到“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性质。夏采晞是省委派来抓这一项工作的，暴动搞不起来，他怎么能不着急？就以我自己来说，又何尝不想很快把暴动搞起来，狠狠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呢？本来，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决定。那些天，我们真为罢工和暴动的事情焦透了心。

要暴动就要知己知彼。我们自己的力量是这种情况。敌人的

情况又怎样呢？根据我们的调查，当时镇江的驻军有钱大钧的第二师一个团，象山炮台一个营，第四十六军一个炮兵团，共六、七千人。此外还有警察几百人、商团一百四十人，公安队二百人、水上警察七十人。我们要以少数徒手群众去对付如此强大的武装军警，毫无一点胜利希望，真似以一个小鸡蛋去碰千斤大石。

夏采晞眼看城区暴动一时搞不起来，又说：“暴动是我们党现时的总策略，城市搞不起来，就到农村去搞，非搞起来不可！”

“到农村搞暴动如何搞法？”我故意问他。

他说：“搞抗租抗税嘛！”

“上党没有地主，只有富农，怎么抗法？”

他又说“有土必豪，无绅不劣！农村怎么会没有土豪劣绅？我们不能怕艰苦的工作。”

我告诉他上党只有七、八个党员。

“七、八个党员就不能暴动吗？每个党员带一、二百人，七、八个党员就能带起一千多人，暴动还是有希望的。”

我对他笑笑，这个同志积极性是很可贵的，就是想法太天真，看样子，他的工作经验太少，比我还少。七、八个党员要在顷刻之间带起千把人来暴动，哪里做得到呢？

我们争吵了一阵，不能解决问题，我估计他一定要向省委去告我，说我是机会主义者。于是，我说：“好吧，我们一起到农村去试试看吧。”

我和夏采晞一起到了上党，晚上召开了秘密的支部会议。到了九个同志，我先说：“我们决定在这里发动抗租抗税，组织暴动，成立苏维埃，把一切土地没收过来，由你们自己组成农民会议来分配给贫农耕种。”我又将搞这次暴动的政治意义讲了一下。

大家沉默了好几分钟，夏采晞忍不住又把暴动重要性强调了一下，他说这是省委的决定，不能违抗，一定要执行。凡是行不通

的决定，终是用强迫命令去贯彻。夏的讲话中，带着严重的强迫命令的语气。所有的党员都低下头一声不吭，有的一个劲抽烟。

我心里知道，他们并不是不愿意暴动。只是这一带大多是贫农，生活很苦，经常歉收，没有地主，而封建习惯势力很大，族长统治很严，贫雇农没有社会地位，不可能一呼就招来上千之众，进行暴动。

我对大家说：“暴动是党的决定，一定要搞的，不要怕。我们研究研究怎么搞法。”

大家就开始认真地讨论，根据本地的情况，一致不同意搞抗租抗税，因为没有租可抗，田税尚早，不是时候。最后决定发动群众起来反对封建势力，把庄上的祠堂烧掉，把族长打死，以配合其它地区的暴动。什么时候暴动，由支部去掌握。

任务布置好了，夏采晞要我和他一起回城。我内心很沉重，这样暴动，有什么好结果呢？我拉着支部书记的手说：“小心一点，能集合多少群众就集合多少，暴动一起来，迅速就把群众带到山里去，建立根据地，千万不要留在本地。”其实这是幻想，他们根本不可能召集到群众。

我们回城后，上党支部里的几个同志大多溜到上海去，支部书记把一个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丢进毛厕坑里，把族长家大门烧了一大块。那时就是这样幼稚可笑。上党支部就垮掉。

夏采晞向省委报告，说上党农民暴动虽暂时失败，但在斗争中锻炼了干部，扩大了政治影响，这种说法是不实的。

夏采晞又要县委发动城区罢工斗争。他所说的内容也是执行中央和省委指示的精神。我和陆钧、闵春华等又到几个工厂去做工作。工人们责问我们：“罢工了，我们吃什么？”罢工事实上搞不起来，夏采晞又决定到电厂、织布厂去撒传单。

我们连夜秘密赶印了不少传单，内容是“打倒资产阶级！”“打



倒国民党!”“要求增加工资!”“不增加工资,就罢工!”等等。

夏采晞匆匆离开了镇江,回上海去汇报工作。

我化装成工人模样,和几个铁路工人和人力车工人中比较勇敢的同志,分头去工厂门外呆着。怀里揣着传单,我到织布厂跟前。等到散工时,我就杂进工人中间,趁人不在意,将传单一撒就跑。

由于我们前几天的各种活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警觉。我们的传单一撒,警笛很快就响了起来。不少人紧跟着我追来,相距只有一、二百米。我一拐弯钻进一个公共厕所,赶紧脱下外面的黑色衣服往粪坑里一塞,蹲下装做解大便模样。

警察经过公共厕所,探头望了一下,看到我穿着白色褂子,以为不是他们要追捕的对象,掉头就走。

我赶紧出了厕所,朝相反的方向,从容走去,安然回到住地。

敌人挨家挨户搜查,天色已近黄昏,城门也关闭了,情况十分紧急。我在镇江搞了年把秘密工作,流氓、小偷无不交往。我曾认识一个小偷。他经常爬进城来偷东西,偷得了东西,又从原处爬出城去。他有一条秘密小道,从未被人发现过。我叫他带我去看过,而且试爬了一次。那条通道非常隐蔽,晚上我就从那里翻出城去了。

当时镇江城很小,连城隍庙都在城外。我找了一家无人的破旧草棚子过了一夜。天亮,我转到东门外,雇一条小毛驴,转移到黄墟,再派人进城与陆钧、闵春华联系,由闵继续负责县委工作。

我们一系列活动把敌人搞得非常紧张。到处风传共产党要举行武装暴动,敌人采取了极严的防范措施,夜间查户口,车站、码头也严加盘问搜查。七月底,我们的一个交通运送两支手枪,在火车站被敌人查获。用刑后,供出:手枪是夏继尘托他在上海代购,送到镇江交总工会主席闵春华的。于是,敌人立即搜查了镇江总

工会和闵春华住宅。那天正巧闵春华外出，敌人扑了个空。接着就是广贴告示，通缉夏继尘和闵春华。那几天报纸上，连日报道镇江查获共党偷运军火，“阴谋暴动”，以及搜查总工会，通缉“要犯”夏继尘、闵春华等消息，弄得满城风雨，影响很大。

敌人不知道夏继尘是什么样人，住在哪里，只得挨家挨户搜查。我的房东见我没有回去，就把我的东西收了起来，房门上用把旧锁锁上。敌人查到我住的那家，房东说这屋早就没有人住。敌人从窗口向里望望，除几张破旧桌凳外，别无它物，也没有追问什么。

闵春华也没有被抓到。有人说闵春华的父亲曾经与共党有来往，敌人就要抓闵的父亲。闵父说，你们想想，象我这样的伊斯兰教头子，会做共产党吗？我在镇江几十年，为人怎样，哪个不清楚？你们相信不相信啊！这样，敌人被他哄骗过去了。

我在农村也很危险，派人把陆钧找来，商量了下一步的工作，叫陆钧暂时负责镇江县委工作。安排停当，我从奔牛买到一张慢车票，乘火车去上海，把详细情况向省委作了汇报。

这时，省委已决定把我调往武进去任县委书记，将浦东县委书记袁世钊调去镇江接替我的工作。

袁世钊去镇江后，我们得到他的信，信中说：闵春华已离开镇江，下落不明；党的组织未遭破坏，只是到电厂去撒传单的码头工人牺牲了，布厂工人有七、八人被捕，其中大部不是共产党员，实在冤枉得很。布厂关门，工人失业，有的沦为乞丐。这样乱搞斗争，内心真不是滋味。两个月后袁世钊又被他调，省委决定镇江县委书记由陆钧担任，以后又继续搞暴动，党组织迭遭破坏。“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党造成多少损失！

听说夏采晞被派往扬州特委担任书记。他后来去莫斯科学习，病死在苏联。他是个很好的同志。在镇江这一阶段，主要是受

整个“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影响。他考虑问题，从主观愿望出发，对客观情况很少考虑，甚至不屑考虑，说话常常大道理讲得多，对实际情况很少分析。这样的思想方法和作风，没有不把工作搞垮的。他在镇江的一段工作，就是一个例子。

其实那时我也是理论水平很低，实践经验不够，也常犯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其他许多同志，也同样有这样的毛病，这大概是历史的政治情况，决定着要犯这个毛病的。

## 5. 接替武进县委书记工作

我从镇江回到上海时，省委书记已改由徐锡根担任。党的“六大”前后，大力提拔工人干部，徐锡根原是上海一家纱厂的工人，一九二五年入党，曾担任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等职务。听说他水平不高，作风也不太正派，但因他有一块“产业工人”的招牌，就当上了省委书记。那时他去苏联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还没有回来，省委工作主要由大盛（李富春）、慕群（何孟雄）负责。

一九二八年九月底，何孟雄分管农委及组织工作。他告诉我，省委研究决定由我去常州接替恽逸群（恽长安）的武进县委书记工作。

恽逸群在常州担任武进县委（又称常州县委）书记期间是有成绩的。他是常州本地人，为人正派，也很有才气。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乔心泉到常州活动，成立了一个临时支部，发展恽逸群入党。大革命时期，恽逸群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兼工人部长，领导过一九二七年春天常州大纶久记纺织厂的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北伐军何应钦部到达常州时，恽逸群等控制的国民党县党部曾积极接应，并收缴了反动警察的枪械以武装工人纠察队。北伐军第十七军军长曹万顺竭力排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恽逸群等曾

利用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向曹提出异议，进行了比较巧妙的斗争。“四·一二”事变后，国民党右派占据了县党部、报社、农民协会，以曹宪章、戴天道为首组成了县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和“清党”委员会。恽逸群仍隐蔽其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中共常州独立支部恢复后，他担任常州独支干事，武进县委常委、书记。由于斗争变化，不适宜再留在本地工作，省委决定调他去宜兴任县委书记。

何孟雄对我说：“常州的工作虽开展得比较好，但县委的几个同志都是本城人，不愿离开家，怕艰苦的斗争。恽同志也存在这种思想。你去常州必须迅速把县委领导同志调整一下，同时要尽快把群众发动起来，与国民党进行斗争。根据常州的实际情况，为组织抗租抗税，组织罢工，积极创造条件。常州的情况，由恽长安同志跟你详细谈。今后常州工作，希望你及时和省委联系。”

我接受任务后，找恽逸群谈了一次，恽将常州的政治、经济情况及党的组织关系，给我详细地介绍。我就于十月初到常州去了。

常州在沪宁铁路的中段，城乡人口共九十三万，其中城市人口约十四万左右。工业比较发达，纱厂及布厂中有大成、通成等较大的工厂，工人共约四、五千人；其它有震华电气厂、武进电气厂、厚生铁厂、万盛铁厂、油厂、米厂等等，工人也共约四、五千人。手工业工人有七、八千人。震华电气厂当时规模虽不算很大，工人三百左右，但关系到锡、常两地的用电，相当重要。

常州的土地比较集中。最大的地主是天宁寺，拥有土地六万余亩，其中一万多亩在本县，余者分布在金坛、宜兴、溧阳、溧水、句容等地。万亩以上的大地主还有姓刘的一家，计一万四千多亩。千亩以上的地主有十五家。五百亩以上的地主有百余家。百亩以上的地主有八百家左右。东南乡佃农占整个农户的百分之四十五。西北乡佃农占整个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租税很重，天宁寺

的浮收田租剥削更重，八分的田作一亩收租，每亩田租由一百二十斤至一百八十斤不等。佃农的生活非常困苦。

常州的官僚政客很多，分城派与乡派。城派代表兼资本家，不少人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中任职；乡派代表地主豪绅多。这些人中的头面人物是奚九如、钱淋淑等。钱淋淑为常州商团公会会长。城乡两派内部冲突非常激烈，县长、公安局长均受其包围。常州驻军不多，但商团有枪六、七百支，枪械比较新式；警察有枪二百余支，陈旧的多。

中共武进县委机关在城内，委员有王听楼、沈国梁（沈菊神）、王玉如（王峰亚）、虞士贤、缪国生等人。常州在“四·一二”事变时，党的力量损失不大，除总工会委员长王寿生被捕，杨锡类、蒋何畏等暂时转移外，党的组织基本上保存了下来。常州工人中有党员六、七十名。学生和其他城市小资产阶级中也有党员几十名。城区有三个支部，知识分子中的党员大多编在西赢支部。共青团员也有四、五十人。团县委书记是陈荣焯。农村的党组织，原来留下的只有三个支部，一九二八年夏天有了较大发展。常州南面的前黄镇一带，有七、八个支部，党员大多是教师或农民，其中以天宁寺的佃户为主；西面卜弋桥、奔牛、新闻几处，有几个支部，党员大多是小学教师，少数是农民；北面安家舍，是个有好几百户人家的大庄子，有二、三十个党员；西夏墅也有几个党员，大多是饭店、旅馆的职工。八月，恽逸群调离之前，县委决定将农村的党组织划分为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片，建立了四个区委，各有四、五个支部，共有党员二百来人。除天宁寺佃户有过少数抗租外，其它地方未曾掀起过大规模的斗争，对敌人和地主触动不大。

恽逸群是一个头脑清晰，比较实际的同志。他后来担任宜兴县委书记，工作也做得比较平稳。一九三〇年他去浙江，先后担任中共肖山县委委员、浙北特委秘书长等职。一九三二年起即长期

从事新闻工作和地下情报工作，是一位很有名望的新闻工作者，写过《蒋党真相》等著作，当时在我们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新华文摘》上连载了好几期，影响很大。解放后，他任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一九五五年蒙受冤屈，被关在牢里十年之久。在十年浩劫中又吃足苦头，但他仍对党忠诚，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于一九八〇年四月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已是垂暮之年，不久就逝世了。我回忆这段往事，认为对这样一个同志还是应该写上一笔的。

我到常州，就住在玉梅桥附近的斜桥巷七号，这是沈菊神的家。地点比较僻静，沿街有一堵围墙，墙内是天井，一侧有一个用石头砖块砌成的大花坛，正中一棵很大的天竺，枝叶茂密，鲜红的天竺子，非常可爱。穿过天井，有幢三间平房，后面通向厨房。这房子原是接引庵的师公王元福私人所建，建成后暂时不用，租给沈菊神的父亲沈锦镛在此开设了一间“圆源转运公司”。这幢房子有很隐蔽的阁楼，三间阁楼相通，进出口在右侧的房间内。人上了阁楼，即将盖板放下，很不容易发现。我就以转运公司为掩护，建立了交通联络站。我经常住在那阁楼上，有时也利用那地方召开党的秘密会议。沈菊神的母亲与妻子就在下面做针线活，实际上是为我们望风警戒。沈菊神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六师十六旅四十七团副团长，积劳成疾，于一九四四年逝世。

常州白色恐怖比其它城市稍好一些，主要原因是这里阶级斗争尚未揭开。但长期秘密工作的经验教训提醒着我，一点也不敢麻痹大意。

当时，京（宁）沪特委（又称苏常特委）已成立两个来月，机关设在常州。特委书记高士贤，原无锡县委书记陈鸿担任常委兼组织部长，原吴县县委书记张子华担任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长，特委委员还有钱正表、茅学勤、宗益寿、恽长安。钱正表当时是江阴县

委书记，茅学勤是江南农民革命军负责人，宗益寿是宜兴县委书记。我到常州接替恽逸群任武进县委书记，同时也接替他担任特委委员。因为常州在京沪特委所管辖的范围内是个很重要的县，所以组织上考虑县委书记应参加特委。我参加特委后，主要是当特委巡视员。

我到常州将近半月左右，特委准备召开一次代表会，由高士贤（化名江英成）、钱正表（化名章阿大、金雨生）等同志负责筹备。不幸一天特委设在常州大成旅馆的联络站，被江阴跟踪而来的敌人密探查觉，高士贤、钱正表及常熟、江阴两县的代表江济森（梅光迪）、沈俊、周书生、锺锡福六人被捕。翌日，又抓了一位同志。我们都非常紧张，决定将特委机关转移到苏州，特委书记由陈鸿代理。

敌人抓到钱正表，真是如获至宝，赶紧解往江阴严加审讯。钱正表一口咬定自己叫金雨生，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软硬兼施，并叫叛徒来当堂指认和对质，叫钱正表的亲友到狱中劝降，种种花招都使尽了。钱正表始终坚贞不屈，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最后敌人说，只要他口头声明脱离共产党即可开释，钱正表仍然严辞拒绝。结果，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江阴西门外君山附近慷慨就义。

事后，我读到过他在狱中写的一首小诗以及临刑前的亲笔遗嘱。

诗是这样几句：

草地斜阳，洁白而纯洁的羔羊。  
不绝地跳跃，不绝地徜徉，  
归乡何处？断头台上。

遗嘱是托一位同狱的难友保存并带出来的。钱正表在遗嘱中这样写道：

余以努力中国革命，历年奔走南北，无时或息，不治生产，不顾家室。母则双目失明，妻则中途离异，无子无女，断种绝嗣，今且并此孑然一身，亦将为革命而牺牲矣。革命到如此地步，亦可自问无愧，而荣幸为何如乎？凡我家属亲友，切勿以我死而悲哀，当偕我同呼革命口号也。

我死后，切勿棺葬，可火葬后投入大江，随滚滚东流而入大海，何等干净！现在中国社会之坟墓制度，以一臭皮囊，占据能生产之土地，实为万恶。望革命当局，将此制度随我同葬江海，亦革命事业之一也。

义贞爱友，我死勿过悲，善保汝体，善事吾母。待吾母归天后，汝方能大解脱。继父伯母，均有人侍奉，毋庸过虑。

我家遗产，仅破屋两间，荒田十亩，我母在时，谁也不能变动。我母死后，伯父家遗田，可悉归金姊才妹主持，屋及西边埭堂后六分，可给四姊外甥家，西田给保根抵债。邢家田二亩，西边田一亩三分，除母亲丧费外，可捐入公家作为教育费。此嘱！

此纸义贞、四姊、金姊、五姊、才妹同执。

中华民国十七年 月 日

钱靖泉临刑亲笔书

钱正表是党的好儿子，毕业于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比我早几年。他在丹阳“二高”任教时，与我才相识。后来，由老师而同志，而战友。今日回忆他这段历史，内心仍有余痛。

## 6. 白塔暴动

特委机关移到苏州，我不得不过来往于苏常两地。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京沪特委常委会通过一个文件



《对金坛工作决议案大纲》。特委对金坛的党组织过去一段时间内未能广泛宣传党的思想，未能切实地组织群众，秋收斗争计划不完备，消极等待情绪严重等问题，作了严厉的批评。特委认为金坛抗租暴动条件已经具备，要我以巡视员的身份速去金坛，领导那里的农民暴动。

为什么特委做这个决定？这事还得回过头来补说几句。在一九二八年的早春，我刚到镇江开辟工作不久，金坛的蒋铁如持丹阳里庄桥姜一鹭的信赶到镇江来找我。他原是在常州当中学教师的，我只知他是国民党左派。他将姜一鹭的信交我。他说是受中共金坛独支书记邓严（又名邓振芳）的嘱托来寻找上级组织的。金坛独支在国民党反动派“清党”时，邓严、马伦被送到南京关押了一百二十多天，于一九二七年八月释放。他们回到金坛后，派蒋铁如到丹阳找党，蒋在金坛边界之里庄桥找到了姜一鹭。姜一鹭命其来镇江向我汇报。

我对金坛党的工作负有责任。蒋铁如向我汇报了金坛党的一些情况。据他说，金坛的党组织开始是由马伦、邓严、徐革他们搞起来的。马伦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由戴盆天介绍参加国民党，后又由侯绍裘介绍加入共产党，党派他回金坛，发展了党员十多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邓严家里开会，成立中共金坛支部，选举了邓严为书记，委员有马伦（负责宣传）、徐革（负责行动）、刘涌泉（负责交通），组织工作由邓严兼管。一九二七年三月，省委决定金坛成立独支，负责人仍为原支部的人员。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全部由我党党员担任，邓严是常委。“四·一二”事变后，四月十七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员到金坛，要邓严交出共产党员名单。邓严说：“不清楚谁是共产党员。”那人说他是邓演达派来的，并出示伪造的邓演达信，说要召开会议传达邓演达的指示。邓严等信以为真，即于次日集会，会场被包围，六十余人当场被捕，徐革翻墙逃走。由

于敌人未掌握我党组织名单，搞不清情况，所捕的人陆续释放，只将邓严、马伦带往南京，搞了三、四个月仍毫无结果，只好放回。

我进一步询问蒋铁如本人的情况，他说他是共产党员，这次调整组织后他担任了独支委员。

我又问：“你们那里现在还有些什么人在负责？”

蒋铁如说：“现在的独支是临时性质的，我们一时找不到上级，只好由原来的独支负责人邓振芳、马伦、徐革三人出头重新搞，除了他们几个外，独支委员新增加了潘洪仁、艾小根和我。邓振芳表面上仍是国民党金坛县党部常委。艾小根又叫艾焕章。他是小刀会的首领，手下有几百人。”

“党员和群众的情况怎样？”

“原有的党员不少消极了。凡是消极动摇的，我们均已除名。党员人数大大减少了，但是群众的情绪还高，我家四周大多是地主家的佃户，发展的基础是不错的。我们最着急的是得不到上级党的指示。”

我进一步详细地询问了他和邓严、马伦、徐革以及其他几个主要人物的情况，然后鼓励他说：“听你所说，金坛的情况还不错，受了些挫折，你们现在又搞起来了。你们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要把革命坚持下去。你回去告诉他们几个，在未得到上级指示之前，先积极行动起来，重点放在农村，先把农民组织起来，抗租抗税。”

他一边点头，一边又问：“那，谁领导我们呢？”

我说：“你们先搞起来，不要等待。我会把你们那里的情况报告省委，到时会派人跟你们联系。”

蒋铁如听了这话，回金坛去了。他们果然很快搞了起来。他们这几个都是金坛本地人，在地方上有点名望，很多人都听他们的话。时间不长，就组织了三、四百人的秘密农会。我把他们的情况向省委作了报告，省委要我直接领导他们，在金坛城乡迅速发展党

员。金坛自从接上组织关系后，工作进展很快，短期内即发展了七、八十个党员，建立了五、六个支部，我专程到金坛去了解情况，曾将县委领导人员作了调整，报告省委。省委同意于是年四月建立中共金坛县委，书记邓严，委员有蒋铁如、潘洪仁、沈长庚、戴培坤。我当时觉得邓严这人不很理想，换了蒋铁如。艾小根虽是党员，但江湖习气较重，仍由他抓好小刀会的工作。

我离开镇江后，袁世钊去，情况不大熟悉，一时顾不上金坛的工作。蒋铁如系知识分子，虽有热情，但比较软弱，工作情绪忽高忽低，有冷热病。一旦没有上级组织的具体指示，就等待观望，工作停滞下来了。

因为有这样一段过程，特委认为我熟悉金坛的情况，所以命我二次去金坛，整顿金坛工作，并临时担任武装暴动总指挥。我在武进的县委书记工作仍要兼顾。我离开后，由王峰亚多负一点责任。

特委要我坚决贯彻特委关于金坛工作的决议，切实把县委整顿好，必要时可以撤销原来软弱无力的县委，清洗消极怠工的成员，由我亲自担任县委书记，重新组成坚强有力的县委，以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暴动。暴动起来后，迅速组建一支农民游击队，开往西旻，到茅山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游击战争。

特委意见要尽快把群众发动起来，对土豪劣绅坚决惩办，对大地主的房子，干脆烧毁。这些都是不顾客观情况的作法。我虽对暴动的认识已有新的发展，内心开始怀疑“没有胜利希望的暴动是不是应该搞”，但行动上还是坚决去贯彻省委的方政策的。

一九二八年四月，我到金坛时，把金坛工作由城市转到农村，主要是城北的白塔区和茅山的西旻山区。半年多来，白塔地区的工作已有相当大的发展。是年适值天旱成灾，广大农民生活无着，更愁交不出地租粮税。我想，这时举行暴动，是比较适宜的。

我到了白塔地区，即向县委传达京沪特委对金坛工作的指示精神。他们受到严厉批评，感到很不愉快，有的有委屈情绪。

我对蒋铁如说：“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教训，赶快把暴动搞起来。”

我和蒋铁如商量决定，就在白塔地区发动群众，举行暴动。

我们立即召集那一带的五、六个乡的支部负责人，在管庄开秘密会议，商讨暴动计划。管庄的党支部书记丁志仪和委员潘洪仁，表现很积极。邓严态度暧昧，他根本不想干，许多重要部署不得不躲避他。艾小根的态度不大可靠，但毕竟是小刀会头领，他表现是一个英雄好汉的样子，将胸脯一拍说：“此事全在我艾某身上。暴动一定能成功！把那几个地主老财统统杀掉。”我们还是信任他。

我们估计：五、六个支部的同志，带领佃户联合委员会的群众共有几百人，加上小刀会的会众，就有千把人了。收缴几十条枪，再搞一些大刀长矛，把队伍拉到西旻，成立苏维埃，是有可能的。

根据特委指示的精神，成立了暴动委员会，我担任总指挥，蒋铁如和潘洪仁担任副指挥，吕靖潮、丁志仪（丁维藩）负责党和粮草工作；蒋铁如和潘洪仁主要负责组织暴动联络工作。

我命蒋、潘二人留在当地积极秘密准备，我就特地到西旻去实地察看一下。那里是茅山东麓的一个小镇，我在镇江时曾到那里去过一次。那里有一个支部，支部书记姓李，是认识的。

我跟他一谈，他非常兴奋，对我说：“这里没有问题，队伍来了可以蹲在山里。我们这里不少人家有防匪的武器，待大部队到时，可以想法动员出来。山下地主武装较多，而且有碉堡，恐一时不大好办。”

从白塔到西旻一百多里路程，要过好几条河，地主武装一定会迎头拦击，丹阳和金坛的敌人保安队，一定从后面追击，究竟能达到目的地吗？我思考着，得不到解决，急急赶回白塔再与蒋、潘、

丁商量。

我们在艾小根家里开了暴动委员会会议，研究了暴动队伍的组织，金坛敌人的兵力，地主武装的数目，可能缴到的枪支，部队往西旻去的路线，以及粮食问题等等。最后确定了暴动的时间。

一天晚上，碧空如洗，银色的月光倾泻下来，大地宛若铺上了一层繁霜。我们开了一次全体党员大会，进行动员。会上宣布了暴动委员会的决定：没收地主所有土地，分给农民；凡土豪劣绅、国民党乡长，均格杀勿论；暴动后组成农民游击队，由潘洪仁、丁志仪带领，开往西旻，成立苏维埃政权。同时，还具体布置了哪些人去缴枪，哪些人去杀地主，哪些人去烧房子等等。

暴动时间到了，我们晚上在蒋庄吴家祠堂召开群众大会。各支部同志按原定计划，把暴动群众带来了，大约有三、四百人。我和蒋铁如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大家起来抗租抗税。佃户们纷纷在会上控诉了地主剥削农民的罪行，表示了抗租抗税的决心。这次农民暴动的誓师大会开得很成功。

当晚我派人去丹阳联系，命吕庄一带的秘密武装集合星夜赶来我们这里一起行动。

暴动起来了。潘洪仁、王金寿、王义隆等五十余人，身带武器，从白塔官圩桥西出发，直奔水岔口，打开坏乡长翟老二家的大门。他见了我们同志吓得软瘫在地，叩头求饶，发誓不再为地主收租粮，并愿交出家里的钱财，给农民游击队买武器。

我们返回预先指定的集中地点，东方已白，各庄的暴动群众正纷纷聚齐。队伍竟有七、八百人之多。奇怪，艾小根所率领的小刀会却杳无消息。我立即派人去艾小根家联系，他们还在祭菩萨，吃符咒。我们就着手编队。农民家属一听说男人要出去当兵，父母妻子蜂拥而至，哭的哭，拉的拉。我喉咙都喊哑了，也无法加以阻止。

事态的发展，很快惊动了敌人。丹阳县保安队加上警察共二百来人，金坛县保安队五、六十人，都连夜出动。镇江的敌人也开始向我们这个方向开来。

情况越来越紧急。暴动队伍经家庭父母妻子的一阵拖拉哭劝，加上敌人的枪声，有的悄悄离去，人数也越来越少。潘洪仁的管庄支部表现很好，缴来了七、八条枪。蒋铁如已经不辞而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金坛敌人离我们较近，他们一路走，一路打枪，在离我们四、五里路的地方停下来，不敢前进。到中午时分，丹阳敌人也离我们不远了。情况极为紧急，我们只有撤退的一条路了，我命丹阳的同志立即撤回原地隐蔽。这点武装来之不易，不能轻易遭受损失。

最后，我身边只剩下了潘洪仁、丁志仪、潘达仁以及二、三十个勇敢的青年，向里庄桥方向撤退。

当时我劝潘洪仁跟我们一起撤，他的老婆孩子哭着，拽着，死也不放他走。潘洪仁对我说：“你们走吧，我留下来继续搞。”

我要把我手中的一支手枪留给他，他不肯要，并说：“你带着防身，我在这里有办法的。”

潘洪仁就在当地躲藏下来。

敌人到了白塔一带到处抓人。当地不少党员和群众被捕。小刀会也有几人被捕，包括艾小根在内。蒋铁如被通缉。我由于用了化名，敌人一时搞不清究竟是谁。

我们退到金坛与丹阳交界处的里庄桥一带，那里的同志已转移隐蔽，我们无法找到姜一鹭等人，老百姓都不敢靠拢我们。我们二、三十人，又冷又饿，天黑后到没有人注意的小村庄里弄点米烧顿饭吃，又坚持了几天。由于活动地区太小，敌人追剿很紧，无处隐蔽，大家商量结果，在横圪附近的坟墓里把枪埋藏起来，人员分散。丁志仪、潘达仁留下坚持斗争，有的人到外地投亲靠友，等待

时机，准备回来再干。

白塔暴动失败后，我即回到特委汇报暴动经过。特委一方面肯定了白塔暴动的政治意义，一方面对暴动失败给我严厉的批评，说我不能及时把暴动队伍拉到茅山去建立根据地，丧失了时机。我当时没有反驳，只请求省委速派人去整理金坛的组织。

几个月后，潘洪仁、丁志仪等又在白塔搞了一次暴动，再次被敌人镇压下去。潘洪仁被捕。他受尽了敌人种种酷刑，双腿被打断，仍坚贞不屈，于一九三〇年被敌人杀害。潘洪仁在就义时非常英勇。双腿被打断以后，不能行走，敌人用箩筐抬着，押往刑场。他在箩筐里怒骂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并高呼口号。沿途的群众饮泣送行。潘洪仁面对敌人的屠刀，毫无惧色，引颈就戮，围观者无不凄然，同时牺牲的还有王金寿、王义隆两位同志。

丁志仪当时表现尚好。于一九三〇年省委派他去镇江担任县委书记，后被捕叛变。

我接二连三领导暴动失败，事实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在京沪线上的农村是不是可以搞暴动？敌人势力那么大，自己力量这么小，以卵击石，没有不失败的。”这意见我只能埋在心底里，如果泄露了，我就有可能被开除出党。这时省委已改组，省委由徐锡根、王克全、李富春、徐炳根、赵容（康生）、何孟雄、胡光明组成，徐锡根任书记。我仍任常州县委书记兼京沪特委巡视员。

跌一次跤，总要总结一点经验。我从这几次失败中，对小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民的特性开始有了比较深切的了解。多少年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形成了他们浓厚的家庭观念。朴实、勇敢、敢于斗争，这都是他们好的性格，但他们有见识浅，凡事看不远，组织性、纪律性差等缺点。所以农民暴动不仅要有坚强果断的领导，而且要有一批懂军事的干部作骨干，或者有一支军队作骨干，使他们有所依附，否则光是一批农民，很不容易形成一支作战的队伍，

即使形成起来，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锻炼。

## 7. 重回常州工作

在我回常州之前，省委找我谈了话，要把常州工作重点放到工厂和京沪铁路去，农村则以天宁寺佃户集中地区为主。总的精神是要争取震华电气厂、大纶纱厂、申新纱厂等几家规模较大的工厂发动群众起来罢工，同时组织天宁寺佃户起来清算它的浮收和进行抗租斗争。在京沪线的中段造成一个很大的罢工抗租斗争声势；同时，罢工起来后迅速占领电厂，切断京沪线上无锡、常州两大城市的供电，给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

我虽因几次暴动失败而受了批评，省委对我还比较信任，仍将组织武装暴动任务交给我去承担。

我接受任务后，即回到常州，仍住玉梅桥的联络站。我找几位同志了解了一下我离开后一段时间内敌我情况，再召集开了一次县委会议，我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精神，会议沉默了好一会儿，没有人发言。县委同志大多是本城人，罢工或暴动起来，就可能有家破人亡的危险。去年宜兴、无锡、江阴等地暴动的失败，牺牲了很多同志，这教训在他们内心尚颤抖着，余悸未已。我的传达使他们惊住了，我深知他们的内心苦痛，一个共产党员真正做到为党的利益去牺牲个人的一切，是严重的考验。我看大家不肯发表意见，就说罢工和暴动，虽属省委的战略目标，但要做到这一点，是要靠我们平时的刻苦细致的工作，去创造罢工的条件。我们必须努力去工作，并不是要我们明天就去领导罢工或暴动。这一点希望同志们不要误会，请大家尽量发表意见。

“我认为组织要进一步隐蔽，不能轻举妄动。”王听楼开始说，“省委的要求，我同意，”他有点“口吃”，接着说，“不过一定要等待



适当的时机，一定要……我们才能有大的行动，不能冒冒失失。无锡、宜兴、江阴、金坛这些地方的暴动都失败了，死了那么许多同志，这个教训，我们一定应很好记取，不能把多年积聚的力量毁于一旦。”

“我们这些人小都在城里，暴动起来，许多实际问题不好解决……”

几个同志发表了不少意见，总的倾向是搞罢工斗争是可以的，搞暴动是不赞成的，但不肯公开反对，只说暴动的条件不成熟，我们现应进一步隐蔽精干，扎扎实实地做工作，待将来机会到来时再说。“机会”在我脑子里闪过这两个可怕的字眼，因我已被怀疑是机会主义的嫌疑分子，如果采取这个方针去工作，那末，不是机会主义也是机会主义了，但我又不能反驳他们，他们这些意见，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而此时此地只好做到心中有数，默默地放进肚子里。

“机会主义”这个概念，说不清楚。但省委的指示精神我必须贯彻，今天说不服大家，只好以后再说，今天只谈谈具体分工问题就结束。

从这次会议后，我思想上很着急，如要贯彻省委指示精神，必须到工厂到农村去把实际情况摸清楚，否则很难做决定。

当时，我们县委有三个完全脱产干部：我、王峰亚、蒋何畏；两个半脱产的干部：缪国生和丁振环。省委每月给一百多元伙食和活动经费，全部在内，财政情况比过去好多了。因之我们暂不需要象镇江那样去拎篮子做小生意或到铁路上当道班工了，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跑工厂、铁路和学校。

我们经常化装成工人到几个大工厂去找工人作无形的调查研究，了解工人的迫切要求，不断地去组织一些不易暴露自己的小斗争。

我也常去前黄乡下。前黄这个地方是我们在东南乡的活动中心。党支部设在前黄公学里，支部书记是陈枕白。他的爱人傅一星也是党员。夫妇两人同在一校工作。这所学校是杨锡类、杨墨斋所办。校本部设在杨家祠堂，有教员六、七人。西街头的三近书院，是前黄公学的分部，有教员二、三人。后街还有一所景德寺小学，也有教员二、三人。三处合在一起，通常都有十几个人，半数为党员。学生中有共青团员三、四十人，都是些高年级的大年龄学生。杨锡类，原名光俦，他原在无锡教书，一九二五年曾发起组织无锡小学教师联合会。同年九月，中共无锡独立支部成立，他任支部书记。北伐军到常州时，杨锡类出任武进县公安局长。常州“四·一四”事变时，他与蒋何畏同去武汉。由于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来信，县政府撤销了对杨锡类的通缉令。他又回苏南，活动于锡常之间。

杨锡类的家族是前黄镇一带的大姓，历史上有不少人曾在朝廷中做大官，是一股很大的地方势力。杨锡类本人在当地也颇有名望，一般人不敢轻易动他。因此，前黄公学便成了我们党的一个较好的秘密机关，西边的施家祠堂则成了我党宣传材料的印刷所。宜兴暴动失败后，宗益寿等曾在此得到掩护。恽逸群、王峰亚、恽玉堂、蒋何畏、李文等，也曾在此以教师工作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杨锡类家在前黄有田产一百多亩，充作学校活动经费。因此，这里成了武进东南乡农民运动的指挥基地。

我下乡也常在前黄公学落脚，到周围一些地方去活动活动，开开会，了解一些情况。

前黄镇本身农民的力量虽不算太强，但周围的谭庄、都家桥等地的农民大多是天宁寺的佃户。天宁寺的田租很重，麦子每亩收三、五十斤，稻子每亩收一百几十斤，而且用大斗大秤，每百斤地租，额外还要多收二十来斤。佃户交不满租，则翻缸倒罐，连种子

都强行取走。因此，这一带的佃户对天宁寺和尚恨毒切骨，普遍有减租的迫切要求。他们与天宁寺和尚已斗了两三年，收效还是不大。我们去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一般的佃户均非常欢迎。然而，当我在党的会议上传达省委的指示，谈到要搞枪，组织武装，准备暴动等问题时，他们的神色也非常紧张。他们都听到过邻县暴动失败的消息。

“这时暴动，危险哪！搞搞减租减息是可以的，暴动一定要失败，不能搞。”这是大多数人的意见。

他们告诉我：几个月前，在我们党领导下，周如乔、朱杰等人组织了二百多人，在旌孝乡西庙开会，准备暴动。这事被国民党当局侦察到了，敌人一得到情报，就派警察和商团下乡镇压。敌人包围了小园窠。周如乔、朱杰等突围出来，藏在朱杰家里的暴动宣传品和农民协会花名册等等均被搜查出来。敌人还抓走了俞桂根、俞家锡等四人，下落不明。武进过去没有搞过武装暴动，一直比较平稳，因此这事对他们印象很深。

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这半年来武进周围地区由于跟武装暴动有关的事情而牺牲或被捕的同志很多，如金坛白塔桥的潘洪仁等，江阴周庄红军游击队干部葛玉怀、陈宗全等，长寿、祝圻一带的朱其连等，沙洲农暴骨干蔡小书等，常熟里仁区委负责人赵守诚等，大多均付出了血的代价。

根据这种情况，我和蒋何畏商量（蒋当时系县委农运部长），为了贯彻省委指示，必须先把这一带的组织整顿一下。于是就调整了东南区委，让徐炳全任区委书记，同时组织了东南乡清算天宁寺浮收田租佃户联合委员会，以加强这一地区抗租斗争的领导。

都家桥支部书记是小学教师周华，都家桥小学里的四位老师都是共产党员。这所学校完全是民办的，周华他们几位老师自己边种地，边教学，边干革命工作，靠种地所得养活自己。全校共有

一、二百学生。周华他们几个人思想比较好，且家口均不在本地，无所忌憚，都赞成暴动，其中个别同志特别表现兴奋。这也是很符合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的。我在这所小学里住了十来天，和周华他们谈得很投机。

我到—个地方，换一个化名，以迷惑敌人的侦探。装束也因时因地而变化。到学校，穿长衫，戴眼镜；到农村，短衫裤，腰里束根腰带，头上戴顶旧草帽；到工厂，则是一身油腻腻的工人打扮。这种办法可以使敌人对我捉摸不定。

武进县当时在京沪线上党的工作基础是比较好的，活动起来比较方便。我跑了东南乡，又跑西北乡。西北乡土地贫瘠，农民生活的困苦情况，比之水网地带的东南乡更甚。那地方东西与江阴毗邻，西边与丹阳衔接。茅学勤等同志自一九二七年秋冬以来，即在武澄、武丹交界处搞武装活动。我到西北乡之前不久，江南红军游击队江阴西区支队负责人高大生、高小生还曾率领部分武装活动于龙虎圩北贤庄一带，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

西夏墅镇上，党员同志大多是服务行业的雇员。有一次，支部书记带我到馆子里吃饭，我发现送上来的菜里油水很足，虾米很多，收钱却很少，心里觉得奇怪。走出店堂，我问那支部书记：“那大师傅跟你很熟，是不是党员？”支部书记含笑点了点头说：“是的。”我才恍然大悟。秘密工作时期，同志之间表达感情的方式也真别致，不用语言，不用握手、拥抱，却把情谊寄托在这炒菜的油水和虾米上。

我在农村，前前后后跑了一个多月，连马家寨等处都跑到了。这时，我们接到省委三月中旬发来的《关于职工运动与工会工作的正确路线》的通告，严厉批评了过去党的组织放弃领导职工运动和工会工作的偏向，提出党的职工运动的路线是通过支部、党团等基层组织，大力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抓住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

和目前最迫切的要求，发动群众进行斗争。

我急急忙忙地又回到城里，根据省委这一指示精神，召开了县委会议，把城市工厂和铁路工作，又进一步作了布置。从此以后，城市工作有了新的的发展，城区的几个主要工厂，都有了组织，罢工一时还搞不起来，群众情绪不高，怕失业，加上黄色工会的破坏，开展斗争是不容易的。

王峰亚和王听楼负责工运，工作还比较积极，这是县委的得力干部。

我们经常向省委作报告，省委也经常派交通将指示文件等送来。时间已近五一国际劳动节。省委送来开展士兵运动问题给各特委、县委的指示信。要我们在国民党军队士兵群众中尽力发展党的组织，派工农分子或党员去当兵或担任军队其他职务，创造条件，发动士兵起来斗争。省委明确指出南京、上海、徐州、蚌埠、镇江是这一工作的重点。我们研究了省委的指示信，认为常州虽非省委指定的重点，也应该注意做好这项工作。因之我到大纶纱厂去动员几名党员或工人到国民党军队去当兵和当厂警，夺取厂里的枪支。工人同志没有一个肯去，这是我的空想，决定还是派一两专职干部去做兵运工作，在原有军队内部发展组织，从内部去开展斗争。派人进去当兵，不是不可以，只是要有一定的条件，否则是做不到的。

省委决定从五月一日至七日为赤色纪念周。要求常州也围绕五一国际劳动节、“五·三”济南惨案一周年、五四运动十周年、“五·五”马克思诞辰等，积极开展纪念活动。

省委还陆续发来了关于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工作的决议和关于各级党委军事指导机关及军队中党的组织大纲等文件。这些指示，我们都一一贯彻了。赤色纪念周时，城里大街小巷我们贴了不少标语。乡下有些地方搞得更为火红。从前黄到殷薛，十一里路，

一路上田里均插了三角形红绿小旗。我们还开了纪念会，规模不大，但情绪却很饱满热烈。

我们这些活动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注意，街上和要道口都密布着便衣侦探。玉梅桥我也暂时不去，把它冷一冷。

省委接到我们的工作报告后，又指示我们说：你们有了这样的工作基础，就应该不失时机地转入实际行动——撒传单，要求增加工资、罢工、武装暴动。只有在这样的实际斗争中，才能锻炼和发展党的力量，才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我研究省委的这个指示。想起以往的经验教训，只要我们这样工作大规模搞起来，组织就一定会遭到破坏，不少工厂就会有关闭的危险，大批工人就将受到失业的威胁。工人们最怕是失业。失业之后，一家老小衣食无靠，当然不无后顾之忧。我回顾在镇江时那种斗争，实在幼稚可笑，没有给敌人多少打击，相反使自己同志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情况在下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都是很清楚的，工作经验是多么可贵，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不深入到实际工作中，要不犯主观主义的毛病，是很少很少的。省委这一指示，县委研究后，决定看一看敌人的动静后再进一步布置。

五月中旬，何孟雄亲自来常州视察工作。我把常州的工作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他听得很仔细，也问得很仔细。他说不久前曾去过徐州等地，对各地的情况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结合各地的情况，对常州的工作提了些意见。何孟雄对实际工作具有很丰富的经验。

晚上，他跟我谈了一大堆问题，谈得很好，我们整整谈了一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当然只是一些基本要点：

对形势估计问题。他说，目前的形势，革命正处在低潮。不是来潮，更不是高潮。有人说现在已处在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我看这不是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你只要看一看目前各地的暴动情况

就清楚了。南昌暴动不是失败了吗？我们有十来万武装（实际上是三万余人），那么大的力量，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广州暴动不也失败了。我们的武装部队和工人赤卫队也不少哪，抵敌不住新军阀的进攻。湖南那边秋收起义，有武昌警卫团，还有工农武装，攻长沙，吃了亏，还有其它许多地方的暴动都失败了。在这许许多多的暴动中，我们党损失了无数优秀干部，大大损伤了党的元气。如果要在近期再组织这样规模的暴动，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了。这说明革命高潮暂时还不会到来，我们正处在革命的低潮。凭我们剩下的这一点力量，一意孤行，跟敌人硬拚下去，我们将有被彻底搞光的危险。李立三他们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说新军阀的统治已不能维持下去，把各地暴动失败的原因归之为领导者的无能，说他们是一批机会主义思想严重的同志，这是十分错误的。

当时何孟雄对外省区的暴动情况了解不很具体确切，实际上有些暴动是站住了脚。我对那些情况更不了解，信以为真。但他讲的基本内容是对的，革命形势确实是处在低潮。

何孟雄还说，对政治形势的估计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四·一二”事变后，资产阶级已夺取了政权，帝国主义已被打倒，封建地主分子大部已转为资本主义经营，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已经达到。我们应该与资产阶级合作，搞议会斗争。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人阶级有很大力量时，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真是闭着眼睛胡说八道。“四·一二”事变后，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并没有被触动，封建地主照样在残酷地剥削农民，所不同的只是旧军阀被打倒，新军阀又起来。我们能去与这些坏蛋一起搞什么议会斗争？这才是真正的机会主义，实际是一种叛变。

这方面，我完全同意何的看法。持这意见的当时主要是陈独秀等一批人，他们取消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党内已经流传说他们是取消派。

关于暴动问题，我说省委要我们发动群众起来抗租抗税走向暴动，建立武装，建立苏维埃，我们有很大的困难。我把白塔桥暴动的经过告诉他，并对他说：如果常州农民暴动一起来，敌人一定会从四面八方围攻，结果必然走无锡暴动、宜兴暴动的老路——以失败而告终。此路已经走不通，是不是还必须走下去？这样做对党有什么好处？你的意见怎样？

何孟雄不一般地反对暴动。他认为暴动一定要有条件，暴动起来，必须要有把握走向胜利才行。否则就要考虑目前的国内的情况，不能盲目地去搞暴动，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成熟后，立即果断地进行暴动，象苏俄十月革命那样。天宁寺佃户的抗租抗税，一定要进行，而且一定要争取胜利。暴动还是暂时不搞为宜。

如果省委一定要搞，怎么办呢？

他说，我回去再向省委提意见。

关于罢工问题，我们也讨论了。他的意见很明朗，罢工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斗争的一种很好的形式，不仅今天应该用，而且将来也应该用。因为资本家是唯利是图的吸血鬼，他们是不会轻易答应工人的要求的，能压就压，能拖就尽量拖。非到万不得已时，他们才被迫答应工人的要求，统治阶级是和资本家一气的，对其不能存任何幻想。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法，一般都是采用延长工时、加强劳动强度、降低工资。我们到厂里去工作，必须把厂里的种种剥削情况查清，用这些活生生的实际材料，向工人群众宣传，作用最大。还有，资本家为了要达到剥削的目的，必定要豢养一批狗腿子，如总管、工头等等。这批人对工人的压迫也很厉害。工人群众特别痛恨这批家伙。关于工头、搜身婆如何侮辱女工等等，都要弄清楚，要提工人普遍的最迫切的要求，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斗争要坚决，要有一批坚强的骨干分子，主要是C.P.和C.Y.的同志，依靠



这些同志在斗争中把工会组织起来，由工会来公开出面领导斗争。当然，斗争一起来，敌人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进行破坏，特别是资方会利用黄色工会来进行破坏。他们最毒辣的手段是收买领导斗争的积极分子。对这些同志，我们一定要事先做好充分的思想工作。对黄色工会，一定要揭露它的欺骗性。对工贼要毫不姑息地斗争，狠狠揭露他们的走狗性质。罢工也不宜轻易使用，一定要时机成熟。照目前常州工厂工人的情绪看来，不宜过早过高地提出罢工口号。对工人群众，切忌说空话。如果空话说多了，工人会说你在欺骗他们。不要随便贴标语、散传单，使敌人警觉起来，随时给我们打击。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吃过很多苦头，现在还有不少同志不愿改变这种方法。

关于工作方针问题，他谈得很多，主要是要我们积蓄力量，隐蔽地工作。他说，白色恐怖如此厉害，一些秘密工作的技术问题，也往往会变成严重的政治问题。

何孟雄谈到土地问题时，主张对富农与对地主一样，应该没收其土地。理由是中国富农的性质主要是封建性的，他们的前途是向地主方向发展，他们不会同情我们革命。

何当时这一看法只有部分是对的。他没有把地主和富农区别开来。后来毛泽东从革命策略上来加以区别对待，将其封建剥削部分主要放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去处理，这是正确的。

何孟雄是我很敬重的一位老同志。他的工作经验是很丰富的。他一九二〇年就在北京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次年入党并参加过在柏林召开的少共国际大会。回国后任中共北京地委特派员等工作，搞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统战工作等等，很有经验。一九二七年冬，他作为中央江苏省委特派员去淮阴，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横沟寺暴动，并创建了中共淮阴特委。我初次见到他是在那年九月，“八·七”会议刚刚开过，他跟我谈话也是比较“左”的。当时他的

话很合我胃口。白色恐怖那么严重，我们对敌人也非常忿恨，“左”的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来，搞实际工作久了，经验逐渐丰富起来，慢慢地接受了许多教训，认识了许多问题，思想变化很快。他分析问题很讲实际。他对时局的看法，与我们下面的同志认识基本相吻合。当时，通如地区的徐家瑾、徐海地区的陈资平（后叛变）、上海的一些同志和我，都很赞同他的观点。

何孟雄在常州召开了两次县委会议，对常州工作作了一般指示，基本表示满意。他没有表示对省委的指示持不同意见。当然，这是共产党员应遵守的纪律。他住了两、三天，就离开了。

以后，省委对常州的工运工作表示不满，说工作进展迟缓。我们根据省委的指示，作了检查，这方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于是，县委决定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除王峰亚、王听楼外，再加上缪国生等参加城区工作。经过努力，各小厂和学校，大多发展了党员，建立了支部。

六月初，孙中山的灵柩从北京移到南京紫金山麓安葬。蒋介石以确保孙中山灵柩南移安全为借口，向全国发出密令，在主要交通干线和城市实行戒严，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常州虽非灵柩经过之地，但因位于沪宁两大城市之间，也采取了行动。风声紧张，我们几个主要领导同志立即转移到前黄。

夏末秋初的一天下午，我从都家桥回来，当天要赶到安家舍去开会，思想上麻痹了一下，想从县政府那边穿过去，出北门走，路近一点，而且沿途有党的支部，可以落脚。我一个人急急匆匆走到大成街头上，离县政府还有一段路程。我一面走着，一面不时回过头去望望，看有没有尾巴。忽然，我发现有一个家伙在我屁股后面紧盯着，思想上立刻警觉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是曾在吕城的一个叛徒张某某。我早已听说这个叛徒在武进县政府当科员，想不到今天狭路相逢，被他盯上了。心生一计，决定吓他一下。

我突然站下来，右手把长衫一撩，显示我有手枪，作准备打击他的姿势，回头喝道：张某，你老实点，你再跟着我，我就先打死你。

我说话声音不高，却十分严厉。他看我右手伸进长衫内，认为我真的握着手枪，一下楞住了，嗫嗫嚅嚅地说：“管，管先生……，我不是盯梢……我是有事经过这里的……你不要误会……请先走。”

“你离远一点！”

他抖抖索索地站在那里，不敢再动。我回身疾走。常州的大街小巷，我已烂熟于心。哪里比较危险，哪里比较安全，我心里有数。几个弯子一转，就进了化龙巷内的项家弄。

项家弄是条死胡同，弄底是周静华家。周静华的父亲名叫周甘生，是读书人，工书法。辛亥革命时，曾任广西岑溪县知事，为人耿直，宦途失意，回归故乡，赋闲在家。他在常州有一定社会地位，而家庭经济状况逐年下降，在艰难踟蹰中靠卖字维持生活。周静华与李文、程畹芳等原先都是常州芳晖中学的学生，参加共青团。一九二七年秋天，恽逸群借债、卖田创办逸仙中学，就动员她们转学。周静华到了逸仙中学，担任学生会会长，组织文娱宣传队，演出《木兰从军》、《春回来了》和高尔基的《母亲》等戏，宣传革命。周静华的哥哥周至行、姐姐周静绮、弟弟周至言，当时都参加革命活动（周至行后在白色恐怖下脱党；周至言于一九四〇年经恽逸群介绍去延安，进了红军大学，后在湖北武刚反顽斗争中牺牲），父母从不加以干涉。

周家住在项家弄底，地点比较僻静隐蔽。周静华的母亲待人和蔼，气量很大，对孩子们非常爱护。我们常瞒着她在她家召开一些会议，故对她家周围情况比较熟悉。

在这危急之时，转到周家敲门。正巧周静华在家，她听到敲门声很急，就赶出来开门，见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忙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被敌人盯上了，速将大门关好。她忙领我进屋，穿过老

式平房，到了她家后园子里。周家的园子隔壁是常州豪绅奚九如的小公馆的后花园。奚九如新造这公馆，安置他的小妾住的。他小妾的女儿和周静华是芳晖中学同学。周静华搬来梯子，让我爬过围墙，她也爬了过来。梯子由周静绮搬走。那时，奚九如家里静悄悄的，母女俩均不在家。周静华就带我从奚家的前门出去，经过娑罗巷拐到大树头。

周静华一直把我送过玉带桥。我回到南门外我的另一住处，将文件等收拾好。房东是小学教师，也是党员。我交待他一些事情，并说我有事外出，一时不能回来，东西请他照应，以防搜查。安排妥当，我即下乡，当晚赶到前黄陈枕白的学校里。我告诉他我在城里发生的事情。陈枕白说，你住在这里不会出问题的，明天派人进城打听情况。

次日，我们派的一位同志到玉梅桥沈菊神家打听周静华家里情况。据说张某见我进了项家弄，知道这是条死胡同，肯定我是藏匿在哪一家人家里，就赶紧去报告。县府派了几十名警察，把项家弄口封锁得死死的，然后从弄堂口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搜到周静华家隔壁的姓冯的家里，翻箱倒柜，搜遍了还无影踪。张某就认定我是躲在周家。警察就用枪托捣门，周静绮只好开门。

大门一开，张某等一伙就涌了进去，责问周“为什么敲门不开？”

周静绮说：“我一人在家，知道你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是歹徒，开了门怎么办？”

张某听她话里有刺，很生气，把手一挥，招呼警察：“到里边搜！”

周静绮拦住他们，说：“你们想干什么？”

张某把头一昂：“哼！你窝藏共党要犯！”

周静绮还是不让搜查，说：“抓共产党？怎么抓到我们家里来？”

我家是什么人家，你们去打听打听！”

张某搜不到人，只好将周静绮带回衙门。

周静绮被带到县里，关了一夜。周仁撰是常州名士。他弟弟仁镐又是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部当官，也算是孔祥熙手下的红人。第二天一早，全家赶到县政府找县长评理，一口咬定张某想敲他家竹杠，趁家长不在，带人到他家里抄家抓人，是犯法的，我们要向上控告。

县长朱葆儒是常州本地人，曾经留学法国。这人既老奸巨猾，又熟悉当地情况。他觉得此事比较棘手，没有一点证据，把一位名门闺秀抓到衙门里关了一宿，在当时社会上是一件非常不体面的事件，事情闹大了不好办。于是就装着事前一无所知，连连告罪，说赶紧送大小姐回府，这场风波就此结束。

常州出现我的行踪之后，敌人内部非常惊慌，在城区紧急搜查了三天，并派大批缉捕下乡侦查，从此我很难再进城去。

我在前黄公学，就在那里化装代课。

那天，我正在讲课，见校门口有两个人转来转去，就提前下课，叫陈枕白速去看看。

陈枕白和他妻子傅一星从从容容走到校门口，跟两个便衣打招呼，问有什么事情。

便衣说：“前天县里来电话，说发现了共产党，要我们这里也留意一下。”

“请进来坐坐吧，喝杯茶。”陈枕白故意招呼说。

“不了，不了，你们忙吧。”

我趁陈枕白与便衣纠缠的机会，出便门往都家桥去了。

七月中旬，胡里清（顾志鹤）来到常州。他一九二五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二六年去苏联学习，次年转党。他回国后被省委派来担任武进县委书记。我则以特委巡视员的身份继续留在常州，主要

抓武进县委的工作。

顾志鹤来时，带来了省委的指示，为了纪念八一南昌暴动，省委常委已成立了“八一”行动委员会。徐锡根、顾作霖、陈鸿、李震瀛、徐大妹、罗登贤等人为委员。伍豪（周恩来的化名）、罗登贤等同志组成主席团，罗登贤为书记，行委要求我们在常州抓紧进行“赤色纪念日”活动和反对国民党反俄宣传。

我们那几年总是在“五一”、“八一”等纪念日搞大的行动，敌人已摸到了规律。事前就采取防范措施，千方百计搜捕我们的同志。丹阳珥陵镇刘巷村我党秘密机关被破坏，陈作范当场牺牲。过了十来天，徐步庭又在丹阳前马村牺牲。我和丹阳的党组织关系比较密切，因而受到更大的威胁，无法进城活动。为了贯彻省行委的指示，我就与顾志鹤、王听楼等商量了行动方案，由他们在城里布置实施。

八月二日，他们将“赤色纪念日”的宣传标语到处张贴，连国民党常州县党部和市乡行政研究会的墙上也贴上了，围观的群众甚多。敌人发现，赶紧派人冲刷。王听楼等又将传单悄悄散发，有的通过邮寄，有的通过夜间派人塞进居民的门缝，有的在工厂区偷偷传递，影响不小，甚至国民党的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公安局长的家里也发现了我们的宣传品。敌人非常恐慌。

## 8. 陈云前来视察

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了。我已经无法再进城去活动，只好把那里的工作暂时交给王峰亚负责。他一直是搞工运的，负责城区的工作比较合适。我的工作重点移到了乡下，在前黄、安家舍一带活动。

我们先派了一个女交通，负责城乡之间的联络。她的公开身

份是前黄公学的教师，二十多岁，她父亲是城里的一个小资本家，家也在常州城里。她经常往返城乡之间，接头联系，有很多方便，且不易为敌人所注意。过了一些日子，大概由于她在家中流露了一些党的工作情况吧，她父亲害怕牵连，就不准她再到乡下教书，要她蹲在家里当小姐。这样我们城乡的联络中断了。于是，只好在都家桥农民党员中选派了一个交通。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决定把活动中心移到了都家桥。

八月九日，省委发出关于秋收斗争的通知。通知指出：今年的秋收斗争，应该是江苏土地革命的开始。省委要求我们在这次秋收斗争中，不仅要在农村扩大党的组织并有计划地建立农会等革命群众团体，而且要设法组织武装，建立游击队，为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军作准备。

没过几天，省委又发出关于秋收斗争的另一通知，对我们在这次秋收斗争中的主要任务、路线、策略、纪律、口号等等，都作了具体指示。县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贯彻省委的指示。我们参照何孟雄谈话的精神，决定把重点放在天宁寺佃农抗租抗税的斗争上。城市斗争主要采取合法的、荫蔽的斗争方式，以积极的精神配合天宁寺的抗租斗争。在斗争中发展组织，积聚力量，以待时机成熟，再决定行动。如天宁寺抗租斗争取得胜利，则立即走向暴动。抗租委员会上升为行动委员会，率领群众把暴动地区和附近地区的地主武装全部缴来，武装农民，请省委军委派一批军事干部来帮助建立红军，并开往苏浙边区去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时，要求搞兵运工作的同志积极秘密组织士兵哗变，奔向东南乡，与农暴武装会合。这计划拟好后即报省委批准。

这时，斗争形势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如淮阴新河暴动，海门警察风潮，泰兴抗租斗争，盱眙李桂五建立游击队等等，据说都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

我们听到以上这些情况，认为一方面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另一方面必须从速把抗租斗争发动起来，以配合全省的形势。但我内心对这些斗争能不能取得胜利，仍有很大的怀疑。我思想上一直矛盾着，但共产党员必须坚决服从党的决定。我们党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省委曾发过一个关于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的通知。在斗争中“表示犹豫或怠工者必须随时予以纠正。纠正无效，采取组织制裁”。于是，又一次召开县委紧急会议，再次郑重地研究坚决贯彻省委秋收斗争指示的具体部署，决定以前黄一带为中心，把天宁寺佃农清算田租浮收委员会改为行动委员会，以王顺荣担任主席，由徐炳善负责组织工作。委员共七人，其中四人是共产党员。行委之下，又设都家桥、谭庄、管庄三个分会，估计有数千会员。我们将这一情况再次报告省委，请求指示。

九月十二日，省委开了常委会。常委有罗迈（李维汉）、任弼时、张文清（康生）、廖仲仁（陈云）、大盛（李富春）五人。省委为了加强对常州秋收斗争的领导，会后即派陈云同志前来常州督促。农历中秋节的前两、三天，陈云同志到达常州。我们为着安全起见，将陈云同志安置在前黄公学。当时，前黄虽然也常有敌探踪迹，但是周围的谭庄、都家桥一带群众基础特别好。

陈云同志在前黄公学住下后，我们即在这里召开县委会议，由他传达省委的指示，内容基本上是省委几个文件的精神。接着，我们向他汇报了武进的工作情况。他听得十分认真，问得也非常仔细。

会后，陈云同志又找了县委几个同志分别谈了话，后又与前黄的支部书记陈枕白、支部委员邵产林，都家桥的支部书记周华，谭庄的支部书记徐祖英等，分别谈话，询问他们那里的情况和群众的要求。他们并不知道陈云同志是什么人，只知道是省委派来视察工作的。



我第一次见到陈云同志，觉得他考虑问题比较实际，工作作风深入细致。他详细了解情况后，就对我们说，常州这一段时间工作有很大成绩，但对城市工作，特别是工厂工作注意很不够。关于农村工作问题，他说：武进东南乡和西北乡如谭庄、运村、管庄、杨桥、寨桥等处，天宁寺佃户集中，多年来寺方以浮收增加对佃户的剥削，群众普遍对此不满，党就应该因势利导，开展公开合法的斗争。你们成立了天宁寺佃户清算田租浮收委员会，搞抗租斗争是对的。要在这个基础上把不种天宁寺田的农民也吸收到农会里来，造成声势。对天宁寺的斗争一定要紧紧抓住。天宁寺佃户斗争的扩大，一定能推动整个武进东南乡的斗争。至于武进西北乡，东西两面分别与江阴、丹阳毗邻，那地方土地贫瘠，农民生活更为困苦。这两年来茅学勤等<sup>①</sup>在武澄、武丹交界处的武装斗争，对他们有很大影响。你们在那里搞起武装斗争来，条件比较好，而且东西两面都可以互相支援。

他重申省委九月十二日给武进县委指示信的精神：“目前敌人严密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必然容易走向武装冲突的阶段，……我们必须准备力量，领导这一不可避免的武装斗争。”他说，你们赶紧把抗租斗争搞起来，发展为秋收暴动，从而组织一支武装，拉到苏浙边区的山里，如郎溪、广德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任务是省委决定的，不能改变。

他问我：“你们对暴动有没有信心？暴动起来，究竟会有多少人参加？”

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只是摆了摆实际情况。第一，暴动起来，没有时间组织武装，因为我们一行动，敌人必然就从四面八

---

<sup>①</sup> 茅学勤(1900—1929)，江苏江阴人，小学教员。一九二七年冬由钱正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冬江阴后塍农民暴动和一九二八年春江阴杨舍农民暴动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九年一月被捕，同年二月六日在江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方围攻过来，农民一听到枪声，就会纷纷走散，过去宜兴、丹阳、金坛暴动，都是这种情况，最后只剩下几个人。如果把农民家小一起带走，又不可能。是不是在暴动以前就把部队组织起来，但是困难的是没有多少人肯当兵；第二，组织武装，领导部队作战，都需要军事干部，我们没有军事干部；第三，粮食问题无法解决，江南地主大部分住在城里，他们的粮食也在城里，向一般农民筹粮不太好；第四，部队的转移困难很大，郎溪、广德一带情况不明。以上这些问题，暴动前是不是要仔细研究一下，希望廖同志多耽几天，在这里给我们多多指示。至于，参加暴动的人数，现在估计可能会有二、三千人。

陈云听我提了这些问题，没有立即表示态度。他思考了一下之后说：你们县委好好研究一下，作出正确的部署。但省委的决定，你们一定要贯彻。你们有什么意见，可向省委报告。

陈云在前黄、都家桥视察了几天，开了几次县委会，并和我单独谈了几次，中心问题是秋收斗争。如何抗租，如何组织暴动，如何将部队拉到苏浙边区去建立苏维埃等等。他对秋收抗租斗争是坚决的，要我们一定把这斗争搞起来。对于暴动起来，组织武装问题，他表示还缺少经验，说经验是从斗争中取得的。对到苏浙边区建立苏维埃问题，他是赞成省委的意见，认为应该这样做。他讲别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一些情况，用意是增强我的信心。

他在一次与我个别谈话时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以上，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剥削很深。同时，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连年战乱，造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有利条件。因此，党决定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条道路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我们已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如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有了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邵式平在赣东北有了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等在湘鄂

西有了革命根据地；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刘志丹、谢子长在陕西渭南；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在闽西；冯白驹在海南岛，也都建立了革命武装和根据地。这些都充分说明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是完全有可能的。根据这些经验，我们在苏浙边区建立一块根据地，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你们要有信心。

他以这些事例来说服我，的确大大增强了我搞武装暴动和建立根据地的信心。当时，我还幼稚，经验不足，尚不懂得暴动要取得胜利必须具备哪些主客观条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从中国特点出发的一种创造，后来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陈云同志当时讲这个问题，客观上也已经蕴含了这样的意思。

中秋节晚上，陈枕白夫妇请我们赏月，陈云、我、蒋何畏参加了，共五个人。他们弄了好几个菜，还有月饼、瓜果，并准备了一点好酒。在艰难的革命岁月里，过这样一个中秋节，实在难得。

前黄公学的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树，宛若一把大伞般地撑着。皓月当空，万里无云。月亮的清辉透过枝叶倾泻了一桌碎影。这样好的中秋之夜，是很少遇到的。几个人在一桌吃饭，谈心，也实在难得。

桂花的芳香，一阵阵地随着微风在夜空中飘荡。

陈云同志，痛饮一杯吧！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许多艰难困苦在等着我们。今晚有机会稍稍轻松一下，明天我们又将为革命事业各奔东西。

饭后，陈云同志和我踏着月光到田野里去散步。他和我在田塍上慢慢地走着。秋蛩齐鸣，分外热闹。小河静静地流淌，夜那么怡静，江南的乡村真美呵，怪不得历代多少诗人、文人乐而忘返。

我们就在一条小河边的干净草地上坐下。我们思想上根本无暇欣赏这美丽的夜景，两人都在想着秋收斗争和去苏浙边区建立苏维埃的问题。

陈云突然问我：“你是不是赞成暴动？”

他望着我，等待我的答复。

我知道这个回答关系很大，考虑了一下，就对他说：“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只有暴动这个办法才能达到目的，其他的办法是没有的。但是，我怀疑取不到胜利的暴动是否一定要搞？”

他不作声，又问：“天宁寺的抗租斗争，能不能取得胜利？”

“我看可以。”

“胜利后接着就搞暴动可以不可以？”

“可以。但仍有可能失败。”

陈云同志立即说：“不一定，看你领导得怎样，如果暴动起来，你能趁敌人不备，立即把队伍带走，迅速开往苏浙边区，待敌人赶来时，你们已到了那边，那里山多，活动范围广，容易生存。你们到那里组织一个军的武装，与敌人周旋，象其它革命根据地一样。你考虑一下，这样做，可以不可以？”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意见，说：“请省委多派几个军事干部给我们。”

“我回去向省委反映你们这要求。不过，干部是在斗争中培养的。你们必须把在斗争中勇敢可靠的同志提起来。”

我又点了点头。

“你看暴动的时间……放在什么时候适当？”

“等稻子熟了，天宁寺和尚下来收租时比较适宜。”

他默默点了点头，说：“天宁寺收租，要收多少日子？”

“天宁寺在这里有收租房，他们总是安排今天收这几个庄子，

明天收那几个庄子，估计一万多亩田，总要半个来月才能收完。收租时暴动最好。”

陈云同志问：“暴动时能拉起几百武装？”

我没有把握，没有作声。他又追问一次。我说：“估计可能拉二百来武装。”嘴里说着，心里在盘算着失败的可能性，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就在周围。常州、无锡、宜兴三个地方各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和桥是锡宜公路上的一個大镇，也驻有国民党的一个营，离这里只有二、三十里路，两个钟头就可以赶来。

陈云同志于九月十八日（农历八月十六）离开常州。我送他从戚墅堰上车，这里比较保险。

临别时，陈云同志再次交代我：“老祝！希望你的事业一定要搞成功！”在人多地杂的火车站，他只能隐隐地这样说，“到时候我再来看你。”

陈云同志走后，我们县委又在都家桥召开县委会议，商量如何组织秋收斗争的具体部署，决定第一步待和尚下乡收租即把他赶回去；第二步估计和尚必带保安队再来，我们就事先组织好一支秘密游击队，突然袭击，将其枪械全部缴下；第三步召开群众大会，迅速把暴动群众带往苏浙边区的山里，不管群众愿不愿意，我们都一定要这样做。能拉多少群众，就拉多少群众。把路线选择好，共产党员一定要全部参加，切不要留在本地；第四步争取在郎溪、广德一带山区立住脚跟。目前，先秘密组织一支游击队，把丹阳、金坛埋藏的枪支运回，武装一部分党员，作为斗争的骨干力量。

这办法比过去暴动已前进了一步，但付诸实施，还要经过考验。缺少军事干部是极大的困难，决定依靠自己培养，经验从艰苦斗争中去吸取。

我把前黄一带的工作部署好以后，还缺少一些党员骨干，决定再到卜弋桥去挑选若干个。我命蒋何畏、丁震球等开始分头到各

乡去秘密动员群众，作好斗天宁寺和尚的准备。我交代他们不要泄露暴动的意图。这一点无论如何要十分注意，否则就要坏大事。

我化装成一个农民，带了一位农民同志，到卜弋桥去，走了几里路，就在路旁茶棚里泡了一壶茶，歇歇脚。

我们正坐着喝茶，忽然进来两个人，都是便衣，短打扮，腰里明显地别着手枪。

我们平时十分注意侦缉队里的那些家伙，几乎大多能认得。我一看其中一个是侦缉队长。当然，他们不认识我。

侦缉队长从上到下瞅了我俩一眼，见我们两人是农民，也不注意了。

他们就在我俩茶桌空着的两面坐下来。我想最好是避开这反动派的鹰犬，但一想如果匆忙走开，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不如镇定坐着不动，万一发生什么情况，横竖我们两人身边也有手枪，可以对付得了。

我一面喝茶，一面在桌下踢踢那青年农民脚，要他注意，他会意了。

侦缉队长四面看看，似乎在搜寻什么人。转过脸来问我们：“你们是本地人吗？”

“我们是卜弋桥南面小李庄人，上城去买点东西。”

“你们知道卜弋桥有土匪没有？”

“没有，很太平。”

我给他斟了一杯茶，便问：“先生到卜弋桥去？”

“嗯。”侦缉队长点头说，“去找共匪！你们没有听说那里共匪杀了人吗？”

我故作惊讶地说：“真有这样的事吗？”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杀人的事是有的，但并非什么共产党所为，而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好几天前，一个地主抢了一个农民的娘子，那农民把地主杀

了，留了张字条，说那地主作恶多端，共产党游击队为民作主，将其惩处！

杀人者留下字条，就远走高飞了。

这件事卜弋桥一带的人都清楚。

我想，这个侦缉队长心里也有数。他无非是借了抓共产党之名，下乡去敲敲竹杠罢了。要是真有共产党游击队在那一带活动，他即使吃了豹子胆，也不敢两个人就去卜弋桥。

略为攀谈几句，我们就起身上路，跟他们背道而驰了。

我们又转了几个地方，动员了几个青年参加游击队。

回到都家桥时，省委的回信已经到了，要我们坚决作暴动的准备。与回信同时到达的还有几份文件。一份是九月二十六日的指示信，要我们抓紧将工人运动（重点是沪宁铁路和军事工厂）和农民秋收斗争搞好，以配合铁路工人运动。另一份是九月二十七日，省委接受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训令与中央决议案的通告，要我们在农村中加紧秋收斗争。

省委对秋收斗争抓得如此紧，非常坚决。我们坚决贯彻这些指示，积极投入了暴动的准备工作。

## 9. 领导天宁寺佃户抗租斗争

秋收已近，天宁寺收租也将开始。

县委拟订的秋收斗争计划大体是这样：第一步，发动农民清算天宁寺田租浮收，走向大规模的群众抗租运动；第二步，在群众充分起来后，趁热打铁，组织一、二百名青年勇敢分子为突击部队，作为暴动的骨干力量，这支部队尽量配备武装，枪械不够时就拿一些大刀长矛。领队由我自己担任，蒋何畏为副。部队抓紧组织，以后发展为游击军队，对外绝对保密。第三步，去郎溪、广德一带建立

苏维埃。

到底将来能拉起多少武装，得待暴动起来才能看出，当然是越多越好，但即使只能拉起百把人的武装也行，否则，无法完成陈云同志交代的任务。沿途行军的种种困难，现在很难估计，只有一点要抓紧，即给养问题，开始就要注意。白塔暴动失败后，没有吃，只好散伙。这次暴动，先要筹集一批粮食，由一些同志用箩筐挑着，随军行动。那时还不知用米袋由每个战士背的办法。暴动起来，万一过不去，就分散在当地坚持，白天荫蔽，晚上活动。县委这个初步计划，以后在行动中再逐步修改。

按照每年的惯例，天宁寺收租之前，总先要派和尚下乡来，实地勘察收成情况，并找庄头算租账，估计能收多少租米，需要多少船装运，然后定下收租的日期。

我们针对和尚的收租计划，在群众中先酝酿一场对和尚的说理斗争。

九月底，一天傍晚，天宁寺收租的和尚下乡来了。消息一传开，四乡群众纷纷集合起来，把和尚收租房子围了个水泄不通。

下来收租的当家和尚叫钦锋，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他不慌不忙，很沉得住气，先来了个猫哭耗子——假慈悲，对佃户的艰辛深表同情；然后又讲了天宁寺也有天宁寺的难处，几千和尚的吃穿，佛门香火的开销，庙宇菩萨的装修等等，全靠这点田租开销，佃农种田、佃主收租是几千年的老章程，不单单是天宁寺一家收租，别地方的寺院都是这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是庙里将这些田收回去自己种，你们就更没有办法了……。

农民与和尚讲理，讲不过和尚。农民觉得和尚讲的也有道理，斗和尚的决心软下来了。

初战失利，必然会影响到群众斗争的锐气。

我和蒋何畏等当时也是破衣烂衫，戴着旧草帽，跟佃户们的打



扮毫无二致，混杂在群众中间，蒋何畏是本地人，说一口本地话，他立即站出来，倾诉了佃户们终年劳累生活困苦，庙租很重，外加浮收，交了租税，就无法生活。你们和尚不劳而获，靠我们血汗养活你们，还说什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你们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群众觉得蒋的道理讲得好。“对！对！”群众一致高呼。

钦锋这家伙吓得不敢作声，他年年下乡来收租，对他的佃户，大体能认识。他看看蒋何畏觉得有点可疑，但不敢问，只好狠狠盯了他一眼，把头低了下去。

群众你一言我一语，闹轰轰的，要钦锋和尚答应减租。

钦锋和尚有点恼羞成怒，恐吓说：“你们这样做，难道不怕犯法吗？”

群众一听就轰了起来，把钦锋和尚推过来搽过去，一片喊“打”声。钦锋和尚吓得满头大汗，浑身哆嗦，连连告饶，哀求大家放他回天宁寺去商量。

我看这一次只能做到如此程度，我们即劝大家放他回去，命他下次再来，一定要减租，否则就对他不客气。他一面答应“是，是”，一面点头哈腰，口念“阿弥陀佛”溜了。

这次交锋，算是取得了胜利。消息当天就在四乡传开，群众的情绪开始高涨起来。

县委连夜开会，决定把农会调整好，进一步发动群众不缴租。准备武装抗租，成立队伍，开往苏浙边区。

抗租前，我们已组织一支二十余人的武装队伍，秘密在乡间荫蔽。料定天宁寺和尚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下次来一定带武装实行强迫收租，我们就武装抗租，这样必定走向武力冲突。暴动起来后，由我带领队伍，向郎溪、广德进发，决不能在本地停留。

县委方针已定，第二天早上，我约顾志鹤在郊区某同志家相

会，目的是把城区工作交代一下，准备当晚再赶回前黄。早晨我到前黄去乘开往常州的快班船，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郊区。

我踏进船舱，一眼就望见昨天被斗败的那个钦锋和尚，正巧他也乘这条船回城。

我估量了一下情况，若无其事地在钦锋和尚对面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他朝我看了一下，认不出我。我昨天是破衣烂衫，今天是呢子学生装；昨天是旧草帽，今天戴一副眼镜。当然，他不会想到我就是领着群众斗他的人。

快班船离开码头后，钦锋和尚和周围的乘客闲谈起来。他好吹好炫，说东道西，其中也谈到了昨天的事情。

“昨天那个穷小子（指蒋何畏）八成是共产党，乡间这些穷鬼们不肯缴租，定是他在捣乱，查出来，一定把他抓起来！”他余愠未消，说这话时咬牙切齿带着愤恨情绪。

天宁寺的和尚预定下次下乡收租的日子，他们把一切都准备好，租了几条大船，派了七八个年轻力壮的和尚，一起下乡。

我们的清算田租浮收委员会和暴动突击队的工作，都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委员会以乡为单位，分成几个片，党支部书记当委员长。组织工作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准备等和尚到来后才公开。农村里的事情往往很难保密，天宁寺和尚在事先已经听到风声，敌人开始警觉了。县里侦缉队的便衣先下来了，可是他们不敢在乡下乱走，只到四乡转了一趟，就回去了。

十月八日夜里，天宁寺的收租船已到达殷市桥下。寺僧跑到庄上先请“大先生”喝酒，再请他们劝劝乡亲们缴租，说庙里实在困难，“大先生”们大多是本地地主老爷，他们知道乡间的情况，推托说我们也不好过问。

清算田租浮收委员会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次日一早在前

黄公学大操场上开减租大会，清算天宁寺和尚浮收的田租，要求前黄、谭庄、都家桥、官庄等几个党支部，连夜对群众进行动员，保证参加，佃户联合会的三百多家佃户至少每家去一人，按时到指定地点开会。

为了造成气氛，我们又命各支部赶制了许多三角形的红绿小旗，并由都家桥小学几位老师写了不少要求减租的标语。

会后，我们又找暴动突击队的一些青年积极分子作了部署，准备根据群众大会进展情况，伺机痛打收租和尚，并夺取前黄镇警察分驻所的枪支弹药。

十月九日清晨，太阳尚未升起。前黄至殷薛的十来华里路旁插上了红绿三角小旗。

前黄的佃户七、八十人先到会场，老幼皆有。接着，都家桥、谭庄、管庄的队伍也来了。几个地方共来了三百六十多人，但跟来围观的群众很多，熙熙攘攘，站了黑压压的一大片。

群众大会由佃户联合会的负责人主持，蒋何畏发表讲话。他历数天宁寺残酷剥削佃户的罪行，如八分田按一亩收租啦，大斗大秤盘剥啦，讲的都是大家经受的痛苦，群众的情绪很快被鼓动起来。

我们觉得时机已成熟，就提出了坚决抗租，和尚不答应，我们决不罢休。

佃户联合会负责人徐祖英向大家宣布了抗租的决定，大家一致同意，只有两个出头反对：一个是流氓地痞，混进了农民组织，还成了骨干分子；另一个是富农，他租了天宁寺五、六十亩田，自己不种，雇工剥削。我们当场把他两人赶走。

我们派暴动突击队把和尚从庄头家揪了出来，带到会场上，令他们跪下，群众欢声雷动，这时秩序有些乱，闹轰轰的一大片。

几个和尚在愤怒的群众面前跪下，抖抖索索，不知所措。我发现为头的还是上次来过的那个钦锋和尚。

“贼秃！你来收租，今年减多少！”群众的吼声。

钦锋和尚不敢正视愤怒的群众，低声说：“今年与往年一样收呀……”

“今年荒年，我们自己没有得吃，一粒不缴！”

钦锋说：“我们二千多和尚也没得吃！求你们行行好！”

县委几个人都化装成农民，杂在群众当中，掌握会场的斗争。

“为什么八分、九分的田要算一亩收租？”

“为什么你们收租要用大斗大秤，欺侮我们佃户？”群众接二连三的责问。

钦锋和尚满头大汗，连连认错，“今后一定改掉！”

“过去几年额外多收了多少？说！”群众大喊。

“不说清不准走！”

群众轰起来了，粗犷的吼声，如钱塘江的怒潮。

几个和尚理屈词穷，跪在那里，闭着眼睛，不再回嘴了。

丁震球说：“从民国元年算起，我们佃户还是吃亏的。”他这话是做群众工作的，不是对和尚讲的，

“对！对！”群众高呼。

“打倒天宁寺大地主！”群众中冒出一声口号。

“打倒地主！”“打倒地主！”群众中举起了无数的拳头，振臂高呼。

几个青年冲了上去，抓住钦锋等几个和尚就打。

钦锋和尚被打翻在地，连连讨饶说：“别打，别打，好商量，好商量！”

“商量什么！把他丢到河里去淹死他！”

钦锋和尚知道事情不妙，只求不死：“你们饶了我，我什么都可以答应！”

“写个不再来收租的字据！”蒋何畏命令他说。

“是，是。”

“带他去写好字据后，把庙里来收租的船砸沉掉。”我交代暴动突击队的几个年轻人。

十来个青年簇拥和尚而去。

钦锋写下了字据，暴动突击队又去砸船，烧船。天宁寺的另一个大和尚浩澄跪在船头乞求饶命。船上的伙计们也帮着说情，说砸掉了船就断了我们的活路。农民见主要的目的已经达到，就把和尚和收租船一起放掉了。

这一行动影响很大。运村、杨桥、寨桥一带的农民也闻声赶来，其中有许多种其他地主土地的佃户，要求我们去斗大地主吴馥之、徐成等，群众情绪高极了，都有打倒地主，分配土地的要求。

钦锋等被带走后，我们的群众大会继续进行。

蒋何畏说：“今天，我们抗租取得了胜利，和尚写下了不收租的字据，有的人认为这下好了，可以不缴租了。我看字据不一定真有用处，天宁寺地主很狡猾，他们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他们必然要买通县政府，调动武装来收租，我们一定要充分准备！”

蒋何畏接着讲了下一步的打算。

大会通过了三条决议：一是迅速建立农民自卫队，进行武装训练；二是派人到天宁寺的其他佃户地区去扩大宣传；三是每家出小洋三角或每担租稻出十斤，作为斗争的活动经费，实际是作为部队的给养。群众一致通过了。

大会一结束，暴动突击队准备去收缴前黄镇警察分驻所的枪支。由于事机不密，警察分驻所把门紧闭，警察早已作好战斗戒备，不时向外打冷枪。突击队一看不好硬攻，就自动撤离。

群众一散，我们估计敌人会很快采取武装镇压的行动。县委根据陈云同志关于“东南乡主要抓抗租斗争，逐步走向暴动，西北乡主要扩大军事斗争”的指示精神，作了新的部署，蒋何畏、丁震球

等几人留下，在前黄一带继续领导群众抗租斗争；我带了十几支枪，转到西北与江阴茅学勤等人留下的游击队联合起来，组织一支能作战的游击队，以便向郎、广转移。

我离开后，前黄、谭庄、杨桥、运村、寨桥一带斗争仍继续发展。顾志鹤从城区下来汇报：钦锋、浩澄等和尚回城后，即向县政府哭诉。县长朱葆儒，接受天宁寺和尚贿赂后，即采取镇压措施。

十一日，天不亮，几十名警察就开到前黄一带，按照名单要抓领导抗租的蒋何畏、丁震球、徐祖英等人，结果蒋、丁、徐等负责同志都没有被抓。警察只抓了另外三个人，一个党员，一个佃户，一个雇农。敌人并不清楚这三人的情况，抓他们的目的，是要他们供出前黄一带的党组织情况。

敌人在前黄周围搜查了一天，傍晚才撤走。

徐炳善等就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决定改变原定部署，发动群众进城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

十四日，群众分水陆两路进城，陆路主要是年壮的男子汉；水路主要是老弱妇幼和部分壮年汉。两路人马共二百三、四十人。陆路由蒋何畏带队，各人手持旗帜标语，沿途得到不少农民的同情和支持。走到半路上，正碰上顾志鹤从城里赶来，说敌人已有准备，我们应改变计划。

蒋何畏坚持非进城请愿不可。他说，水路已去，陆路决不能中途退却。

顾志鹤说：“那么，由我带队进城。你是被通缉的要犯，熟人又多，政府正在找你。”

蒋何畏坚持要去，说：“这批人，你不熟悉，临阵没有领袖，不行！”

顾志鹤劝阻不住，说：“那，我跟你进城，由我出面，你暗中掌握。”

这样，群众队伍继续向城里进发。

快近中午时，陆路群众先到，直入城里，来到县政府门口；水路迟到一步，为军警所阻，只有二、三十人冲了进去。

群众到达县政府门口时，军警已经戒备森严。大家就高呼口号：“要求释放无故被捕农民！”，“要求县长出来答话！”

县长朱葆儒派了一个代表出来说：“此事政府正在调查，你们可派代表进去商量。”

顾志鹤、蒋何畏等知道是计，不肯推派代表，坚持了一个多钟头，群众高喊着，一定要求县长出来。

县政府代表见僵持不下去，就骗群众说：“你们秩序太乱，分两排站好，以便县长出来接见。”

顾志鹤等原布置请愿群众围在一起，以保障领导同志的安全。县政府派警察和侦缉队员到队伍中细查，硬将群众分为两排站好，群众不知是计，自动站队，顾、蒋等无法阻止。

一站好队，蒋何畏即被侦缉队认出。警察冲上来，把蒋何畏抓了进去。

群众一看苗头不对，遂在顾志鹤等率领下，向县政府冲击，抢夺蒋何畏。县政府军警荷枪实弹进行阻止。

警察开枪，一个名叫胡和尚的少年当场被打死，警察又逮捕了八人。顾志鹤受伤，被群众救出。

城里的大小旅社客店已接到通知，不准东南乡进城的人住宿，房钱由天宁寺包付。

十六日，武装军警又到前黄镇，突然搜查前黄公学。在放牌位的神龛中搜出步枪子弹三百多发。于是，又抓走了陈枕白、傅一星、宋友琴、胡观榆四位教师。

那些天，敌人四出抓人。我到西北乡时，正值因猪行收费时，十块钱要带一块铜角子，以实际币值银贵铜贱，农民吃亏，西北乡

石桥支部领导了一次斗争。农民七、八十人捣毁了猪行。斗争虽暂时赢得了胜利，但引起了敌人对西北乡的关注。

几天后，接到省委给我的信，调我速去苏州苏常特委工作，常州工作着顾志鹤、王峰亚、虞士贤、宗锡山等负责。

我接到省委来信时，顾志鹤负伤隐蔽了，蒋何畏<sup>①</sup>被捕了，王听楼在城里，其他几个同志也很难联系上。前一段时间，敌人已查抄了常州玉梅桥的联络站——园源转运公司，搜捕我和沈菊神，没有抓到我们，即抓走了沈菊神的父亲沈锦镛和母亲沈江氏，这更增加了我进城活动的困难。

我好不容易派人去找来几个同志，开了个小会，决定将暴动队的武器埋藏起来，人员暂时遣散隐蔽，很快把善后工作处理完了。我将工作交代一下，即去苏州潘儒苍特委机关报到，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武进的工作从此就无暇再多过问了。

## 10. 参加江苏省二次党代会

一九二九年十月下旬，我去苏州专搞苏常特委巡视工作。陈鸿代书记，下面只有两、三个人，工作推展不开。我请求到各县去看一看，首先到苏州去了解情况。

苏州城里，只有店员工人中还有二、三十名党员，工厂和铁路方面的组织已被破坏殆尽，农村方面党员也很少。这里开展工作的关键是发展组织，但县委提了不少困难。他们说，党交给支部的任务，党员不执行，你要去找他们，他们就有意回避你。我不相信，就亲自到观前街找几个店员同志聊聊情况，他们和我应付几句，就

---

<sup>①</sup> 蒋何畏被捕后，一九三〇年判刑。一九三四年他在敌人威胜利诱下叛变，当了国民党武进县党部特务室的特务。抗战爆发后，他脱离特务组织，并于一九四四年重新参加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又脱离革命。一九七八年病死。



推托店里有事，走了。我想，这种人怎么能做共产党员，不仅不够格，而且很危险。县委说，阊门外的伤兵工作做得不差，有几十个党员。伤兵工作做好了，有什么用？要斗争，要暴动，光有少数伤兵无济于事。我当时的思想也相当“左”，对下面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

我又到常熟等县去看了一下，那里的工作比苏州还差。从福山暴动失败后，一直未能恢复过来。其它一些县的情况亦复如此。

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严重。许多党的组织被破坏，许多党的骨干和基本群众被逮捕，被杀戮。党外的群众意志普遍消沉，党内的同志情绪也很低落。江苏一万多党员，如今只剩下二、三千人了。一个地方党组织被搞垮以后，想再去恢复就很困难了。这严酷的现实在我脑海中冲击着。我想，我们那种做法可能是错误的，如果还一味“斗”下去，党会被搞光掉的。我的这种想法虽未向省委的同志报告过，但省委可能已有所觉察了。

十月下旬，我接到通知，省委决定调我去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

党中央于一九二九年春天开始在上海举办干部训练班。已经办了多期。前几期中央干训班的负责人是李维汉，主持日常工作的是曾中圣，保卫工作由中央特科的陈赓、刘鼎等同志负责。是年初冬我进干训班时，日常工作已改由易秀（胡克坚）主持。每一期干训班参加的同志，大部分是各地特委县委的负责干部。这一期能轮到我进训练班学习，是很好的事情。我们这批人参加革命后，一直在下面搞实际工作，在那种环境里，很少有学习革命理论的机会。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低，非常需要从理论上提高一步。

我接到通知时，非常兴奋，很愉快地从苏州回到上海。

我们这一期被调到中央干训班学习的总共只有七个人，大家都用化名，互不了解各人的历史。干训班规定不准互相询问情况。

这在当时复杂的秘密斗争环境下，也是必要的。干训班的纪律很严，进去后即不准外出。我们各人的真实姓名、职务、工作表现、思想情况等等，只有省委和中央主要同志知道，别的同志是不知道的。

中央干训班的课程：国际国内的形势，由周恩来同志主讲；农民运动，由李维汉同志主讲；职工运动，由康生主讲；妇女运动，由蔡畅同志主讲；青年运动，由 C.Y. 省委书记主讲。我们听讲后，一个一个各自把过去的工作总结一下。总结时，七个人不在一起，而是单独进行的。我总结了历次领导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我认为暴动失败，主要是对政治形势估计错了，选择暴动的时间和地点也都错了。当时，上海、南京是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腹之地。他们对这块地区的统治，死也不肯放松，过去许多军阀也是如此，新军阀及帝国主义都配备重兵防守。我们把暴动的地方选择在这里，是很不恰当的。敌人兵力集中，交通方便。暴动一起，敌人即刻赶到，自己没有一点整理队伍的时间，怎么不失败。我的这些意见受到了很严厉的批评和斥责，结论是我领导暴动的思想不正确，行动很不得力，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我受了不舒服的批评后，作了不合实际的检讨，检讨搞了两次才通过，其他同志我不清楚，但在吃饭时，看他们的脸色表情也猜到几分。

干训班不到一个月时间，就结束，分配工作。

十一月十七日，省委通知我，参加二次省党代会，是作为京沪线上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我当天离开中央干部训练班，由易秀领我去沪西龙华路外日晖桥附近的一所大厦。后来知道，这是由我们党秘密控制的一所学校——泉漳中学。

大楼前围着篱笆，院子较大。篱笆上装有电铃。去开会的人，事前均规定好各自按电铃的暗号。易秀按照暗号捺了电铃。紧闭的大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位厨娘打扮的中年妇女，看样子很象一

个工人。她让我们进去，叫我们到大楼里面一个柜台前接洽，自己关好大门，就转身向隔壁的屋子去了。

我们进楼来到柜台前，那里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医生，显然是作为掩护的。他问了我们的名字，在代表名单上查对了一下。我的化名仍叫祝同。他把我的编号发给我，叫我跟他上楼。上楼后，他把我交给一位招待员，招待员把我领到宿舍。这间房间住了十多个人，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同志，除了个别外，我都不大认识。各人的真实姓名，彼此之间都不知道，但一见面却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亲热得很，谈话时互相均以假姓名称呼。在当时那种白色恐怖下从事秘密斗争，这么多同志聚集到一起，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熟悉的同志相会，更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我们这些代表，一经到会，一般就不准外出了。会议伙食等生活杂事，统由机关负责同志承当。

开会地点在楼上的一间较大的房间里。保卫工作做得很出色，如果一旦被敌人发觉，是可以抵抗并掩护同志们撤走的。

在我的印象里，中央和省委对这次全省代表大会是十分重视的。中央除派李立三、周恩来作为正式代表，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大会外，实际上当时在沪的中央其他负责人，如向忠发、项英、蔡畅等，也几乎全部到会了。中央军委曾中圣、朱瑞、邝继勋等列席。省委几位常委，李维汉、李富春、陈云、康生、李硕勋，都参加了大会。其他，上海沪东、沪西、闸北、法南、沪中、浦东六个区，以及从上海以外来的代表，如何孟雄、夏采晞、李超时、阮啸仙、严朴、陈资平、刘瑞龙、柯庆施、王克全、吴国治、孟济平、徐炳根、顾作霖、惠浴宇、祝同、陆钧、蒋云、游无魂、郭梦麟等；职委的代表徐锡根、王秀英、徐大妹等，也都是当时我党在各地区或各方面的负责人。

十月十八日，大会开始。上午九时左右，李维汉同志宣布正式开会。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三十六人，实际上到了三十四人。

他讲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接着就是选举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候选人名单由省委拟定的，交大会通过。主席团成员共十人，即周恩来、徐锡根<sup>①</sup>、李维汉、康生、王克全<sup>②</sup>、吴国治<sup>③</sup>、孟济平、徐炳根<sup>④</sup>、陈资平、顾作霖<sup>⑤</sup>。大会秘书长为王克全。名单宣读后，大家就酝酿起来，我听到有几位同志都在小声议论：“怎么主席团里没有何孟雄？”表决时，我环顾了整个会场，见有七、八个人弃权。我当时考虑，名单上的大部分同志都是可以的，但是主席团中排除了象何孟雄那样有水平、有威望而又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确是美中不足。大会以大多数赞成而通过。选举结束，徐炳根站起来说：“我们许多同志在斗争过程中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杀了！我们要表示追悼！我提议大家起立，为彭湃同志、李宝林同志、以及其他死难烈士静默三分钟！”他的话音刚落，我们都纷纷肃然起立，低头默哀。

默哀毕，李立三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他的报告很长，讲了一天多时间。它的主要内容是说：世界革命已经进入“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国内的统治阶级也一天天走向崩溃。在新

---

① 徐锡根，原为上海厚生纱厂工人，一九二五年入党，曾任中共江苏常委，“六大”时任省委书记，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任省委职委书记。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叛变投敌，改名冯琦，充当中统特务。一九四六年任国民党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后逃亡台湾。

② 王克全，原为上海工人，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秘书长等职。时任上海总工会主任，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增补为中央委员。一九三一年五月被开除出党，六月叛变，充当国民党军统特务。抗日战争时，任军统重庆稽查处副处长，后因枪支问题受责于戴笠而自杀。

③ 吴国治，原为上海沪中区估衣业营业员，时任中共沪中区委书记，江苏省“二大”被选为省委委员。一九三三年任松江中心县委书记时叛变投敌。

④ 徐炳根，一九二八年二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次年十二月省委与省行动委员会合并，任主席团成员。后又任省委委员等。

⑤ 顾作霖(1907—1934)，江苏嘉定人(现属上海)，中共党员，曾任团江苏省委书等。一九三一年到中央苏区后任中共中央局委员、少共书记、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在瑞金积劳病故。

形势面前，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推翻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在党内则必须反对取消派，取消派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走狗，同时还必须反对一些同志的右倾思想。在农运中，主要是实行反富农政策。

十九日上午，李立三的报告结束，稍事休息，由李维汉代表省委作题为《江苏政治状况与党的任务和策略》的副报告。省委这个副报告的主要精神，是与李立三的政治报告基本一致的，即“左”的倾向比较明显。由于这个报告也很长，李维汉在大会上说明只是抽出几个中心问题，加以阐述，而整个书面材料将在会后刊登在党的内部刊物上。

二十日，大会讨论中央政治报告和省委副报告，原定一天结束，但意见分歧很大，争论非常激烈，二十一日延长了一天，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大会主席说明：因秘密工作环境关系和各区工作紧张，讨论不允许再延长时间。遂由中央代表李立三作了结论。

以后几次会议：二十二日，康生作了省委组织工作报告；二十三日，恩来同志作了中央组织问题报告；二十四日，中央代表作土地问题报告，接着，又由陈云同志作了省委农运报告，即《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二十五日，徐锡根作省委职工运动报告。其间也穿插着讨论。徐锡根这个人文化水平、理论水平均极低。他的报告“大纲”是别人帮助他临时准备的，但是他还是大一二三四、小1 2 3 4地讲了几乎一整天，空话连篇，“左”得要命，使听的同志们都感到很不耐烦。凡是“左”倾思想严重的人，总是空话、大话很多，装腔作势，夸夸其谈，不着边际。做报告也好，写文章也好，都带一股很浓的“八股”腔。我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时的文风也是这样的，至今流毒还很深。

在这次全省党代表大会上，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以及策略、理论等重要问题，是有争议的。大会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会场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全都挂上了厚厚的窗帘。代表中抽烟的人不少，整个屋子都弥漫着浓烈的烟雾。各种思想就在这浓烈的烟雾中交锋。

那时，代表们大多还只有二十多岁，年轻气盛，尽管由于保密和安全等原因，大家都尽量把发言的声音压得低低的，但激昂的情绪是压不住的，说话时甚至不停地挥动着拳头。会议进行十分紧张，同志们的注意力也非常集中。

向忠发没有在会上讲话。他在一九三一年六月，因生活上的问题，不听恩来同志的劝告，结果违反秘密工作的原则，被敌人逮捕。他一被捕，立即叛变，后仍为敌人所杀。

这次代表大会上，意见的分歧主要集中于这么几个问题：

一是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李立三为首的所谓“高潮观”。他们认为世界革命已进入高潮，中国革命也已是“成熟复兴”。反动统治阶级已经不是动摇，而是“走向崩溃”。我们已经到了“直接革命形势”，也就是到了总同盟罢工到武装暴动的阶段。“中国革命可以有几省或一省割据的前途”。另一种是以何孟雄为首的所谓“低潮观”。我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他们认为“反动统治是动摇的时期，只是崩溃的开始”，“革命形势是开始复兴”，而“不是成熟复兴”，我们目前还未到“直接革命的形势”。这些意见，李立三听了非常光火。再一种是所谓“来潮观”，总的看来意见是比较倾向于何孟雄的，但他们也主张暴动，不过比较强调要有条件。持这种观点的只有几个人。

实际上，“高潮观”和“来潮观”对形势的估计，都是主观主义的。当时的客观情况恰恰相反，革命确实处于低潮阶段。大革命时期我党力量比较雄厚的几个地区，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武汉方面，自从宁汉合流，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中央不顾以宋庆龄为首杰出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

反对，悍然举行“分共”会议，大肆镇压革命后，我党的力量遭到严重摧残，一直恢复不起来；广州方面，经过一九二七年底的广州暴动，由于优势敌人的猖狂进攻和起义部队没有及时转入农村，起义失败，党的组织也基本上被搞垮了。华北、平津一带革命力量迭遭摧残；上海、南京一带，更是反动派推行白色恐怖政策的重点。今天这里机关被破坏，明天那里同志被杀害。仅一九二七年内，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地就屠杀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三十八万人。全国的共产党员由六万多人降为一万人左右。这两年多时间中，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人如赵世炎、陈延年、汪寿华、肖楚女、熊雄、张太雷、周文雍、向警予、彭湃、杨殷、颜昌颐等同志均相继牺牲，这对党的事业是很大的损失。

国民党反动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竭力扶持下，却开始站住脚跟，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他们代替了北洋军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反革命新军阀的军事专政。

敌我力量十分悬殊。这严峻的现实，何孟雄以及我们这些在下面搞实际工作的人，是有深切的体会的。以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来看，由于国民党新军阀的军事专政，实行了极端残酷的反革命镇压和血腥大屠杀，无锡、丹阳、镇江、金坛、常州、苏州等，没有一处不是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革命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并被迫转入地下，象苏州那样比较重要的城市，除手工业工人中还有几十个党员外，党的组织几乎已被破坏殆尽，其他几个地方，反革命的力量也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再如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地区，如海门、启东、如皋、徐州、蚌埠等等，情况也大体如此。党内不少同志有畏难情绪。一些不坚定分子则叛变的叛变，落伍的落伍，颓唐的颓唐。过去有过联系的群众，大多不敢再靠拢我们。有的对面不理不睬；有的较好的同志，相见时对我们悄声说：“你早点走啊！叛徒、特务很多！”三言两语，也匆匆走了。上级派下去的人，

开展工作困难很多。如此现状,怎么能说“高潮”已经到来了呢?

二是斗争策略问题。大致有两种态度。李立三提出的是“准备地方暴动”的“进攻路线”。他要求按照“国际第十次扩大会议提出的政治罢工的口号”,说“我们必须用群众的行动政治示威去刺激群众”,“向着总同盟政治罢工的方向走”,并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南京、南通等城市迅速进行暴动,组织游击战争。徐锡根、康生等人表现得更“左”。徐锡根认为“我们的斗争毫无疑问的要采取进攻的策略”,“现在工人和资本家已到了肉搏的形势”,我们必须有计划、有组织地“去发动大的斗争”,“才能冲破资本进攻的形势”,“推动斗争更向前发展”。康生也主张要“不断进攻”。他说,“不进攻就是保守”。他要求“全江苏同志一致努力,准备武装暴动”。这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是认为:当前不是要暴动,而是要进一步隐蔽和保存革命力量,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等待新军阀混战,俟时机成熟时,我们再大干。这就是何孟雄所提出的,斗争策略应该是“准备进攻的路线”。何孟雄尖锐地批评康生专门搞大罢工的主张是“急性病”,而“不进攻就是保守”的说法是“形式逻辑”。陈资平当时也认为省委的进攻策略是“夸大了客观可能条件”,“没有估计到群众的自觉力”。他明确表示反对那种“放弃了日常斗争”,而搞“不断示威”的做法。同时还指出:游击战争必须具备某些必要的条件,目前条件尚未成熟,“马上要游击战争是不正确的”。在策略上,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少,其中大多是我们这些长期在下面搞实际工作的同志。这并非我们认识水平高,能比别人更好地分清是非,而是由于我们这些人更直接地下面亲身经历一次又一次暴动失败的痛苦教训。这是血的教训呵!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暴动一次,失败一次;暴动一处,丢掉一处。每一次挫折和失败,总有不少艰苦创建起来的组织被破坏,总有许多优秀的同志被逮捕、被杀戮。严酷的现实,教训了我们,使我们不得不认真



思考问题，并牢牢记取那些流血的经验。

三是有关理论问题。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革命与党的主观力量究竟有没有关系？李立三说：“革命高潮和党的主观力量没有关系，革命是客观力量造成的。”许多同志对这一论点有异议。我记得，政治报告刚结束，小山（阮啸仙）<sup>①</sup>就反对李立三的观点说：请你把恩格斯、列宁也说过“主观力量不要紧”这一点，提出确凿的论据，决不能捏造。李立三是随口说恩格斯、列宁都说过这话，其实在理论上并不一定有所根据。阮啸仙当面“将”了他一“军”，他提不出确凿的论据，只好避而不答。其他同志，有的举津浦路工人要求发放八个月欠薪和饭金一事为例，说明当时客观上“很迫切要求斗争”，但是那里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的教育，工人就不能团结起来，斗争也不可能得到有力的推动，“这证明主观力量是重要的”；有的引证西北饥荒为例，说明“即便客观条件好，如果没有主观力量，还是不能走向高潮，共产党的作用即在于此”。这些论证都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此外，在理论上，还有一些问题，例如江苏社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还是封建主义占优势？中国的富农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还是属于封建主义性质（即地主性质）？这些问题会上也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四是党的组织建设问题。这方面的问题，与会同志没有深入开展讨论，但意见的分歧还是存在的。例如，关于党的组织路线，重点应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省委强调必须放在产业工人中，党的领导机关百分之九十五要建立在产业工人区。当时全国四亿人口，产业工人不过八、九十万，而农民却是绝大多数（占总人口

---

<sup>①</sup> 阮啸仙，一九二一年入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农民讲习所任政治教员，曾任广东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委员，赣南省委书记等。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牺牲。

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城市还有手工业者、贫民、自由职业者等等。如果强调发展重点放在产业工人中,其他方面就有很多限制,势必产生关门主义的现象,党就不能得到大的发展。从江苏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只有上海、无锡、南京、南通、常州等少数几个大的城市,产业工人比较集中些。广大农村仍然是主要的。农村的革命斗争主要得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及其骨干。如果不注意农村的发展工作,革命怎么能全面搞起来?

又如,“我们一定要认清上层小资产阶级是反革命”和“富农必须清除出党”的问题。这也是李立三等政治报告中的主要论点。当时外县的党组织往往是一个地方总共只有那么几十个党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如果我们把大学教授、讲师、中学教师、医生、甚至小学校长等等,都一概视为反革命,而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具体政策界限又不很明确,究竟什么样的人“富农”也说不清楚,这也是富农,那也是富农,连富农的子女或其他稍有薄产的人也统统作为富农,这样左也开除,右也清洗,有些地方的党组织即使不完全瘫痪,也只剩下几个孤家寡人了,群众运动又如何发动与组织呢?

再如,“在江苏党内右倾还是主要危险”,“我们一定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肃清取消派”,并坚决与“调和派”斗争的问题。据我所知,当时少数取消派是存在的。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帝国主义被赶走了,封建主义也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胜利,因此主张召开国民议会,发展资本主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那些人总是举南通的张謇<sup>①</sup>搞的

---

<sup>①</sup>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一八九五年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在通州创办纱厂、一九〇〇年起,陆续开办通海垦牧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并创办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南通学院、盲哑学校、南通图书馆、博物苑等。著有《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啬翁自订年谱》等。

通海垦牧公司和江浙地主实行货币地租等例子，以说明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化。实际上这些意见均是主观主义的东西。如这次参加省二次党代会的江常师等人，就持这种观点，而且此后不久就在被称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了名。一起签名的有陈独秀、彭述之等八十一人。这样的人党内是有的，但毕竟是极少数。至于，所谓的“调和派”，其实就是指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这样一批坚持正确意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好同志。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党内的主要倾向是“左”而不是右。已经够“左”的了，还要不停地“开展反右倾斗争”，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呢？

在这些问题上，各种不同意见的斗争是相当尖锐的，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其实，中央代表和省省委常委中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致。我记得，恩来同志就明显地发表过和李立三同志不同的意见。他认为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是不同的。有革命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他说：“我们同志常说革命高潮到来就可以无条件暴动，这还是要看主客观的条件。”因此，他尤其强调：“我们更应当加紧我们主观力量的发展。”陈云同志也作了必要的说明。他认为“开始复兴和成熟复兴是有差别的”，“为示威而示威，这不是我们的路线”，游击战争也“不是明天就开始”，但是我们一定要为这一斗争创造条件而“更加紧群众工作”。

现在，我回忆起来，这次党代会总的说来还是比较讲点民主的，不同意见都可以发表，有关中央和省委会的报告中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也可以指出。何孟雄在会上表现得很顽强。他据理力争，慷慨陈辞、讲得头头是道，有时感情激动得不能自己。他发表意见后遭到几个同志的反驳，第二天他又提出“要把意见摆出来，一定要第二次发言”。我们一些在下面搞实际工作的同志，大多是同情他的观点的，不过，从整个会议来看，发扬民主还不够充分。正确的

意见发表出来，李立三不虚心吸取。何孟雄坚持了自己的意见。李立三代表中央做结论时，就多次点他的名，说他是“很动摇的”，他的路线“就是调和派路线”，并且强调指出“我们在政治上一定要和调和主义作斗争”。这样，何孟雄很快就成了这次党代会上的主要斗争对象，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只好服从大会的结论，低着头坐在会场的角落里，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地猛抽，不再说话。其他，如陈资平、峻山等人，也被中央代表在结论中点名批评，受到很大的压力。这种作风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今天想来，幼稚可笑。

会议原拟开两周时间，后因上海白色恐怖特别厉害，中央和省里的主要干部几十人聚在一处，开会时间不宜过长，所以一再紧缩，只开了九天，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结束。

最后一天通过了关于政治、组织、职运、农运、青运、反对党内取消主义、武装保卫苏联等一系列决议案，并选举了新的省委。新省委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提名，经大会主席团通过，最后交代表大会表决。我记得，选举时何孟雄表示自己在大会上持有不同意见，要求从省委候选人中除名。但大会认为他已服从决议，当选没有问题。任弼时因调中央工作，未列入候选人名单，由李立三作了说明。

这次代表会议之后，我没有再见过何孟雄。他是一位光明磊落、敢于坚持真理的好同志。后来王明教条主义宗派集团推行更“左”的做法，他仍然坚持与之作不调和的斗争。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他在天津路中山旅社与欧阳立安等同志一起，被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和帝国主义公共租界巡捕房组成的联合行动队逮捕；同时，住在三马路东方旅社的林育南等同志也被捕。次日，李求实为找林育南而撞进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又遭不幸。以后又有不少同志在华德路小学等处被捕。这是王明教条主义宗派集团上

台后，我党遭受到的一次大破坏。

被捕同志中还有我在常州时一起工作过的恽雨棠、李文，以及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等左翼作家。他们在同年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都在龙华壮烈牺牲了。鲁迅为左联五作家的牺牲，还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章。这是一件震动一时的大事情。告密者的鄙劣伎俩和丑恶灵魂，是应该永远受到人们诅咒的！

陈资平此后担任过上海法南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徐海蚌特委书记，以及红十五军军长等职。一九三二年秋，调任河南省委书记，化名张华甫，刚到开封没几天即被捕。敌人将他押送到蒋介石的武汉行辕，他即叛变投敌，后参加 C. C.，颇得信任和重用，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南京实验区区长。他又策动其弟陈伯扬以及王伯谦等人叛变，对我盐城、淮阴、徐州、海州、蚌埠等地党组织造成极严重的破坏。因此，党中央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发出决议，认为陈资平等“被国民党逮捕后，完全投降国民党并进行破坏党的工作，完全成为共产党的叛徒、无产阶级的敌人，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在党报上公布”。陈资平此后又先后担任过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委员，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肃反专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战地党务处处长，中统局苏鲁豫皖四省办事处主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等职。他的叛党事实，铁案如山，是推不倒的。至于，他在抗战胜利后，参与组织“孙文主义革命同盟”，进行过反蒋活动和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那是另一回事。

中共江苏省第二次党代会，对江苏党组织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对江苏党的工作是有建设性的作用与贡献的。中央和省委的报告中也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内容，如恩来同志关于党要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以及如何以马列主义武装群众、如何实行党内民主化、如何加强党的纪律性等意见，李维汉同志关于“农民

是无产阶级最好的同盟军”等意见，陈云同志关于要用各种名义来组织农民群众和有系统地建立各级农会等意见，对于我们当时的斗争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即使是李立三的报告，也有不少正确的、合理的部分。然而，这次大会的精神，确是以立三同志的政治报告为基调的，“左”的倾向贯串始终。本来已经存在于江苏党内的“左”的东西没有完全克服，经过立三同志等的加码，又向“左”的方向跨进了一大步。尽管许多同志有不同意见，党员还是服从党的决议，代表们回去还是认真贯彻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努力干革命。这次代表大会后，江苏的党组织和革命运动，曾一度有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左”的影响，革命力量所受的损失也是非常严重的。

时隔五十多年，我回顾这次党代会的情况，深感我们党当时在思想上、理论上还很幼稚。总结经验教训，我认为有几个问题是必须引起重视的。一是无论何时我们对形势的估计一定要实事求是。凡是形势估计错了，一定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二是我们对待事情决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原则性与灵活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应该相结合，特别要研究特殊情况。三是对各种人和事的看法，切忌形而上学。即使敌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或一成不变的。四是千万不要学习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的做法。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历史总是发展变化的，不是凝固的。如果固定地、死板地看待问题，一定要犯错误。五是必须认真改正对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共产党员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这样。

## 11. 到无锡任中心县委书记

江苏省第二次党代会结束后，我从龙华外日晖桥附近的泉漳中学，移居到闸北的一个中等客栈。根据省委的指示，要我通知武进县委顾志鹤、岳锡山来上海谈工作。他们到了上海后，由李维汉同志主持开了一次会议，专门研究常州的工作。参加这次会议的除省委几个负责同志外，还有我和孟济平。孟济平当时负责外县工作。

会上，顾志鹤等详细汇报了天宁寺抗租斗争的经过。李维汉作了指示，要常州方面继续冲破白色恐怖，进一步开展抗租斗争，并加强城市工作，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也发表了意见，主要谈的是加强铁路工人和几个大厂的工作问题。我经过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后，思想上更趋向“左”倾，口头上也是强调要罢工，要斗争。对常州工作，我主张武进县委将工作重点放在几个大工厂和铁路工人中，同时主张加强士兵工作，准备迎接全省的五一总同盟大罢工。我的思想“左”倾，主要是怕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省委决定我到无锡去任中心县委书记。当时的中心县委实际是一个小特委，以无锡县委为中心，领导江阴、常熟、宜兴、溧阳四个县，作为上海外围的一个区，直接配合上海的总同盟大罢工。

李维汉把这决定告诉我后，我立即向他反映情况说：我不宜去无锡工作，因那里熟人太多。李维汉把脸一沉，说：“你怕死吗？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党分配的工作，否则没有资格当共产党员！”“好凶！”我内心这样想，实际上我对党的决定是服从的。

李维汉说：“你去无锡后，迅速成立罢工行动委员会，行委委员

只要三至五人，一定要选择产业工人担任领导，只有他们最坚强可靠。”

这是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对工人阶级的绝对化的认识。

临走前一天，李维汉、蔡畅、康生等又分别找我谈了话。中心问题都是讲的五一大罢工各方面的工作，无锡中心县委如何迅速配合上海行动起来。

李维汉同志对我说：“你一到那里，就要抓紧时间把情况摸清楚。前一时丹琳在无锡担任县委书记兼组织工作时，有过工作报告。据他们讲，那里的国民党改组派活动很厉害，已占据了国民党县党部的部分要职和两个工会。C. C. 和改组派都想把无锡作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中心，我们也必须把那里作为仅次于上海的重要地区。你去后首先把领导机关整顿好，不要用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领导，因为他们大多是不坚定分子。领导总同盟罢工的行动委员会，必须全部是产业工人。你自己也要进工厂做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好地真正了解工人的苦痛，才能更好领导工人阶级去进行斗争。上海的五一总同盟罢工一发动起来，你们就要在无锡响应，声势要大一些，越大越好。江阴、常熟、宜兴、溧阳四个县委，也要相机配合行动。”

康生在省二次党代会后，负责组织工作。他到客栈来和我谈的主要内容是：搞大罢工是目前党的工作方针，无锡工人的工资比上海低，很容易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大罢工。全国革命形势高涨，罢工的条件已经很成熟了。国民党已趋向崩溃，你去后先发动一、两个工厂罢工，逐步发展到全面罢工。无锡产业工人集中，比上海一个区还多，基础雄厚，容易掀起罢工浪潮。对特务、叛徒要狠狠打击。无锡东北乡不久前出了个叛徒，把几个支部统统搞垮了！要组织“打狗团”，给这些叛变分子处以死刑！

为了创造罢工条件，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宣传鼓动工作，如



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你们在宣传工作方法上尽量要趁工厂上工放工的时候，多搞飞行集会，发表简单有力的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口号一定要鲜明：如“打倒国民党！”“五一总同盟罢工！”“庆祝苏区大胜！”“武装保卫苏联！”等等，要搞得敌人非常恐慌。各厂都要以赤色工会来对抗黄色工会。在斗争中把勇敢的先进分子吸收进党来，大大发展壮大党的队伍！

他的意见完全与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但我到无锡后，还是照他的意见去执行了。

蔡畅同志是当时负责党中央的妇女工作的，她也直接抓江苏的妇女工作。她对下面的情况比较了解。她对我说：无锡的工业，主要是纱厂和丝厂，这些厂的工人大部是女工。工运工作，在无锡来讲实际上就是妇女工作。如果把无锡的妇女工作搞起来，工会工作也就搞起来了。女工工资低。拿摩温（工头）欺侮女工更厉害。搜身、辱骂、调戏是常事，如有反抗，立即遭到毒打，或开革。在这种资产阶级加封建的压迫下，工人特别苦痛。你们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从他们这些切身利益出发，进行广泛的宣传，就很容易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这样群众就会跟着我们走。

何孟雄、王克全、徐锡根，都分别和我谈了一些问题。他们的意见有的是与省二大精神一致，有的明显是与省二大精神相背离的，如何孟雄还是坚持他在省二次党代会上发表过的意见。他说：“国际形势好，不等于我们国内形势也好。现在急于大罢工、大暴动，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他希望我要注意隐蔽和保存力量，切不要蛮干。他说盲动是要毁灭党的。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供我参考。我当然内心明白。

王克全的意见大体与何孟雄相近，但他暗示如果李立三不改正他的路线，我们只有另想办法（即另立省委）。

我思想上倾向于他们的政治意见，对另立组织对抗省委不同

意。何孟雄也不同意这个意见。

我带了组织关系回到无锡，那里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我按省委指示的联络地点，到周山浜的一片小酒馆里去找刘阿二。他是省委军委派到无锡搞兵运的，参加县委。前县委书记丹琳走后，由他临时负责县委工作。那时负责省委军委工作的李富春，交代我到无锡后仍叫刘阿二担任军事工作，不要随意变动。

我到小酒馆，就找一张空桌子，坐了下来。

跑堂的过来，问我：“客人想吃点啥？”

“老板可在？”

“我就是。你找我有啥事体？”

“你这里有位刘阿二先生吗？”

“出去了，你找他有啥事体？”

“我从上海来，他亲戚要我带信给他。”

“好的，你晚上再来。”

当天晚上，我又去周山浜小酒馆，和刘阿二接上了头。看样子，刘阿二是一个很老实的好同志。他拉我到酒馆后房去谈，我四周围看一下，问他有没有后门，他告诉我没有，我想不妥，约他明日到附近地方详谈。明日我们在郊区人少来往的地方一个池塘边谈。刘将无锡的情况作了介绍。

他说无锡的工商业虽然比较发达，党在这里开始活动的时间也比较早，但迭经破坏，我们党的力量已根本不是很强的了。

农村方面，东北乡原有五个支部，党员共二、三十人，由于叛徒告密，那一带的组织全部被破坏。东南乡原有一个区委，因长期经费困难，敌进逼又紧，结果全部出走。石圻湾有一个支部，由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在负责，党员人数不清楚。方桥有个党团混合支部，其中党员八人。板桥也有个党支部，只有三个党员。

城市方面，力量也很单薄，党员分布在五金业、估衣业、人力车

工人、小学教师、旅馆茶房、饭店跑堂中，人数不过二、三十人。他们的特点是分散，很难发动斗争。旅馆、饭店中的党员，主要任务是侦查敌人的消息，并适当做一点通讯联络工作。驻锡的国民党军队陆军第六十一师五十一团第一营中，有一个党小组。在产业工人中，党的力量也相当薄弱，广丰、广勤、申新、丽新等几片大纱厂，以及南门薛家的丝厂，有一些党员，人数不到三十，而且情绪不高，战斗力不强。

县委委员原有七人，除刘阿二外，还有两个工人，三个小学教师，一个农民陆甫泉。他们的思想状况是不符合省委的要求的。

刘阿二将工作汇报后，我把省二次代表大会精神向刘谈了谈。接着，又分别与几个县委委员谈了话，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征求他们对县委今后工作的意见。他们对暴动都非常害怕，因几次暴动后许多同志被杀，一直心有余悸。他们共同的意见，认为县委暂时不能搞大的行动，尽量多做点隐蔽的工作。他们这些意见与省委指示的精神距离很远，要说服他们是不容易的。我只好把原来的县委由陆甫泉负责，移到郊区，专做农村和小学教师的工作。我和刘阿二、周荣根、倪阿来四人重点抓工厂工作，他们都是工人，组成行委会，机关设在城内，行委的任务是积极组织并领导五一总同盟大罢工。

共青团无锡县委书记是以后来的华希贤（化名小李），他与徐志良等一起，专做学生工作。

组织调整好了。我于十二月十六日以无锡县委的名义给省委写了报告。除对当时无锡政治经济形势作了必要的分析外，主要讲了工作计划。由我负责铁路和申新纱厂方面的工作。周荣根负责黄包车工人和沿铁路附近的农民工作。刘阿二负责兵运工作。县委另一位同志负责广勤区各丝厂的工作。工作的重点放在铁路和申新纱厂、乾生丝厂上。根据各厂不同情况抓住工人的迫切要

求，发动罢工，由零星的罢工汇合成五一的大罢工。对黄色工会坚决进行破坏，揭露他们是资方派到工人队伍中来进行欺骗的走狗。

我们都深入到工厂去活动。我到周山浜的庆丰纱厂，支部书记姓王，十几个党员，编了四、五个小组，除了两个修理机器的“铜匠”外，大多是女工。又到广勤纱厂，找到了陆阿妹和另一个翻砂工人的妻子，他们以拜小姐妹的形式作掩护，建立了一个党小组。再到振新纱厂，六、七个党员，也都是女工，但拿摩温控制很严，年轻的女孩子又比较胆小，缺乏必要的组织能力。康生在上海向我说的赤色工会，实际上各厂并不存在。

我到无锡没有多久，省委发来了关于组织同盟罢工的中心问题的指示和计划大纲。省委指出：组织同盟罢工必须有中心斗争纲领，加强宣传鼓动，使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密切联系发展，进一步肃清取消主义。计划大纲对组织铁路、海员、兵工厂罢工的主要路线和具体工作作了部署。这两个文件给我的印象是要求太高，实际上不能做到。省委又要求我们迅速成立罢工行动委员会，并限期将组织情况和委员名单等报告省委。

当时无锡的经济和政治情况相当复杂。大资本家分为五个系统。杨氏系统（杨艺芳、杨藕芳及杨艺芳之子杨翰西）的业勤纱织公司和广勤纱厂，有两万多纱锭，另七十多台织布机，资本一百五十万元，工人三千多人；荣氏系统（荣宗敬、荣德生）的茂新面粉厂、振新纺织厂、申新纱厂等，有十来万纱锭，四、五百台织布机、一百多台轧花机，还有面粉机械若干，工人万余；薛氏系统（薛寿萱）的裕昌、永泰、锦记、华新几片丝厂，有缫丝车六百多台，工人一千五、六百人，另外还有太湖水泥厂等；唐蔡系统（唐保谦、蔡絨三）的九丰面粉厂、润丰油厂、锦丰丝厂，有工人六、七千人；唐程系统的丽新纱厂也有一千多工人。资本家互相竞争、倾轧，矛盾相当复杂。但这些矛盾，当时我们不敢利用。

农业方面，天灾人祸，普遍歉收。西南乡只收七成，其余地方只收五、六成。农民生活非常困苦。客观的经济情况，很便利发动群众起来革命，问题在于革命的方法是不是对头，光凭热情和主观的想象提出要求，是达不到革命的目的的。

政治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很尖锐，如吴稚晖派公开进行倒孙祖基活动；顾述之、钱孙卿等利用教育局与县政府的对抗；国民党县党部 C.C. 派又与县政府勾结起来，倒教育局。C.C.的正式名称是国民党中央干部俱乐部，是由那时把持国民党党权的陈果夫、陈立夫受蒋介石指使组成的一个特务机构。在无锡这机构才刚刚成立，靠二陈在国民党内掌有组织大权，力图扩张势力。而改组派在无锡的势力也不小，斗争更为尖锐。但他们对付我们党和革命力量，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罢工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即报省委批准。刘阿二、周荣根、倪阿来和我四人组成，可算全部是工人，我也算在工人之内。名单报到省委，两三天就批下来了。那时省委有个高个子、大鼻子的政治交通负责与我直接联系，每周来一、二次，送文件，并把县委的工作报告带回去。

十二月中旬，大资本家薛寿萱家开的锦记丝厂发生自发罢工，我立即去了解情况。罢工的起因是东洋的人造丝充斥市场，我国丝绸销路不好，厂方亏本，从而大批开除童工，并不准女工带婴儿入厂。我到丝厂时，工人正在罢工，要求厂方允许女工带婴儿入厂和恢复童工工作。厂外一片混乱。厂方以关厂停业相威胁，工人急需有人出来领导。于是，县委决定派周荣根找到关系，把几个积极分子秘密组织起来，成立罢工委员会，领导这一斗争，反对黄色工会出面仲裁，一切由工人直接向厂方交涉，周荣根直接掌握罢工委员会。由于资本家困难较大，暂不提过高要求。

锦记厂有了党的领导，形势很快转好。我们又动员其他丝厂、

纱厂的工人声援锦记厂的罢工斗争。黄色工会几次派人来调解，说资方困难很大，劝工人不要罢工，均被工人赶走。资方见势头对他不利，软了下来，被迫承认条件，允许女工带婴孩进厂喂奶，吸收部分童工回厂，但不能全部吸收，工人才同意复工。罢工取得了胜利，锦记丝厂工人的情绪开始高涨起来。我趁机做好几个积极分子的工作，把罢工委员会改成了工会。

无锡这地方是我第二故乡，我对它有深厚的感情。大革命时又在此地负责学运工作，熟人很多，多么想看到许多老同学和老师，但又十分怕暴露自己，所以没有必要时，不轻易进城找关系，这时很想进城去找找老关系，请他们介绍我到工厂去做工，考虑的结果还是不进城为好，最后仍通过庆丰纱厂一位姓王的支部书记的关系，先在庆丰工人宿舍区租了一间小房子住下。王某是厂里修理机器的师傅，俗称“外国铜匠”，有技术，在厂里说话比一般工人有用，所以我再请他帮助，在厂里当一个零工，扛扛棉花，打打包，既作为掩护，又能直接与工人多接触。我别的工种不会做，只能在清花车间做工，拣拣棉花，劳动简单，清花车间大多是些老太婆，唯有我是小伙子，大家看不起我，开展工作不大方便。但拿摩温不大注意我，又有方便的一面。

我在庆丰纱厂工作了个把月，情况稍有起色。有一天，刘阿二突然来找我，脸上略带惊慌的神色。我把他带到僻静处，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告诉我：常州发生了兵变！详细情况还不清楚。消息来源于驻锡部队中的我党同志。他们说无锡即刻就要戒严，部队也要严紧起来了。城厢各要处均将派兵把守，以防万一。军警正在筹划要在无锡拉二十四条大船和一千个伕子，看来会有大的行动。我想，常州兵变是否与我党领导有关还不知道，但乱了敌人阵营总是好事，我们应该抵制拉船拉伕。我们研究了一下敌人军警的情况，无锡城的驻军不多，但其他武装还有相当数量：陆警六百

五十人，水警五百人，商团八百人。就这两千多人枪，可以不难维持他们的统治。拉船和伙子，可能去江西服役，与常州兵变无关，常州兵变有可能是谣言。

我们应以破坏敌人封船拉伙，迟缓敌人的行动。于是，就找人分头行动，通知我党打入敌军警内部的同志设法拖延敌人行动时间，秘密告诉河中停泊的船只悄悄开走，结果敌人只拉到十余条小船和几百个伙子。

紧接着，我们又策动国民党军队驻锡的五十一团一营三连闹饷，又组织业勤纱厂工人搞了一次工潮。那次工潮，因放工时工头搜身，强迫女工当众脱去衣服检查，女工不肯，发生争执，工头就打那个女工。三百多工人，一齐拥上去，把工头打了一顿，并要求厂方将那个工头开革。这段时间内，我们还上街贴了许多标语，散发不少传单等，搞得敌人恐慌得很。侦缉队四出活动，满街乱跑，加紧对共产党人的搜捕。我们搅乱敌人，但也妨害了自己的活动。

为了应付紧急情况，行委在城里崇安寺一家裁缝店里设一个联络点，与各地来找中心县委的同志联系；在广勤路设一个联络点，与城区和各工厂的同志联系；在南门外设一个秘密机关，专存放印刷机和文件，除一秘书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各负责同志，除个别规定能知其住处外，任何人都不得将自己的住处告诉别人。我的旧住处已引起人怀疑，因此离开了庆丰纱厂的工人集居处，搬到了另一个地方。这新的住址离刘阿二住处较近，方便多了。我们这样做可以尽可能减少损失。

我和刘阿二的住址，都是严格保密的。县委委员和罢工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的住址，只有我知道。倪阿来住广勤路附近的达鑫翻砂厂，周荣根住东林书院附近。但我们两人的地址，他们不知道，也不允许有人去。为了便于联系，我们又在通惠桥附近设了另一个联络点。我每到一处，姓名都变，有时叫祝同、有时叫顾雅思

或夏继尘等等，为了瞒过敌人经常变化。我的装束也因时因地而异。到学校、客栈等地方，就穿长衫或学生装，戴上眼镜，显得很潇洒的样子；到工厂、码头等地方，则穿上工装，而且到那里就跟工人一起驮煤扛包或干翻砂等杂活。

我在无锡工作，困难比别处大。白天一般不能在热闹的大街上露面。开会大多利用郊区僻静之处，选择时间不在星期天，会议时间很短，个别谈话则采取边走边谈的办法。

无锡的工作进展很快。一两个月时间，我们又在布厂、机器厂、翻砂厂、估衣业、北街、光复门等处，新建立了七个支部。

陆甫泉等几个县委委员把工作重心移到乡村后，也大力恢复并发展党的组织：南乡东丹、张镇桥、西南乡都有了党的组织，其中贫农占一半，其余为教员、小贩等。党员的成份有了较大的变化，支部生活开始趋于正常。

康生来无锡检查工作，我把无锡工作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颇为满意，他说：“无锡条件已经成熟，配合上海五一总同盟大罢工，是很有希望的。你们必须抓紧时间把工人发动起来，从个别厂罢工，逐步发展到全面罢工。要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如散发传单和飞行集会等，一有机会就要进行。要注意防止侦缉队和叛徒的破坏、追捕，也要防止改组派捣鬼。要加强驻军工作，抓住欠饷打骂这一关系士兵切身利益的事情，发动他们逐步走向城市暴动。这样才能狠狠打击国民党反革命气焰，使他坐卧不安。”

由于我们不断散发鼓动各厂同盟罢工的传单，敌人大大提高了警觉，四出抓人，凡有点嫌疑的人，大多被捕，连国民党改组派分子也抓了不少。愚蠢的敌人把他们也看作了赤化分子。我们的组织也有几处被破坏了，有几个同志被枪毙了。

三月五日，省委又给我们指示，主要意思是说省委接受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的第十七号通告，强调指出：



“目前军阀战争继续爆发（当时张桂联军以及唐生智、石友三和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联系，举兵反蒋拥汪的战争刚刚平息，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集团及他们的将领鹿钟麟、商震、黄绍竑等五十余人，又共同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司令，共同反蒋），反动统治日益削弱，革命浪潮日益发展。江苏党必须领导一切群众斗争，使之汇合、扩大、深入，即举行政治罢工，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举行兵变，实现地方暴动。”

我们接到这通知后，认真研究了如何贯彻问题。一面在各厂努力发动群众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首先在庆丰突开，其他各厂跟上。另一面加紧对敌六十一师一营的活动。条件成熟时，立即哗变，拉入太湖里去打游击。

三月十日，刘阿二根据县委的部署，带了一批人在兵营附近散发传单，内容是要求发清士兵欠饷，造成军队混乱。敌营长立即集合部队训话，追查传单来源。告密者有赏，隐瞒者格杀勿论。敌军中的几个我党同志，根据刘阿二事前布置，故意顶撞营长，想扩大事态。敌营长下令抓了几个人。随即有人叛变，敌人连忙派兵搜捕。刘阿二开始没有被抓住，他转移到西门外迎龙桥堍的棚户区，隐蔽在黄包车工人住的草棚内，结果还是被敌人侦查到了。

三月十三日，《申报》登出了刘阿二等七名共党因“煽惑兵士叛乱而被捕”，并押送“苏州团部讯办”的消息。同时，还刊登了营长梁载荣具文请求将有关人犯“就地正法，以遏乱萌”的报道。

我立即转移了住地，并通过关系探听刘阿二等同志的情况，准备设法营救。据驻军中党小组内未被发觉的同志报告，敌人抓到刘阿二后，即连夜严刑拷问。但，不管敌人用什么酷刑，他总是一口咬定自己是“做小生意，卖香烟瓜子的”。敌人无法，才将他解往六十一师师部，继续多次刑讯逼供，他仍不变口供。敌人查不到任何证据，只好移送法院。后来听说他被判了五、六年徒刑。有人说

刘阿二叛变了。我也听说过那样的话，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不实之词。

刘阿二被捕后，因刘知道我的住址，为防止意外，我不能再返住地，后也没有听说敌人到我住处搜查过。敌人到处抓人，空气特别紧张，我如照旧办法活动，容易被捕，决定埋伏更深一点，活动方法更隐蔽一点，即去找黄包车党小组组长老黄同志，商量解决我的住宿问题。老黄是苏北逃荒过来的，已在无锡拉车七、八年，地形人头都很熟悉。我找到他，把情况告诉了他。他愣了一下，说：“暂时在我家隐蔽几天再说。”他家住在通惠桥北运河岸边，离桥堍仅三、四百米。那里全是棚户。他家五口人：夫妻俩、一个老母亲、两个孩子，挤在一间低矮潮湿的小草房里。当晚我就在他家房门口一小块地方睡下了，实在不好意思。住房问题，又成了我的迫切要解决的严重问题。白色恐怖非常厉害，有这种紧张局面，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传单、标语随便乱来，敌人能让我们这样搞下去吗？他们非下决心把这种隐患消除掉，这是斗争规律，我们只想到自己如何去做，一心想把敌人搞得很恐慌，而不想到敌人如何对付你，这是最愚蠢的想法。没有老婆租不到房子，我只好移到倪阿来家暂住。这是秘密工作所不允许的。我犯了错误了，就此种下了祸根。

刘阿二被捕，对我们是一个打击。尽管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厉害，但是，五一大罢工的任务逼得很近，省委又不断的催促，我们不得不还是在深夜出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甚至还在大白天到郊区工厂区举行飞行集会。这又进一步把敌人和自己搞得很紧张，五一的任务怎能去完成？所得到的结果是相反的作用。我们这样蛮干，等于告诉敌人，共产党活动还很厉害，必须加紧搜捕，这就给党组织带来了更严重的破坏。每次行动，都有一些组织遭到破坏。街上到处是缉捕和警察，各厂的厂警对厂内外的工人监视

特别严密。对城区学校对教师和学生监视更加严密。有一次北塘小学有两位教师同志深夜在巷子里贴标语，躲在巷角的密探跟上了，第二天一早就将这所小学紧紧包围进行搜查，警察把昨夜贴标语的两位教师抓去，另两位教师被迫转移到乡下。这学校的组织就此垮掉。

敌人用严刑追查他们的上级领导人。审讯到第三天，供出在无锡的领导人叫顾雅思，敌人误听为顾阿四。再追查我的住址，他实在不知道，不久敌人将这二人枪杀了。当时只要你一供认是共产党，很少不被枪决的。

又一次，荣巷的工商中学教师在朱祥巷一带电线杆上贴了“打倒蒋介石！”等几张标语，敌人追查，几个教师同志不得不逃走，工商中学的组织就此垮掉了。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

敌人到处抓人，市面上人心惶惶。茶楼酒肆中，经常有人谈论顾阿四是什么样子，王阿弟又是什么样子。一人传十，十人传百，越传越离奇。我为了隐蔽更深一点，活动更方便一点，便通过黄包车党小组老黄的关系，托人租了一辆黄包车，交了十块钱押金，每日交租金一元，余下归自己。我实在没有拉过黄包车，全靠老黄教我，年轻人一教就会，每天也可拉到一两块钱。当时无锡一地就有黄包车近三千辆，拉车工人有五、六千人之多。我按照车伕打扮，戴上一顶破毡帽，脸上涂点灰污，很象一个车伕。有一天，我拉着一位老太太，刚进通惠桥附近的一条巷子，谁知道巷子里正突然进行搜查，警察将巷子的两头堵了起来。

“一个也不准出去！”警察朝行人厉声吆喝着。

我把车拉到巷子尽头，索性就在警察旁边停下车来，向车上一靠，随即从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点着火，抽起来，看着巷内的动静，内心有点紧张，表面上却很平静。警察看我跑得气喘吁吁的样

子，又看了看车上坐的老太，确认我是刚进巷子的，未问什么，搜查完毕，就放我过去了。据说，那次也抓走了两个嫌疑分子。

自从刘阿二被捕后，我派在南门坐机关的小黑皮也被捕了。这是很不应该的事。小黑皮是无锡C. Y. 的负责人之一，个子不太高，黝黑的皮肤，长得不漂亮。我想新搞个联络点，决定派他去住在那里。单身汉租不到房子，我叫徐荣生（即徐志良）替小黑皮找个假老婆。徐荣生一直搞C. Y. 工作的。他说有一位女同志，南通人，学生出身，在南通蹲不住了，转移到无锡，由他介绍到丝厂当剥茧工的，人还老实，年龄也相当，比较合适，但她已有对象，需要做思想工作。我们与女同志说妥，要她住几天机关就离开。她总算勉强同意了。我们就在南门外租了一间房子，叫他们搬进去。哪知搬进去的头天夜里，就生出了麻烦。一张铺，两个人。女孩子不肯与小黑皮一起睡铺上，小黑皮硬要她一起睡。她不愿，纠缠了一整夜。第二天，女孩子哭到我这里，我批评了小黑皮，他当面承认错误，回去还是照旧犯，那姑娘哭闹起来。房东老太就透过门缝偷看，很怀疑他两人的关系。第三天，姑娘又来找我，对我打个招呼，走了。房东老太怕连坐，泄露疑点，结果被侦缉队发觉，派人来一查，小黑皮又无正当职业，当即带了去。两杠子一压，就招供了。追查领导关系，他供出了我的一个化名。联络点被破坏，小黑皮被送到县政府，判了徒刑。当时，由于“假夫妻”而出事的实例不止一、两次，这办法实在要不得。我认为千万不能再做这样的笨事。

倪阿来说：“你先暂时住我家里，再慢慢想办法。你看怎样？”

我说：“对外怎样说法呢？”

“算是我翻砂厂里临时雇的一个师傅。”

## 第三章 七年铁窗生涯

### 1. 被捕入狱

我的住地移到通惠路达鑫(耀记)翻砂厂,名为“厂”,实际上是个小翻砂铺。倪阿来既是厂主,又是工人,另外雇了个小徒弟做做下手,以维持生活。

这翻砂厂,楼下一大间为翻砂间,楼上一间一隔为两小间。大一点的那间,倪阿来夫妇住;我住在小房间内;小徒弟住在翻砂间里。

达鑫翻砂厂出门,穿过顺兴里,就是广勤区第一台戏馆。

情况很紧张,白色恐怖很厉害。天天有人被捕或被杀。一方面由于我党领导的江西及各地武装斗争节节胜利。几个月来红四军入闽,先后占领长汀、上杭、连城、永定、龙岩、武平、宁洋、漳平等地,闽西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同时在江西又攻占了南丰、会昌等九县,推动了赣南各地的起义。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等,在广西领导了百色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以及红七军、红八军。湖北洪湖地区,段德昌、段玉林领导的两支游击队会合,组成了红六军,部队发展到四、五千人。许继慎、曹大骏、徐向前等在大别山成立了红一军。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迅速发展,使敌人大为震恐。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大喊大叫要搞五一总同盟罢工和各地武装暴动,引起了敌人的警觉。于是就严加防范和镇压。那几天,公共场所各处,便衣密探进进出出,象狗一样,东嗅嗅,西

闻闻，发觉一点蛛丝马迹，就大肆出动，戒严、搜查、逮人。茶馆里贴着“请客人莫谈国事”的大纸条。你只要一议论国事，发几句牢骚，就立即有惹祸的危险。老百姓也感到人人自危，恐慌得很。

敌人已掌握到我们活动的规律：每逢五一、五四等大的节日，我们都要搞大的行动，而活动的时间一般总是在上工、放工或晚上，地点又大多在工厂区域或公共场所。我们也明知敌人已掌握我们的活动规律，哪些时间已不利于我们活动，我们应该如何去躲避，但还是要去搞，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到处贴标语，散发传单，恐吓敌人，结果总是相反。想想真是幼稚得很，革命经验的取得实在不易。

为了更好地组织五一大罢工，同时又避免敌人注意，行动委员会决定对各工厂进行单线领导，防止面的接触。由我联系庆丰、裕昌等，周荣根联系申新，倪阿来联系广勤。我觉得住在倪家，来往人太多，那地段靠近戏院，情况很复杂，天天想设法离开，但又找不到房子，总似有块石头压在心上。

有一天晚上，我和倪阿来两人商量了大半夜。

我说：“形势很不好，我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我们应事先把供词对对好。万一我或者你一旦被捕了，我们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要统一口径，免得临时出毛病。主要是我们两人的关系，一定要咬紧，坚持说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我是来无锡找职业的，你是租房子给我住的，我的女人已经回金坛去，千万不能说别的。我的几个化名：夏继尘、顾雅思等都被敌人掌握，列入了通缉的名单。敌人一找到我，就有可能被处决。你千万不要提这些名字。如果敌人提到，你无论如何要坚持说不认识，或不知道。你老婆是文盲，说什么让她瞎说去，只要我们两人口供一致就行。我今后改名为管兰亭，金坛人，这是我小时候在金坛用过的名字，一般人不知道，到金坛我家去可以查到根的。这就不怕敌人查了。关于党组织的

事，千万不能透露一点！根据最近一连串事情来看，你只要一供党的秘密，肯定马上会被枪毙。一供，就杀。不供，又无证据，问题不大。这是不能存有任何侥幸的！党的机密比生命更重要啊！”

应变的口径就这样统一了。

当时，有许多问题必须作过细考虑，因为严峻的现实不容许我有丝毫疏忽。许多不可弥补的损失，往往是由于一些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引起的。

倪阿来的妻子是不可靠的。但是倪阿来是一个好同志，勇敢顽强，讲义气，万一被捕，他不大可能会出问题，但他的老婆是有外遇的，很危险。她不是我们的同志，我们没法将实际情况以及万一出事如何应付敌人等办法对她讲，只好随她去了。

五一总同盟罢工的日子渐趋临近。无锡的配合工作必须抓紧，即使只有一两个大厂能罢起工来也是好的。我把目标集中到庆丰、申新这两个有几千工人的大纱厂上，争取一个首先罢起工来，然后影响其它厂。周荣根原是丽新纱厂的铜匠，病在家里。我与他谈了之后，他带病去工厂活动。我联系庆丰厂，自己不好出面去开会，只好由一位姓王的支部书记负责，组织女工中的党员在她们家里开会。这些党员大多是细纱车间的女工，活动能力较弱。行委要她们抓住取消搜身这一群众迫切要求，进行串连，以帮助姐妹的办法，大力开展工作。但工人顾虑很多，一时发动不起来。

申新厂的工人待遇比较好，工资以外，厂方每天还免费供应一餐午饭，三菜一汤。周荣根找厂里几个同志研究五一罢工问题，他们一致不同意这样搞法，说：“一罢工，我们就暴露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只能等一等，待有机会时再提出来。”

周荣根向我汇报。我想：“勉强搞也不行，就只好让步。”我问周荣根：“不罢工，是不是可以贴些标语，散些传单呢？”

他表示不能这样做，一做就会使组织被破坏的。

飞行集会的做法，厂内已根本不能搞，厂外人也不便去，因这几天各大厂都有二十多名厂警，加紧在厂内外巡逻。特别是在放工的时刻，还有便衣侦探分布在厂的附近。你一喊口号，他们就从你身后将你抓起来！考虑再三，只有在散工时，带一些传单悄悄地撒在地下，工人群众象潮水般地涌出来，不易被发觉。这样效果差些。这种蠢事，我们做了几次，相反地把厂里搞得特别紧张起来，少数觉悟较低的工人反过来骂我们，说是害他们。

以后我们向省委写的工作汇报中说：“统治阶级被我们吓慌了。”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教训是上面任务压得紧，下面不得不说假话。

我对各县工作都作了部署。

四月八日回到达鑫翻砂厂，刚吃晚饭，突然几十人把我们住的房子团团包围了。“嘭”的一声，门被踢开。几个彪形大汉冲上楼来：“把手举起来！”

我一看，三支手枪对着我。我放下饭碗，站起来，沉住气问：“你们干什么？”

“少啰嗦！”一个化装成工人模样的便衣进来就将我上了手铐。敌人搜查了我的住屋，什么也没有搜到。

他们又抄了倪阿来的房间。房间角落头的墙缝里，塞着几张要求增加工资的传单，很不容易发现，他们一进去就拿到了。这明显是有内线的。

敌人把我和倪阿来铐在一起，倪鲍氏没有上手铐，一并带走。临走时，我对他们说：“那小皮箱我不要了，那件夹长衫我带着。”

他们将长衫从上到下摸了摸，扔给我。

一路上，我趁他们不在意，悄悄对倪阿来说：“那晚上说的事，你还记得吗？”



“记得。”

“一定要咬紧牙关！”

“嗯。”他点了下头。

到了警察局。当晚就开审，他们紧紧追问共产党的事情。

“你是共产党！把你的同党交出来！”

“我不是共产党，哪里有什么同党！”

我一被捕，就作了牺牲的思想准备，要我承认是共产党是不行的。我身上有那么多关系，从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直到上海，这么多同志与组织，我一出纰漏怎么得了！宁死，不承认是共产党人。

敌人就用酷刑：踩杠子、吊打、火油灌鼻子。

我被整死过去三次，冷水一泼，又醒过来。歇个把钟头，再审，再动刑。

我说：“你们一定要我说，我就说，钱逊卿（商会会长）、荣德生（大资本家）和县党部的一批负责人都是我的同党！”

敌人恼羞成怒，再用刑。我还是那几句话。搞到半夜，没有结果，把我关进一间屋子，地上铺着薄薄的稻草，我就在稻草上躺下过夜。

倪阿来受审的地方，与我隔着一间屋子，但是房间不大，又是板壁，声音听得很清楚，想是故意审给我听的。

用刑时，倪阿来伪装叽叽哇哇地惨叫。

他老婆鲍氏又哭又劝：“你说嘛，那几张传单都是姓管的给你的，他是共产党，讲了，你就没事了！”倪阿来骂了他老婆。

倪阿来只说不知道，并死死咬住说他不是共产党。

“管兰亭跟你什么关系？”

“他是金坛人，来找事做的，租了我家的房子。其他的事情，我不知道。”

审来审去，还是这几句话。

第二天，白天让我睡觉，我昏昏沉沉的，似睡非睡。刑伤很痛，浑身不能动弹。估计夜里还得刑讯，必须咬紧牙关挺住，不供还是会有希望的。

晚上，我又被整死过去几次，浑身不能动了。我想，他们不敢将我就此弄死的，挨着吧，躺着吧，不说话，看他们对我有什么办法！

第三天晚上，敌人又逼供。我神志模糊地说：“你们局长、县长、书记长都是共产党员……钱逊卿、荣德生都是共产党员……”

敌人没办法，看我这样已经不起敲打，不敢再用刑。加之，我在最后一次受刑时，透露我是金坛大地主某人的孙子，某人与金坛马荫棠老先生是好友，请他们去查查，看是不是共产党？我早知道县里侦缉队的头目沙壳子是帮会头子，系金坛马荫棠的徒弟，因此这样说的。敌人一听我与马荫棠有关系，心里慌了。马是他们的“老太爷”呀！只好把我暂时搁下了。

接着，金坛马荫棠给沙壳子打来长途电话，关照他要照顾好管某。这样事情就松下来了。

为什么马会这样快从金坛打电话来呢？当我被解到警察局，关在一间屋子里候审时，乘隙把一件好长衫送给看守我的警察，请他从速给我家里发封快信。信寄出后，我再给他二十块钱作为酬谢。那警察高兴极了。他每月只有八块钱薪饷，有这么多外快，怎么不快活？下岗就按我讲的意思发了快信。我父亲接信后，连夜赶到金坛，请马荫棠打电话关照，请他大吃大喝并送礼。同时，又叫我堂兄赶来无锡，给沙壳子送了重礼，请他设法不要解送南京，而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并请了无锡的大律师张桐代我奔走。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规定，凡是共产党县以上负责人，要送南京宪兵司令部，一般共产党员和嫌疑份子，则送司法机关。

我这件长衫起了很大作用。

张桐律师受我家里委托，找到警察局的头子，说：“你把管兰亭关了几天了，秘密刑讯，国法规定抓了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送交司法机关，你们已经大大超过这期限了！怎么交代？”

警察局长见律师出面干预，就赶紧把我和倪阿来转送县初级法院。

在离开警察局时，沙壳子来看望我。他摸摸我的头，说：“你年纪这么轻，家境又这么好，何苦要干这些事呢？你叫人家罢工，人家砸了饭碗，日子怎么过呀！”

“谁说我叫人家罢工，还不是他们栽害我的。”

“传单都搜出来了，还能赖吗？”

“什么传单？那是栽赃害人！”

他默不作声地走开了。

过了一天，承审庭开庭。我看到上海C.Y.派来的华希贤，还有徐荣生两人也在那里候审。他们住在中正路二十一号机关。我很惊疑，为什么他们也被捕了？华希贤很年轻，不到二十岁，大学一年级学生，政治经验太少。在审讯时，我、倪阿来、徐荣生均否认是共产党员，而华怕又要动刑，说我们是共产党，他自己不是。承审人员问他：“你既不是共产党，怎么知道他们几个是共产党？”他天真得很，说是侦缉队里的人叫他这样说的，不说就要上刑，还要枪毙！

审讯没有结果，敌人就将我们四人关进无锡监狱。看守员为了敲竹杠，把我们四人都钉上脚镣。如果给点钱，就可以不钉脚镣。我们都不愿出这个钱。我坐下来，两腿一伸，笑一笑说：“这下可以休息休息了！”

看守没有弄到外快，很生气，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死到临头还开玩笑！”

我那时确实有点轻松之感，就是骨节伤痛和喘咳折磨着我，行

动有些困难。

关进无锡监狱后，乘早晨放风的机会，我找倪、华、徐三人秘密谈了谈。我问他们怎么被捕的？有没有证据被搜去？华希贤讲，他是七日晚上，与徐荣生一起被捕的。可能是房东告密，搜出一份当天刚从上海带回的指示（共青团江苏省委第十九号通告）。这指示要求各地组织罢工、罢课运动，支援南京和记洋行工人的斗争，促成“五一”总示威运动。他刚到家，文件还在皮箱隔层里，被敌人搜到了。刑讯时，他只好承认是共青团员，刚入团不久，情况不清楚。徐荣生说，他未供什么。倪阿来告诉我：他没有讲出他与我的关系。这样，我心里有了底，再次叮嘱他们说：无论到什么地方，不管受什么刑，都不能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不能供共产党的组织。否则，个人牺牲事小，党组织被破坏可不得了。我考虑到华希贤是大资本家的儿子，他家里可能劝他投降，因此格外鼓励他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顽强的共产党员。我们都是党的好儿子，现在到生死关头了，一定要牢记入党时的誓言，在敌人的屠刀面前，绝不能低头！现在只过了第一道关，以后情况不知道。顽强些，更顽强些！只有不怕死，才能闯过难关！”

他们三个人的劲头又鼓起来了。

我们在无锡坐了个把月班房，经过多方活动，于一九三〇年五月被解往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等待着我们的，又是一种新的斗争。

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的监狱，在苏州城里司前街内。四周的风火墙有几丈高。监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十字监，一部分为看守所。看守所又分一所和二所。两部分之间用铁门隔开。

监狱里关的犯人很多。十字监和一、二看守所加在一起，共有两千余人。其中政治犯，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改组派，大约有八百人左右。年龄小的只有十三岁，老的已经七、八十岁。

我被关在第二看守所的第五十一号号子。这个号子里连我共关了八个人。四个是政治犯，是共产嫌疑分子；三个土匪，还有一个小偷。共产党人在监狱里很有威信。

次日放风的时候，有一个人主动来找我谈话。

他一见面，就自我介绍说：“我叫冯自由，是监内互济小组的。政治犯来了，我们是有帮助责任的。”

我知道有革命互济会这样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前期为中国济难会，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由恽代英、董亦湘、沈雁冰等共产党人发起的，其中也有杨杏佛、郑振铎等非党的著名人士。出版过《济难》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做过大量营救被难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工作。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开始，在党的领导下，成立革命互济会，由潘汉年领导。全国有总会，江苏等省有分会。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反对逮捕、屠杀革命者，争取释放政治犯，救济被监禁的同志，援助烈士家属等，有时还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展秘密工作。这组织有一些比较著名的进步人士和大律师参加，实际上是我们党营救自己同志的机构。我没有料到高等法院监狱内也有相应的小组，听他一说真是喜出望外。

我想：这是党派来跟我联系的同志。他的名字怎么与上海先施公司大老板的名字相同呢，大概是个化名吧。

放风时，被关押的人大多在弄子里活动，少数人到墙外去倒便桶。

冯自由就跟我在号子里单独谈话。这个人看样子老于生活世故，我不敢贸然太相信他。

他问我的案情。我简单讲了一下，说我是被冤枉抓来的。

他说：“你的案子，只要没供出什么，很快就可以出去的。”

我对冯自由的真实情况，一时还弄不清楚，所以不便暴露自己

的真面目。他也似乎不急于问我，说：“你有困难可以找我们帮助。”

五月十七日，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对我提出起诉。三十日就判决了。《判决书》上，说我参加了共产党，散发传单，煽动工潮，扰乱社会，判三年有期徒刑。

敌人未掌握我的情况，又拿不出证据。律师张桐对我说：“你放心！罪证不足，我代你上诉，我看一定可以宣判无罪的。”

隔了两天，张桐律师拿来上诉状，让我看后，打了指印，他拿走了。

倪阿来无罪释放。华希贤判了六个月，取保赎出。徐荣生大概判了两、三年徒刑。

倪阿来回到无锡，门被封了，老婆也跟人走了。启封后，发现家里东西已被抢一空，只剩下一个空洞洞的屋子。他又来苏州，手里拎了两根油条，到牢里来探望我。

他苦着脸对我说：“我什么都没有了，老婆也没有了……”

我安慰他一番，用暗语叫他速去上海找省委。

倪阿来走后，我拎着他送进来的两根油条，回进号子内，心里难受极了。

不久，狱中的党组织通过关系，了解了我的情况，由二所党小组长茅理的舅舅陈某找我谈话。我将情况向他说了，请他转告组织。他立即转告了二所支部书记朱思伦，朱又找我谈了一次。

我请朱思伦把我的事情迅速告诉苏州县委转告省委。不久，省委将我的关系转到司前街监狱特支，苏州县委又决定我参加特支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原来，苏州司前街监狱内，有我们党的一个特支委员会，归省委直接领导，和苏州县委也有关系，负责人是袁世钊，这是我熟识的一位老同志，一九二八年我离开镇江，曾在省委与他交接过工

作。省委将我的关系转来后，他很快就通过“外役”倒马桶的同志，给了我一封信，把省委的通知告诉我，并要我参加一、二所斗争的领导。

以后，我逐步了解了狱中特支的情况：特支书记袁世钊，此时已被判处死刑，尚未执行。委员徐家瑾，也是被判处死刑，他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暴动，是通如特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们两人都关在十字监。另外还有三个委员：我和朱思伦，都关在二所；陈百坚则关在二所。共五人。

特支委员会，平时无法开会，一般是通过外役同志或看守中的同志，进行秘密通讯联络。

特支下面有四个支部：十字监有两个支部，一、二所各有一个支部。当时看守中，十字监有两个党员，二所有一个党员，一所没有。这三个党员，只有特支委员知道。政治犯中的党员总数约二百人左右，大部份是外面转来的，少数是监内发展的，如王治平、陆某某等。王治平是杀人犯；陆是上海一个大资本家的汽车夫，因与资本家的女儿恋爱，被送进监狱的。狱中这些党员，大多有一定的文化，战斗力很强。

由于政治犯人数很多，力量很强，并且有党组织的坚强领导，经过多次斗争，过去的监狱由笼头统治的情况，已经彻底改变，笼头的剥削也已彻底取消。这对监狱当局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们从此很不容易收到外快了。看守所均由犯人推选代表，组织委员会处理犯人的事情。代表们代表所有难友向监狱方面提要求，提抗议。狱方如不接受，大家就团结起来，进行斗争，闹监常闹得很凶。因此，敌人不得不让步，允许犯人从早到晚放风，可以在看守所的范围内比较自由地活动，开开会，唱唱《国际歌》之类，狱方也睁只眼、闭只眼，一般不敢强行干涉。

难友们自己集资办了个小卖部。我们二所的小卖部是由王治

平负责的，他一个人住一个号子。放风时，支部可以在他那里开会。

看守坐在看守台上。他做他的私事，什么事也不问。

苏州监狱的号子很小。号子里，有的放两张铺，有的不放铺，只有一些烂稻草。地上有一个浅坑，作放马桶之用。几个所的马桶，都规定时间由犯人中的“外役”抬走，倒到一个大粪池里去。墙又高又厚，不怕犯人逃跑。因此倒马桶时，犯人的事，看守一般不问。我们乘此机会，就可以交换情况和意见。

每个号子的门上方，都有个六寸长、四寸高的长方形窟窿，叫检视洞，以便看守可以从洞里观察号子里的动静，有时也可以将饭、菜等从洞中递进号子。我们却从这检视洞用小镜子反照弄内看守的动静，看守是觉察不到的。我们就用此法来侦察敌人的行动。检视洞上有一块与洞相吻合的小木板吊着，必要时可以将洞口关闭。

号子与号子的墙顶上，又有个小洞，装一盏十五瓦的电灯。这通道，我们可以用来传递纸条。

碰到值班看守稍好一点的，我们就偷偷地请他代买报纸，一张报纸要一两块钱。

有必要的时候，苏州县委还派家属来探望特支的负责人。特支的几位同志都是特委、中心县委以上的干部。

监狱里最令人感到恐怖的事，是死刑犯的执行。如果那天推迟放风时间，死神的阴影就在弄子里徘徊了。

号子门全被紧紧地锁着，检视洞也关上了。弄子里寂然无声，真是一片死的沉寂。

每个人都屏着气，竖起耳朵，静听着外头的声音，想知道哪个号子的号门被打开。

不一刻儿，一阵脚步声从外面传进弄子。那是敌人的书记官



带人下来了。

接着，传来书记官高喊某某人出来的声音。

号门响后，一阵“咣啷咣啷”作响的镣声，由近而远。

死神随着镣声离去了。

稍过一段时间，就开始放风。难友们相见时，首先是探询哪个“大喜”了。如果系自己的同志，我们内心格外愤怒和难受。

那时，死刑的执行，一般是采用残酷的绞刑。尸体从小洞里拖出去，让死者的家属领走。

我所在的第二看守所中，大约有二十几个被判了死刑，随时都有被执行的人，大多是杀人犯。这些人遇到这种日子，实在是痛苦极了。

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一般都上了脚镣。我在无锡时因不愿化那种可耻的钱，也被钉上一副五斤重的大铁镣。一到放风的时候，多少副铁镣挂落在水泥地上拖着走，“咣啷、咣啷”，“咣啷、咣啷”，犹如发出愤懑不平的抗议声！

狱方对待犯人是相当苛刻的，对政治犯尤甚。饭里有砂子、石子、稗子、谷子、虫子，俗称“五子饭”。狱中卫生条件很差，跳蚤很多，还有虱子。我五月入牢，正逢夏季来临，苍蝇、蚊子成群结队。犯人中得肠胃病、脚气病、浮肿病的人很多，肺病的发病率也很高。

在我进苏州监狱之前，狱中特支已经领导过几次闹监斗争。影响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二九年底，由我党的同志曹起缙带领戴璧城、钱玉麟等政治犯发动的。他们提出要求改善医疗条件，增加放风时间和不准克扣囚粮等条件。狱方不答应，大家就绝食三天，迫使敌人作了让步。但戴、钱因闹监各加判三、四个月，曹则被加判了两年。另一次是由徐家瑾、陈百坚、朱继臣、朱顺志等发动的。他们也宣传鼓动并组织全所的在押犯闹了好几天。敌人又被迫作了些让步，我到监狱时，放风时间已大大延长，笼头的黑暗统

治也已被打倒，但伙食与卫生条件仍然极差。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是无官不贪，监狱上下也是贪钱如命，放风等问题，在他们看来，尚可让步；唯独克扣囚粮和医药费用乃他们中饱私囊的主要财源，动一动就象割着他们身上的肉一样。

我参加特支委员会后，组织上又酝酿着新的闹监斗争。不少同志认为，闹监斗争不仅是为了改善一些狱中的生活条件，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在斗争中把在押的犯人都动员起来，团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不断给敌人以打击。这想法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只有斗争，才可以活下去，也才能更好地启发和教育一般的难友，使他们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新的闹监斗争又开始了。

## 2. 苏州监狱的绝食斗争和暴动

一天，特支通过外役从检视洞丢进一支香烟似的纸卷。我捡起来打开一看，是特支的指示：十字监和一、二所同时提出要求，凡政治犯每人每天要发一个咸鸭蛋。如果狱方不答应这个要求，我们就要采取行动！限三天答复！这是多么幼稚的行动啊！这个要求是脱离群众的。我想提出意见，但一时又无法将意见转给世钊同志。既是特支的决定，就得执行。十字监和第一看守所已行动起来，我们二所只好紧跟着发动起来。

监狱当局直接向高等法院报告了。法院的答复是：“无理要求，不准”，并责令“严加管教”。

狱方怕我们闹事，停止放风。我们即通知各号子敲号门检视洞上的木板以示威。木板敲打号门的声音很响，连司前街上都能听到。警察来到了，我们还是照样敲。

“不准敲！不准敲！”

我们不予理睬，敲得更凶。警察走到哪里哪里稍停一下；警察一过去，就敲得更厉害。

警察接受监狱当局的暗示，拖出几个平时的活动分子去，用皮鞭抽。王治平和茅理舅舅陈荣等平时老挨揍，这次还是挨到他们。

我由于有律师保护，监狱方面有所顾虑，这次没有挨皮鞭。

每一次闹监，总要有十几个人挨揍。

特支紧急通知，既然狱方不同意我们的要求，我们就绝食抗议，那时绝食叫“罢饭”。

这一要求并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不少人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党不得不采取命令的办法，强制群众罢饭。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出现内奸，主要是改组派分子。同时，这次绝食斗争，事前没有充分准备，群众顾虑很大，不知道将罢饭几天。然而，敌人也颇感棘手，万一饿死重要的政治犯，他们的责任很大，所以在绝食的过程中，不断派人下来劝说。

我们二所党支部接到特支的通知，立即宣布罢饭斗争纪律：谁抵制罢饭，谁就是叛徒。叛徒，就要打倒！这样才没有一个人不参加罢饭。

罢饭命令宣布后，到开饭时，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非政治犯，一个个都躺下了，没有一个人出号门端饭。

看守抬饭来时，号子里一点声息都没有。

看守用铁勺敲敲饭桶，说：“吃吧，吃吧，何苦呢？不吃要饿死的！”

没有一点反应。绝食斗争的纪律很严，即使有人想吃，也不敢。吃了，压力很大，有时是会受到难友们严厉惩罚的。

一连三天，全体罢饭。狱官很害怕，怕消息外泄，怕律师干预，怕报纸舆论。我们就利用敌人这些弱点，利用各种关系，向社会揭

发。狱方答应不再虐待犯人，至于这鸭蛋实在不允发给，请大家原谅，这样才恢复吃饭。

开饭后，光是二所就病倒了几十个，又死了几个人。

这是一次。

还有一次，是有一个刑事犯得罪了看守，看守出去叫了十几个人来，把他拖出去揍了个半死。

特支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发动大家抗议：狱方不守信用，看守又虐待犯人，必须陪礼道歉。看守方面则表示，如迁就犯人，都不干了。

狱方感到很难办。犯人要闹监，看守要罢工。典狱长没有办法，决定不同意陪礼，反而将那犯人加判了三年徒刑，调往别监羁押。

于是，全监狱又一次绝食。这次“罢饭”持续了五天，几位特支的领导同志也都爬不起来，我也爬不起来了。外头的报纸大登特登狱中犯人闹监的消息，尤其是几种小报搞得非常起劲，对高等法院攻击得非常厉害。

高等法院的检察官、典狱官纷纷下来。通过谈判，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决定开除打人的看守，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事情。

斗争算是取得了胜利，但复饭后又有半数人病倒，十多人死掉。

放风时，我们到各个号子去慰问，弄子里活动的人很少，很多人都在号子里躺着。

我考虑：狱中斗争是必须坚持的，但绝食这种形式，非到万不得已时还是不要轻易使用为好，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

这次绝食斗争之后，狱方吸取了教训，耍阴谋诡计，进行“调整”。一、二所的几个骨干被调到了十字监。十字监也有人调过来的。我住的五十一号号子，调走了两个党员，调来了特支委员徐家

瑾和几个政治犯。看守也调动了，还派来了一些军队，加强了对监狱的控制。这样一“调整”，把特委的整个部署都打乱了。放风也由整天放风改为上下午各一次，每次一小时，以减少犯人的活动时间。

监狱当局为了对政治犯严格管理，还经常抄号子，有时一周一次，有时一周两次。要是有什么纸条子被查到，就将有关人犯关进单独号子，加以隔离。

这样，有个把月时间，我们特支委员间的联系，感到十分困难。

其时，为什么在监狱都这样蛮干，原因在哪里呢？因为那时期正是立三“左”的错误发展到顶峰时期，是由于中央“左”的错误决定的。六月十一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由李立三主持，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李立三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革命的趋势在全国各地均有同样的发展，因此要求各地都要马上暴动起来，尤其是中心大城市更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的革命高潮。他还错误地认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之开始。因此，他又定出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为了贯彻这个主观主义的计划，他们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领导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七月十四日，江苏省委遵照中央的指示进行改组，成立了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由李立三亲自兼任书记，实际上又取消了党的组织，以行动委员会代替了各级党委的领导。以上这些情况，我是以后才陆陆续续知道的。

苏州县委也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在苏州成立行动委员会，组织暴动，要苏州监狱特支作好准备，立即将狱中的犯人组织起来，从闹监走向暴动。暴动时间等省总行动委员会确定后再告。罢饭是走向监狱暴动的一个重要步骤。

监狱里除了被判几个月、年把有期徒刑的轻犯思想上有些顾

虑之外，大家都很高兴，好象胜利、解放就临到了眼前。政治犯大多希望暴动，突出去夺取政权。我是不相信这些幻想能够成功的，我已经有了不少幻想暴动的教训了。外面暴动尚且那么困难，何况在敌人手掌之中呢？我沉默不言。

特支委员徐家瑾调到了我住的号子后，特支决定他担任二所的支部书记。这是一位很坚强的好同志。他告诉我关于他的经历：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偕同另一位青年杨文辉去武汉投奔革命。当他俩到达时，武汉政府已与蒋介石同流合污。杨文辉悲观失望，在黄鹤楼跳江自杀。徐家瑾单独去江西南昌寻找党，参加了“八一”起义，随军入粤，到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担任政治工作。

同年十二月，粤桂军阀混战，我党发动广州起义。徐家瑾跟随叶剑英同志率教导团学员，先解决了一部份反动军官和士兵的武装后，即遵照广州暴动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解决了反动的公安局。后来，起义失败，徐家瑾被捕入狱。他趁机越狱逃跑，化装潜回上海，找到党组织，党又派回通如地区工作。一九二八年，如皋农民暴动时，他在城里负责策应工作，没有暴露。党组织命他与叶胥朝一起恢复城区工作并建立交通站。他在如皋城里开设了一个“读书消费合作社”，作为与西乡党组织的联系机关。在此期间，他领导了如皋师范学生举行反对屠杀农民的示威游行。反动派开始注意他的活动，但又找不到充足的证据，只好采取笼络的办法，聘请他为《皋报》的主笔。徐家瑾就利用该报的副刊《先路》宣传革命思想。结果为国民党右派指控而被捕，押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审讯。

在法庭上，徐家瑾表现很好，他责问法官，你有什么证据要逮捕我，法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判了他死刑。这可能是反动派省党部查到他的历史情况，奉命判决的。照徐的案情，不可能判死刑，

当时，徐上诉最高法院，案子暂时搁了下来。

他和我关在同一号子，这给我们研究工作带来了方便。

外头不断传进来各种消息：七月下旬，彭德怀带领红三军团攻入长沙；八月、再攻长沙；九月、三攻长沙。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以谢恃、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另立“国民政府”；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派兵入关。方志敏等领导的赣东北红军与闽北红军汇合后，在闽浙赣边区有了很大发展。鄂豫皖的红一军和闽浙赣的红十军均有大的发展。消息毕竟是消息，我们在牢中弄不清真实的情况。

传到狱中的消息，都是鼓舞人心的，特别是从特支传来的，更使同志们高兴，很多同志水平不高，分析能力差，以为蒋介石很快就要垮台了，大革命的形势很快又要到来，我们都可以出去了。放风时大家高兴得几乎忘了一切，相互拥抱祝贺，看守看了也莫名其妙。当然，这些消息是正确的，但分散的，汇合一起同一时间传来，就变了另一种新情况了。

我和徐家瑾讨论这些问题，联系研究监中斗争问题。认为监狱斗争，在这新情况下，敌人必然要百倍疯狂地反扑，必然要采取更加严厉的镇压，我们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对所内的叛徒要十分警惕，特别我们号子里有个家伙，是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对共产党人非常仇恨，时常与敌人勾勾搭搭。我们有几次发现，此人偷听徐家瑾和我的谈话，然后跟看守咬耳朵，报告我们的活动情况，他对我们的威胁很大。

放风时，党支部几个人商量，非除掉这个人不可。于是，在取得看守中的我党同志的有力配合下，趁其不备，将他闷死了。此事非常干净利索。狱方验尸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形势日益紧张，省委通知苏州县委行动委员会决定组织兵暴，由纱厂工人和监狱中的政治犯配合，夺取政权。规定时间是农历

十一月九日（公历十二月八日）。县行委通知监狱特支作好准备，指定袁世钊为总负责。一、二两个看守所由祝同任指挥，十字监则由袁直接指挥。特支命徐家瑾将县行委的通知转告我，我很惊讶，我知道在两个月前，瞿秋白、周恩来等同志在上海召开过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那次中央全会，已经批评了立三错误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不久，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也于十月份撤销，改为江南省委，领导江苏、上海、浙江党的工作。李立三也不再兼任书记。实际上，中央已结束了李立三“左”倾的错误。那末，为什么省委现在还作这样决定？这问题很难解释。当时，我即向徐提出疑问，请他转告世钊同志，我不同意担任这一任务。我并和徐商量：监狱暴动有没有可能？如果有可能，那么应该怎么搞法？

我过去几次搞农民暴动，尚且取不到胜利，现在，狱中搞暴动，更是没有什么希望。

苏州是京沪线上的一个重镇。敌人在这里驻有一个师的兵力，我们凭什么力量与敌人作战？单靠敌人军队中少数士兵和监狱中的一部分犯人想发动暴动，是不可能的。南昌暴动，我们的力量总算不小，广州暴动，我们的力量也算不少，结果都失败了。根据这些经验教训，我看苏州暴动的可能性很小。至于苏州地方党的工作我很清楚，没有听说在军队中有较好的工作基础，只知道在阊门外的伤兵医院里有一些线索，纱厂里亦没有工作基础。怎么在短期内就可以搞起暴动来呢？这一定是少数同志的幻想。

再从我们这个监狱的情况来说，一到晚上，所有号子门都用大锁锁上，即使能冲出号子，外面还有三道大铁门，没有大型破坏工具，就毫无办法。



我这些意见，徐家瑾很不赞成。他说：“你是不是怕牺牲？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全监同志的利益！”

“正因为考虑全监同志的利益，我才把这些意见谈出来。”我很激动地说。

“省委和县委不会不考虑这些问题！”徐反驳我。

“你怎么知道他们能考虑这些问题？他们一贯是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实行全国暴动。决不考虑暴动有没有可能的问题。”

“你一定要考虑全监同志的利益问题！”

“你不讲道理！”

我们两人低声而愤怒地争论起来。徐大为恼火。我环顾四周，只好忍住气靠着墙壁，默默地坐着想着，觉得徐家瑾话虽刺耳，但他的精神还是可钦佩的。我坚信我个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保留一下再说，党的决定还得服从。然而，面对现实情况，决不能沉默。

徐家瑾觉得他自己刚才的话说得太重了。他想了一会儿，又来我身旁坐下，低声对我说：“你对实际情况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你讲到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那两次暴动，我是有亲身体验的。不少好同志流血牺牲了……，不过，干革命，总免不了会有挫折，会有牺牲。这次暴动，是党的决定，不管怎样，你都得服从。”

我想：“是呀，共产党员一定要服从党的决定。党要你去牺牲，就得勇敢地去牺牲。我过去不也是这样教育别的同志的吗？现在轮到自己去牺牲，怎么就能不干了昵？我内心自问着，沉默片刻，说：“让我考虑考虑，再商量吧。”

徐家瑾将我的意见密报了特支书记袁世钊。袁很急躁，随即命一位党员看守秘密给我送来一信，意思是说：“省委对此次暴动，是有把握的。你不要犹豫，要坚决照指示办，否则就开除党籍。”

既然如此，我只好接受任务，找徐家瑾继续商量如何部署暴动

的问题。暴动的时间，是不容商量的，县委已经决定为十二月十一日。主要问题是如何发动狱中的群众起来，一致行动。在群众中做这工作很不容易，在押犯情况很复杂，讲得过早、过迟，都不相宜。早了，容易暴露；迟了，有些准备工作无法进行。监狱暴动是一件很机密的大事，有不少具体工作必须做得非常秘密。如锉开脚镣的锉子，号门上的钥匙，通讯联络工作的具体规定，都要早作准备。光靠苦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努力去克服这些困难，谋事在人，事在人为，或许可能解决问题。

我每天都无法睡觉，始终对这次监狱暴动感到没有成功的希望。经过几次闹监，我脚上的铁镣已增至三副，穿衣、走路都极为困难，其他同志的情况也和我大致差不多。号子门和外面的三道铁门，怎么解决？没有武器，怎么对付反动军警？这些问题老在我头脑里转来转去。考虑再三，觉得只有自己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才有勇气向困难作斗争。我的思想上就这样定下来。

脚镣问题，经过县委克服种种困难，通过党员看守带进来几十把小锉，秘密发到各号子同志，叫他们晚上躲在被窝里慢慢锉。小镣、两三晚就锉开了；大镣、有拇指粗，多费点工夫，也锉断了。各人用布条或棉絮扎紧，走起来不显破绽；暴动时，可以把镣分开绑在两腿上，行动就比较便利多了。

号门钥匙，由看守中的党员悄悄地按照原件复制好后，经县委送了进来。这是个大问题，总算也顺利地解决了。

监狱大铁门问题，没有办法可想，向县委汇报请示。县委决定等外面暴动起来，即派人攻打进来，砸开铁门。里应外合，就可以突出去。

县委交待我们狱中特支的任务是：把同志们组织好，冲出监狱，径至南门警察分局，把那里的枪械全部缴下，然后直奔东山，与暴动的队伍会合。

行动的日子日趋临近。县委又通知我们：联络信号，是听司前街上三声枪声。枪声一响，你们就立即打开牢门，冲出去。

我们在积极准备暴动，敌人也在积极地部署防卫。

暴动的前几天，县委派人撒了不少宣传鼓动的传单。多么幼稚呀，暴动前还撒传单，这不是向敌人泄密吗？敌人顷刻警觉起来，紧张得很，匆忙从外面调来一个营，加强对监狱的防守。一个连守住大门，用两挺重机枪封锁了必经的通道；一个连守卫在屋顶上，居高临下，对准着牢门；还有一个班游动巡逻。这些情况我们起先一点不知道，是看守透露的。

暴动前两天，狱方就停止了一切接见。

弄子里除开饭时有人外，其余时间连人影也难看到。我们偶然听到墙外一队队的脚步声，号子里却很少听到声音，死一般的沉寂，笼罩着整个监狱。

暴动的时间到了，各号子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枪响就立即行动了。

晚上，大家等呀，等呀，没有一个人睡觉。看守所里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连一声咳嗽都没有。每个人都侧着耳朵，在倾听着外头的动静。“有没有枪声？！”如果这时哪家有婚丧喜事放几个爆竹，那就糟了。

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三点，四点，五点，一直等到天亮，还是没有听到枪声响。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外面到底怎么样了？”在每个同志心里都闷着这样一个疑团，可是得不到解答。

我悄声对徐家瑾说：“大概暴动已经失败了。”

徐家瑾点点头，很痛苦地发呆着。

八点钟左右，铁门“哗啦”一声开了。一阵急促的皮鞋声，二、三十个士兵，枪上上着刺刀，冲进看守所。在各号子门口站着，看

守把号门打开，叫在押犯人全部出来，排好队。敌人先抄号子，壁角壁落，铺盖衣裤，一一仔细搜索。然后对犯人一个个验镣，前几个号子已发现带镣的犯人大多已将铁镣锉断了。查到我们这几个号子，验镣的看守正是我们的秘密党员。我脚上的三副镣，他只验出了两副是断的，一副大的未查出。我估计大概是看守故意放过的。

验镣后，十几个铁匠，“叮叮咣咣”地给每个人重新钉上。我被补钉上一副中号的镣，徐家瑾换上了一副大镣。敌人忙了一个上午。

号子封得死死的。弄子里，看守和士兵不断地踱来踱去，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监狱。犯人大多躺在铺上唉声叹气，“失败了！”每个人内心都在悲伤。

叛徒开始活动起来，特别是被打倒了的笼头和国民党改组派分子，以及个别的死刑犯，他们都为了个人私利出卖灵魂了。“报告！”“报告！”不断地喊叫看守。

典狱长利用这些人大肆搜集我们内部情况。大概经过两天时间，敌人把我们的情况和他们平时掌握的材料，汇成一起向法院呈诉。法院向国民党省政府请示。省政府批复，叫将监狱中暴动中的要犯押解镇江，交临时军法会审处审判。那是一个不久前临时组织起来，专门对付我党的镇压机构。

法院根据报告上去的名单和材料，派检察官来看看守所核定了须解往镇江的人犯名单，然后再带法警来号子，将我们点名调出。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我们被带到牢门口集合，彼此看了看，共有三十余人。其中袁世钊、陈百坚、徐家瑾、黄子仁、雷鸣夏、王治平、茅理等十几个人，是我熟悉的。有一些人是初次见面，如刘季平、马达，以及后来叛变的梅光迪等。还有些不是共产党员或在牢里没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

我们上路了。个个都带着铁镣，沿着长街蹒跚而行。两边用绳索拦起来，象是软栏杆。

我们高呼着口号，唱着《国际歌》。

徐家瑾还吟诵了他即兴而作的诗：“软软栏杆英雄血，鲜花万古香不灭……”

大家都是气昂昂的，从司前街到盘门外的火车站，一路上歌声、口号声不绝于耳。围观的群众，为之欷歔者很多。

一节敞篷车厢载着我们三十多人和一个排的保安队，驰向镇江。

在火车上，特支秘密商量一下，首先要设法与互济会联系上，再设法与镇江县委接上关系。我们对这件事作了最严重的估计，亟须向上级党委报告，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请求组织大力进行营救。

保安队的士兵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事又解往镇江呀？

我们麻痹他们说：“到镇江，就要释放了。”

车抵镇江，保安队的士兵劝我们：“到了，不要再喊口号了。否则我们不好交代。”

为了照顾他们的处境，我们决定不再喊口号。

在镇江站下车后，敌人按名单将我们分成三批带走。我们和同志互相亲切地拉拉手说一声“再见”。我内心却在说：“永别了，同志们。”

### 3. 镇江越狱前后

我们被解到镇江，思想上有一种横竖终归是牺牲的想法。但不能等死，必须积极想办法，一方面进行求援营救；另一方面，万不得已时设法越狱。

敌人把我们三十多人，分别关在四个地方。我和陈百坚等十一人，关押在警察局二中队驻地，那里原是个城隍庙；袁世钊等，关押在警察一中队驻地；黄子仁、刘季平等，关押在镇江麒麟巷的侦缉队里；还有一些同志关的地点，已记不清了。

我们被关在城隍庙里的十一个人，由警察二中队的二、三十名警察看管。我住在大庙的偏殿里，离庙门有三、四十公尺。这是十殿阎王中的一个阎王的殿宇。大革命时，这些阎王小鬼，连同城隍老爷一起，都被打倒了。如今三间屋子是空空的，只剩下一座阎王老爷坐的空泥台和两旁判官、无常站班的小泥台。偏殿旁边有两间屋，大鬼、小鬼、牛头、马面都乱七八糟集中堆放在那里面。

偏殿的神龛的栅栏已被拆光。三开间的殿宇与一个天井连在一起，门窗俱毁，中间没有一点隔离。刮风下雨均无遮掩，与露天差不多。

庙门口有外岗哨，门里口也有一个门卫，其时正值隆冬季节，哨兵们常常裹着头，把枪搂在怀里打瞌睡。

我们在偏殿里住，地上铺一层稻草，上面盖一条薄被，就这样准备过冬。每到刮风时，寒冷刺骨，缩成一团。几天后，下大雪了。夜半冻醒过来，被子上、衣服上均是厚厚一层积雪。“梦别慈母（指党）去，醒来雪满衣。”我这样自吟着，盼天亮。

我们几人中，五人有党的组织关系；六人没有组织关系。其中有一叫梅光迪的，是个可恶的坏分子，他就睡在我的身旁。据说他是江阴 C. Y. 县委的组织部长，被捕后把江阴的组织全破坏了。因此在狱中没有恢复他的组织关系。

我想与省互济会取得联系，一时无法找到，决定先与自己家里联系上。

门卫极严，敌人交代不准在押犯人与外界通信或接见，违者要严办，这样我与外面联系很困难。堡垒还是从里面攻破，下决心一

点一滴地做警察的工作。开始从闲谈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然后再掌握他们的迫切要求，来提高他们觉悟，并收买他们，经过几天闲谈，了解到他们真实情况，每月薪饷仅六元、七元，除吃饭外，只落三、四元，无法养家，所以他们必须经常在外敲竹杠。抽头聚赌，或与小偷勾结，捞一些赃款，以弥补不足，对警察工作很厌恶，他们常悲叹说：“没办法，当警察。”我表示对他们很同情。三五天后，感情上比较接近了。于是，我悄悄地请他们中比较好的代我寄出一封给我弟弟的信，并给他一块钱，他很高兴。

过几天，我弟弟接信赶来，他给门岗一些钱，偷偷地进到我的寄押处。

我将我们从苏州转解到镇江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要他秘密赶快设法托丹阳商会会长郭颂如、镇江省商会会长陆小波等共向省府说情营救。这事是瞒过梅光迪谈的，怕他打我的小报告。弟弟走后，我和陈百坚商量，如何再与袁世钊、徐家瑾、王子仁等联系上，互相通通情况。

正在此时，省委已得知我们被解到镇江，派朱思伦通过关系来同我们秘密联系了。他在苏州曾与我同关在二所，经组织营救出狱，党分配他在互济会工作，他来找我们比较方便。他通过秘密联系，先到一中队看望了袁世钊，再到二中队来看望我。

据朱世伦告诉我：暴动那天，苏州县委只策动了在阊门外的七、八百伤兵。其中有我们一个党的组织。县委命他们以进城请愿的形式，冲进县政府和县党部，抓住或打死反动头目，占领苏州城。哪知，国民党反动派很快得到了情报，预先采取了防范措施，借口说苏州监狱内大批共犯与湖匪联合，图谋暴动，实行全城戒严。伤兵队伍刚到阊门口，就为军警所阻。伤兵闹了起来，硬往城里冲。军警开枪打死十人，抓了一些人，其余被打散了。接着，县委机关被破坏，暴动也就失败了。

我向他讲了我们的近况。

朱世伦说：省委已知道了，并估计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正在想尽办法营救你们，希望能达到一个不杀。办法是两个：省委意见是通过贿赂全部买下来，二是万不得已时设法越狱。前一个办法，互济会已在积极进行；后一个办法，由镇江县委负责进行。

朱世伦看望过我们后即回上海。临走时要我们保守绝对秘密。

当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叶楚伦，其亲信的秘书长金体乾，是松江一带人。互济会通过上海一个资本家的关系，请他出面说项。他们在松江金宅谈了几次。国民党的官僚很少不贪污受贿的。金要价很高，说此案情节太重，没有两万块银元，无法解决。即使有钱，要将那三十多人退回苏州，也不可能的。只能做到少杀，就这样也还要找几个土匪代替枪决了，以掩盖社会舆论。谈判了几个星期，省委没有钱，只能出三千元，未果。

大约到了一九三一年一月中、下旬，省委估计用贿赂的办法已希望不大，派人来与镇江县委研究，作出了越狱的决定。

越狱是大家高兴的事，这必须有外力帮助。省委决定由镇江县委与狱内同志共同研究完成这一任务的具体办法。

我们通过镇江县委同志的多方分头联系，商量确定越狱的时间为农历大年初一（即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七日）。警察一中队住地，由袁世钊负责；二中队住地——城隍庙，由我与陈百坚负责；麒麟巷侦缉队住地，由黄子仁负责；另有一处，由谁负责，会不会是徐家瑾，我已记不清了。

我抓紧做好了二中队的一个警察的工作。此人原籍山东，在镇江孑然一身，无牵无挂。我要他到时候争取值班，并答应给他一笔钱，让他乘混乱之际开小差，到别处谋生，他同意了。

为了筹措越狱时所需的经费，我又写信叫我弟弟管文彬迅速



送钱来。他赶到镇江，又通过贿赂，由警察秘密带来看我，表面上是给我递送衣服和食品，暗中在袜子里塞了两百块钱。

梅光迪很怀疑我的行动，贼头贼眼地盯着我弟弟交给我的一些东西。我弟弟走后，他就走过来翻我的衣服和袜子，发现有了一大叠钞票，就吵吵嚷嚷地要我请客，否则就要充公。

我怕事情闹开来，泄露了秘密，误了大事，只得憋着一肚子火气，拿出两三块钱，托警察买了些牛肉、兔子肉和老酒，请大家吃了一顿，才算把这笔钱隐瞒下去。

寄押在警察一中队的袁世钊那边的看守人员，大多是地痞流氓分子。他们利用职权在外敲榨勒索，鱼肉人民。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对于政治犯的看守倒是较马虎的。本来，白天黑夜皆应由警察站岗、看守，然而他们却常常用两只狼狗来代替这一工作。

狗就是狗，它们忠心耿耿替主人服务，因此主人也就特别喜欢狗。开始，这两只凶狠的狼狗相当尽职，牢牢地看守着囚徒们，不准他们出门。只要稍有一点动静，那畜牲便竖起了耳朵，呲咧着尖利的牙齿，随时准备扑向你。你如果要违犯它们的职责，那它们就会撕破你的衣裤，咬烂你的两腿。然而，狗毕竟是狗，它们并不像“人狗”那样阴险歹毒。狗中最讨厌的是“人狗”，人的模样，狗的本质。我们很多事情都坏在这些“人狗”身上，而真正的狼狗却比较地容易对付。

袁世钊等想了个非常好的办法，将这两条狼狗“收买”。他们决定在狗身上下工夫，于是每天出高价请看守买一些肉来，每顿都悄悄地分一半肉喂狗。喂了四、五天，狗渐渐觉得这些人是好人，不是想吃它们的狗肉，反而喂它们以猪肉，于是就给了被它们看守的人以自由了。起初他们试着一个人向外走动一下，狼狗瞅一瞅，并不发威；接着，两三个人再试，狼狗也未作声。他们一有机会就

进进出出，以麻痹这两只狼狗。到临行动时，又准备大量喂以猪肉，让它们吃得很舒服，饱饱地好休息。

寄押在麒麟巷侦缉队的黄子仁、刘季平那边，设法做了一个经常站门岗的青年侦缉队员的工作，由马达与他拜了兄弟，向他问清了附近的地形和交通情况，约定等他上岗时动身，并带他一起走，保证由马达负责给他介绍更好的工作。马达原姓贾，其兄贾伯涛是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当时正担任着武汉警备司令部的司令，曾致函江苏警察厅长请求酌情给马达以优待。因此那侦缉队员想攀高枝，对马达的话无不照办。

这时，蒋介石正对去年秋天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谢恃、邹鲁等制造国民党二届中央扩大会议、另立国民政府一事而被捕的所谓政治犯办理特赦。我们特支决定麻痹看守我们的警察，故意散布我们也将被特赦的空气。因此警察对我们的防范较松。

越狱的时间越来越近。镇江县委在外头积极活动，我们在里头抓紧准备着。哪知道，就在越狱的前两天，情况突然发生变化。二月十五日，敌人枪杀了袁世钊，使警察一中队那边我们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

袁世钊是一位好同志，他担任过松江县委书记，领导过枫泾暴动，后来又担任省委特派员，对镇江等地的革命工作有过不少贡献。入狱之后，又一直是我们队伍中的中坚。他为越狱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规定的行动时间还没有到来，就先被杀害了。下一批将轮到哪些人呢？只有加紧越狱的准备工作，能突出去几个就几个，为革命保存力量。

镇江县委派人送来通知，原定时间不变，要求我们充分作好准备，北固山下有一条船等着我们。

二月十七日夜，四周墨黑，连一点星光都没有。阴历大年初一，警察和侦缉队的头目出去吃喝嫖赌玩了一天，其他的人除个别

当班的以外，吃饱喝足也都睡觉了，这是越狱的极好机会。

我们虽都躺在地铺上，假装睡觉，精神却振奋得很，只等规定的时间一到，就立即行动。

我头蒙在棉被里，不停地用电筒照看怀表。

子夜十二时还差十多分钟，突然听到警察住的地方传来急骤的电话铃响，我们“嚯”地坐了起来，侧耳静听，只听得隐隐传来警察说话的声音：麒麟巷侦缉队中关的犯人跑了！正在询问关在城隍庙的犯人有没有情况。

我一想情况不妙，立即命令大家行动，冲出去，到北固山下上船！

我冲出偏殿，见我们事前买通的当班警察早已逃之夭夭，立刻领着其他人跑。

这时，警察那边一片嘈杂声。有打电话向上级报告囚犯逃跑情况的，有吆喝人追捕我们的，有叫喊找不到人找不到枪的……乱成一锅粥。

我们跑出城隍庙，漆黑的夜幕笼罩着一切。我们拚命跑着，后面警察已经追来。一面吹着哨子，一面打枪，包抄上来了。

我对镇江的道路虽熟，奈何脚上钉着三副铁镣，既放不开步子，又会发出声响，很快被警察追上了。

那晚折腾了半夜。天亮前，我们关在城隍庙里的几个人全部被抓回。

事后才知道，问题确实出在麒麟巷侦缉队那边。那晚，马达买通的那个青年警察临时动摇了，他不敢上班，称病请了假。马达怕他万一告密，自己责任最大，于是个人伺机提前行动。他看到侦缉队的人大多回家过年，代站门岗的家伙很大意，在半夜换岗后跑到屋里去吃夜餐了，于是就擅自行动，穿过小院子出大门跑了。刘季平一看情况不好，就招呼其他三个同志快跑，惊动了侦缉队员，就

出动追捕。马达跑到铁路边，被抓回来。别的同志躲到老百姓家里，也都被查出。刘季平翻过墙向西，想越过铁路。天黑，路又不熟，一脚落空，跌落沟里，反而躲过了警察与侦缉队员的搜捕。后来他经招隐寺，越过一座小山，折向东南，奔渣泽车站，乘火车去了上海。

寄押在警察一中队的同志，也准备逃跑。他们事前给两条狼狗吃了两三斤熟肉，狼狗懒洋洋地躺着，要冲出去问题不大。但他们考虑到要三处地方统一时间行动，不料由于马达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引起的恶果，敌人很快来了电话，警察加强了防范，越狱行动未能实现。

次日起，我们这三个地方，敌人都加强了警戒，一个个验镣。我脚上的铁镣，有一副曾用铁锉锉过，但包得很好，未被验出。看守我们的人，改成了双岗，重申停止外人接见。敌特活动也特别活跃，镇江县委不好再与我们联系。省委命朱世伦来镇江，通过关系设法进来看我们。他告诉我说：白色恐怖很厉害，你们暂时中止与外面党发生关系，党籍保留省委，狱中的党组织也停止活动。各人可以自己想办法，利用家庭或其他社会关系，赶紧活动，能营救出一个人就是一个。什么方法皆可用，但不能破坏组织，损害同志，否则就开除党籍并设法惩治。要想尽一切办法，尽量争取保存党的有生力量。

这时期越狱失败所带来的后果相当严重。农历年一过，敌人突然将徐家瑾、陈百坚、黄子仁、陈文豪等陆续枪决在北固山下。

有一天早上，天刚亮，敌人就来提陈百坚同志。我们听到动静，一个个都起来了。四个士兵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喊道：“陈百坚！出来！”

陈百坚和我们一一拥抱告别。他用手拍拍我的背脊说：“我先走了，希望你们保重。”意思是要我注意，切不可盲动。他说完就昂

首挺胸走出了阎王殿。他一出门，举起戴了手铐的双臂，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我们也喊：“陈百坚同志万岁！”“打倒国民党！”

他的口号声渐渐地远去了。

我们又悲痛又愤怒地躺在铺上，摒住气，听着远方传来的枪声。

“百坚同志，大概已经倒在血泊中了！”大家都在想着。

朱世伦来后，我就写信给父亲和弟弟，要他们尽量想想办法。

当时，我有个姑父，他的亲弟名叫陈雨声，在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特务营当上尉书记官，省政府的警卫、军法会审处的行刑等工作均是由特务营承担的，陈雨声与特务营营长又是至交，我们过去将这些人人都作反动派看待，其实国民党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中间有不少是两面派分子或进步分子，陈雨声就是其中的一个进步分子。我父亲找到他，陈表示尽力帮助。他与省民政厅长也有私人关系，所以军法会审处的消息，他基本上都知道。

据陈雨声告诉我父亲：临时军法会审处有三个主要的法官，一个由苏州原江苏高等法院调任的；另一个由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派来的；还有一个是由李明扬的保安处调来的。处长是钱家骧，常州人，由省民政厅调来，大权在他手里。

陈雨声化的钱都由我家负担。张桐律师一般不好出面了，只好转为暗中帮助，省互济会有时也找他。此人比较好，这次省互济会又派人找他一起商量，请他帮助出出主意。他说，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营救：一个方面请丹阳、金坛、镇江三个商会会长联名出面具保，证明我是金坛的大绅士之子，不是“赤匪”；另一方面用个人名义，承认是国民党改组派，递状子，说是受了冤枉。状子递送到省政府和临时军法会审处。省政府方面，由丹阳商会会长郭颂如去疏通。军法会审处方面，由我父亲和张桐分别去贿赂。省互济

会说这办法很好，并请张设法多营救几个。张答应尽力为之。

陈雨声派他的妻子，每星期来看我一次，把一些消息透露给我。有一次，她告诉我从苏州解来镇江的人，不论原来是否判刑，可能一律要处决。又一次，她告诉我说：叶楚伦说，要把事情弄清楚，凡是参加苏州监狱暴动的人，一律要严办。风声很紧，我叫我父亲加紧做钱家骧的工作。

此时，我们已被押往县公安局看守所严加看守。茅理、马达等也解来了。看守所的屋子，两面是木栅栏，有一木栅门。木栅门外，终日坐着一个七十来岁的老看守。据他自己讲，他已在这里干了四十余年看守，经过了几个朝代了。出了他的看守值班室，又有一道门。他回家时，就将这门锁上。门外是堂屋，有两间是优待室，关在那屋里的，不是一般的囚犯。

我刚到这看守所时，这个老看守很象老狐狸，一眼就看出我的镣有毛病。他说我是个老逃犯，威吓说：“这事非向上峰报告不可！”一上报，我这条命就靠不住了，我知道这老狐狸借此敲我竹杠。

关在堂屋优待号子中的是季藩、季恺两兄弟。听说，他们家是如皋的大地主，有良田千亩。他俩因有参加红十四军暴动的嫌疑而被捕。一是家里富有，肯在看守身上化钱；二是嫌疑犯，不一定判罪。因此，他俩在看守所中颇受优待，不象我们被关在笼子里。

季藩兄弟已跟老看守混得很熟，他俩听说老看守发现我的镣有问题，就说：“你老爹爹做做好事，积积德嘛，叫他送点香烟钱给你，你就高抬贵手算了。”

老看守不作声了，考虑片刻，说：“你大相公说了，我总是听的。”

“十块钱，怎么样？”季藩出了个价。

老看守点头答应了。十块钱，比他每月的饷银还多，他内心很

喜欢，随口就说多谢季大相公。

我当时手头只有五块钱，先给了他，答应等家里寄钱来时再补足，钱宽裕的话，可以多给他一些，他表示同意。

老看守见我不是穷汉，手脚还大方，将来有油水可捞，很高兴。他叫来铁匠，把我脚上原有的大镣全部除去，换上一副两斤重的小镣，于是我两脚感觉很舒畅，原来痛苦和快乐都是相对的。

同牢的马达，我知道他搞无政府主义，父兄均是国民党的大官，政治上不能不提高警惕，他不知我的底细，我表面上对他敷衍着。不几天，他果然出去了。

茅瑄也在那里关了一段时间。他是我们的同志，被捕时供认是“土匪”，判无期徒刑时罪名也是“土匪”。因临时军法会审处只审政治犯，不审土匪，后来又把他解到别处去执行了。

跟我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小偷，其实是个赌鬼。他妻子常来送饭，打扮得很漂亮。我怀疑他是不是敌人的侦探，问他是怎么进来的，他说是得罪了人，“遭到陷害”。这人被关一个多月，就释放了。

季藩、季恺在镇江看守所关了一段时间，就被解到别的地方去了。去什么地方，我打听不到。

过了几天，季氏兄弟曾经住过的那间优待号子中，突然关进一对夫妻。细看时，大吃一惊！那不是李超时吗？李超时是江苏邳县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政治大学参加共产党，后来担任过东海县委书记、江苏省委巡视员等工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我在上海参加省二次党代会时，曾经见过他。党代会结束后，我去无锡，他被调到南通特委。后来，听说他在南通、海安一带领导农民暴动，建立了红十四军，他担任过军长、政委。他妻子叫吕继英。怎么他们也被抓了。

老看守与我也熟了。我假装不认识的样子问他：“前面关的是

什么人？”

老看守告诉我说：“听说是共产党的大头子，叫张文生，叶主席亲自关照，要特别优待。”

我想找吕继英谈一谈，趁无人的时候送了老看守几块钱，叫他把吕继英悄悄地引到笼子外面见一见。吕把被捕的经过简单讲了一下。据吕继英告诉我，红十四军失利后，他们回到上海，省委派他们到徐海蚌特委去巡视工作。他俩在上海火车站就被密探盯上了，到镇江一下车即被捕。超时化名张文生，死不改口。敌人叫来叛徒王益之对质，超时怒不可遏，打了叛徒。

我叫他俩无论如何不能供认，否则就无法挽救。

吕继英点点头，走开了。

我估计他们的事情可能希望不大。

果然，没有多久，李超时就牺牲了。

我见李超时夫妇被带走了，没有回来，就向老看守打听他俩的下落。

老看守告诉我说：“那姓张的不得了呀，连叶先生请他吃饭，他都不去。请他当大官，他也不干。军法处开庭，军法官说他姓李，他偏说姓张，军法官叫一个姓王的人出来，跟他当面对质，他趁军法官不备，拿起审讯台上的大砚台，就向姓王的头上砸去，真是吓煞人了！最后一次审讯，他又举起椅子要打军法官，被法警绑了起来，当晚就被枪毙了。那个女的没有死，因为她肚子里有孩子，快生了，没有杀，被带到别的地方去了。”

盛夏未尽，连日暴雨。那样的大暴雨为我二十多年所未见过。

和我一起坐牢的人，放的放了，解走的解走了，号子里只剩下我一个。家里父亲与弟弟又不能常来探望，只是写写信，汇点钱来。

黑云压城，暴雨如注，我心头的愁云终日不散。暴雨连下多



日，长江大水倒灌镇江市区，看守所地势低洼，水深一米左右。警察进出，水至齐腰。我的号子里也水深一尺。老看守给我两条长凳，我日夜都在板凳上生活。

我请求让我调换个地方，老看守说：“外面街上都撑船了，还能有什么干净地方！”据他说，这次长江大水，受灾的地区很大，几乎占了鄂、湘、赣、皖、苏、豫六个省的大部，光湖北一地淹死的人就有几百万之多，苏北地区也淹死很多人。南京下关、水西门等到处是水，没法住人了，难民到处皆是。

天黑，老看守就将栅门一锁，“哗啦哗啦”地蹒水走了，他估计我是无法逃跑的。

我就在这水牢中蹲了好几个月，很想买点东西吃吃，可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晚上，我睡在水牢的两条长凳上，实在不敢睡着，生怕一翻身会掉下水。煤油灯光亮很小，时明时昏。青蛙在屋里屋外一夜叫到天明。这真是千古奇景，过过这种生活，锻炼锻炼革命意志，还是件大好事。

最痛苦的是没有书看，也打听不到国家的大事，同志们的消息也杳然全无。有时偶尔从看守那儿听到一两句蒋介石在江西吃败仗，到处征调骡马送往前线等事情，也前言不搭后语，弄不清事情的真相。

到秋天，镇江的大水才渐渐退去。看守所里不再淹水了，但一股霉腥味，实在难闻。

水退了，我受足了湿蒸风寒也病倒了，痢疾拉得很厉害，休克过去好几次。请来的医生，本事不大，架子不小，给几片西药，就走了。幸亏靠自己体质的抵抗力强，经过二十几天与病魔艰苦斗争，身体渐渐地恢复过来。

“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当时蒋介石正在集中力量进行内战，

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张学良的东北军奉令撤进关内，日寇很快占领了东北全境。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人、学生纷纷起来，举行反日大罢工、大罢课，并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还殴打了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东北等地的抗日自卫军、抗日救国军，也响应我党的号召，奋起进行抗日斗争。国民党反动派面对全国人民这种情绪，穷于应付，捉襟见肘。

十一月左右，陈雨声派一士兵给我送了些吃的东西来，点心里面有一张不具名的纸条，写了几个小字：“无期徒刑，放心。”

隔了几天，一个上午，我被押到临时军法会审处。

军法官什么话都没有问，对我说：“你在监狱里谋划暴动，本来是要枪决的，看你年轻，判你无期徒刑。押下去！”

实际上判决书上写的是二十年。二十年时间不长，国民党不可能维持二十年。我过二十年也不过四十余岁，正是壮年，依旧可以大干革命。我很愉快地昂首走出法庭。你们这些狗官，将来落到我手里，非将你们粉身碎骨不可！

我父亲去找了钱家骧，想把我送到金坛去坐牢，家里可以经常有些照顾。钱对我父亲说：“你这大少爷实在不安分，京沪线上他关系很多，千万不能把他放在江南了。只要再有点风吹草动，他就会牵连进去，那时就很难办了。我劝你，还是放远一点好。”

其实，军法会审处早已商定，怕我再闹事，把我放到远远的淮阴去，他们知道我在那边没有一个熟人。

我父亲想想这话也有点道理，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淮阴算是远了，“充军式”地走了，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他写信劝我千万不要再闹监，安心走吧，并且给我送来了一些行李衣物和钱。

由于当年大水灾，苏北各县大多遭淹，去淮阴的路很不好走，只好暂时把我转到镇江监狱寄押。

镇江监狱完全是旧式的监狱。狱中的大笼头姚登，乃镇江东乡姚家桥附近人，离我老家不远，是个惯匪头子。此人凶残无比，与看守勾结起来，敲犯人竹杠。我是过路寄押的，他还比较客气一点。

有一天，新押犯叶胥朝同志关进牢房。按牢规，凡是新到的犯人都要出“铺监费”，否则就要吃苦头。笼头动用吊打等私刑，迫害囚犯，是经常的事情。这种刑罚在明清两朝，由牢头直接执行。清末以后，由笼头执行，敲榨得的钱财，由监狱当局和笼头分配。大头归监狱当局，小头归看守和笼头。叶说，我家穷，没有钱。笼头就叫他的狗腿子把叶押到马桶边，掀开盖子，叫叶把头伸过去闻臭气。他们把这种刑罚叫作“看金鱼”。我气愤极了，“唰”地站起来，说：“你们这样对待我们政治犯是不行的！”

姚登说：“你到这里，自己不破戒，还叫我们不向别人要钱，你老实些！”

我想自己初到这里不几天，人孤势单，没有帮手，不便与他争吵。

当晚，叶胥朝同志“看”了半夜“金鱼”。

旁人打圆场说：他“看金鱼”已经看够了，让他休息一下。

第二天，姚登还是摆弄他。他们谈判结果，给了十几块钱了事。

那时，吴治平也关在镇江监狱。省委军委曾派他做兵运工作，后被捕，此人以后下落不明。

我在镇江监狱寄押了一个多月，就向北起解。

#### 4. 清扬路上一囚徒

一九三二年初，我被往北解送，渡过长江，到了扬州，沿途好大

的水呀!

在扬州监狱，我遇到几个熟人：王亚成、魏其楚（魏翹南）、王治平等，他们都是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

扬州监狱的笼头比镇江监狱的更凶恶。这里的犯人包括政治犯在内，均不敢触犯他的权威。趁笼头不在眼前时，我对王、魏诸人说：“你们怎么这样懦弱，居然在笼头高压下生活，不敢吭一声，这不是共产党人的性格!”

王亚成解释说：“你初来，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这些家伙，手下有不少徒弟，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一涌而上，先揍你一顿。我们政治犯在这里人数少，斗不过他们。”

“怎么好这样解释呢？共产党人，无论到哪里，都要做群众工作。今天少数，明天不就成为多数？坐在那里不工作，永久得不到群众的拥护，永久只好被人欺侮。”

我们的谈话，被笼头的徒弟听到了。笼头就来找我。他摆出一副江湖好汉的架势，对我威吓说：“你老兄从我这个码头过，要是不识相，在我这里惹是生非，老实对你说，我这人不是好惹的!”

我一听他这样威胁我，也不示弱，胸脯一挺：“你说清楚点，我惹了你什么了?”

王亚成、魏其楚、王治平等几个怕我吃眼前亏，一齐都过来相劝。

那时，一般监狱的笼头对政治犯大多顾忌较大。他们怕政治犯有外援，如律师、记者，或与国民党中的大官有关系，要是冲突起来，后果很难预测。他对我的情况又不清楚，见我并不示弱，想必有后台，笼头立即转弯说：“你蹲几天就走了，我们要在此长坐牢，山不转水转，后会有期，请多多帮忙。”说完，叹口气，就走开了。流氓嘛，欺软怕硬，是他们的特性，这种人在我的经历中见过不少。

冬日的苦寒，漫长的，象是没有尽头一般。朔风凌厉，雨雪纷

飞。从小小铁窗对外看，只是巴掌大的那么一小块铅灰色的天空。

我盼望着早日到达目的地，进行新的战斗，共产党员最大的苦恼是闲着没事干。脑子不用会生锈；耳、目不用会无知；手足不用成懒汉。一个共产党员久闲着，就会渐渐丧失革命的意志。

在苏州，在镇江，狱中有党的坚强组织，虽然那时狱中斗争很艰苦，也犯了一些错误，但精神是愉快的，斗志是高昂的。到了扬州，没有组织关系了。省委决定狱中同志不准与外面发生关系，这种处境，对我来说，精神上是痛苦的，唯一的办法，只能忍耐着，等待着。

魏其楚是淮阴一带人。一九二六年冬天，他秘密参加了国民党。“四·一二”事变后，他赶到武汉，想投奔革命，哪知到武汉时，汪精卫已继蒋介石叛变革命，非常失望。回家时经过徐州，由宿迁的地下党员蔡德甫和第七师范学生（C. Y. 支部书记）陈亨州介绍，加入共青团。由组织派遣，回乡发展团的组织，建立了泗阳县第一团支部。接着又到淮阴，在淮阴中学上学，做秘密工作。一九二七年一月入党。一九二八年二月，组织上决定他回泗阳任中共泗阳县委宣传部长、共青团泗阳县委书记。暑假后，又调淮盐特委当特派员，负责所属各县团组织工作。一九二九年夏，反动派在淮阴大肆逮捕进步学生。为了安全，经特委批准，他转移到上海去工作。他对淮阴的情况非常熟悉，知道我将去那里，便向我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由于大水，水路不易行舟，陆路又不通，我在扬州监狱耽搁了二十多天。

有一天傍晚，来了个五十多岁的老解差。他先到号子里看了看我，大概是来看看我身上有没有油水可捞。他看我年轻，不象个“穷鬼”，很得意地走了。他到典狱长那里把提解手续办了，回来对我说：“明天五更起解。你如果今晚要上街逛逛，吃点东西或洗把

澡，可以对我说。”当时的规矩，只要拿到监狱里的提解公文，这个起解的犯人就归他处理，监狱当局就无权过问了。

我知道他的意思，他允许带我上街洗澡等等，无非是想从我身上捞点油水罢了。

“好，请你今晚带我去洗个澡。”

他咧开嘴笑了，说：“七点钟我来带你。”

有钱可以差山鬼，我在老解差陪同下洗了一次很舒服的澡，给了他两块钱。

“你想不想吃点什么东西？”

“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不愿在他身上再多化冤枉钱了。

老解差有点失望，瞥了我一眼说：“好吧，那你就拾掇拾掇，明天一早就动身！”

“是坐船还是走路？”我故意问他。

“这个你就不用问了。我自有安排。”他很怕我搞他的鬼。

我挪动了一下步子，脚镣叮咣作响。我指指脚说：“上了这东西，怎么走远路？”

老解差心中不悦，显然是嫌我没有多“孝敬”他几块钱的缘故。他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气，说：“你是犯人，叫我有办法？找根布条将镣吊起点吧。”

我不想再跟他噜嗦什么，就不再作声，跟他回到监狱。

他想多捞点外快，又无从下手，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年轻人，好不懂事！”回身就走了。

我没有别的什么需要准备，就找王亚成、魏其楚、王治平几个聊聊。我说：“我明天就要起解，一早走。我对你们提一点临别意见：反动的国民党一定要打倒，这个漆黑一团的旧社会一定要彻底推翻，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共产党人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工作，直到生命结束时才能停止。扬州监狱与镇江监狱情况差不

多，土匪犯不到三分之一。让凶恶的笼头爬在大家头上作威作福，是不行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熟视无睹，要把大家秘密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反掉笼头和监狱中的一切陋规。”

那时我还“左”得很。经历了那么多的错误，还是一厢情愿地蛮干。

他们一面点头，一面又流露出畏难的神色。最后彼此拉拉手，互道“珍重”，就分手了。

我躺下后，悄悄地把棉袍腋下拆开，留下几块钱作为路上零用，把几张大钞票藏进去，缝上。心想，苏北的监狱可能比南方监狱更黑暗，必须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一路上妖魔鬼怪一定很多，准备作坚决而又艰苦的斗争！路上的情况怎样？现在很难逆料，有机会，还是设法逃跑！那个解差是个五十开外的老头子，我打倒他是不成问题的，难的是怕找不到机会动手。

我睡了似乎没有多久，就被喊声唤醒了。

“管兰亭！起来！起来！要上路了！”

我睁开眼来，天还是漆黑的，估计不过四、五点钟吧。冬天，天亮得迟。我吃了两块隔夜请看守买来的烧饼，打好铺盖，把脚镣扎好，扛起铺盖就走。到门口一看，是两个解差，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一个三十来岁的壮年人，一人拖着一根水火棍，就跟京戏中《苏三起解》里的解差差不多。

老解差与看守打了招呼，我们就出了牢门。

天，下着濛濛细雨。街上冷清清的，没有行人。街灯非常昏暗，看样子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

老解差在前，我居中，年轻的解差押后，慢慢地走着。古人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我却是带镣长街行，很有一些奇特的诗意。

那老解差身上，不知带了一些什么东西，不停地发出“切壳，切

壳”的声响。

天气很冷，解差紧缩着脖子，我却由于穿着棉袍，又扛着十多斤重的铺盖卷，不觉得怎么冷。到了东门口，城门还由“铁将军”把守着，管城门的吏卒大概还在睡梦中。解差喊了几声，没有动静，只好叫我在城门洞里歇着。我想不通解差为什么要这么早动身，心里怀疑着，依偎在铺盖卷上等待天明。感兴所至，撰诗一首：

踟躅扬州路，  
镣声夹雨声。  
城门吏未起，  
倚笈待天明。

等了半个多小时，城门终于开了。我们出东门，来到运河码头。

老解差停住了脚步，回过头来对那年轻的解差说：“就在这里等一下，你看着他，要当心点！”

我不管地上湿不湿，放下铺盖卷，就往上一坐，看那老解差上哪儿去。

天边已经发白。大运河沿岸的小船鳞次栉比般地停靠着。有的船艙上冒出乳白色的缕缕炊烟。这些小船，大多在北边湖里打了鱼，来扬州赶早市的。

我这才明白两个解差为什么起早的原因。

老解差一连上了好几条船，上去下来，不知他干了些什么鬼事。我正纳闷，忽见他走到渔船中间，吆五喝六地嚷着说：“我们是办差的，解犯人，你的船要派差！”

他左瞅右瞧，最后看中了一条船，踏上去不下来了，很凶狠地说：“就派你这船当差！”



我离河边较远，隐隐约约听到船家的哀求声：“太爷，我们苦啊！请你老人家抬抬手，照应照应吧！”

老解差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磨蹭了个把钟头。回来时，手里提了一大包鱼、虾、豆腐之类的东西，衣袋也塞得鼓鼓囊囊的，看样子他已捞到不少油水。

船也拉到了一条，船家频频求他照顾。

“少送一程吧，送到湾头，就放你们船回来。”

我们上了船。风不太大，小船沿着运河向北行。到七点来钟，天色大亮了。我向北望去，白浪滔滔，无边无涯，不禁问道：“怎么走到海里来了？”

“这是大水，还没有退走，前面就到邵伯湖了。”

小船“依依呀呀”地摇着，中午到了湾头。一眼望去，难民们密密麻麻地蹲在运河大堤上，芦席搭的小棚子，简直望不到尽头。

我们登上运河大堤，棚子与棚子之间还留着一条路。老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惨象，满目皆是。许多人只穿一条破单裤，在凛冽的朔风中颤抖着。青壮年一个个面黄肌瘦，都是有气没力的样子。老人和小孩，更是萎蔫孱弱，非常可怜。

这几年来，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蒋介石一心“剿共”，官僚们争权夺利。政治腐败，水利失修，酿成了这样的大水灾。听说，这一年仅江苏一省，受灾面积就达三万七千多平方公里。一千七百万亩良田被淹，近七百万人无家可归。里下河地区汪洋一片，这洪水中中和着多少难民的血泪呵！

国民党政府也高喊救灾，从美国借了大量“美麦借款”。但是，这些赈济灾民的粮款，到灾民手中，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

难民们愤怒极了。他们在大堤上用烂泥塑起叶楚伦等人的像，贴上大名，并对着这些泥人咒骂，尿尿。

几个保安队的士兵，在附近转来转去，无可奈何，一切只当看

不见。

老解差把一大包鱼虾交给我，说：“你蹲在这里拣拣鱼虾，我再  
去弄条船来。”

他向那年轻的解差丢了个眼色，意思是小心看守好了，别让他  
跑掉。

年轻解差点点头。老家伙就背上揣着大封解差公文，拖着水  
火棍走了。

我打开包，开始拣鱼虾，心里默默地咒骂这两个坏蛋。现在，  
老百姓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还昧着良心趁火打劫，真是狼心  
狗肺！我恨不得将他们杀了！

看看堤东，也是汪洋一片。对这腐败的社会，积满了怨愤，我  
当时有诗一首，如今只记得其中的两句了：

一片哀鸿乌云压，  
万家水底龟在天。

我远远地望那老解差，他又在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吆五喝  
六，敲人家竹杠。

船民生活都是很苦的。风里雨里，就全靠捕这点鱼虾过活。  
对解差的敲榨很气愤，但又不敢反抗，磕个头，送块把钱，请老解差  
高抬贵手。

个把钟头，他又弄到了一、二十块钱，高兴得很，笑咪咪地又拉  
了条船回来。

他叫我们上船。

船上是老夫妻两个，还有一个中年妇女。她一把眼泪、一把鼻  
涕地哀求着：“老爷，送一程以后，你无论如何放我们回来。我男人  
和孩子挑鱼到城里去了，回来怕找不到我们……”

“行了，行了，噜嗦什么？”老解差不耐烦地两眼一瞪说。

那中年妇女托旁的船上的渔民，要他们等她男人回来告诉一声，船晚上就回来。

渔船解缆航行了。

老解差命那妇女烧饭。鱼、虾、豆腐、青菜、猪肉、鸭蛋都有，全是老家伙从各条渔船上弄来的，连同油、盐、酱、醋在内，他一个子儿都不化。

老解差钻进船舱里，窸窸窣窣地解开衣带，将身上“切壳切壳”作响的东西拿了出来，原来是一副鸦片烟具。我一路上的疑团，此时才恍然明白。

他伸了个懒腰，躺下来，开始抽大烟。

渔船继续沿着运河大堤前行。向北，堤上的难民更多，人山人海。附近镇上的人多到大堤上做小生意，有做炕饼的，有炸油条的，熙熙攘攘，一路不绝。

每隔十来里路，有一处施粥站。领粥的难民排成一、二里路的长蛇阵。每个施粥站有一个排左右的保安队。

兴化城淹没了，县政府也搬来堤上，人住在一条大船上，旁边靠一条汽船，随时可以移动。

饭后，我们船到了一个大口子，这是国民党军队炸掉的大堤。不炸大堤，扬州城就保不住；炸了大堤，就淹没了整个里下河地区。

听船家说：这一年，里下河地区淹死的人不计其数。正当田地里粮食将收未收时，堤一炸，大水涌来，眼看要到手的粮食，可惜全被淹了。

一路上，我坐在船头看到这些情景，联想起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大多是由于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加上水灾或旱灾，群众起来造反的。明朝末年的张士诚，不就是在这一带率领饥民起事，在苏北号称齐王的吗？我们党为什么不知这里的情况，不派

同志来组织农民暴动呢？

如果把这些保安队的枪械缴下，和群众一起组织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一举可以攻下扬州，割据苏北，即使失败，也可以利用洪泽湖等有利地方开展游击战争。我们过去眼睛只看着大的中心城市和铁路工人，不顾条件是否具备，乱搞暴动，没有不失败的；现在这里的条件很好，要搞暴动，希望很大，可惜省委不知道！这样的好机会，白白地看着它与洪水一道付诸东流而丧失，多么可惜。

船，在浩淼无垠的邵伯湖中行驶。我几次想动手干掉这两个解差，准备冷不防先把年轻的那个打下湖去，然后再干掉那个老家伙！我几次差点儿一跃而起，但又克制了自己。船上还有三个人，他们急于要回去，家里还有两个人等着他们哩。我若闯下祸后，他们就回不去了。同时，四周这白茫茫的一片，如果动了手，既害苦了船家，自己又到哪里去？离开了船是不行的，决心很难下，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觉得不可鲁莽，再等机会吧。

船，已从西面越过运河。东西两面的水面是相平的。我看到有些草屋的屋顶还有点露出水面上。树干上残留着水痕，大水退得很慢。看样子，老百姓还要较长时间受苦受罪。

傍晚，船靠高邮县政府所在地。这里除了县里的保安队之外，还驻有省保安处的正规部队，汽艇就停靠在县政府的帐篷附近。高邮城里的水还未退走。

我们还是蹲在船上。船家央求放行，老解差死活不准。老太婆和中年妇女一直哭哭啼啼。老解差骂骂咧咧，最后答应说：“明天一早找到别的差船，就放你们回去！”

我想，这家伙还不是想再多捞外快。

次日，东方发白。又来了两个解差，也拖着水火棍，是高邮县派来接替的。我跟他们到另一条船上。扬州的两人交差之后，乘原船回湾头去了。

我们从高邮起程。前面是高邮湖，水面比邵伯湖更为宽阔，一路大水。中午吃了点东西，深夜到宝应。这段路程很长，船行还算快。

上岸后，宝应的大水已退，但街上行人很少。

两个解差找了一间地板房，空空的房里霉气很重，他们把我关在这间空屋里。我对周围情况不清楚，怕他们把我暗算了，因此不大敢放心熟睡，时刻准备跟他们拚命。

第三天，又来两个新的解差，带我向北。大堤上还是到处挤着难民。到了淮安，路上比较干了。

在淮安住了一夜，第四天由淮安的解差押解我去清江。这段路只有三十多里，下午就到目的地了。

两个解差带着我在街上转了很长时间。他们问我说：“你要不要吃饭？我们有地方。”

我肚子确实饿了，吃顿饭也花费有限，就点头说：“好吧。”

我们进了一家馆子，点了一菜一汤。解差看了我一眼，笑笑，对堂倌说：“再来两个菜，弄瓶大麴酒来。”

四菜一汤，外加一瓶大麴，吃掉了我一块八角大洋。也许是这顿饭吃得还满意吧，解差征求我的意见说：“时间还早，你要不要在街上买点东西？没关系的。”

我想，初次到苏北，熟悉熟悉清江浦的市面也好，就跟他们走了。

清江是一个小城，主要市面都在一条七里长街上。我们东逛逛、西看看，什么闸口啦，花街啦，几乎全城都走遍了。

我们还到一家茶馆里坐了不少时间，沏了茶，要了点心，钱当然由我付。我趁两个解差喝茶、吃点心，谈山海经的机会，给家里写了封信，说我已到淮阴，马上要进监狱，如半个月内没有接到我的信，就请张桐律师来淮阴看我，以防万一。

这样磨磨蹭蹭，直到晚上九点钟光景，我们去县政府内的淮阴监狱。

## 5. 乌烟瘴气的淮阴监狱

经过县政府那阴森森的门岗，我们径直往里走去。

黯淡的灯光下，呈现着“淮阴监狱”四个黑色的大字。

进了监狱门，就是看守的值班房了。犯人进牢，先要登记。看守问了我姓名，从何处来，判了多少年刑等等。解差交了差就离去了。手续办完，看守打开门，带我进去。门里是个大天井，再进二道门又是一个大天井，天井四周都是牢房。看守把我带到第七号号子，这是这监狱里最小最肮脏的号子，看守开门让我进去。这号子很简陋，约十二平方米又一隔为二。前半间屋，睡着一个笼头，代替看守执行职权，后半间屋，关着十七、八个犯人。前后是用栅栏隔开的。

房间很小，拥挤不堪。虽说时令还是冬天，但是一股说不出有多难闻的汗热臭气已扑鼻而来。我被熏得差点呕吐。这牢房没有窗洞，门一关就不通气了。

看守将我交给笼头，说：“新来的，你要好好‘照应’他！”

我知道这是他们中间的暗语，意思大概是叫笼头好好整整我，给我一个下马威，然后可以榨取我的钱财。

笼头是个瘦长条子，象个鸦片鬼子。他开了栅栏门，叫我进去。

他指着一个墙角，对我说：“那是最好的地方，你过去睡吧！”我看出那是号里最坏的地方。

我不理睬他，伸手提铺盖，却被笼头一把拽住了。他凶相毕露地说：“家有家规，牢有牢规，你要守规矩，不然就对你不客气！要放

漂亮点儿!”这是江湖流氓的时髦话。

我把铺盖卷朝他一丢，还是不理睬他，径自从躺着人的隙缝中一脚一脚向那墙角跨去。好不容易跨到那里，一看墙角正好放着一只大粪桶，没有盖子。旁边落脚都难，哪里还能有铺位！睡不好睡，坐不好坐，只好站着，分明是他在作弄人嘛！我从来也不曾受过这种气。

我下午跟淮安那两个解差在茶馆里喝茶时，早已打听了这牢里的情况。看守与笼头是互相勾结的。新犯入监，一定要先谈好“铺监费”，谈好了，才给你睡觉的位子，否则就要立着挨打，直到你答应才罢休。

我已下定决心，一个钱也不给！

我也斜了一下笼头，在昏暗的马灯下，他坐在铺上，正端详着我，捉摸着在我身上能榨出多少油水，看样子他在高兴，因为我不象个穷小子的样子。

我轻轻请躺在地铺上的人挪出点地方，使我好蹲了下来，可是他一声不吭。

“不要挤！”我身旁边的一个犯人吼斥我。好凶呀！我内心想，还是不吭声。

过了几分钟，笼头开口了：“你懂不懂得监狱里的规矩？”

“规矩？有什么规矩？你说吧。”

“你第一次吃官司？不懂，告诉你：犯人初来，必须铺监，不然，牢神要惩罚你的！”

“嘿！”“牢神”就是你这个样子，我冷笑了一声说，“吃官司，我从无锡、苏州、镇江、扬州，一直吃到这里，从来不信什么‘牢神’不‘牢神’！我每到一地先打‘牢神’后打‘小鬼’。”

我也是用江湖口气给讲话。他一听我这话，惊住了。全号的人大多坐了起来。笼头停了一刻才说：“铺监，是我们这里的老规矩！”

要漂亮一点，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深知当笼头的大多是些土匪之类的亡命之徒。这些人怕硬欺软，更怕你外头有人撑腰，惹出祸来，使他们的主子丢官。

“我家有钱，与你无关！”

“你嘴硬！给我打！”笼头跳了起来说。

两个犯人从地铺上爬起身，就冲了上来。

一个打手上来，朝我兜胸就是一拳。我毫不客气，狠命朝他头部猛击一拳，那打手差点跌倒在地。

我厉声喝道：“谁来？我把他眼珠都抠出来！谁要试试，就来吧！老实告诉你们：我从江南到江北，不知打了多少笼头了！你们长着眼睛，也不瞧瞧，想敲我的竹杠，休想！蒋介石都敢打，就不能打你？”

笼头大叫：“不要怕，给我一齐上！”但没有人再上，笼头气馁了，他只好自己摆出一副磨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

“你们再动，我把这粪桶倒在你们头上！”我踢了一脚粪桶说。

笼头嘴里骂，心里软下来了，不敢动手。其他人平时受笼头欺侮，也恨他，见我很凶，一下都坐起来，默默地看着我。笼头看硬的不行，就让另外两人来软的：“光棍不吃眼前亏，图个安逸算了。”

“图安逸？我早就不打倒蒋介石，当大官了！”

号子里议论开了：“他敢打倒蒋介石？那是什么样的人呢？”  
“蒋介石都敢打倒，当然天不怕，地不怕了！”

笼头改口了：“你吃什么官司？”

“吃‘打倒蒋介石’的官司，因为他欺侮老百姓。”

“明天再说，大家睡觉！”笼头彻底泄气了。

“哼！你们要钱，一个子儿都没有！要命，有一条！你要钱，打个电报到镇江叶楚伦那里去！”

大家听我这话，愣住了。笼头见势很硬，又摸不清我的底细，



就对号子里的犯人说：“挤挤，让他睡下。”

几个人就挤了挤，让出了尺把地方。我坐下来，看着笼头，防备他再耍什么花样。我牢记他的“明天再说”这句话，预想明天可能还会发生更大的风波。

“拿条被给他！”笼头命令他的狗腿子。

一个犯人就递过来一条破麻袋帘子，气味很大。我受不了，没有盖，叠一叠，丢在一边。天亮后拿过来一看，每个麻丝眼里都是虱子，屁股朝上，胖鼓鼓的，简直叫人肉麻。

天一亮，号子门就开了。犯人都到天井里去活动。七号的小笼头就出去向总笼头报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我刚出号子，七、八个人就窜了上来，想把我围住，要给我颜色看了。这情势，我见过不少，知道他们要动手了，连忙退后几步，往墙边一靠，说：“哪个上来，我就抠哪个的二饼（眼睛），抠一个是一个，踢死一个算一个！我拚了一条命，来吧！”

我年轻体壮，横竖横了，什么也不怕，他们见我脚上上了镣，知道非一般犯人，如今又摆出这样一副拚命的架势，摸不到我的底细，不敢动手。即使凭着他们人多势众，真的把我打死或打伤，也就要闯大祸。因此，七、八个人只站在那里发狠，并不过来。

双方相持了十余分钟。

这时，人群中站出来一个三十几岁的人，腿有点瘸，衣服一掖，完全是一副绿林好汉的派头。他对我露出一些同情之意，对大家说：“我们在江湖上闯荡的人，从来不作兴欺侮远来之客！”他又环视了所有围观的人，大声喊道：“弟兄们，欺侮外客，就是孬种！谁敢动手，我孙老二‘路见不平’就要‘拔刀相助’！”

围观的犯人纷纷议论开来，称赞“孙二爷说得对”。

那七、八个人也就悄悄地溜开了。

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孙二爷，确是个绿林头子，被判了十几年

徒刑。他在牢里也有一批徒弟，平日很讲江湖义气，相当有威信。总笼头则是一个和奸杀人犯，判了无期徒刑。一般绿林好汉是看不起这号人的。

“好了，你们都回去！”总笼头站出来说，“孙二爷的话是对的，我们再慢慢商量吧！”

我细看此人，四、五十岁，大胖子，眼睛已半瞎了。

总笼头这样一说，喽啰们就乖乖退下了。其他人暗暗高兴，一个个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神情。

总笼头把我带到他住的地方——牢里和面的面房，请我坐下。

当时，淮阴监狱，每天开两顿饭，每顿饭发一个大馒头。两顿总共只有十两（十六两制）面粉。规定囚粮每天每人十四两，典狱官贪污四两。全监二百来人，每年贪污的总和也很可观。这是一个很好的肥缺，外人一般不尽知晓。这间和面做馒头的房间，兼作总笼头的优待住房，住着两个总笼头。一个叫卢四太爷，六十多岁了，留半长的胡须，过去当过土匪头子。另一个叫彭步青，牢里的犯人都叫他彭大爷。这两人都是看守、典狱长的忠实走狗，又是欺压犯人的凶恶霸头。敲到的竹杠，如“铺监费”、赌头等等，都要与看守、典狱长分成。七成归狱方，三成归笼头。各号子的笼头又是他们的徒弟或徒孙，一般都是判了十年以上的徒刑，凶得很。

彭步青请我坐下以后，就问问我的情况。

我说我是金坛人。他不知金坛在何处。

我说：“金坛靠近浙江边了。”

“呵！千把里路哪！家里是做什么的？”

我知道他的用意，故意说我家里很富，八百多亩地，两个店铺。

他又惊又喜；以为可以弄一笔大钱，于是很客气地对我说：“你家里每月给你寄百把块钱是不成问题的啰。”

“是呀，”我说，“可惜我与家庭断绝了关系。”

他大失所望，沉吟了片刻，他立即站起来说：“那末你吃这样长的官司，今后怎样混下去呢？”

“慢慢混吧，横竖国民党不长的。我到这里，人地生疏，要请彭大爷多多帮忙。”

孙二爷正好进来。他往铺上一坐，豪爽地说：“年轻人，不要怕。我们都是落难之人，会照顾你的。”

我说：“谢谢你，孙二爷！”

他说：“你刚才是好样的！”他转向两个总笼头，“让他移到我的号子里吧！”

彭步青对孙有几分顾忌，只好同意他的意见。

当天我就搬进孙二住的第三号号子，孙二是三号的笼头，他亲自安排我睡在第四个铺位上。那里比较干净一些，也比较宽敞一些。说宽敞，也不过一尺左右的铺位。铺盖也由他们替我搬进来了。

淮阴监狱，这个特殊的黑暗的封建性的底层社会，在江南监狱是少见的。我必须把它的真实情况弄清楚。

这里关了三个政治犯，我先找他们了解一下。谢冰岩，本地人，人很忠诚老实。其他两人是沈家俊和金人龙，也都很年轻。谢、沈二人开始都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来做了工作才讲了真实情况。金人龙是普通群众，被人陷害的，他沉默寡言，后来忧郁成病，死于狱中。

我那天早上跟笼头交锋时，他们三人也都在场，远远望着我，他们平时受笼头欺侮，见此情景，为我捏了一把汗，但在淮阴监狱里看到这样的斗争场面，内心又觉得很高兴。

谢冰岩被判了十五年徒刑。他父母天天给他送牢饭。外面的情况，由他们透露进来，不管是谣传还是事实，我听了都如获至宝。

在监狱中的人，最痛苦的是与外界隔绝，尤其是我们共产党人。监狱当局是不准监犯知道外界的情况，新监旧监都是一样。

我决定在狱中继续为党工作，但决不再在狱中搞暴动的蠢事。

我在淮阴狱内狱外都没有熟人，只有慢慢地一个人做工作，采取交朋友的办法团结群众，首先团结好谢冰岩，作为帮手。

我花了几天时间研究监内的情况，拟订腹稿，预备一步一步地打倒笼头统治。

整个监狱共有七个号子。两个总笼头睡在和面房，一至四号是比较大一点的号子，五至七号较小，更拥挤。我住的地方就算是相当于大轮船上的三等客舱了。监狱是由旧式的民房改建的。牢里关的犯人，百分之八、九十是土匪。

孙二告诉我，淮阴出城三里就是他们的天下。象王营、三棵树等地方，他们白天带着枪可以大摇大摆，没有谁敢说他们一个“不”字。年轻人满了十六岁不做土匪，就不算好汉。县政府的人不勾结土匪是不敢出城的。

为了弄清监狱的情况，我有时也到总笼头住的和面房里去转转。那里确实供有牢神的神龛，以保狱中的平安。我联想到京剧《苏三起解》中祭牢神的情节，觉得这监狱与江南的差别很大，倒与明清等封建朝代的监狱差不多。

整个监狱只有三个看守。每个看守每月四块钱薪水。另外有三个副手，政府不发薪水，他们的薪饷全靠向犯人榨取到的钱几个方面分成拆账，还要“孝敬”看守长和典狱官。狱中高利贷也非常盛行。

笼头敲犯人竹杠，花样很多，手段刻毒之极。新犯人进牢房，先要问你有多少家产。他们起码要把你家产的很大一部分拿出来铺监。你不给或少给，就把你绑在木栅上毒打。答应了的数目，就

必须限期交清，否则又要绑起来揍。许多犯人被逼得倾家荡产。有的犯人家属在外乞讨，凑点钱数送进来，以供这些恶棍享用。

除此以外，牢里还有不少蝇营狗苟的赚钱办法。

一种是专设小房间，供犯人夫妻相会。一天不少批，如要在狱里跟丈夫过夜，每夜要给五块钱。

另一种是聚赌。进监狱第一个天井旁边，有三间屋子专做赌场之用。每天晚上封了号门，就找犯人去赌博，通宵达旦，抽的头钱很高，全部归看守收入。一夜可得三、四块钱。赌徒无钱，笼头可以借贷，收利息。

再一种是笼头的狗腿子专设几个小煤炉子，供犯人烧煮。囚粮每天十四两，被剋扣去四两，就只有十两了。每顿一个馒头，无菜无汤，馒头又发得极松，吃下去不一刻就饿了。你必须请家里送点番薯或苞米、青菜等类的东西来，在小炉子上烧烧，炒炒，热热汤。监内专设一人为犯人买菜和油、盐、酱、醋等东西，此人专赚犯人的钱过活。用他们小炉子烧东西也得付钱。

每天早晨，还允许外面的小贩进来卖油条烧饼，但必须是与看守有关系的人。那时，经常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长得很俊俏的，据说是衙门口茶馆里老板的养女。她每天早晨开封时，总拐一篮子烧饼油条进来叫卖。由于犯人太饥饿，生意很不错，能赚一些钱。但她的衣着非常单薄，手背上常露伤痕，令人感到很可怜。这孩子监狱进进出出叫卖约有两年多时间。有一天，突然她没有来，大家很奇怪。我向一个看守打听，说那小姑娘被家里人拷打，上吊死了，什么原因不清楚。

监狱情况弄清后，我考虑再三，认为打倒笼头是不大可能。从县政府到监狱当局；从典狱长、看守长到看守，再到笼头，是互相串连在一起的，活象一条铁链子，一环套着一环。取消笼头统治，看守没有外快，就活不成；看守都不干了，典狱官也当不了；而且上自

县政府的官吏，下至监狱的看守，谁不通过笼头从犯人身上捞钱？他们这样一伙贪婪的吸血鬼，是决不会甘心这样一棵摇钱树倒掉的。我个人新来此地，没有党组织的坚强领导，狱中政治犯又那么少，斗争很难取得胜利。斗争的道路艰苦得很，我不能再冒失。最后决定还是等待机会，设法减轻一些剥削和压迫，比较实际。

淮阴监狱如此乌烟瘴气，实在看不惯。我和谢冰岩等几个人就一起读书。谢是本地人，能弄到书，我们就利用时间学习，学哲学、政治经济学，也读古典文学作品，我还研究了《易经》作了详细的注释，并试图用辩证的观点来解释这部古典哲学著作，写下了不少心得体会。

这监狱里脏不可言，虱子、跳蚤成灾。天好的日子，犯人一排排坐在墙脚根，一面晒太阳，一面捉虱子。

每逢春夏之交，牢里总要流行一次伤寒之类的传染病。一百几十人，躺下一大半。缺医少药，每年总要死一批。监狱当局，视若无睹，死了拖出去，名字还挂在那儿，照样领囚粮，吃空额。

我到那里两三个月后，也得了一场伤寒症，差点死掉。幸亏我已新交了几个朋友，睡在我旁边的一个叫周三，是开茶馆的，六十来岁。他在青帮中是个小头子，跟我处得很好。我发高烧，呈昏迷状态时，他花钱请人买来几斤荸荠，洗净后榨了两碗汁水，给我灌下去，出了一身大汗，病就渐渐转好了。

谚语说：“撑不死的脾寒，饿不死的伤寒。”得伤寒后，肠胃受损严重，饮食必须十分小心。我那时没有这经验，病刚好，就大吃东西，病又反复了。周三又设法从外面请来了一位医生，姓孟名石仙，医道在淮阴就算好的了。孟石仙替我诊治，打了几针，病又好转了。从此，我和孟石仙又交上了朋友。

孙二渐渐被我争取过来。他与总笼头有很多矛盾。孙二向我这边一靠，他的那批人也就倒向我这边来了。三个政治犯，我经常

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谢冰岩表现很好，沈、金二人意志低沉，没有多大希望。

反对剥削和虐待犯人，是得到群众拥护的。有一次，笼头大敲犯人竹杠，体罚十分残酷，我们轰了起来！

“都是难友，不能那样毒打！”“这样欺侮人，太不够江湖义气！”一片怒喊声，笼头吓得躲了起来。

全部看守下来威胁说：“如果闹事，就关号子！”

这一吓，群众为了切身利益，软下来了。

又一次，我们提出：“‘铺监费’不能要得太多。”结果也没有成功。

以后陆续搞了几次小规模斗争，碰了好几个钉子。因为笼头、看守、典狱官、承审员等的利害关系牵连在一起，势力不小，而我们没有坚强的组织领导，又没有外援，力量太薄弱。

闹了几次，监狱当局很头痛，认为我是一个危险人物，想把我压倒。于是，由典狱官出面，向县政府控告，指控我在监狱内宣传赤化，要搞暴动！

承审员开庭，把我弄到法庭上去审讯，企图给我加刑。

“管兰亭，你在牢里为什么要宣传赤化，搞暴动？你知罪吗？”

我坚决反驳：“这是诬陷！他们敲我竹杠，我不让，就诬害我。诬告的要反坐的！”

“有人控告你，你还狡赖！”

“告我宣传赤化，搞暴动，有什么证据？我说他们敲榨、诬陷，是有一大把证据的！哪个告我，你叫他来，我跟他当面对质！我是请了律师的，请把我的律师叫来，有证据我认罪，无证据请办诬告罪。”

承审员一看苗头不对，只好改了口气，说：“你回去，不要再闹了，再闹是要加刑的！”

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听说，事后承审员责备典狱官说：“你们怎么搞的？这种政治犯厉害得很。你们不要惹他，优待一点。事情闹大了，又是律师，又是报馆，事情很不好办的。”

过了一些时候，这个典狱官就被撤换了。新来的典狱官姓王，河北人，大高个子。此人对革命虽然谈不上有什么认识，但对当时社会的腐败却是有一定的感慨的。因此，他对我们这些政治犯的态度，比他的前任或后任来说，是要比较开明一点。他命人给我开了镣，并把我们移到面房里去住。两个笼头和我们住在一起，实际上是使其监视我们的行动。这也是他们从前次庭讯中得出的管理上的教训。

我与谢冰岩商量，监狱的斗争各处均有其特点，淮阴的情况要搞象苏州高等法院监狱那样有组织的大规模斗争，不具备条件，因而改变办法，要开展看守的工作。那时，正式看守只有三人，一个叫张志祥，一个叫陈庆，还有一个姓沈的。前两个都是“老衙门”，四、五十岁年纪，做了二、三十年看守了，对犯人的心理很熟悉。张志祥为人虽有点滑头，但经过争取工作，已经同情我们。每天下班后，他都到我们那里聊天。狱方内部有些事情，县政府的人与典狱官之间有些秘密，他都偷偷地告诉我们。小马是伙计，二十四、五岁，苏州人，大概是犯了什么罪，逃到苏北来的，为人比较纯洁，经过争取教育，做了我们的秘密情报员。

和面房的门，晚上不关，可以随意进出，相对说来自由多了。我的床背后，隔墙就是老百姓的家。有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盘算：那是什么人家？可不可以想想办法从这里溜走？这必须请外面党组织进行秘密打听，不能有丝毫的疏忽。但是，在镇江越狱失败后，省委决定将我们的党籍保留在省委，关照我们不要与外面党组织发生联系的。因之，我犹豫不决，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最后还是违反党的决定，与谢冰岩商量，请他父亲设法去找党。谢冰岩入狱



后，仍保持一些党的线索，说不定能接上联系。

一个多月后，谢冰岩的父亲找到了党，把我们在狱中的情况告诉了党，要求他们派人来看我们一次。

当时中共淮盐特委的负责人是赵心泉、陈亚昌、沈亚平、万金培等。赵心泉为特委书记兼淮阴县委书记。有一天，淮盐特委派一个名叫沈肇华的人来与我们联系。他出了几块钱，就直接到里面来了，没有看守监视。谢冰岩告诉我说，他认识此人，是特委委员，负责秘书工作。

我开始问他外面的情况。

他说：“我们与省委失去关系已半年多了。”

我说：“为什么你们不能在乡间或洪泽湖内打游击？土匪尚能成群结队在乡间活动，我们不比土匪高明得多吗？”

沈肇华说：“你的意见，我带回去向特委汇报。”

我问他们的经济情况，他说困难得很。

经过详细询问，我发觉淮阴的党组织软弱无力，他们的思想不少还保留在陈独秀时代的水平上，不能向他透露任何秘密真情，而且很懊悔与他们接上的关系。万一他们叛变了，就会招致很大的麻烦。

果然不出所料，时隔不久，淮盐特委被破坏了。不少人叛变，当了特务。赵心泉也被捕了，关押在西监。我们经常看到他，但不敢去和他接近。从那以后，我们与外面的党组织才断了关系，但仍有一些人冒充党的同志来看我们，其实都是叛徒、特务，想用党的牌子来拉我们下水。我们都拒绝了，有时干脆不见他们。

我料想他们不会对我死心，叛徒、特务川流不息地进入牢内窜来窜去，严密监视我们的行动，想方设法找我们的空子。

最后，反动派就搬出了一个叛徒、大特务徐锡根来。徐锡根其人，我认识的。他曾经当过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上总和全

总的党团负责人。一九二九年，江苏省二次党代会后，他仍是省委常委，抓工运工作。一九三二年底，我在狱中看到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报上刊登了徐锡根向国民党政府自首的消息。还有他写的“劝告共产党员”投降的文章。由于文章中披露了不少有关党内斗争的情况，我相信这不是敌人伪造的。

有一天，看守张志祥向我透露：“省里有位要员来了，是专程来看你的。”

我问他是谁。他告诉我是省特务室主任，姓徐。上头要他们把地方打扫干净。

次日上午九点钟光景，我被喊到接见室门口。我一看，是徐锡根。同时，我发现徐的后面还有一个阴影，没有进来，不知是谁。

我和徐锡根隔着门见面，离他有一丈多远。我透过门上小洞看到他的脸庞。看守张志祥闪在门里，面向着我依在门边听我们谈话，特务看不到他。

徐锡根看到我完全是犯人模样，假惺惺地问我：“祝同同志，你好吗？”

“吃官司，无期徒刑，在这里坐牢。”我说。

他叹了口气。“一别多年，情况变化太大了。我和罗章龙他们都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被捕的。这几年，何孟雄他们都死了。我和王克全几个人保存了下来。”稍停片刻，他接着说：“情况变了，我只好采取另一种方式进行革命。”他胡扯些什么，我内心在想。

我没有答话。

他装作很感慨的样子，压低声音说：“江苏省委早就被破坏，不存在了。我们正在组织新的共产党。希望你能出来，同我们一起干。”

我想，特务总是怀着阴谋诡计，叫头脑简单的人上圈套。我冷冷地说：“我决心不干了，在牢里读点书，等待期满释放。”

“不要消极，只要想办法，一定可以出去的。”

我重复一遍说：“我决心不干政治活动了。”

他露出一副失望的面孔，说：“请你多考虑考虑。有机会再来看你。”回过身走了，好象后面还跟了一批人。

看守张志祥开了门也跟着出去。

我回头把情况告诉谢冰岩，两人大笑一阵。估计特务不会罢休，我们商量，考虑到敌人可能对我加以暗害，只好给家里写信，请张桐律师来一次。

张桐律师来了，问了些情况。他对监狱当局交代说：“我是管兰亭的律师，是受法律委托的，这个人如在监狱出了问题，我是要追根究底的。”他又向高等法院备了案，以防我会有什么不测之祸。

不久，国民党省政府的民政厅长由典狱官陪同，名义上是来视察监狱，实际上是来查看我们是否有闹监等事。

那天，所有号子都锁上门。他到我们所住的地方，叫看守把门打开，要见我和谢冰岩。见面后，他问了问姓名、案情等，就带点惋惜味儿说：“你们蹲在这里也不是长久办法，能出去最好出去。年纪轻轻，不要把青春在这里白白浪费掉。”

我俩不理睬他，只是冷冷地望着他，这个吸血的官僚只好默默地走了。

在此期间，我们从与各种各样的人接触中，了解到监狱头子与国民党县长祁云龙之间矛盾比较深。我和谢冰岩商量后，利用这矛盾，再次进行了反笼头斗争。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监狱头子被撤换，狱中的情况略有改善。

淮阴城范围不大，有点比较新奇的事，人们就争相传言，很容易弄得满城风雨。闹监的事越传越离奇，我竟成了人们谈论中的“新闻人物”。因之，吴觉、张一平等，都来监狱看望我们。

吴觉是我们党的同志，曾在上海私立建设大学读书，后转入大

夏大学。一九三〇年在夏大加入C.Y.，一九三二年九月转党。他曾几次被捕，刚从苏州反省院出来。他的家族是淮阴很有势力的名门大族。其祖父是清朝的武科秀才。父亲吴引湘，原先亦是清朝的秀才，后考入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任教于淮阴的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国学方面造诣颇深，在当地算是个名士了，国民党江苏省省党部里有几个委员均是他的学生。吴觉被捕后，经过他父亲到处活动，才得以释放回家。

张一平是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委员，与吴觉同乡，两人从小就很要好。张为人热情正直，同情并支持我党的革命活动，在各方面都很尊重吴觉的意见。他通过吴觉介绍，跟我相识，经常利用其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的身份与在淮阴的社会地位，到监狱中来探望我和谢冰岩。每次来时都带一些食品之类的东西，以贴补我们在狱中生活之不足。

一九三四年，张一平和吴觉利用淮阴一位名叫卜跃斋的商人的资金与印刷设备，办了一份《大众报》。张一平自任董事长和社长，吴觉名义上是该报副刊的编辑，实际上是真正的总编辑，报社的大事小事都离不开他。这张报纸常常用比较巧妙的手法，来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封建势力的腐朽没落，能接触实际，又尖锐泼辣，很受读者欢迎。他们跟我熟悉后，就约稿，我答应了。一个囚徒为外面的报纸写社论，也是挺有意思的。我撰稿，由他们提供材料，用一个“灵”字作笔名，写了七、八篇社论，锋芒针对当地的官僚士绅、特务、流氓等。这些家伙看了恨之入骨，但不知作者究系何人，无可奈何，只好迁怒于报社，处心积虑地想把这张报纸搞掉。

是年秋，吴觉又一次被捕。我听说他是在《大众报》社里被抓的，案情很重，可能要从严判刑。究竟是什么案子？我不清楚，心里很为吴觉焦急。我向狱方提出要求，仍将政治犯放在我和谢冰岩一起。狱方对我有顾虑，隔了多天，勉强同意了。

吴觉被看守送进来。我看他精神十分疲惫有病，似已被用过刑。

看守一离开，我就问吴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吴觉告诉我：特委蹲在乡下，连报纸也看不到，消息闭塞，活动不便，决定将机关搬回城里，派夏如爱带陈亚昌、万金培进城找他，帮助找房子。房子找好了，想不到万金培住在石码头袁福盛客栈里被特务发现，抓了去。夏如爱、陈亚昌住王营西坝，第二天接到万的信，说是病了，已不能行动。夏、陈进城探听情况，又被特务盯上，好不容易脱身，跑来告诉他。他报社有事，走不开，又想万不会出卖他，犹豫了一下。哪知万供了，在县政府一口咬住吴觉是共产党，还有手枪。县政府那些家伙，为《大众报》的事正对他恨之入骨。万这一供，抓到了把柄。他们马上来抓他，报社也同时给封了。

我问他手枪问题是怎么回事。

他告诉我说：手枪本来就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的，暂时存放在张一平那里。敌人追得很紧，他一口咬定自己不曾有过什么枪，枪是某人的，偶然由于好奇心，曾摸玩了一下，一颗子弹也没有，早已归还给某人了。

我又问他抄到什么证据没有。

他说没有。

“你供了没有？”

“我没有供。我说我才从反省院出来，怎么会又去干共产党呢？”吴觉回答得很肯定。

我和谢冰岩商量，认为只要万金培推翻前供，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就叫吴觉沉住气，不要着急。

黄昏时分，我给了看守两块钱，叫他带我到东监去找万金培。我到东监一看，万金培被笼头看得紧紧的，住在号子的角落头，动

也不敢动。

看守将万喊出来后，就走开了。

我问万：“你什么时候被捕的？”

“有个把月了。”

“开过庭没有？”

“开过了。”

“同时被捕的还有谁？”

万低下头去没有回答。

我郑重地对他说：“你千万千万不能供。一供，你的命就难保了。即使为你自己着想，你要活命的话，也无论如何不能供。”

他点了点头。

我又问：“你牵涉到吴觉了没有？”

他把头低下，没有作声。

我说：“如果你供了吴觉，你自己也就是共产党了，那就危险极了。下次开庭，你坚决把前供推翻掉，说前供是被严刑逼出来的。”

万听了这话，眼泪涔涔的，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说：“我照你说的办。”

我与万不相识，也不很了解，别的话不便多讲，就离开了。

我回西监对吴觉说：“你只要不招供，就不会有多大问题。”

这样，吴觉就死不承认，万金培的原供也翻掉了。

吴觉的父亲来见我，老人为儿子的事愁煞。我安慰他说，你再在外面托人想想办法，看来问题不大。几天后，吴觉就被押解去镇江，交李明扬保安处的军法处。听说后来判了两年六个月徒刑。

## 6. 暗无天日的黑牢生活

由于我们不断反笼头，闹监闹了好几次，狱中黑暗不断向外界泄露，反动政府对典狱官无能很不满，陆续撤换了好几次。敌人于是采取新的办法，决定把我们这两个不易控制的政治犯送走。他们向江苏省高等法院请求，将我们送往南京模范监狱严加管教，当然高等法院立即批准。

这次行动，敌人非常秘密，他们故意把我和谢冰岩分开押解。

解走前一天狱方才通知我解往南京，我估计凶多吉少，立即写信给家里，叫父亲带一笔钱在镇江等我。我用钱买通解差，让我在那里与父亲见面。在那种社会里，有钱能使鬼推磨，临离淮阴之前，我花了二十几块银元，先到开茶馆的周三家里，谢谢他在狱中的照顾，又到孟石仙医师家里吃了顿饭，还到谢冰岩家里去，向他母亲辞行，谢谢他一家。

一九三五年冬天，又是一个阴霾弥天、寒风凛冽的日子，我终于离开了淮阴古城。我将要去的地方，定会有一场更加艰苦的斗争。

清早，县政府的两名解差带我登上了淮阴到镇江的轮船。由于事先已花钱收买了那两个解差，因此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乍看起来如同平常人出远门一般。但他们的警觉性很高，紧紧跟随着我行动，以防发生逃跑或投河等麻烦事情。

我们进了预定的船舱。此舱共四个铺位，有一个空着。我们坐定不久，就进来一个带黑眼镜的人。他清清铺位，就在我对面坐下，不跟我们搭腔，只是听我和解差闲谈。

我到外舱看看，解差当然与我寸步不离，那戴墨镜的家伙也远远地盯着我们。

我想，这是个秘密特务！莫非想找机会对我下毒手？我须作好防范准备，少出船舱为好。

我找机会对解差说：“做人，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人，最可怜的是做人家的狗！”

解差脸一板，说“你太无礼了！讲话一点不顾人面子。”

我知道解差误解了我所说的意思，以为我是骂他们两人了，就笑笑说：“我不是说你们的，别误会。”我朝那戴墨镜的家伙斜乜了一眼，解差才明白我的含意。他俩发现有特务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心里也不大满意。

轮船行了一天一夜，次日上午才靠镇江码头。

我们按照预先跟我父亲通信中约好的滨江旅馆住下。我父亲已提前赶到，在旅馆里等着了。我父亲吩咐茶房叫了些点心来，殷勤地招待了两个解差。那个戴墨镜的家伙又紧跟着到了，他踱到账房柜台前，看了看旅馆登记牌，要了一间跟我们靠近的房间。

我花钱买通解差，请他们同意在镇江停留一天，让我们父子叙叙家常。我和父亲就关起门来在房间里密谈。父亲讲到几年来家道日渐衰落，有无限感慨。国事方面，主要是议论国民党出卖东北三省等情况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的暴行等情况，我听了愤怒极了。父亲对我说：这样下去，国家势必要大乱，你耐心地等待着，千万不要再闹监，国民党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的。我也说了些淮阴监狱中的事情，讲到那里的黑暗腐败，老人连连叹息。我为了不使老人再为我提心吊胆，答应到南京耐心等待时局的变化。我觉得父亲对时局的预计，是有远见的。内乱外患，连年不断，国家怎能不变！

中午，我们又招呼茶房到馆子里叫了些酒菜来，请两个解差美美地吃了一顿。吃饭时，我父亲对两个解差说：“晚上请你们去看影戏。”解差相互望了望，慢慢地点点头。看样子，他们既怕带犯人



去看电影，要担些风险，有点为难的样子，但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电影，很想去看看新鲜。那时，镇江是省城，刚刚有电影，淮阴还没有，两个解差听说要请他俩看电影，内心还是很高兴的。他们商量了一下，说：“管老先生既然破费，我们就不客气了。但要请大公子多加小心，被人看出来是不大好的。”我知道他们怕我暴露了，对他们不利，就说：“我决不会叫你们为难。”

当晚，我把衣服换了，又戴上一副墨镜，棉袄裹得紧紧的。我注意周围的人，以防从淮阴跟来的那个特务搞什么鬼名堂，但此人在我们吃饭时起就没有看到，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就一起去看了电影。那影片是无声的，我觉得索然无味，两个解差却感到非常新鲜。

回到旅馆，我和父亲约好：到南京后我就给家里写信。如果三个月接不到我的信，你就请张桐律师到南京来找我，以防敌人对我暗害。

我父亲点头答应，并再三叮嘱我凡事都要小心些。

来日清早，父亲买了许多吃的东西，送我上火车。

我到南京后，不知关到哪个监狱，谁也不给透露，解差也不肯说，这显然是他们的上司有人特意交待了的。

车到南京，我们从下关雇了一辆马车进城，不知经过哪些地方。南京虽到过，但并不熟悉，沿路荒凉得很。到了监狱，解差交了差就走了。那里监狱的看守仔细搜查了我的行李铺盖，将我所带的书籍笔记全部没收，其中最可惜的是我花了不少心血写下的一本《易经》注释和研究的手稿，竟被他们一下子糟蹋掉了。

搜查以后，我被带到监狱尽头处，关在角角落落的一间非常狭小的屋子里。屋里黑洞洞的，即使大白天也是光线极为微弱。看守叫我在这里住下，他把门“砰”的一声关上，“卡嚓”一声把门锁上，急急匆匆地走了。

“敌人是用一种卑鄙的手段对付我了。”我心里这样想。

我一个人被关在与世隔绝的黑牢里，只听到看守在外头走来走去脚步声。每天两次，看守在牢门上敲两下，喊一声“开饭了”。我从门框小洞里接过瓦钵子，大约老秤三两饭的样子。饭里砂子很多，咸菜汤里还有蛆。

我的铺盖是经过严密搜查后，才送进来的，书啦、笔啦……，连我身上的裤带也被搜去了。

长期吃官司的人，棉袄里经常塞有十块、八块钱，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肯动用的。然而，我被关到这样一个鬼地方，有钱又有什么用处呢？看守是不准跟我讲话的，他们在弄堂里走来走去，你喊他，他连睬也不睬。我想给家里写信，看守说上面命令不准通信，也不准接见。我想，他们是有计划地悄悄地把折磨死，对外就可说病死在狱中。我必须很快设法把情况告诉家里。

关在黑牢中，任何人都不准和我靠近，脑里无数往事都一齐涌上心来。“四·一二”事变，多少同志倒在血泊中！一些怕死的、怕吃苦头的逃走了。可怜的墙上小草们，还想在国共之间摆来摆去。白色恐怖一到，这些人都倒向敌人。有的跪在敌人脚下，成为可耻的叛徒。如今，我已到了将踏着先烈的血迹，在这里倒下去的时候了！为革命而死，死而无憾。但是，一个共产党员决不能默默地等死，我得去找门道，去向恶魔斗争！生，当为人民解放而生；死，亦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死！

时间流逝。在这漫无边际的黑暗和孤寂中，愤怒是无济于事，空想也是无用的，总得想出个点子来打破这黑暗中的沉寂。想来想去我希望能弄到一部《王文成公全书》看看，其中有记述王阳明反对宦官刘瑾，而被流徙到贵州的龙场去的事迹。我想了解他是怎样度过那些非人岁月的。

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打通与外面的联系。我想只有从看

守和一个倒便桶的犯人身上打主意。如果能疏通其中的一个，就有希望了。揣度看守一边，难度非常大，因为上面规定他不准和我说话。那个被指定来倒便桶的犯人，可能容易些。不过，他每次来时，总有看守立在门口监视着，不大好办。

我只好耐着性子窥伺着，等待时机。

一次，倒便桶的犯人来了，看守开了牢门，因事走开几步，有一个小空子，我连忙拉了他一把，轻声说：“你能不能为我向外通通消息，说这里关着一个政治犯。”

他看我一眼，默默地点了下头，端了马桶就出门去了。

事后，我才知道，这监狱里关着不少政治犯，大多在一个监狱附设的工场里做工。那个倒马桶犯人找到一个政治犯告诉说：“那角落头秘密关着一个人，几个月了，看样子可能是一个共产党头头。”

狱中的同志都是非常热诚地关心着自己的战友的。监狱里有我们党的秘密组织，已与外面党组织失去联系，同志间是单线关系。他们立即找一个与他们有关系的看守去打听情况。那个看守只打听到我是江北解过来的，不准通信，不准接见，不准买东西，也不准跟他们接近。

监狱中的同志感到问题严重，找那看守商量，请他最好能把我的姓名查清楚，能同外面联系上。

隔了一天，那倒马桶的犯人来了，走时轻轻地踩我一脚。

我低头一看，地上丢着一个蚕豆大的小纸团。等人走远后，我拾起来展开一看，上面写着：“你叫什么名字？”几个字。

我没有纸笔，俟他下次来倒便桶时，我触他一下：“请给我一个墨头子。”

他没有回答，再来时丢下一个墨头。

“再拿点纸来。”

他再一次来时又悄悄带来香烟壳子那么大的一张纸，卷得很小很小丢下了。

我的牢房里，只有一张铺，一只便桶。放马桶的坑边有一小块砖头。我把它拣起来，磨了磨，权当砚台。开饭时，留下一点汤，倒在砖头上，用墨头磨磨。又从睡的芦席上取下火柴棒大小一根小梗子，写了几个字：“管兰亭。律师张桐，无锡。”虽说只几个字，竟写了近半个钟头。

后来，倒便桶的犯人把这张纸条偷偷带了出去。工场同志请前看守到外面去代我写了封信，告诉张桐律师，说管兰亭关在南京模范监狱，不准接见，请速设法营救。他们不知道张桐律师的详细地址，信封上就只写无锡二字。张桐乃无锡有名的大律师，知道的人很多，那封信终究收到了。

这时我在黑牢里已关了几个月了，身体越来越虚弱，主要是缺乏营养，又不能活动，见不到阳光，生命仅靠自身的老本在维持。我命令自己一定要活下去，精神不能垮！

我请倒便桶的犯人托人代买一本《王阳明全集》，一本一本悄悄秘密地分开带给我。有时一本书，他带在身边几天，都没有机会交给我。经过不少时日，四本书全带进来了。

小开本的书，我凭借牢门上那四、五寸见方的小洞透进来的一线光亮，躲开看守，每天看一点。还用那小段墨头子，在砖头上磨磨，用小芦梗蘸点墨汁在书上圈圈点点，终于看完了。

我蹲黑牢已过半年，营养严重不足，空气污浊，又长期不见阳光，视力急骤恶化，腿上的肌肉也萎缩了，足背浮肿得很厉害。如此下去，最多再三、四个月，非死不可哩，敌人就是这样耍阴谋企图将我折磨死掉，但是，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七月，有一天，看守进来突然通知我出去接见，我知道带出去的信，已经生效，心里一阵喜悦。

牢门一开，我走到门口，两腿软弱无力，一下子倒下了。

看守拉我起来。强烈的光线，我一看就天旋地转，怎样也站立不住。

看守又把我扶起来，歇了歇，让我扶摸着墙壁慢慢朝前挪。好不容易挪出一小段路，还是坚持不住。看守就叫两个别的犯人来，架着我走，一直到了看守的值班房。

我抬头一看，来的果然是张桐律师。

张桐看见我如此模样，便问：“管先生，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我坐下来，讲了讲七个多月蹲黑牢的情况。

“简直是暗无天日！这儿还有法律没有？”张桐很生气，当着监狱当局的面说。

典狱长连忙解释：“张先生，这不是我们的事，是省党部和特务室关照的，说他一再闹监，要打消他的气焰……”

监狱当局最怕犯人与外界联系，尤其怕报界和律师公开揭露他们非人地虐待犯人等情况。反动派杀人如麻，却还总要弄上一块遮羞布。如此的监狱还加以“模范”的“美名”，要是把其真实内情披露出去，舆论的压力，他们吃不消。上头那些官僚恼羞成怒，或为了平息舆论，监狱当局更难免成为替罪羊。因此，连连向张桐律师解释，希望原谅一点！

“什么话！国家有法律在，判了刑，关归关，怎么能如此虐待！”张桐律师更气愤了。

第二天，罐头、肉、饼干都送进来了。医生也请来了。

我对医生说：“我不需要什么药，我需要阳光和新鲜空气。”

这次交涉，产生了大效果。

狱方将我调到一个七、八人的大号子。

七、八月份天气炎热，饕蚊成阵。我买了一把芭蕉扇，在扇子上题了两句诗：

我怒狂风起，  
笑汝化作灰！

反动派的种种非人迫害，我是永远不会忘却的。

父亲找我找了许多地方，始终找不到，还是张律师通知他的，张桐是互济会的成员之一。

典狱官代省党部和特务室受过，被法院申斥并给予记过处分。

我在大号子里又关了十来天。看守长常来讨好，还说一些特务室如何可恶，国民党如何腐败之类的话。我心里暗暗冷笑。

我对看守长说：“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弄到工场去做做工，活动活动，关久了，身体已经很弱，做做工，要好一些。”

看守长说：“好的，好的。等批准了，就告诉你。”

我很快被送到工场去了。

一到那里，我会到了谢冰岩。我说：“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谢冰岩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我以为你被他们弄死了！”

我们两人的重逢，真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他把工场的情况，详细告诉我。

这是一个监狱印刷厂，共有七、八十人，大部分是政治犯，比较自由。只有一个看守坐在那里，做做接收和统计等工作。犯人每天劳动所得是两个铜板。大部分同志不愿意作非法斗争。因为只要你一闹监，监狱当局立即送你进内监，活动就很不自由了，这又是一种情况。我想，在那种情况下，公开斗争是不适宜的，同志们应该抓紧时间学习。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我准备串连少数同志，有计划有系统地学习一些东西。只要不触犯看守的利益，这桩事情估计是可以做的。可惜我在工场不久，又被调走了。

事情是这样的。张桐律师回去以后，与我父亲商量，觉得我关

在南京模范监狱是危险的，主要是特务决不会放过我，虽然眼前碍于表面上的所谓“法律的尊严”，不好直接动手，但是这伙豺狼会用种种卑劣的手段，种种阴谋诡计，进行暗算，这是防不胜防的。不如再花点钱，把我调进反省院。

我父亲问他如何进行。

他说：“这事由我去活动，你准备一笔经费。”

我父亲就按照他的意见办了。

一九三二年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寇进攻上海。驻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的领导下，奋起抵抗。上海的工人、学生、市民，在我党的领导下，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全国人民也纷纷声援。同时，强烈要求释放政治犯，举国上下一致抗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应付社会舆论，由内政部长薛笃弼出面，宣布给政治犯一律减刑三分之一。我当年判决二十年徒刑，应减刑七年，剩下十三年刑期。可是，我的刑期并没有减。张桐律师到高等法院查了我的案卷，立即代拟文书申请减刑。法院只好依法减刑为十三年。按照反省院条例，政治犯服刑三分之一以上，法院应责令监狱当局将犯人送反省院。当时，我已被关押六年以上，尚未移送反省院。法院和监狱当局均已违反规定。张桐律师向法院提出这个申诉，理由充足。监狱当局得悉此情况，就匆匆忙忙把我移送苏州反省院去。

张桐律师这一合法斗争是正确的。为了防止不测，他出主意把我从模范监狱弄到反省院去很对，如果不这样做，有可能被敌人暗中搞死，对党对我都很不利。

这样，我就离开了南京那座残害政治犯的“模范”监狱。

## 7. 苏州反省院真相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我被解送去苏州。

我出了南京“模范监狱”，一路上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心情轻松了一些，但新的斗争又将开始。

我初步盘算了已走过的历程，回顾一下六年多来狱中斗争的经验，觉得狱中斗争要取得胜利，一定要有党的领导和外面的有力援助，苏州监狱的绝食斗争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主要是有监狱内外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并通过互济会、律师、记者等等给予有力的声援。我从黑牢中获释，也是由于狱中有地下党组织，通过他们才找来张桐律师。此外，我觉得我们在狱中主要的任务是学习，应该利用多种办法多弄到点书，认真学习，我和谢冰岩在淮阴监狱中，读了一些书（但读得还太少），确实受益非浅。当然，这并不是要放弃必要的斗争，有些斗争还是不能不进行的。以上的想法，是从我长期艰苦的生活实践中吸取的教训。

那表面上同情我党的看守长一人送我去苏州反省院。路上，他一再对我说：“估计你很快就将恢复自由。因为，时局非常紧张，全国民众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呼声很高。国民党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好前途的。”

我对此人的政治情况和思想情况摸不到底，不知他说的话出自真心还是假意，也不便对他说什么，点点头而已。

在开往苏州的火车上，我买了几份国民党的报纸，押送我的那个看守长也未说什么闲话。在报刊上，登载了北（平）宁（辽宁）路日军向驻守丰台的二十九军挑衅，驻军立即还击，以及北平学生和市民前往慰劳等消息，觉得时局确实非常紧张。那时，国民党对新闻检查尽管很严，但报上的字里行间却还是透露了上月下旬我党



中央致书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要求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三民主义，国共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等主张。我看了，心里甚为兴奋。但从整个报纸来看，连篇累牍的仍是为蒋介石卖国政策鼓吹捧场的文章，看了又感到很气愤。

我看看报纸，又想想各种问题，不知不觉中火车已到达苏州站。进江苏反省院的第一天，我单独一个人住一个号子。次日起身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看看这里有没有熟人，想从熟人那里知道一些反省院的情况。开封了，我见到了吴觉、彭康、李初梨、柯仲平等，还有一批土地革命时期常州、无锡等地的基层同志。见到这么多熟人，真是又惊又喜。

我在这里又见到吴觉，真高兴极了。他那号子里有两张床，其中一张空着，他暗示我要求搬到他那里去住。

我向看守提出了这个要求，看守不了解我与吴觉的关系，就同意了。

从此，我与吴觉朝夕相处，在一起度过了七、八个月的时光，没有分离过。只要号子门一封，两人就毫无忌惮地骂娘，“乌龟”、“王八”什么都骂，无拘无束，无话不谈。

我知道反省院是国民党搞的所谓“感化”机关，是企图解除我们思想武装的地方。然而，国民党的监狱我虽蹲过不少，这样的地方却还是第一次。吴觉是第二次了。

反省院里的情况，吴觉熟悉得很。上至院长、思想考核主任，下至一般看守、勤杂人员，他都知晓其底细。

反省院当局知道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宣传部长、F. F. 的要人周化鹏等均是吴觉父亲的学生，而且亲自写信来打过招呼，因此也不敢怎样得罪吴觉。

他将反省院里的情况，详细向我作了介绍。

反省院建制归高等法院，但所收容的政治犯却不限于江苏省范围内的，有些外省市的也移送来此。

政治犯进了反省院，即成了所谓“反省人”，这是反动派强加给我们的名称。院方将“反省人”按文化程度的高低编组。整个反省院内当时有政治犯二百多人，共分四个组，即甲组、乙组、丙组，外加一个研究组。研究组的成员均系大学教授、著名作家一类的很有影响的人物，彭康、李初梨、柯仲平、刘仁静等，都在其中，人数不多。甲组是高中以上程度的，其中有不少是大学生，有一定地位的国民党公务人员也编入其中。吴觉就被编入甲组。乙组是中学程度的。丙组是小学程度和不识字的。四个组人数多少不一。研究组只有十个人左右。甲组有三、四十人。乙组和丙组都有好几十人。

这些政治犯中情况也比较复杂。有我党的高级干部，有我党的一般党员和赤色群众，也有少数叛徒、特务或其他人员混杂在里面。

政治犯往往仍用化名。曹荻秋当时化名张云卿，装成不识字的样子，先被分配在丙组；后来院方发现他文化水平不低，调到乙组；又发现他懂英文，再调到甲组。

反省院内向“反省人”灌输的内容，主要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陈立夫的《唯生论》。陈立夫以“唯生论”的发明者自居，大肆宣扬他的所谓“哲学体系”，标榜自己既反对唯物论，又反对唯心论，胡说什么“唯生论”贯串了中国哲学史的始终。这在我们学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看来，感到十分可笑。他那些东拼西凑、牵强附会的说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唯心论的变种而已，是赤裸裸地为国民党的反动政治服务的。

反省院里的四个组，每个组相当于一个班级。采取教员讲授，“反省人”记笔记的方式学习。教员人数不多，有时从外面请进人

来讲演。每组有一个主任。甲组的主任姓熊，因他上嘴唇厚而豁，象兔子嘴，一般政治犯背后都叫他雅号“熊豁子”。由于教员讲课时，大多数政治犯根本不听，常常交头接耳，嘻笑讥讽，讲堂里的秩序混乱，有时还故意提出些难题责难教员，弄得教员张口结舌，十分狼狈。因此，院方决定改用研究组的办法，采取将甲、乙组分成分若干小组，少者四、五人，多者十来人，命政治犯依照他们所发的《三民主义》学习讨论提纲，每小组分担提纲中的一部分，进行研究讨论，指定几个人担承学习小组长，讨论后由组长汇报并写成文字材料上交。政治犯大多数人还是不睬院方那一套，小组讨论时根本不谈什么学习“心得”、“体会”，天南海北地瞎扯，事后由小组长抄几句书上的话，向上搪塞完事。

反省院当局还办了个《反省半月刊》。刊物上登载的文章一般都很短，数量亦不多。每期四、五篇，内容都是些所谓学习《三民主义》的假“心得”，以及“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陈词烂调。此刊物由反省院思想考核主任朱少清和熊豁子等各组主任组成编委会。撰稿人有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国民党党棍、反省院的头子和教员等，同时，院方也以威胁利诱等办法，命作为“反省人”的政治犯写稿，或干脆将各小组长为了搪塞应付而瞎抄瞎编的学习“心得”登上去。编委会对政治犯的稿件，常常按照他们反动的政治需要，擅自篡改和添加内容，并不给本人看过就任意登上去。因之，大多数同志均不愿主动写稿。

政治犯不肯写稿，敌人便千方百计逼迫你写。如果写骂娘的文章，要倒霉；写敷衍的文章，他们不感兴趣；只有写那些拍马肉麻的文章，才能得到反动当局的欢迎。院方规定“反省人”每天都要交“学习心得”笔记。你若不写，他就不停地找你麻烦。一般政治犯只好每天抄几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上的有关词句，抄好后再加上两三句自己的假话，应付应付压力了事。所以群众说“三民主

义,饱饱肚皮”,抄上几句,才有白米饭吃。这样一来,不少人常常上当,文章被敌人乱改乱加,造成不良影响。

“反省人”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愿意悔过的,准备出去后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下面找点事做做,这是极少数,实际上等于投降;第二种是消极颓丧的,悲观失望的情绪很浓重,整天唉声叹气,准备出去后不再搞政治活动,在社会上找点其他事情做做,混混日子,这种人不少;第三种人是坚持革命信念的,意志坚定,准备一出去就再干革命,这也是少数。这三种人对反省院里的现实,表现也不一样。第一种人对国民党反动派阿谀奉承;第二种人对什么也不感兴趣;第三种人思想上与敌人对抗,表面上不露声色,以比较巧妙的方式和敌人斗争。

反省院的行政组织:最高是院长,中层是思想考核主任、教育长、总务长,最下面是教员、训育员(包括各组主任),最往下是看守和勤杂人员。

我很注意这些人中间有没有掺进特务。

吴觉说,这些人中间很可能有特务,“反省人”中间也可能有特务,要我当心。

我跟彭康等同志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因院方很注意政治犯相互窜号子,我跟他们交往不多。有时去聊聊,也大多是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吴觉提醒我说:反省院里表面上很松,象个学校,实际上很紧。如果三、五人彼此了解,思想一致,经常交往,就会被视为“精神组织”,会有人向上密报的。到了这里,不肯反省,有所抗拒的话,他们马上会把你送回监狱,严加看管。研究组有位大学教授,不肯学习,公开骂娘,就被重新关进监狱去了。

我在镇江县公安局看守所时曾接触过的季氏两兄弟中的季恺,也在苏州反省院里。他安分守己,奉公守法,树叶子落下来都

怕打破头。他哥哥季藩已出钱买出去了。此人后来表现非常英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又把他抓了起来。他在如皋的法庭上，义正辞严，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他虽然没有在组织上参加中国共产党，却真有点革命者的大无畏气概！

“反省人”在院，都由反省院当局编号。我身上背的是“51”号，被编入甲组。思想考核主任朱少清，甲组主任熊豁子一起找我谈了话。谈话内容一共三条：一、到这里要守这里的规矩，不准捣乱；二、你是共产党，在这里不准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东西；三、要好好学习，反省。这次谈话总共不到两分钟时间。

我第一次参加听课，是由熊豁子主讲的。他戴副眼镜，上唇豁了个大口子，讲起话来直漏气，听不清楚。我打听了他的情况，此人系中央大学毕业，学哲学的，国民党员。

反省院里还有个“反省人”自治会。按其章程上说，是“反省人”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实际上是上头有命令或经上头认可的事情，自治会才能办，叫开会就开会，叫讲演就讲演，“反省人”是没有自主权的。自治会的委员会，原先两三个月改选一次。我进去时一届委员会结束了，也没有改选。他们马马虎虎，就让它空着，许多人都不愿意做这方面的事情。

我到反省院个把月以后，朱少清找我去谈话。

他说：“你要写点文章。不写点文章，将来不能出去！写了文章，我们才能考察，知道一个人转变得好不好。”

我没有作声。回到号子里，把这事告诉了吴觉，他说不要理他，如催促到不能再拖时，就抄《三民主义》的文章应付他一下。

过了几天，他又催，我还是拖！

两三个月后，我被逼得没办法，就写了一篇类似短篇小说的东西，题曰：《创疤》。

这篇文章是以我一九三一年春天在镇江蹲牢时所遇的一件真

实事情为题材写成的。那时同押的一位同志，江阴人。我们从苏州被解到镇江去时，正值红一方面军继三军团后再次攻打长沙后不久。那时方志敏在赣东北也正搞得轰轰烈烈。蒋介石连忙纠集十万兵力，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军事“围剿”。结果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连他的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也被红军活捉了。蒋介石气急败坏，拚命在后方报复泄恨，到处屠杀革命者。我们被解到镇江交军法会审处审判的人，全都认为必死无疑，没有哪个想到能侥幸活着出去。那位同志就给家里写了封绝命书，叫他父亲到镇江北固山乱坟堆里去找他的尸体。他家里接到此信，一家人嚎啕大哭。他父亲带了人赶到镇江，在北固山下乱坟堆里找来找去，从早到晚找了整整一天，没有找到写有他儿子名字的木牌，只好在一个无牌的新坟前烧了纸钱，祭奠一番，大哭一场。回头想想，有点不对头，第二天再去找，还是没有找到。老人家心里不踏实，找到关押我们的城隍庙里，花了几块钱，看守让他进来看看。他见到儿子正在那里和我们打扑克，真是又气恼又高兴，责备儿子说：“你怎么这样给家里写信的？你母亲还在家里哭得死去活来呐，你真是好糊涂嘎！”。我用这个故事隐晦曲折地反映国民党反动派所制造的白色恐怖。审稿的人没有看出文章的真意，在刊物上发表了。

过了多天，熊豁子通知我说：朱主任叫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我进了朱少清的办公室，见他正气乎乎地拿着一支毛笔，蘸上红墨水，在新出的半月刊上乱划乱涂。

他见我来到，就将那本半月刊往我面前一甩，脸孔铁青地说：“你自己看看！都写了些什么！”

我以沉默相对。

“你这样胡乱敷衍我们，你管兰亭还想不想出去？老实对你说，你这一套是蒙骗不过我的！你回去重写！”

“重写！”写什么呢？还是拖，拖到实在没有办法再拖了，我到

阅览室里找了一篇谈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失败的文章，照抄了一遍，换了个题目：《土耳其的过去和现在》，交上去，聊以搪塞。

当时，我还自认为这是一种和敌人斗争的好方法。其实那篇文章的立场和观点是有问题的。由于写的是外国的事情，思想又比较隐晦曲折，我没有觉察其中错误的实质。文章交上去后，哪知敌编委会的人又别有用心地把文章偷偷篡改了，加上了“共产主义不适合土耳其，同样不适合中国”等几句话，并很快将它发表了出来。

我看了那一期半月刊，心里很恼火，觉得自己上当了，去找彭康。

彭康听我诉说写那篇文章的经过，又仔细看了看那篇文章，对我说：“没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声明一下，说文章的内容被改掉了。”

我照彭康的意见，找半月刊编委会的人，但他们对我的抗议和声明置之不理。

接着，《反省半月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三民主义的实施报告》，署了五个人的名字，都是我们这一学习小组的，我和吴觉的名字也列在其中。我们去问编委会，声明这文章不是我们写的，他说：“是你们学习讨论时的发言记录！”原来是这么回事！其实，那篇讨论记录只是说三民主义好，没有涉及其他问题，敌人竟利用我们的“讨论记录”作宣传，内容什么也没有，这些党棍子既愚蠢又卑鄙！可恶可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拘捕了蒋介石和他的随行人员十数人，并电请我党代表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这犹如一颗突然爆发的重磅炸弹，引起了全国很强烈的反响。

“捉得好！捉得好！”

“十年来，他不知杀了我们多少同志，这笔血债一定要清算！”

“不杀蒋介石，不足以平民愤！”

反省院里轰隆隆地炸开了！我们的心情都十分激动，只有个别人保持沉默，不发表意见。

斗争的锋芒，很快转向反省院当局。大家一致要求抗日，释放政治犯。

反省院院长刘云，以及朱少清等一伙人，灰溜溜的，整天哭丧着脸，夹着尾巴，不大敢公开露面。门口加强了警卫部队。

在那几天里，我们高谈阔论，吵吵嚷嚷，兴奋极了。

我和吴觉在屋子里，彼此拿国民党开玩笑，挖苦国民党和其豢养的那些狗。

一天凌晨，反省院外面突然响起了爆竹声，大家都莫名其妙。看守长下来传话，说“蒋委员长已回到南京”，“张学良已被捕，交军事法庭审讯”，你们要安心学习，不准再吵！

一盆凉水向我们头上泼下来！同志们沉默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每个同志心里都忐忑不安，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不了解外面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也没有听到党中央关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许多人对这件大事感到大惑不解，思想上转不过弯来。

蒋介石这样的独夫民贼，已经抓到手了，为什么还要放掉他？

这问题在思想上翻腾，得不到解决，一时令人大失所望。过了一些时候，才听说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代表党中央去西安与蒋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重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等消息。大家冷静下来，认真思考，认为党中央这一英明决策可能成为时局的转折点，十年内战也可能结束，从此抗日战争要开始了。我们几个老同志互相这样谈论着，思想上又振奋起来。

过了一些日子，外头又传来好消息，二月十五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工农三大政策。”二十一日，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了



一个实际上接受我党停止内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主张的决议案。听说我党中央的要求中，有“保障自由，释放政治犯”这一条。蒋介石已经被迫答应了这一要求！

我们在院里面又大哄起来，纷纷吵着要求院方早日释放我们出去。我们通过秘密串通，各人都向院方打报告，院方却始终不肯答应。同志们耐不住了，要求向刘云质问。

“什么时候放我们出去？”

“放，总是要放的。我们已向省党部请示了。大家不要急，请你们等几天。”刘云敷衍我们。

“蒋介石都答应了，还等什么？”

“等命令。我个人不敢作主。”刘云和我们耍滑头。

反动派终归是反动派，一点不松口。看来还需要作艰巨的斗争。但形势对我们有利，估计反动派不敢对我们公开摧残了。

时间跑得飞快。形势的变化，促使反省院当局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欺骗改良的办法。我们住的号子门终日开放了，并决定对我们实行军事训练，说是“为了抗日”。

操场上搭了一个检阅台。每天下午三点钟，刘云等七、八个官僚，煞有介事地站在台上，把我们集合起来，编好队，找来一个校级军人指挥我们操练，每天总要搞个把小时，目的是想转移我们要求释放的目标。

有的同志骂娘说：“真打起仗来，你们这些家伙不知逃到哪里去了！”

外面的消息不断传进来，日寇调兵遣将非常紧张，抗战已经迫在眉睫。

有一天，我的老友贡子湘突然来院看望我。他是丹阳延陵人，过去政治上是比较进步的，但不是共产党员。

他对我说：“你母亲叫我来看看你，要你想一切办法，抢在抗战爆

发以前出院，打起来，敌机轰炸，就不好办了。”

我懂得他的意思，他说的母亲就是党。我问他：“我母亲现在什么地方。”

他看了看守一眼，不作答复，只是要我把他来看我的事转告其他兄弟。他匆匆地走了。

我估计他是从南京来的，是来转达党的秘密通知的。

我很着急，几天睡不好觉。为什么我父亲还不来看我？

在反省院的政治犯中，对时局的估计还有分歧。我们同志中绝大多数主张抗战，情绪高涨，国民党改组派为主的少数人，则仍然悲观失望，对抗战没有信心。

反省院院长刘云当时是反共分子，他忧心忡忡，满腹牢骚。他是苏州东山人，国民党党棍，做了院长，生活过得很优裕。他与一些资本家和社会名流过从密切，思想很合拍。他们怕抗战，怕日军来了，搞垮商店，破产。他们怕美妙的生活一旦破灭，悲观失望的情绪很浓。

社会上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青年学生们，到东到西，各处奔走，要求抗战，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

刘云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思想。他看到反省院里也热烈议论抗战，一天到晚哄、哄、哄的，就把我们召集拢来开会。

他讲话的意思是：我们的武装不如人家，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那么多，我们怎能与它抗衡？我们的军队不如人家，日军训练有素，具有武士道精神，我们能战之将不多，军队是杂凑起来的，怎样能与它匹敌？我们的百姓不如人家，浑浑噩噩，只有少数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在瞎嚷嚷，真正抗战的力量在哪里？他从鸦片战争谈起，什么八国联军啦，甲午之战啦，直到今天，说没有人能打得过人家。连沙俄都打不过日本，我们中国能行？他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抗战，抗战必亡！他说，请诸位想想，看对还是不对，共产党只有共产

国际，没有民族思想。因此，如果打起来，国民党打败了，他们就可以和苏俄勾结起来，夺取中国！

刘云讲得唾沫星子乱飞，大骂共产党，恨不得把共产党一口吞掉。我们绝大多数政治犯对他恨之入骨。我们把他讲的无耻谰言一一记下来，将来他受人民公审时，叫他赖也赖不掉，兜着。

他的讲话稿在《反省半月刊》上发表时，作了删改，露骨的地方删去不少，但基本内容格调没有变。这家伙后来果然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汉奸。

在国共合作的空气里，反省院中对政治犯的控制松了一些。院方又把自治会搞了起来，每天安排了文娱活动时间，有两个小时可以下棋、打扑克、拉胡琴、唱京戏。作为院方御用工具的自治会，会长和委员不再需要经过院方圈定或批准。他们把选票直接发到各号子里，让大家民主选举。结果选上了我当会长，彭康、曹荻秋、吴觉、邱国庆等二十几人为委员。

这时我父亲已来看过我，并告诉我：外头一切都活动妥了，通过丹阳县商会会长郭颂如，请了两家万元以上资本的铺保，上头已批准你交保释放，你安心等着吧。

我想我已交了铺保，等待即将出院。对于什么自治会之类的事，已无心过问。开会时，叫我代表讲话，我一句话也不说，“去你妈的，”我内心在骂。对自治会的看法，当时政治犯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积极参加活动，不断揭露反动派的阴谋，为争取早日释放政治犯而斗争；另一种人认为这是敌人御用工具，我们不能利用，利用就是帮助敌人欺骗。这种争论当时谁也做不出正确的结论。

一九三七年五月的一天，我终于获释放，出了反省院。我与吴觉、曹荻秋等同志道了别，走到出口处，看到父亲和郭颂如，还有两位保人正在那里具保。具保的内容是某某出院不准危害民国，否

则没收保人全部财产。保人具结，盖了印章。院方把我交给保人领回。

我一出反省院的大门，胸襟豁然开朗。在监牢度过了七年多艰难险阻的生活，如今又重新开始踏上伟大革命事业的征途，新的使命在召唤着我！

## 第四章 迎接抗日高潮

### 1. 为准备抗战四处奔走

父亲把我带到客栈。中午，在苏州观前街附近的闹市区找了一家上等馆子，宴请郭颂如和两位保人，表示对他们的感谢。

郭颂如系丹阳商会会长，与我父亲是换帖兄弟。他对我说：“侄儿，你年轻哪。宦海浮沉，风云多变。如今，为人处世，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随时随地都会有不测的危险。希望你这次出来之后，找个职业，经商也好，讲学也好，安分守己地过过日子，千万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了。”道道地地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我思想上反驳了他，但我没有表示态度。

父亲接着说：“多亏了你伯父，你应该谢谢你老伯。”

我当时想，他是资本家，我怎么好谢他呢？那不是投降嘛，敬他一杯酒，可以。于是，不开口，只端起酒杯，敬了一杯。如今想想，实在幼稚可笑。

两位保人也说：“你这次出来，我们担了很大风险，全家的生命财产都押在这上头了，请你小兄弟要多多照顾照顾。”

吃过饭，游览了苏州一些园林。我对玩，兴致不高，一心注意国内形势的发展。

大街上到处纷纷扬扬，青年学生和工人们宣传鼓动抗战，气氛非常热烈。然而，细心观察社会的各种人们，也分明感觉到有隐隐的几分惊惶不安，宛若缕缕游丝，萦绕在人们心头上。

我买了几份报纸。报纸上登载着不少有关抗战的文章。有关东北抗日联军在南满、松花江和鸭绿江一带，以及东西兴安岭和黑龙江、嫩江平原，开展游击战争，英勇抗击敌寇的消息也不少。这里、那里群众都起来了。看了这些报道，我很受鼓舞。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却还在千方百计地压制抗日。报上以显著的篇幅刊登着江苏高等法院对沈钧儒等上海七位抗日救国运动领导人，提出无理“公诉”的消息，看了又令人愤懑。

次日，我们离开苏州。一路所见又是另一种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路上的运兵列车一辆接着一辆。我们到一站，就让一趟兵车过去。兵车上装着大炮、辎重……，听口音，都是国民党的杂牌部队。这些兵车都是一个方向，开往上海去的。

父亲还要陪郭颂如他们去丹阳有事。我急于回乡下了解情况，以便尽快拉起抗日武装。我从奔牛下车，走孟河，先回家去看母亲。

午后两点钟光景，火车停靠奔牛车站。我出站，雇了一辆独轮车，吱吱呀呀地赶路。

这里，我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曾几次经过。往事历历，犹如昨日。

下午三、四点钟，到了西夏墅，我回想起当年领导武进农民运动时，曾在此地一家馆子里吃饭，大师傅在菜里放了一大把虾米的事，很想看看那人还在不在，便叫车子停下，再到那馆子里去吃点东西。可是，一打听，那个大师傅好几年前就被捕了。

我很扫兴地走出街，继续赶路，抵孟河。这里有我父亲的一位好友，名叫丁树森，开着一爿客栈。他叫我在他店里过夜。

我在孟河住宿一宵，起来刚吃过早饭，庄上的两个年轻人刘敖福和蔡黑狗就兴冲冲地赶到了。一见面，他们满脸带笑地说：“恭喜二先生脱难！”

我辞别了树森。他送我出南宋时韩世忠修筑的孟河古城。

我看看故乡的山，故乡的水，一别七、八年，真有无穷感慨。

我问问刘、蔡二人有关家乡的情况。

他们告诉我说：“自从你被捕以后，老先生到处奔波。县里的缉捕又常常下乡来敲竹杠，老先生真象逃难一样，吃了不少苦啊！”

三人谈谈说说，到了家。

人还没有进庄，庄上两大串爆竹便劈劈啪啪地炸响了。许多人围了上来。

“二先生回来啦！”

“恭喜二先生！”

情绪很热烈，其中不少是庄上的穷苦人，他们一向待我很好，经过这几年的大波折，相见之下，倍感亲切。

我母亲、嫂子还有不少亲戚都来了，悲喜交集，都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傍晚，我父亲也从丹阳赶回来了。

暮春天气，暖融融的，一家人团聚。此时，我哥哥已经去世。我问：“大哥是怎么死的？”母亲抹着眼泪说：“你哥哥不争气，自己家里老婆不要，去和一个寡妇七搭八搭，吃住都在那寡妇家里。你嫂子跟他吵，他就去山后开‘白土’，送出去卖，不多久就得病死了。”

我听说他的病情，估计是患的血吸虫病。

我的四弟文照（寒涛）因我被捕而外逃，不在家。三弟文彬在丹阳教书，也不大回来。

我关心的是抗战消息。

父亲从城里回来，告诉我说，战争快起来了，不出两个月定然爆发！省党部、省政府都在作迁移的准备，东西已经在偷偷往北运

了。

“这消息，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父亲说，这是陆小波告诉郭颂如的。不会错！陆小波也作了两手准备，把一些东西偷偷运走了！陆是全省商界的头面人物，我在镇江狱中，他和郭颂如一起帮了我不少忙，他的消息很灵通。许多学校、庙宇都住了兵。不少大的商店都准备移动了。

父亲叫我好好休息一下，如果战争一起，就到大后方去。他已经为我准备了一些钱。

夜深人静，我翻来复去，难以入睡。我想：总要把党找到才好。一是去上海，一是去陕北。陕北熟悉的同志多，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陈云等同志都在那边，然而，千里迢迢，路上特务又多，我刚刚保释出狱，敌人可能暗中监视，去西北，危险性很大；上海呢，时隔多年，没有可靠的联系渠道，万一摸到国民党反动派布置的罗网之中，更不好办了。两处都决定不下来。

几天没有睡好觉，加之身体很虚弱，决定在家休息十天、半月，再出去活动。

休息了几天，总定不下心来。经过反复斟酌，决定陕北和上海、南京等处，暂时都不去，先到丹阳城里摸摸情况再说。首先是了解一下过去城里一些老同志的情况。其次是探听抗日局势发展如何。因为乡下每天都有这样那样的传闻，不知真实情况怎样。再次是摸摸县城里的反动派的动向。这都是必须做的准备工作。

当然，进城也是有危险的。因为叛徒梅光迪是丹阳县特务头子，反共很积极。他的特务遍布各乡。他一定知道我已回家，必然要想各种办法对付我，不能不提高警惕。如果进城去，就必须考虑到会有被秘密绑架的可能性，从而要想一个比较妥善的办法，以防不测。

我决定利用公开的社会关系，去拜会郭颂如。他是县里有影



响的上层人物，县太爷有时也不敢不靠他。我堂而皇之地去他家作客，并在他家住下，梅光迪就无可奈何了。

同时，我党中央为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而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等内容，也陆续通过报纸，透露出来。如停止武装暴动，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等等，社会上已广为流传。我研究了党中央公开宣布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想到象郭颂如这样比较开明的士绅，应该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今后我们在丹阳开展工作就便利多了。过去对这样的人不团结，是很不策略的。我应该去做做他的工作。至于将来可能有人会说我勾结资本家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而怀疑我，不信任我等等，只好随他去了。我把工作先做起来，总是对的。

这样合计之下，我拿定了主意。

翌日清早，父亲命我带了点土产就进城了。从访仙桥坐船进城，只须半天时间。进了城，我直奔郭颂如家，郭正待吃饭，见我到了，十分高兴。吃了饭，留我住在他家。

郭颂如对我说，国共已经合作，你可以行动自由了。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历史的规律……。

我静听着，内心不同意他的看法，只是不好意思反驳他。

午后，郭颂如休息，我出去走走。

九年不到县城，市容依旧，而人事已非。我先到公园，后到体育场。迎面与姜育生相遇。他矮小个子，依旧是一只斜眼。他看看我，很惊讶！

“啊呀！不是老管吗！你什么时候出来了！”

他的政治态度怎样？我还一时摸不清，只听说已投靠了国民党，在国民党里干事。

“到我家里去坐坐，多年不见，好好聊聊。”

“好的，我正要去看看你哥哥呢。他还好吗？”我觉得这是打听消息的好机会，跟着他去了。

姜氏兄弟的家还是老样子，不过他俩都已娶了亲。我看了看他们的新房，见了见他们的妻子。我想，姜育生这不到一米五的矮子，加上又是独眼龙，其貌极丑，还能找到老婆，大概是地位的关系。

姜育生叫人去把他哥哥姜寄生找了回来。姜寄生已当上了丹阳县戒烟局长。戒烟、贩烟，这是个肥缺。他见到我热乎乎的。据姜育生说，他们都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政治面貌已经很清楚。我佯装一个坐了七年多牢，外面情况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向他们打听。

“听说国共又合作了，是真的还是谣传？”我故意这样问。

“是真的，一点不假。共产党归国民党领导。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红军取消了。工农民主政府也取消了，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了。”姜寄生眉飞色舞地说着，讲到“归国民党领导”、“中华民国”这些字眼时，均用重音，以示强调。我感到他已经一屁股坐到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去了。

“噢。”我把想法闷在心里，又问：“真的能抗战吗？”

“真的。当然是真的。”

“抗战能胜利吗？”

“一定能胜利。我们有几百万大军……”

“你们看，监狱里的政治犯，是不是一概能放出来呢？”

“能，能，一定会全部释放的……你不是已经放出来了嘛。”

我忍不住了，反驳说：“我是出钱买出来的，与放出来不一样。”

“出钱也好，不出钱也好，终究是放出来了。过去，出钱也放不出来。”他厚颜无耻地强辩着。

此人怎么堕落到如此地步！我内心甚感惊讶。

“抗战起来，丹阳县作些什么准备？”

“县党部组织各界宣传抗日……”姜寄生脱口而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我摸清了姜氏兄弟的思想情况后，不与他们争论，就岔开了话题，说：“何霖还在不在此地？”

“在，在。他如今是《丹阳日报》社的社长啦！也是县党部委员。阔气得很！一家过得舒舒服服。”

“他对抗战有什么看法？”

“他的报纸上天天在宣传抗战。”

“能不能看到他？还有，蒋子樵？”我这样问。

过去中共丹阳县委书记的几任书记：我接夏霖，汤醒白接我，陈作范接汤醒白。以后，就是蒋子樵。我听说，蒋子樵后来也被捕，投降，参加了F.F.，与二姜是一派。

F.F.是“Flip Flap”的简称。它原是留美学生中的一个团体，里面头面人物居多，如王正廷、顾维钧这些人都是其重要成员。后来，这个组织发展成了蒋介石下面的一个重要政治派系。蒋子樵属于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叶秀峰的系统。因此，我想从二姜口中证实一下。

“子樵比当小学教师时阔绰多了！他如今是省党部宣传部的科长啦，叶先生每周都要接见他一次。他平时住镇江，每礼拜六回来。”

“老熟人，总得见见面，能不能约一约他，还有何霖，见见面。”我那时对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认识不深，只觉得接触一下不要紧，对了解情况很有好处。但，这几个人会不会暗中都是特务？我不能不警惕。

为了弄清这批人的底细，我即去草堰南门找林学震。林是当年由夏霖介绍入党的，年纪比较轻，后来也被敌人抓去，判了几年

徒刑。刑满释放，在草堰南门开着一片米行。前面是米店，后面是砬坊，雇有七、八个伙计，在当时丹阳县城也算是一个小资本家了。

林的父亲为他留下一个管账先生，家还是由他当。他有个弟弟，名叫林学熙，小名叫林黑狗。

林学震一见我，喜出望外。这是真热情，他向来对我很敬服，他要我搬到他家住，好畅谈。

“我还是住在郭会长家里，比较安全些。”

“你住到我这里来。没问题，我保险！我有劣绅林立三做靠山！”他很有把握地说。

丹阳县城里有两个臭名昭著的大劣绅。一个叫胡荫介（尹皆），是前清秀才，大地主，担任过省议员，在地方上包揽词讼，无恶不作。大革命时，夏霖等曾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率领各界群众数百人，前往胡家，抓他游街。胡荫介事先闻风逃遁，怒不可遏的群众将他家捣毁一空。“四·一二”事变后，胡荫介又回到丹阳，勾结国民党第十四军的部队捣毁左派的县党部，并大肆捕捉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胡荫介之子是中央大学毕业生，进了国民党，后来当上了《中央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胡荫介是名符其实的大恶霸。另一个叫林立三，军阀统治时期，他在如皋等县当过县知事，也有一股恶势力。此人联系商界、知识界的人比较多，在本地没有昭著的罪恶。

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就以这类人作为他的社会基础。丹阳县城实际上是由这两家的势力统治着。凡新官上任，必先到胡、林两家拜会，“请两老翁关照”。他们说什么，县太爷都得听，否则就别想在这地方站住脚！

林学震和林立三是同一个家族，所以他说有个大后台，可以保险。

我想了解过去一些共产党员的情况，就答应他的要求等第二天搬到林学震家里住。林不是国民党员，为人也热诚、正直，就是他妻子把他管得很紧。我们两人谈话，他妻子有时在隔壁偷听。她怕丈夫再去冒政治风险。

我回郭颂如家住了一宿。次日搬到林学震家里。林为我准备了一间小房间，以便随时可以密谈。

我问他关于二姜、何霖、蒋子樵诸人的情况。

他告诉我：二姜叛变了，投靠国民党 F. F. 派，做他们的特务，丹阳各乡均有他们的组织，蒋子樵是他们的头子。何霖也叛党了，投靠国民党 C. C. 派，也做了 C. C. 派的特务。他们内部矛盾很大，但反共都很坚决。他要我和这些人接触时提高警惕。

林学震还告诉我：现在县党部的书记长叫林德润，是林立三的亲侄子，是个党棍，但反共不坚决。如今国共合作，他也跟着敷衍几句。此人看样子是对各方面都不想得罪。县党部内部分成了两派，经常互相攻击，势均力敌，难分难解。估计抗战起来后，这些人为了私利，很可能做汉奸。

我向林了解一九二七年秋天我在丹阳做县委书记时的一些同志的情况。

他告诉我：除戴盆天、胡洪涛、姜家兄弟、何霖、蒋子樵、张富根、张溪等叛变投敌外，其他同志如张连生、张洪孝（张娥华）、陈作范、汤醒白、姚润生、莫男等牺牲了。洪娴还在，表现尚好。周少鹤精神受刺激很大，消极了。孙秀英、荆贺宽等情况不明。

我问他：“你出狱后有没有去找过党？”

他说：“白色恐怖那么厉害，特务又多，不好去找！”

“万一日本鬼子打过来，你的打算怎样？”

林学震轻轻叹了口气说：“城里有钱的人家，大多打算把家搬到上海租界去，有的准备去汉口或重庆。我没有资格到上海去做

寓公，打算把店关掉，搬到乡下去住。”他压低了声音，“告诉你一个秘密消息，丹阳县政府已在作逃难的准备。特务室有十几条枪，也在积极布置应变办法，听说他们想等日本鬼子占领县城后就当汉奸。这批人最无耻。他们主要由 C. C. 控制。梅光迪这个叛徒，手段毒辣，秘密杀了不少人。”

林学震又说：“姜寄生当禁烟局长，捞了不少外快。鸦片烟不禁还好；一禁，反而公开化、合法化了。傍晚，你到街上走走看，只要是好天气，到处弥漫着鸦片的香味，抽大烟的人不知有多少。二姜就靠禁烟发了财。”

他又讲到何霖，说何经常利用报纸敲老百姓竹杠。只要什么地方发生一点小事，就是他敲竹杠的好机会。当事者怕丑事外扬，就送他很多钱。

我在林学震家里住了三、四天，了解了不少情况。

蒋子樵回来了。一见面他就假装热情地对我说：“老管呀，你回来了！好了，好了，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好大干一番了！”

我故意问他：抗战起来，省党部准备怎么办？

他低声对我说：“请你保密，我们准备到江北去。省府顾（祝同）先生已准备好了，交民政厅韩（德勤）先生具体办了。”

这个消息很重要，我内心很高兴。

战事肯定要爆发了，统治阶级普遍带恐惧心理，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利益决定的。

我想弄一点武器，有了武器就好办了，决定去找何霖。

我对何霖说：“战争爆发，万一丹阳沦陷，你有没有办法把毛胡子的保安队拉到访仙桥去？这样可以保护我们那里的老百姓，你也搬了去，一切由我负责筹措好了。”我决定只要毛胡子一到乡下，就把他扣起来，要他下令缴枪。因为何霖与毛胡子都是胡荫介系统的人，所以我做何霖的工作。

“到时候，我和你再商量。”何霖只是不置可否地回答。

我在丹阳城里逗留了五、六天。林学震不希望我走，但我急于想打听党组织的情况，不得不离开。

我到了常州城里，听说过去的那些人，有的叛变了，当了特务，有的逃亡在外，不明下落。我下乡去，到了安家舍、前黄等地，找了个别与党失去联系的老同志聊聊。他们除热情以外，没有什么情况可以告诉我。

我又回到家乡，日夜在访仙桥周围一带进行串联。我把镇上两个有势力的小资本家也争取了过来，一个叫汤铭新，他是访仙镇的商会会长；另一个叫戎友仁，群众叫他“金木大刀”，因他喜欢乱讲话，容易伤害人。这两个人被我争取过来了，将来镇上的税收可全部归我充作军饷。

我的基本力量是过去农民协会的骨干，特别是一些失去关系的党员。我把埤城、孟河以及四乡的熟人联系起来，靠统一战线开展工作。跑了一个半月，事情有了眉目。

时间已临近七月，吴觉已从反省院保出来了。我立即赶到苏州。我手上缺少干部使用，很想要他到我那里参加抗战，但他决定回淮阴地方去抗战。他在那边人熟地熟，是有基础的。

形势越来越紧张，苏州的市面已很冷落了。街上的客栈，停的停，关的关。我怕交通所阻，无法回去，决定与吴觉分道扬镳，各自回自己的家乡去。

## 2. 建立丹北抗日武装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附近之芦沟桥发动进攻，我国守军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影响下，奋起反抗。八日，我党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

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这声音立即传遍全国，各地爱国群众纷纷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斗争。

我在访仙桥，立即以我父亲的名义，把他当过乡长的那几个乡的十几支枪收了过来。七、八支套筒，六、七枝独响枪，虽都是破旧的武器，我们却视之如珍宝，统统妥善地收藏在家里，等待时机把队伍拉起来。

丹阳北乡的许多乡长，不少是我大革命时领导过的乡农会会长。白色恐怖到来后，这些人靠到国民党那边去了，但一般作恶不多。这些人在本乡有影响，有号召力。我们决定先把他们争取过来，作为过渡。

我对他们进行抗战的政治工作，告诉他们：一是我们必须坚决抗战，不抗战，一定会国破家亡；二是抗战必须跟共产党走，国民党是靠不住的。这两条内容虽然不错，但后一条当时这样提法是不太恰当的。由于我不了解党中央的统战政策，作了公开宣传。后来引起国民党分子向陈毅同志告状，说我反对国民党，不肯与国民党合作，并造了不少说我杀国民党党员等谣言。但是，当地一般群众对我比较熟悉，是相信我的，即使是那些一度倒向过国民党的人，由于战争将起，国民党的头目们大多想逃走，他们处在树倒猢猻散的境地，急于想找条政治出路，也纷纷表示愿意跟我们抗日，一切听从我们指挥。

我在四乡奔走了二十多天，丹北抗战的蓝图，在头脑里已经初具轮廓。我认为日本侵略军如果打进来，语言不通，人地生疏，是睁眼瞎子、是聋子。我丹北为丘陵地带，山峦起伏，人多粮足，可以建立根据地，可以打游击。

这与“四·一二”事变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要建立一个根据地确实困难，现在就很容易了。我已经联系上不少过去的农会骨



干和散失了的党员。敌人一旦来，我们就把国民党在这一带的反动势力赶走，把他们的枪械都缴下来，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鉴于过去组织农村暴动的经验教训，必须先拉起一支基干队伍，作为群众的核心和依靠力量。

我们作了初步估计。访仙桥镇区公所和警察分驻所约有二十多支枪，各乡都有十余支。埤城、姚家桥、孟河、黄墟、吕城等五、六个区的区中队和警察，也各有枪二、三十支。再加上乡里老百姓手中还有不少枪，总共可以凑到二百多支枪。我们以这些武器为基础，先搞起一支基干队伍是不难的。有了这个武装，才能比较容易地控制这块地方；有了这块地方，才能解决兵源、粮食等问题。然后，以这块根据地为依托，逐步向外发展。

在我考虑建立根据地的时候，曾经选择了几个地方，除丹北外，有茅山地区，武进前黄地区等。为了确定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建立抗日根据地，我决定再到这几个地方去实地观察一下。我先到白塔、西旻一带，这里靠近茅山，地形条件好，还有几个支部没有被破坏，党员大多还在，但与上级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思想落后，已不大象是共产党员了。

我问一个姓李的同志：“这一带抗战起来，你能不能搞点武装，把国民党赶走，占据这块地方？”

他坚决不同意这样搞，说如果我们这样一搞，政府和那些大地主都会立即来进攻，那就完了。

他还是过去的老经验。

我看看这一带山上的树木稀稀落落，群众条件差，决定暂不考虑，又赶到常州前黄、安家舍一带看了一下，条件都不如丹北好，就此决定留在丹北地区进行工作。

我到金坛家里，筹集了一些钱，再回丹阳。

开始，我思想上有三个问题难解决——人、枪、经费。照眼下

情况看，兵源和经费问题不大，武器也还有办法，只有干部问题难于解决。没有干部，许多事情都不好办。干部问题在工作中确实是带有关键性的。考虑结果，只能暂时把条件放低，只要坚决抗战、工作积极的，就提为干部，再办一个训练班，在斗争中加速培养。

我弟弟管寒涛从外地回来了。他是一九二七年的党员，丹阳农民暴动失败后，逃到外地去教书。他表示一定积极抗日。我的另一个弟弟管文彬，“八·一三”后，也从丹阳回来，听说抗日，高兴得很，决定跟我们一起干。我们一家三兄弟先团结起来，取得了一致意见，分别派他们工作。管寒涛的爱人吴芝岚，此时也在我家，叫她做通信联络工作。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在这一地区斗争的影响还在，群众对党的信仰大多未变，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抗战一起，群众都起来，真是条件成熟，事半功倍。

我又去吕城，找到了卢子模。卢子模在大革命时参加过党，后自首，到国民党的导淮委员会做事，实际是做特务工作。曾去淮阴监狱看过我，被我劝说了一顿，他表示悔改，自动脱离导淮委员会，逃回江南，改名换姓蹲在常州乡下教书。抗战起来，学校停办，他就回了老家。他见到我十分高兴，告诉我，庞森、丁晓南、贺同芳、杨俊等人都回来了。后来我一一找了他们，其中有几个人是黄埔军官学校三、四期的毕业生，搞军事的。我托卢子模负责，把他们组织起来，秘密把武装集中起来，他照办了。

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和管寒涛等半公开地在四乡活动。我父亲耽心我们被土匪、特务暗害，要我们多带几个人陪伴。我有秘密工作的经验，行动一般不给别人知道，路总绕着走，觉得问题不大。

我在丹阳西南乡，找到了一九二七年暴动失败时送我去宝堰的支部书记王骏声。他在全州一带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我也叫他

抓紧时机收集一些枪支弹药，并着重在青壮年中多做做工作。他也很高兴地去做了。

为了解决充实武器问题，我决定秘密到镇江去一次，侦查一下，看能不能在省政府垮台时弄到一点武器弹药。必要时，我想带一批人去突袭军械库。

我到了铁路边，老人员一个都找不到了。象闵春华、杨以萱、杨治这些人早已倒向国民党，有的当了特务。码头工人中，也找不到一个熟人。

我去茶馆坐坐，又到各处听听、看看，了解一些群众的意见，并打听镇江弹药仓库的地点。

我在东门一带转悠很久。后到城隍庙去看一看我过去越狱的旧地，但见那里还是老样子。我在那里徘徊很久，后又转到北固山下去找一些老朋友的墓地。我伫立很久，面对乱坟累累，荒草萋萋，没有一块墓碑，心里说：袁世钊、徐家瑾、李超时、陈百坚、黄子仁等同志，不知你们安眠在那几个墓穴里？我今天来看你们，无法祭奠，有待革命胜利后，再携清酒一杯，苍松数枝，前来恭祭你们吧！我含着泪水，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慢慢地离开墓地。

午后，我到镇江南门，那一带同样是冷冷清清，街上行人稀少。

在离国民党省党部不远的地方，我折向北走，正巧有一人向南而来，贴面碰上，我一下楞住了！出现在我面前的人，竟是金坛白塔暴动时临阵溜走的蒋铁如！不久前，我到金坛打听过此人，知道他已投敌，在省特务室工作。

蒋铁如一把拽住我，压低了嗓音说：“啊呀，你吃了豹子胆，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被保释出来，到镇江看病的。”我冷冷地回答。

“这里特务多如牛毛！你快走！要碰到别人不得了！”

“我是保出来的，怕什么？”我很镇定。

“你们在丹阳北乡的活动……你当上头不知道？赶快走！”

“你如今在干什么？”我明知故问。

“我在省特务室。”他没有隐瞒自己的身分，“我已看到县特务室关于你在乡下活动的情报。你快走，这里危险！”

“谢谢你关照，我马上就走。”

“我陪你走一段。”

“我不需要陪。”

“我陪你走，你放心，我不会害你。”

他走在前，我走在后，相距几尺远。我时刻戒备着。走到大市口，他回过头来对我说：

“我得回去了，你快走，以后再见吧。”

“此人表现尚好。”我内心想，“以后还应该团结他。”

我到了城外，雇了一条小毛驴，立即离开了镇江。

“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后，京沪线上除国民党军事人员来往外，交通几乎完全停顿。我记得“七·七”芦沟桥事变时，群众一片慷慨激昂的抗战热情，青年们高唱着田汉、聂耳合作的《毕业歌》，鼓动性很大。而今，敌机不断轰炸，人们纷纷逃难。往日沸腾的城市现在骤然冷落下来。一批批火热的青年大多被家庭送到大后方去了。大商人转移到武汉、重庆，小商人转移到乡下。旧时国民党压榨人民的种种统治机构，除留少数人做点军需后勤工作外，也纷纷撤走了。

战争进行到一个月左右，丹阳天天挨日机轰炸，人心惶惶。毛胡子的保安队不打自散，三个五个、八个十个陆续逃到乡下。以后，我把他们的武器统统缴了下来。

时机日臻成熟，我跟管文彬、管寒涛商量，立即行动起来，把我们自己庄上几十户人家的青壮年统统组织起来。第一个抗日自卫团成立了，决定采取公开的方式大规模活动。

战火愈烧愈烈。城市、铁道、公路、桥梁，均成了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人心浮动，恐怖的空气传到农村。国民党军队的许多伤兵，不断地往后方送，战败了的军队也成连成营地退下来，士气沮丧，队伍散漫，从我们乡下经过，我没有力量收容他们，只好空着急。有的士兵就把枪支弹药丢入江里河里，开了小差；有的则为非作歹，到村庄一住下就四出捉鸡逮鸭，乃至掳掠强奸，弄得乡间大哭小叫，鸡犬不宁。

我感到时机愈益紧迫，就更加紧发动群众起来，进行筹建江南抗日自卫总团的工作。

十一月九日，蒋介石下令淞沪守军分两路撤退，一路向南京，一路向杭州。十二日，上海失陷。成千上万的难民经过我家乡西去，其中大部分是青年。

我们接待了几批太仓、昆山的青年。他们是有组织的，每人背一个包。我让他们在我家里住下休息。他们无处买米，我家有米和山芋之类的食物，让他们吃个饱，不收钱。

我对挤满了我家的男女青年说：“你们要是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抗战，我们非常欢迎。”

这群青年，除极少数外，大部分都不愿留下来，恐慌的心理把他们牵向西去，牵向大后方去。靠两条腿，什么时候能走到“大后方”呢？即使到了“大后方”又能干些什么呢？

淞沪撤退时，前方国民党的部队已溃不成军。军队和难民似潮水般地向西涌。丹阳城里的人也跟着成群结队逃难到乡下来。他们向南到延陵，向东到访仙桥，狼狈不堪。国民党各级政府垮台，到处是散兵游勇，流窜乡间，抢财物，抢女人。

土匪蜂起，有的本来不是土匪的人也当起土匪来了。绑票、抢劫，有的还杀人、烧屋。乡村一片混乱，遇害的群众求告无门，悲惨极了！

形势转变这样快，完全出于我意料之外。日军已沿着京沪铁路、镇澄公路和大运河，向西攻击前进，国民党仅以少数部队节节阻击，争取时间，好让大部队撤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丹阳、镇江相继沦陷。

远远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我立即带领倪山庄上和附近庄上的刚刚武装起来的青年，赶到访仙桥镇上，把国民党区长于坤一和区中队、警察所的枪支全部缴下，武装群众，解散了区公所。我们一下缴到了二十余支枪，都是汉阳造，青年们兴奋极了。

接着，我们又去临近几个镇上缴来了七、八十条枪，把基干队伍迅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大队，委任张福生为大队长。同时，命令原先联系好的各乡乡长，迅速打起抗日自卫团的旗号。

京沪线上寂然无声。我带了几个人到京沪线上陵口镇去看看战场。因为那里曾发生过阻击战。铁路两侧挖了许多散兵坑，不少战士被打死在散兵坑内，无人收殓。

我又到运河边上去察看一下，河上横七竖八地积着几十具士兵的尸体，衣服都被人剥光掉了。

日军经过的交通线，两旁的村庄全部被烧光了。日军侵华的初期是采取高压政策，他们见人就杀，见屋就烧，把小孩挑在枪尖上，耍着玩，惨无人道，令人发指。

当敌人沿着镇澄公路西进时，我曾带了几个战士，登上我家庄子后的一座二百多米高的小山顶上，荫蔽地观察敌人运动部队。小山离公路约三华里。因为附近山峦起伏，树木森森，敌人不敢贸然进山。有时向山里打几枪，示示威。敌人大部队行动，不管其他事情，只有一个附带的任务，即在公路两旁焚烧房屋，直到村庄完全成为废墟为止。

丹阳县城沦陷时，听说城里已空无一人，整个县城基本上也被炸光、烧光了。到处狼烟，遮天蔽日，白天也乌沉沉的，惨白色的太

阳也失去了它往常的辉光。一到傍晚，所有的村庄都笼罩了一层浓厚的烟霭，死一般的沉寂，连狗吠的声音也听不到。旧日山明水秀、鸡犬相闻的江南农村，顷刻间变得黯然失色的一派惨状。

为了备战需要，我们到各处去察看地形，连长江中的扬中县也到了。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日军更是疯狂地烧杀淫掠。一个月左右，共杀了三十多万人。六朝古都，大火数日不绝，大部分精华和三分之一的房屋都被焚毁。

敌人夺得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以后，侵略气焰更为嚣张。三、五个士兵，甚至单枪匹马或徒手，就敢下乡抢东西，找“花姑娘”，有的竟远离据点十里八里，进行烧杀。这些野兽找不到“花姑娘”时，即使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也难幸免。

敌人这些暴行客观上起到了动员人民起来反抗的作用，打掉了某些人的顺民思想。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不少有产阶级人士同样受到沉重的打击。这对上层分子是一大教育，非常有利于我们搞抗日统一战线，许多地主分子均作为开明士绅参加了抗日阵线。

十二月，我们就在访仙桥镇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各乡到有几十个代表。我在会上提出要成立江南抗日自卫总团，大家都很同意。商量决定：各乡各村凡十六岁至五十岁的青壮年，全部编入抗日自卫团。抗日自卫团每乡一个，下设三至五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三至五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辖三个小队。每个小队为十人左右。每个乡的抗日自卫团至少要搞三、五十支枪，作为基干力量，枪支从散兵游勇手里去缴，从江河湖塘中去捞，其他人员或用梭镖，或用大刀。各乡的基干队三、五十人，全部武装，属半脱产性质。如果以后乡基干队上升，立即由大队补充起来。这样部队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成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今后兵源可以得到源

源不断的补充,丹北才能成为一个打不垮的抗日根据地。

抗日自卫团的大旗一经竖起,立即威声传播四方。真是登高一呼,山鸣谷应。只要时机成熟,事情就好办。有些地方,过去我们未曾联系过,这时也闻风响应,自动组织起来,自动找上门来请求领导。问情况、讨办法的人更是络绎不绝。还有不少商人也主动来缴纳税款,请求保护。

抗日与肃匪,乃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成立抗日自卫团,是顺乎民心的举动。丹阳又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地区,大革命时,夏霖、黄竞西、钱正表等曾在这一带领导过轰轰烈烈的斗争;土地革命时期,我和陈作范等其他一些同志也在这一带组织过农村秋收暴动。党的影响和威信至今犹在。我们号令一出,从者如云,四面八方都动起来了。这声势之迅猛,是过去我们历次暴动所不可比拟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访仙桥派人告急,说有一股土匪来镇上洗劫。侦悉是过去武进县保安大队长张少华部下刘笃的队伍,奉命来访仙桥镇进行破坏。我立即带了部队赶去,以一部正面进击,另一部包抄其后路堵击。刘笃见势不妙,仓皇逃窜。这次行动对推动抗日自卫团的发展影响很大。访仙桥镇商会筹款帮助我们购买一些枪支弹药,希望我们能派部队常驻镇上,防范土匪再来。

此次战斗之后,群众情绪很高,信心也足了。我们迫切需要扩充部队,计划组织四到六个大队的脱产基干武装,每大队三至五百人,一面对付敌人,一面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必要的斗争。同时,我们命令各乡抗日自卫团加强基干队的组织和训练。如果没有武装,既不能抗战,又不能自卫。这时,梅嘉生也回家乡组织了抗日自卫团。他是学过军事的,担任访仙桥北乡的自卫团团长,以加强我们这边的防御力量。



各乡抗日自卫团比较分散，亟须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我们考虑，各乡自卫团的组织应该有一个章程，否则，就不好指挥和整顿。因此，我们决定召开一次各乡抗日自卫团团长会议，讨论和通过抗日自卫团的章程。遂于二月间在访仙桥镇北后册塘村正式开会，到会的各乡负责人百余人。我在大会上宣布江苏省江南抗日自卫总团正式成立。会上讨论并通过了抗日自卫团章程，决定各乡抗日自卫团由总团统一领导。总团长由我担任。各乡自卫团团长，由总团长委任。各大、中、小队长由团长委派，不采取选举制。

根据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除建立武装以外，还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府，制订税收制度，以保证部队的给养。因此，我们将旧乡保长制一律废除，由抗日自卫团代行政府职权，委任卢子模为丹阳县县长，巢玉堂为武进县长，朱正爵为镇江县长。当时在群众心目中正统思想尚很严重，觉得我委县长是不合法的。特别是在中上层分子中，有不少人说我是“胡闹”。在那种情况下，若没有一点革命精神，是做不出大事来的。

战争本身是一种很好的动员。它使人民群众感奋起来，团结起来，一致对敌。丹北抗日武装迅猛发展，人是有了，枪很缺。我们一面动员群众想办法，自设炉灶，锻打大刀长矛；一面通过各种关系，搜罗枪支，因之，就有不少人为我们买枪，买弹药，如邹诚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冒着极大的危险，到南京附近地区去为我们购买武器。有些缺枪的自卫团，就这样弄到了不少枪。最迫切的是需要一批掌握部队的干部。为了解决干部问题，我决定把许多从外地回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灌输一点简单的抗日思想，即派到各乡抗日自卫团去工作，充实领导力量，并给予锻炼机会。这些同志都比较积极可靠，能发挥作用。我们又在戎梅马村戎姓祠堂创办了第一期政训班，我、梅嘉生、管文彬、管寒涛等都参加讲课。参加这期训练班的有近四十人。此后，由韦永义同志主持又续办了两期，

培养了一批当时急需的军政干部。后来这些学员同志绝大部分表现都很好，象胡文杰、陈桂生等同志牺牲时，已是主力部队的团、营级干部，表现不好的只是个别的。

四月三十日，我们又在后册塘召开各乡抗日自卫团分团长会议。当时抗日自卫团已发展到八十四个，包括武进的孟河、中行、小河、黑木桥，以及镇江的大同、练厂、纪庄、大港、大路一带均已建立。参加抗日自卫团的青壮年数以万计。

五月初，有一支川军的流散队伍，约三十人左右，由一连长方钧带领投奔我们。我们将其收留整编。以方钧带来的一个排为基础，并从各乡抗日自卫团的基干队中抽调了一百余人枪，加以充实，编为总团部直属第二大队。方钧为大队长，曾发明为副大队长。第一步派他们驻扎在长江边之大路镇一带，加以补充和扩大。第二步相机渡过长江收复新老洲，把扬中县政府的一个保安中队吃掉，准备逐步向江北发展。

新老洲有十万多人口，是长江中的一个孤岛，比较富裕，税收多，部队给养可以得到保证。

此后，我们又先后组建了总团部直属第三、四两个大队。第三大队大队长韦永义；第四大队大队长梅嘉生；陈志为独立大队长，共带八十余人，后编入第四大队。

为了充实加强总团部的机构，我们于六月间成立政治处、参谋处、秘书处。政治处主任韦永义，副主任管寒涛；参谋处长杨志，未到职；秘书长朱廉贻。

### 3. 在斗争中巩固和发展

丹北抗日力量的崛起，面临着与日、顽尖锐复杂的斗争。在抗日问题上，国民党迫于形势，不得不与我党建立统一战线；在反共

问题上,国民党顽固派又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一致。我军每一行动,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立即向上级报告。日、顽两方则常常配合行动,来对付我们。此外,国民党特务还有计划地破坏我抗日自卫团,并企图用投毒、暗杀等手段打掉我主要领导干部。

抗日自卫团是一轰而起的群众性组织,不少乡的自卫团内部很不纯,有些特务、土匪混在其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要在丹北这块地方坚持抗日斗争,就必须尽快整顿、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

我们就下决心先清除特务和土匪。总团部决定责成各乡自卫团限一周内把以上这些坏分子坚决清除,特别是基干队必须整顿,纯洁队伍,否则就将自卫团解散。这一命令是收到较大效果的。但是,由于当时情况复杂,更没有党的领导和保证,问题解决得并不彻底。

为了彻底肃清特务、汉奸和土匪,必须坚决杀一批首恶分子。我们采取断然措施,一下子逮捕了不少土匪和特务,经过审查,将其中十一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和两个破坏抗日的特务,押到丹阳嘉山南麓,公开枪决。同时,要求各乡抗日自卫团,继续肃清匪患,保护百姓。哪个乡有土匪特务,我就找哪个乡的抗日自卫团团团长是问。通敌、通匪者严惩!这件事震动很大,残匪即纷纷远逃。各乡自卫团掀起清匪运动。不准抢劫!不准烧杀!不准当汉奸!不准组织维持会!这些口号,家喻户晓,于是,整个丹北一下子平静下来了。特务土匪敛迹,人心得到暂时的安定。有些离我们较远地方的群众,也派人来请求自卫总团主持正义,帮他们驱逐股匪。四面八方都派人来联系,我身边没有干部接待他们,就由家里人帮忙。由于我家的村子在山里,离市镇较远,有些人几十里路赶来,人太多,吃饭都成了问题。我老母亲整天为各乡来人烧茶做饭,家里粮食吃光了,柴也烧完了,困难虽大,但很愉快。

我的这些措施，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大肆攻击。韩德勤一面命令张少华部限期将江南抗日自卫团坚决歼灭之，一面又命令他在丹阳、镇江、武进等县的国民党和特务组织从我内部进行破坏。巢玉堂任武进县长，尚未就职，即为张少华派人暗杀；朱正爵任镇江县长，被国民党特务威胁恐吓而逃走。因此，镇江、武进两县的县政府，皆未能正式成立。

由于群众拥护，我们的力量发展很快，局面打开了。主要的经验是一切革命的主张和行动，都必须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提出，少说空话，多考虑群众的切身利益，多替群众做点实事，这样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发展就是斗争。我们的力量发展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是不能安睡的。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我们消灭掉，这是规律。丹北抗日武装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发展，附近的国民党顽固派和它们的特务组织又大肆造谣，说管某大杀国民党，向韩德勤那里告状。韩德勤拍案大骂，并悬赏缉拿我归案。打死我的人，赏格开始为大洋五千元，后来竟升至五万元。我们估计访仙桥镇和倪山村这两个目标大的地方，敌人一定要经常来奔袭的。我们决定乘他们来奔袭的机会，在他们回去的路上埋伏部队，狠狠地给予打击。好几次敌人都吃了这样的苦头，以后下乡的次数就减少了，乡村完全由我们控制，孟河与倪山仅十余里，孟河据点的日军出动，常常被游击队伏击，打死他十余人。敌人只好进行烧杀以泄愤。

日本是一个小国，人口不多，对日寇只要我们下决心打，今天打死他几个，明天又打死他几个，日积月累就成了一个大数，等于打了一个大胜仗，全国到处都这样打，日寇无论如何凶，他也是经不起这样可怕的消耗，最后必然走向失败。在孟河这样一个小地方，使它遭到得不偿失的消耗，我想敌人是很懊丧的，最后，他决心把孟河这个据点撤走了，从此我们又与武进北乡连成一片。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我们深感主力太小,各乡自卫团力量又太分散,形不成一股打击力量,不能取得更大的战果。因此,必须从速壮大主力。于是,我们决定再次从各乡基干队抽调人枪,充实四个直属大队,使每个大队达到五百人以上。各乡自卫团基干队上升为主力后,又从群众中为基干队补充满额。从此,丹北的抗日武装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战斗力有了显著的增强。

但是,敌人也在不断总结经验,其小部队出动不易奏效,反而受到损失,于是几次出动较大的部队,作较大范围的奔袭,妄图消灭我们。

有一次,我率司令部夜宿陈庄,这里离倪山仅六、七里路。日寇和伪军悄悄地出动了千余人马,拂晓包围了倪山村。管寒涛同志大意,住在家里,发现敌情,立即戴上一顶缴获的日军钢盔,拿了一支手枪,带领村中的老弱妇幼转移到村后的山洞去。

倪山自明代开始,就有人开“白土”(俗称观音土)。几百年来,山已掏空,形成许多山洞。这洞与那洞相通,洞中可藏千人以上。

老弱妇幼动作比较迟缓。俟管寒涛把群众安置好,再带自己爱人吴芝岚去山洞时,敌人已经在后面穷追不舍。吴芝岚同志跑得慢了些,进山洞时心急,脱落了一只鞋,掉在洞口,管寒涛最后进去,也未发现。

日军追到洞口,发现一只女人的鞋子,高喊“花姑娘,花姑娘”,高兴得很。再往山洞里看,黑咕隆咚的,不知其深浅。

敌人一面打着手电筒,一面嘴里叽哩哇啦地叫着,进洞搜索。

这山洞叫“蟹爬洞”,很深,不熟悉的人根本无法进去。管寒涛紧握手枪,隐蔽在山洞暗处,监视着进洞的敌人。

日寇用绳子把人从洞口向下放,企图深入到下面洞里。一个日军刚下来,管寒涛就向他连射两枪。那日军大叫几声,被拉上去时已经断气了。

敌人哇啦哇啦乱叫了一阵，派人拖来了一门九二步兵炮，对准山洞轰。洞口被轰塌了，堵塞了。

敌人的用意是想把洞里的人封死，哪知“蟹爬洞”路路相通。管寒涛他们早已转移到别处去了。

敌人从凌晨攻到午后三、四点钟，还不撤走。

我在附近的山上，考虑到洞里的群众，即布置向敌人进攻。其时，敌人已是“再而衰，三而竭”，士气大为低落了。我们部队一发起攻击，敌人不敢恋战，且天色将晚，必须赶回城里去，不得不匆匆逃走。

此后，我们把倪山的“蟹爬洞”搞成了天然的荫蔽所。敌人来时，就撤进洞去。住的、吃的、连烧饭的地方都有。一家一户，安置得很好，仓库也设在那里，敌人无人带领根本无法进去。

侵华日军兵员不足，只能有限地控制一些点和线，于是改变策略，采用欺骗政策，招抚顺民回城，并且搜罗一些汉奸、流氓和想发国难财的奸商，成立维持会，为他效劳，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阴谋。

我们的政策，就是与敌人针锋相对，杀汉奸，打维持会。所以，这些维持会只能在敌人设立据点的地方起作用，我们眼下力量还不够，一时尚奈何它不得。其它没有敌人驻扎的地方，维持会是组织不起来的。敌人派武装下乡，用威逼、劝说等办法，并收买汉奸组织维持会，休想站得住，一打就垮。

敌人出动，大多是沿着交通要道而行，我们就经常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敌人不善于夜战，晚上一般都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出来。我们就利用敌人这一弱点，去捉汉奸，破坏公路。从孟河到埤城这段公路，就是夜间挖掘掉的。此路挖掉后，山南山北连成一片，来往同志就很安全了。由于我抗日自卫团不断打击敌人，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敌人不断进行报复“扫荡”，多次奔袭访仙桥和

倪山村。

一九三八年一月，驻孟河的日军又突然袭击包围了倪山村，搜抄了我的家，抢去一批东西，其中有万余发步枪子弹没有来得及转移，竟被敌人抄去，连茅屋也烧光。

有一次，敌人奔袭访仙桥镇，其时我正在那里做镇上流氓分子邱永祥的工作，有点疏忽大意，日军突然包围了访仙桥镇。

通讯员急匆匆地跑来报告：“快走！鬼子进街了！”

我一看，镇外敌人已放上哨，不准人出去，就躲进一家杂货店。

敌这次奔袭的目的：一是搜查镇上有没有游击队，二是要在访仙桥镇设立维持会。

敌人在大街两面交叉搜查，查了这家，再查那家，挨次序搜查过来。我就利用敌人交叉搜查的空隙，迅速转移到已被搜查过的人家家里。街上住家我较熟悉，这家转到那家，一直转了十几家，最后到了一家小客栈。

老板娘把我藏在后屋，叫我蹲着不要出去。

她家有后门，直通河边，万一发生情况，问题也不大。我放心蹲着，请老板娘监视好敌人。

敌人中午到达，搜查到下午三点多钟。然后，召集街上开布店的汤铭新、开瓷器店的戎友仁等四、五个商人去开会。

日军的一个队长对他们讲了话，要他们把维持会组织起来。如果有游击队，立即报告皇军。

他们满口答应，并凑了几头猪羊，作为慰劳，也送了些钱给汉奸和翻译，把他们打发走了。

汤铭新、戎友仁等见到我，问我怎么办？

我告诉他们说：对鬼子要坚决打！维持会不能搞！你们不要怕，敌人到这里是瞎子、聋子，我们是有把握对付他们的。

汤、戎等人听了半信半疑，但维持会终于没有成立。

战斗非常频繁，“扫荡”与反“扫荡”每月都有一两次。我们部队也在战斗中壮大起来。

当我们与日军频繁战斗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经常趁机进攻。

丹阳一带原是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在丹北搞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当然不会死心。

“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省特务室就作了统一部署。凡县党部委员系本地人者，皆须将县党部移到乡间办公，领导各区党部和区政府维持乡间秩序，而各县特务室主任亦移至乡间，继续进行反共活动。丹阳沦陷后，县党部委员即分两部分搬到乡间。一部分至延陵，一部分至访仙桥镇。到延陵地区的以林德润为首的几个委员，怕苦，后全部逃往上海。姜寄生兄弟及周友三等为代表的几个委员移到访仙桥办公。县特务室主任梅光迪移至窦庄庙一带，梅怕我搞他，请求回江阴工作，省特务室批准其请求。省党部、省特务室则随省政府迁淮阴办公。丹阳和镇江地区的党部由蒋子樵联系。

这些情况是由镇江县特务室派在姚家桥主持工作的姚康所提供的。姚为我争取，后被镇江县特务室派特务暗杀。原国民党江苏省特务室情报科长蒋铁如，此时已回金坛。他也向我提供了这些情况。互相印证，情况是一致的，蒋铁如反共并不坚决，后也为我争取。新四军到达茅山地区后，他经组织批准，在党领导下，参加抗日工作。

姜寄生兄弟和周友三等到访仙桥后，即与我们争地盘、争领导权。他们和我争论的关键问题，是抗日武装归哪个党领导的问题。姜、周坚持江南抗日自卫总团应归国民党领导。他们的理由是所谓“延安的八路军尚且归国民党蒋委员长领导，你们江南抗日自卫总团更应该归国民党领导”。我坚决不同意。我说国民党军已逃



走，不存在领导问题。姜、周说：“丹阳县党部还在，可以领导你们。”我说：“那就请你们先发枪支弹药、军饷制服等等，否则你们休想谈什么领导不领导的问题。”我明知他们已属丧家之犬，不可能办到，因此就这样顶它回去。

这问题，争论了几天，他们不愿服从。他们依仗手中秘密控制了几个乡的自卫团，有几十支枪，如窦庄庙自卫团、荆林桥自卫团、中行里自卫团，名义上属总团部领导，而实为姜、周等所控制，自以为可以与我抗衡，有把握夺取丹北这块地方了。我决定先将这些自卫团的基干队全部改编掉，并将几个团长撤换。他们见大势已去，匆匆忙忙带了家眷，乘我不备潜回丹阳城，去当汉奸了。这是他们的预定计划。姜寄生等回城后，凭借日寇的势力，秘密与苏北国民党省党部联系，同时又与乡间国民党顽固势力联系，继续进行反共，特别是对我丹北根据地进行破坏。另一个县党部委员何霖留在访仙桥，他表示愿意服从我们领导。我们给了他适当工作，不给实权。还有一个姜育生表示愿意留下，我估计是兄弟两人密商好留下的。

姜寄生等唆使丹阳的顽固分子一再向韩德勤告状，韩密令张少华部限期将我消灭。张少华原是常州的保安大队长，武进县圩塘人，清帮头子，拜七港张四拐子为师。抗战开始，他趁机招收流氓、土匪和散兵游勇，将保安大队所辖三个中队扩充为三个团，成立保安旅，自任旅长，敲榨抢劫，欺压人民。常州沦陷时，他逃至武进北乡，以后率一个团过江，进驻泰兴，担任城防，在长江沿岸设卡收税，命令贾常富的三团控制扬中，承寿根的一团留驻圩塘一带。他得到韩德勤的命令，立即命令承寿根团向访仙桥进攻，贾常富团向姚家桥进攻。

承寿根原系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时期曾任安家舍支部书记。后被捕坐牢，抗战开始后出狱，在小新桥、龙虎塘一带组成一支抗日

武装，不久被张少华收编。承急于找党，听说我在丹北组织抗日武装，曾几次派人与我联系。

一九三八年春，承接到向我进攻的命令，立即派一位姓张的副官向我报告：“韩德勤已命令张少华消灭你部，要承团占领访仙桥，贾团占领姚家桥和大路镇，相机攻占埤城。”承要我早作准备。我要他立即回去请承并携带韩的命令来我处商量应付办法。果然承带公事来了。我看见命令，证明承的报告是正确的。承要求把部队拉过来。我告诉他：我这里经费困难，政治上也不宜把部队过分集中，要他将部队仍部署在圩塘、魏村一带，待机向东发展，搞掉梅光迪，控制澄西地区。他同意我的意见。我要他注意张少华的动向，随时向我报告。承要求恢复党籍，我答应他要等新四军到来后才能解决，到时我再跟他联系。承就回去了。

国民党顽固派对丹北地区的破坏，一天紧似一天。除命令部队向我进攻外，潜伏下来的原梅光迪系统的特务组织，也奉命到丹北猖狂活动。承寿根与我联系后，不久有一支特务的别动队乘我不备，突然袭击访仙桥。四周自卫团闻讯，即往围攻。特务部队见势不妙，即向西夏墅方向逃窜。张少华部贾常富团同时进攻姚家桥，我部进行反击，将其打回扬中。

国民党顽固派跟我们的斗争日趋尖锐。总团部对抗日自卫团进行教育，要大家严防顽固派的破坏和进攻，作好必要的准备。

这时，江南抗日自卫团所控制的地区已东至武北一线，西至镇江市郊，南抵京沪铁路，北到长江。这一块抗日根据地，人口超过百万。然而，存在的问题还很多。领导成分复杂，队伍不纯，思想问题不少。如有的乡自卫团不愿自己的人和枪上升为主力；有的头头为国民党所控制，对抗日存有二心，甚至还有野心，常常与土匪暗中勾结，杀害抗日干部。

胡桥附近的王忠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收罗了十几个

流寇，成立了一支小游击队，流窜于胡桥一带，靠着朱梦莲作后台，胡作非为。

朱梦莲在大革命失败后仍是中共党员，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搞过农民协会工作。我离开丹阳后，他投降了国民党反动派，参加了复兴社。此时，他控制了几个乡的自卫团，有一百多条枪，身边还有三、五十人的脱产武装。王忠信靠着他的势力，暗杀了我们好几个同志。这批人不解决，对丹北根据地的危害性很大。

其次，吕城一带，以卢子模为首的一伙国民党势力，其中有几个黄埔军校毕业生，控制了几个乡的自卫团，每团有枪二、三十支。卢本人还直接掌握有一个排的脱产武装，挂着当初我委他作县长而组织起来的丹阳县政府招牌，蓄意扩充私人势力，准备单独搞一个局面，与总团部对抗，这事亟需解决。

此外，还有段家桥的翟锦魁，也有几十支枪。此人心神不定，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如果形势趋于严重，势必叛变。

至于孟河以北的黑木桥，过去是个土匪窝。现在有个土匪头子名叫陈金根，收了几十个徒弟，搞了三十来支枪。张少华暗中委任他当团长，叫他扼守江口，作为桥头堡。此人如不消灭，必成大患。

这些人目前慑于总团有四个直属大队的主力部队，一时不敢轻举妄动。如不及时解决，对丹北根据地的抗日斗争非常不利。

四、五月间，卢子模逐步靠向国民党。总团即派梅嘉生同志率第四大队去整编他所控制的武装，一个晚上即解决问题，卢子模本人逃走。朱梦莲的武装在乡间发展蓝衣社组织，三头两天开会，宣扬蒋介石的“功绩”，在自卫团内部“宣誓效忠蒋委员长”。我带一大队突然到了胡桥，把朱的基干队全部编掉。朱慌了手脚，溜到江北大桥去了。紧接着，我们又收缴了段家桥翟锦魁、黑木桥陈金根等伙的武装，惩办了一些暗通日寇或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破坏抗日

工作的首恶分子，丹北抗日根据地遂完成了统一任务。

韩德勤见丹北形势发展，对国民党顽固派日益不利，再次严令张少华的保安旅向丹北发动进攻。张部几个团没有一个敢冒险行动，只是放了一些谣言以敷衍韩德勤，韩也无可奈何。

在这前后，上海党组织得知我们在丹北地区打开了抗日局面，派何克希、李青来联系。李青是上海党派到张少华保安部队去帮助国民党抗战的，他当时担任该旅政工处科长。

何、李二人到丹北后，当天下午我们会见了他们。

李青对我说，承寿根是国民党部队，你们不能拉他，以免破坏统一战线。他又说：你不能搞独立的政权，听说你委了几个县长，这是违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延安的边区政府都取消了，你更不应该胡搞。我要他们拿出上海党的介绍信，他们说路上不便带，因此，我很怀疑他们的身份。他们从哪里得知承寿根与我的关系？我想把他们扣起来，但又想如果真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就不好办，还是请他们走为好。我与李青争起来。何克希见我的态度很不客气，就悄悄走了。李青不肯走，继续和我谈。他说：“农民是靠不住的。我们抗战不能依靠农民，一定要依靠工人，依靠国民党，军队在国民党手里，不依靠他怎么办？”我听他越说越不象话，不愿再跟他争论，请他立即离开这里，连晚饭也没留他吃。他悻悻地走了。

李青回去，在张少华跟前不知说了些什么。后张少华决定用开会的名义，把承寿根搞掉，并将他的部队拉回泰兴去编掉。这阴谋我不知道，承寿根也不知道。

承接到开会的通知后，立即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估计其中有诈，劝他无论如何不能去。承决定不去。李青亲自拿了张少华的信，并打了共产党的招牌，去做承的工作，左说右说，承动心了，上了当，去泰兴。张少华早就在泰兴街上布置了埋伏，承寿根刚进泰兴城，就被乱枪打死了。

接着，张少华即命令承团调回江北。只有四、五百人过江，一百多人跟着承妻金芝芳走了。后来日军“扫荡”，金芝芳逃往上海，当了汉奸。与承寿根有联系的曹玉堂，是国民党左派，一向是我向东发展的依靠力量，他缺少斗争经验。承被暗害后，他仍不很警觉，我也未能及时告诉他不要离开部队，他还是每天回家住宿，也被张少华派遣特务杀害了。这是我部向东进军的一个挫折。

国民党顽固派与我们的斗争仍非常尖锐。我派人往常州南乡的前黄一带找老同志，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

京沪铁路以北已比较稳定了，我们又积极向铁路以南去发展。

我在丹阳西南乡泉州一带的旧同学朱廉贻，在当地颇有影响。其父朱渊是西南乡声望卓著的士绅，前清秀才，孙传芳时代当过省参议员，为人公正，丹阳各乡群众大多很听他的话。请朱廉贻在那边组织武装，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委他为第六大队长，朱很快接受了这一任务，并得到了他父亲的支持，迅速组建了一百余人的武装，枪械齐全，控制了泉州周围十多个乡的地方。

这一阶段，我的同学巫恒通也来找过我。他抗战前乃泰兴县教育局局长，句容人，很朴实。抗战开始后，他辞职回乡，路过访仙桥，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告诉他：句容东昌街一带是打游击的好地方，你回去抓紧把武装搞起来，不要怕国民党压你，自己独立搞，不要上人家当，你搞起来后，我去找你，你放心。

我还在延陵找到景洪良，他也是过去办农民协会的熟人，请他把延陵控制起来。

金坛的蒋铁如，他在镇江沦陷前，奉国民党省政府之命回到家乡拉武装，但不坚决反共，可以争取。原小刀会的艾小根，在那边也搞了一支二、三十人的游击队，经常活动于白塔一带。我派人去找蒋、艾二人联系，他们同意归总团领导。

无锡东北乡的梅村和南方泉一带，有陈枕白同志在组织抗日

武装。江阴则有缪国生组织了抗日游击队。这都是土地革命时的老熟人。我派管齐山带了两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东去跟他们联系。管齐山等三人经过西石桥附近，被梅光迪的特务武装发现，三人都英勇不屈地牺牲了。

我回想起丹阳刚沦陷时，梅光迪带了十几个特务潜逃。我得到情报后，命令第一大队长张福生率队去蔡塔里埋伏，俟梅光迪等经过时，将其击毙或生擒。张福生原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哪知他后来脱了党，偷偷跑到丹阳梅光迪手下当过特工小组长，抗战初期打入抗日自卫团，并继续与梅光迪有勾结。这次竟与梅秘密联络，偷偷将梅等放走，然后才虚张声势地打了几枪以掩人耳目。翌日，梅光迪写了封信挖苦我一番。我接到信，很惊讶，知张福生可疑，立即追问捕梅的经过。张说是去迟了一步，梅已逃走。我心中有数，秘密派人去了解张过去的行为，证明其有问题，决定设法将其调开。堡垒最怕被人从内部攻破，在处理张福生之前，我一面自己加强保卫工作，一面关照一大队下面几个中队长，没有我的命令，部队不准随意调动。

梅光迪逃到西石桥一带，大收徒弟，拉起一支百余人的队伍，打着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挡住了我们向东发展的道路，后一度混入新四军。皖南事变后，他认为新四军大势已去，到上海投靠敌人，公开反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继续重用他，授予少将衔参议。大陆解放前夕，据说他要跟特务头子毛人凤逃往台湾，而毛人凤却要他潜伏下来，他不肯，被毛在机场打死。

#### 4. 陈毅率部来茅山

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根据国共两党谈判协议，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开始将长江以南各省红军游击队整编为一、二、三支

队，长江以北各省红军游击队整编为第四支队。从二月起，陆续在皖南歙县岩寺地区和皖中舒城地区分别集中。四月十三日，军部由南昌迁到岩寺。党中央明确指示，新四军的任务是：“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陈毅、粟裕等同志肩负开创茅山抗日根据地的重任，率部向苏南挺进。

四月二十八日，粟裕率领先遣支队，进入苏南敌后，开展战略侦察。先遣支队出发后，毛泽东同志又及时致电项英：“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于是，陈毅也于五月中旬率领一支队千余将士，由安徽岩寺出发，经茂林，北上南陵。六月一日，又离开南陵，越过宣（城）芜（湖）之间的铁路，东进高淳。十二日，到达溧阳之竹箠桥，与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汇合。

陈、粟会合后，粟裕设了一个诱敌出来加以伏击歼灭之计。他先派一部分部队到句容附近游击，并虚张声势，扬言要在数日内攻克句容。句容守敌十分恐慌，向镇江之敌求援。于是镇江之敌派出两个小队，附带部分弹药，向句容增援。粟裕则事先率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面约三十里的卫岗埋伏。那里山高、路隘、林密、既便于荫蔽，又便于出击。六月十七日，天下着濛濛细雨，日军分乘五辆卡车，从镇江开往句容，趾高气扬，毫无戒备。当汽车进入伏击圈时，新四军指战员勇猛出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击毁敌汽车五辆，毙敌土井少佐、梅岗大尉及日军士兵三十余人，缴获枪械

数十支，日币万余元。这一仗大大鼓舞了江南抗日人民。

我得知新四军到苏南的消息，即派朱士俊、虞景柯、虞荣和等去延陵附近找新四军联系。朱士俊等见到了陈毅，汇报了丹北地区抗日斗争的情况。

六月底，一支队二团二营营长段焕竞奉陈毅之命，率部越过铁路到达访仙桥找我。陈毅命他很快找到管文蔚，并要管去延陵找陈毅。因此，段到达访仙桥后，立即赶到倪山找我，并传达了陈毅的话。从此，我和党接上了关系。

段部在访仙桥休整数日，即与我商量攻打京沪铁路上的新丰车站的计划。

新丰车站本是个小站。敌人为了保护京沪线的安全，在那里驻扎日军第十五师团松野联队庆江中队的一个小队和一百多名伪军。敌兵力较弱，便于我军歼灭之。

商量结果，由段焕竞率领的一部分主力，先将车站团团围住。我率领抗日自卫团和群众武装，将新丰与丹阳之间、新丰与镇江之间的两段铁路挖断，并将电话线拆毁，使镇江、丹阳之敌情况不明，无法增援；同时，将镇澄公路也彻底破坏。攻击的时间定于七月一日的晚上。

攻击一开始，伪军先被打散，日军龟缩到一个大碉堡内。镇江之敌向东出援，前进数里即为游击队所阻，退了回去。丹阳之敌因守军太少，又不明情况，未敢妄动，只是盲目向西打枪。

经过一夜激战，新丰之敌基本被歼，缴获枪支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一部分，据点营房全部烧毁。京沪线火车为之一日不通，公路交通中断一月有余。

这次战斗，使敌人大为震惊，但无力进行大规模“扫荡”报复，只是事后派少数部队将附近几个村庄烧了以泄恨。而我京沪沿线群众却人心大快，都说共产党新四军能打仗，中国有了希望。抗战



必胜的信念，开始在敌后的江南人民心中确立。陈毅、粟裕的威名，也在人民群众当中广泛传开了。

我将对付敌人“扫荡”报复，作了必要的部署后，于七月上旬去延陵谒见陈毅。

那天，我晚上十点多钟出发，越过两道封锁线，当夜赶到睦巷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住宿。这里设有我们的交通联络站，以后改为兵站，离封锁线二十余里，距离丹阳县城也有差不多的路程。联络站的同志们将我安排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睡了一觉。天亮时，通讯员带我继续向一支队司令部驻地赶去。

上午十一时左右，我们到达延陵附近的一个村庄，那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了。

通讯员带我们来到一家朝东向的房子前，门口站着—个战士。他看到我们，就上前询问：“你们找谁？”

通讯员对他说是来见陈司令的。

那战士转身进去通报，只听里面说：“请他进来。”

战士出来，请我们进去。陈毅已经迎到门口。他向我端详一下，问：“你是管文蔚同志吗？”

“是的。”

“你昨天夜里过来的？过铁路封锁线方便吗？”

我说：“方便。”

陈毅是一个中等身材、长得很结实的中年人。虽然比较消瘦，但神采飞扬，双目闪闪的。他很平易近人，落落大方。我初次见到他，就觉得遇上了一位很好的领导者。

陈毅边说边领我走进屋子，两人在一张八仙桌旁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桌上放着一叠信笺，一支毛笔和一块小方砚。看样子是刚写过信。

初次见面，我就想把丹北敌、我、顽的情况详细向他汇报。

他说：“不忙嘛，今天我们先谈谈其他一些事情。”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他要和我谈什么问题？还有什么事情比敌情更急呢？

以后才知道，在丹北地区被我撵走的那一批国民党顽固派分子，以及被我们杀掉的几个特务、土匪的家属，还有一些流氓地痞分子，在新四军一到江南时，就纷纷到陈毅同志处告了我的“状”，说我杀人很多，“不赞成国共合作政策”，“反对国民党和地方士绅”等等，要求新四军从速将我消灭掉。

这些情况，我当时一无所知，陈毅对我说，先谈别的事情，指的就是这些流言蜚语中所涉及的有关政策思想问题。

那时，陈毅对我的思想状况大约有一个估计，以为我从“四·一二”事变后，曾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工作多年，又带着“左”的思想被关进监狱，对遵义会议后的党的路线不了解，对抗战以来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领会不深。出狱后，发动群众的一套做法还具有“左”的色彩，对地主、资本家的看法也还停留在过去的老观点上，对国民党的态度也不曾改变。因此，政策把握不准，杀人过多。

陈毅对我的估计，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是比较符合我的思想发展规律的。所以，一见面，他认为首先必须解决我的思想问题，要把“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向我彻底地作一次剖析。

陈毅的这个意图，当时我无从知道，他当然也不便初一见面就直接对我讲，他怕我一时思想上接受不了。我呢，只想到自己坐了七年多牢，受尽折磨，出狱后一心要找到党，要和敌人干！哪里考虑到自己思想上行动上还是否存在什么“左”的问题。我当时还有些幼稚病，思想水平较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看得不多，加之党内斗争的经验不足，对陈毅所说的“先谈谈其他一些事情”，很感

到茫然。于是，就只好默默地听他讲。

“老管，你听说过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吗？”陈毅很和蔼地问我。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些，今年五月，上海党派何克希、李青也来找我谈过，对那些意见，我想不通。”

“他们说些什么？”

“国民党报纸上宣传说，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了。国共合作即阶级合作。共产党的军队归国民党收编，军令、政令都统一了。何克希说，我们与国民党合作，对抗战有利，所以我们不能挖国民党部队的墙脚。这话还有点道理。李青讲的不象话了。他说抗战要靠国民党，国民党有几百万正规军，我们党力量很小，所以要全心全意地帮助国民党抗战。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和他大吵了一场，谈不拢。”

“哦！”陈毅对李青的说法似乎感到很吃惊，他说：“那样讲当然是错误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各个党派各个阶级根据他们本阶级的利益，都会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他立起身来，走到门口喊道：“特务员！拿包烟来！”然后又回到自己原来坐的地方，继续说：“我们必须按照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解释，来向同志们和各党派各阶级作正确的解释。”

特务员走进来，把一包老刀牌香烟、一盒火柴放在陈毅面前。

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摸着 I 带的一包前门牌香烟，想拿出来，又不好意思，最后还是把手伸出来，接过陈毅递到我面前的一支老刀牌香烟。

“你们这里最好的是什么烟？”

“大前门。要在大的市镇才有卖。”

“我们继续谈下去，”陈毅说，“我们党对统一战线的解释是：凡是一切愿意抗日的政党、阶级、团体或个人，都要联合起来抗战，形

成一个伟大的抗日阵线，当然汉奸是除外的。这与我们内战时期，领导农民工人和地主资本家作斗争，是两种不同的政策。如果我们还是死抱着过去那种狭隘的观点和政策去指导抗战，必然会把地主资本家甚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起赶到日本鬼子那里去了。如果那样做，抗战一定不能取得胜利。但是，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由我们共产党来领导，其他党派是不能担负起这个责任的。”

他继续说：“抗战这面大旗，国民党要扛着，我们更要扛着，凡是爱国的各党各派都要扛着。谁不扛着，谁就休想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国民党与我们一起抗战，是有他的目的的，其中一部分人是不怀好意的。他们想利用抗日这块招牌，借日本人的刀子把我们逐步消灭掉。他们的办法是将八路军、新四军活动的地方限得死死的。他们不准我们成立抗日民主政府，不准我们征收公粮，不准我们扩充部队和发动群众！这就是很明显的证明。这一点，在我们有些同志中不愿意讲出来，怕破坏统一战线。这是错误的。”

陈毅停了停，又说：“我们抗战的目的是明确的，是为了祖国，为了民族，为了我们子孙万代的幸福，不是为了别的。因此，我们除了努力打仗外，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部队，发动群众，实行二五减租，成立三三制的民主政府等等，来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如果我们的力量不能壮大，抗战就不可能胜利。我们有些同志不愿意这样做，怕刺激国民党。”

“我们决不能受国民党的限制，要独立自主地干，一定要在抗日过程中壮大人民的力量！我们的力量要逐步发展到与国民党的力量相平衡，甚至超过他。到将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就不敢欺侮我们，中国才有救了。这一点，在我们党内还有一些同志是不敢想，也不敢这样干的。”

“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很可能是我们党将来的或者说是永久的战胜一切敌人的战略性的政策。”

这时，警卫员进来问：“可以开饭吗？”

陈毅看了看表，说：“可以。”

警卫员把饭菜端到桌上，是一碗青菜，一碟炒鸡蛋，一碗青菜汤。

“没有什么吃的，但比我们三年游击战争时好多了。吃！”陈毅同志用筷子指指菜。

“那时，天天吃苦菜和竹笋。老百姓送的米很少。白狗子封锁很紧，老百姓不易上山。”他很有感慨地说，“不容易熬过来啊！革命是艰苦的，曲折的，困难很多，今天有，将来还会有，而且时间很长哪！”

吃完饭，陈毅点了一支烟，说：“到门外走一走。”

我们一同出了大门，走到村外。初夏的江南田野，阡陌纵横。远山，近林，庄稼，满眼葱绿，悦目赏心，十分宜人。

陈毅停了脚，遥指远处的茅山之巅，说：“那里住着日军一个小队。他们的任务是封锁交通，不让我们进入他的后方。可是我们天天在他们眼皮底下过来过去，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侵略者到了别人家的国土上，就好象瞎子聋子，天天挨人家打屁股，还自以为是什么‘伟大的胜利’。世界上就有这样的蠢货！原因是什么？一句话，脱离了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群众。现在，敌后的群众，从工人、农民到地主、资本家，都同仇敌忾，和我们一道打鬼子。这就是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敌人只好孤零零地站在山顶上，天天听西北风的呼啸，长吁短叹。今天这个敌人是这样，明天换了新的敌人也会是这样。我们要把全国人民团结在我们周围，筑成一道铜墙铁壁。那么，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

陈毅又很风趣地说：“谁要是没有群众的拥护，谁就要象茅山

顶上那一伙孤立的敌人一样。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上天去！被西北风吹上天去，烟飞灰灭！他们不能下地，下来就有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拿着大刀长矛对着他。”

我想：陈毅这番话，可能是给我敲一下警钟，要我千万不要脱离群众。脱离群众，迟早总是要被群众打倒的。

警卫人员走来，向陈毅报告：“镇上有几个客人来找你。”

“请他们到侦察科坐坐，叫参谋先和他们谈一谈，等一刻我就来。”

陈毅和我又回到原先的屋子坐下。

“我们接着上午的问题，再谈一刻吧。”陈毅和我谈起党内“左”倾错误问题。当时他尚不便公开指王明的名字，只说李立三和某某同志。他说，“他们的思想都给党造成了很大损失。土地革命时期，他们对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采取了过左的政策。不给生路，烧杀过多，结果完全孤立了自己。”

他讲到这里，停了下来，又拿起烟，点着火，向木椅上一靠，慢慢地抽起来。

听了他这席话，我心头感到有点沉重。陈毅是不是感觉到我还在采用“左”倾时期那一套旧政策，脱离群众，孤立自己？我默默地望着陈毅，头脑里紧张地思考着：我思想上是否还存在着“左”的东西？

陈毅接着说：“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是与立三同志、某某同志的思想路线不同的，那就是一切政策、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同志过去在苏区反复讲了这个问题。他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反对从书本出发。某某人则一切从书本出发。凡是马列书上没有的，他们就不敢讲，也不敢做。遇到困难，总是从书本上去找答案。这样脱离实际，结果没有不失败的。一九二七年冬天，龙源口战斗、以及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之所以

能胜利，就是靠针对当时敌我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第五次反“围剿”犯了错误，把外国书本上的战争方法搬来对付中国的敌人，牛头不对马嘴，而敌人却采取较实际的办法，结果我们打败了，红军不得不卷起铺盖走上长征的道路。”

陈毅为了使我透彻地理解这个问题，举了两个生动的例子。他说，一九〇五年俄国波罗的海水兵起义，向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请示怎么办。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就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找根据，找指示，但翻遍了所有的书也没有找到现成的答案。最后只好眼看着水兵起义失败了。这是外国的事情，这种事情我们中国也不少。有一次，我们在赣南山里被包围了，有人就主张打电报向中央请示办法。我说，中央正在长征路上，无法了解我们的情况。这种事向中央请示，中央有什么办法呢！战争情况是千变万化的，一味机械地照上级指示办，怎么能不打败仗？

我听了这段话，心悦而诚服。但我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对待书本知识呢？”

他想了一想，说：“我们学习，主要是吸取书本上的思想、原则、观点、方法，而不是死记书本上的字句。看问题一定要注意问题发生的时间、条件、场合，而不能抛开具体的实际情况去照搬照套，如果死搬硬套，一定会犯错误。”

“对上级指示呢？”我又问。

“上级指示的精神，一定要坚决贯彻，决不能容忍借故不执行，否则就要受到党纪处分。共产党所以有力量，就是有铁的纪律，全党都自觉执行，特别是军事命令。至于如何贯彻，一定要根据你那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有步骤地具体贯彻下去。上级对这些是不应该过多干涉的。”

陈毅侃侃而谈，既生动又深刻，我从未听过如此精辟的议论。我一边听，一边咀嚼其中的道理，确实感到迷信书本，不从实际出

发，不会独立思考解决问题，是没有不把事情办糟了的。自己过去搞工运、农运，为什么垮掉？不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些道理，受了“左”倾错误的影响吗！而对这些问题，我至今还没有很好地认识。陈毅初次和我谈话，就抓住了今后斗争中这个根本性的思想路线问题，对我教育是深刻的，我永远不会忘记。

陈毅站起身来，说：“我从延安回来时，中央交给我的任务：一是要在江南打几个胜仗，建立我军的威信；二是争取群众，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广大群众都争取过来；三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有影响的上层分子。苏南国民党的基础很雄厚，许多上层分子的正统观念很浓。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千万注意，一定要把统一战线工作做好。今天我们只能简单地谈这些，过几天我派刘炎同志到你那里去，你再和他细谈你那里的情况。你有什么意见，统统给他讲好了。刘炎是一支队政治部主任，他会回来告诉我的。今天我还有一个会要开，晚上要行军，不留你了。”

他送我到门口，叮咛说：“我们新到这里，情况还不够熟悉。这一带土匪较多，你沿途要小心一点。”他和我握了握手，“再会，下次我去看你。”

我匆匆离开了村子。抬头望望西边，太阳将要坠下山顶，彩霞满天，宛若五色斑斓的织锦。空气清新如洗，沿途微风吹拂，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畅快。

晚上，我在睦巷南面的一个村子休息片刻。吴仲超来看我。他以战地服务团名义，负责地方党的工作，正在发展党员和筹建党的组织。我向他介绍了丹北地区的情况，他也向我讲了茅山地区的情况。我因急于赶路，与吴仲超只交谈了个把钟头，就匆匆告辞上路了。

后来，我逐渐懂得了，陈毅教育我的这些道理，本来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基本思想。陈毅在斗争实践中，学习、运用并不断



加深体会，加以丰富，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江南的斗争实际情况相结合。因此，他一到江南，就到处走动，对江南的敌情、地形、交通、乡村情况等等，均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沿途和许多农民、士绅、资本家、小知识分子，特别是对地方的著名人士交谈，问得很详细，对他们的过去和现在的表现，也调查得很仔细，因为现在这些人尚有一定的号召力。至于和从城里逃难来乡下的各阶级、阶层的人谈话，询问他们许多问题，特别是弄清日本侵略军烧杀的情况，国民党军队溃退的情况，群众的思想情绪和迫切要求，他工作做得更细致。这样，他才真正从实际出发，提出根据地如何发动群众起来抗战的办法和步骤。

我回到访仙桥没几天，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就来到我的部队。他带来了委任令，将我江南抗日自卫总团所属部队改为丹阳游击纵队，任命我为丹阳游击纵队司令员。

我把抗日自卫团的情况和几个直属大队的组建经过，还有我个人参加革命的经历，向刘炎作了详细的汇报，他听了很高兴。

随后，刘炎视察了一大队，并看了几个乡自卫团，询问了他们的情况，看我讲的情况是否符合实际。我们还找了访仙桥附近几个乡的自卫团团团长来开了个座谈会。其中有西茆村的刘克之、麒麟村的殷序、袁行里的袁某等十余人，刘炎仔细地听取了他们的发言，进一步了解自卫团的组织情况。

这时，丹北除四个大队主力外，编入抗日自卫团的青壮年已有约二万五千人，其中拿枪的基干队约三千余人，我们已经搞起了一小块抗日根据地。

刘炎调查研究后，很高兴地说：“我们部队刚来到茅山地区，脚跟还没有站稳。你们这里已经有了这么大一块地方，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以后敌人‘扫荡’时，部队就不受冷欣的限制，可以两边来回转移了。”

他对我说：“你这里已有一支不小的力量，还必须把妇女和儿童也组织起来。不要把他们排除在抗日的大门之外，他们能做许多工作。”

我跟刘炎谈到丹北地区国民党的情况。我汇报了姜寄生、姜育生、周友三与我们争地盘、闹磨擦，我不得不将他们赶走；张少华部贾常富团奉韩德勤命令向我进攻，承寿根被诱骗和杀害，以及梅光迪等特务搞垮我们在孟河至奔牛交通线上活动的游击队，暗杀我西夏墅抗日自卫团团团长巢玉堂，捕杀我派往澄西的管齐山等同志的情况。刘炎表示：“这些人，他不搞你，你也不要搞他；他若搞你，你就搞掉他！有理由，不要怕！”

我汇报了卢子模、张福生的问题。我深悔不该推荐卢子模这样的人当丹阳县长。刘炎说：“只要他不当汉奸，尽量争取他还是可以的。如果他坚决反对我们，解决他也是应该的。”

我汇报说：“张福生这个人，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吕城乡下的党支部书记，表现尚好。后来脱党了，不知什么时候他秘密地在梅光迪手下当上了国民党特工小组长。这一点我原先不了解。抗战开始后，他打入我部队，当了第一大队长。在职期间，他干了两件坏事，使我认识了他的真面目。一件是秘密放走梅光迪。一件是今年春天我派他带两个排到江北去侦察情况，他仅仅乘船在长江里转了一下，就回来谎报‘对岸火力很强，无法过江’，相反却把我方情况密报国民党扬中县政府。这情况是一大队彭桂清同志发现后，向我报告的。”刘炎很重视这问题，对我说：“马上将他撤下来，送军部审查，查实情况，将他枪毙。”

谈完这些，我要求刘炎把丹北的情况转告陈毅，并尽快派一批军政干部来掌握部队，因为我们这些人大多是半路出家，对作战是外行，还要从头学起。

刘炎答应了。

晚间，我派人护送刘炎过了铁路。

## 5. “挺 纵” 北 渡

一九三八年八月，经新四军一支队党委和陈毅转报党中央，恢复了我的党籍。同时恢复党籍的还有管寒涛（一九二七年入党）等同志。

我们恢复党籍之后，就开始培养和发展党员。先后在部队发展了管如松（警卫连长，后脱党）、沈芬孝、胡文杰、陈桂生、梅嘉生、朱启祥、王祥、彭桂清等入党。

九月中旬，刘炎二次来丹北，带来张福前（原名张震东）、郭猛等二十多名军政干部，加强了部队的领导力量。刘炎代表新四军一支队宣布：丹阳游击纵队正式编为新四军之一部，番号为新四军挺进纵队，重新任命我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郭猛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张震东同志为参谋长。原游击纵队所辖四个大队扩充为四个支队（相当于团）。一支队司令员由张震东兼，政治部主任由郭猛兼，参谋长由张震东兼；二支队司令员方钧，政治部主任薛汉阳；三支队司令员韦永义，政治部主任惠浴宇；四支队司令员梅嘉生，政治部主任刘文学。各乡的抗日自卫团，从其基干队抽出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人枪，充实上述各支队。当时，对内是新四军的正式编制，对外仍以丹阳游击纵队或江南抗日义勇军游击纵队的名义。因为国民党限制新四军活动范围，对外不用新四军番号，则我部就是地方抗日武装，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以便将来向东向北发展。

刘炎对部队工作作了详细指示。他说：“部队一定要党化，党对部队有绝对的领导权，部队内部不搞统一战线，不能允许其他党派在部队内发展组织或进行活动。”

“党的支部一定要建在连队。连队的支部一定要保证党的政策的正确执行，保证上级命令和指示的正确执行。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很好地爱护、教育每个共产党员。要保证搞好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并坚决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

“连队的每个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做模范。不论在平时或战时，党员都要与群众生活在一起，以模范行动教育和影响群众，丝毫不能脱离群众。平时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战时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有错误时，共产党员要多负担些责任，决不能把错误推给群众。这样才配称得起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刘炎这些指示原则，对我们军队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话至今犹响在耳际。

我们认真地贯彻了这些指示，部队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后，魏天禄、贺敏学、龙树林、陈时夫等同志先后来挺进纵队，大大加强了党对各支队的领导，使我们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进一步得到很大的提高。

十月，中共苏南特委派特委宣传部长周苏平（周金水、周福生）来，我们让他以挺纵政治部民运科长名义，负责丹北地方党群工作。尔后，他与鲍志椿等同志在地方上先后发展了陈云阁、汪云龙、陈西光、周志贞、赵文豹、李培根、陈寒、孙定国、巢耀明、殷路、祝明夫、恽士宜、邹国器等入党，并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建立丹北特别支部，周苏平为书记，陈云阁为组织委员，汪云龙为宣传委员。同年七月，建立丹北县委，书记周苏平，组织部长陈云阁，宣传部长王志明，民运部长汪云龙，青年部长陈西光，统战部长管寒涛。丹北地区党的领导也得到了加强。

十月初，日军又调集部队“扫荡”京沪铁路以南的茅山根据地，新四军主力转移到外线打击敌人。陈毅带一个警卫排来丹北。一

天下午，挺纵司令部接到通知：陈毅同志于某日来挺纵，希派人去接，并注意保密。接到通知后，我立即找纵队参谋长张震东、政治部主任郭猛等同志，商定前往迎接的部署。

陈毅来到的这天傍晚，张参谋长率领所部到陵口以北约五里的新庙附近隐蔽。一俟天黑，即派出一个加强连悄悄地急行军到陵口以西三里的铁路附近隐蔽下来；向丹阳附近派出便衣侦察；以一个排向东监视陵口之敌；一个加强排埋伏在陵口以东约五里处的铁路边，监视吕城方面之敌；另用两个排埋伏在陵口镇以东外围。我给部队交代的任务是：不准陵口敌人向东出动。如果陵口之敌向东出动，则我西面部队即作由西向东的佯攻，使敌不敢离镇一步。东面部队只是监视，无论如何不准响枪。其余部队和我在大王庙渡口等候陈毅到来。渡口离陵口约二里余。

铁路两侧三里路以内的村庄，在丹阳沦陷时，都已被日军烧得光光，此刻要找一间完整的房子休息都不可能。我们部队便在村中断壁残垣之间休息。

陵口位于丹阳以东二十里左右，是京沪铁路线上的一个小镇。敌人为了确保铁路和运河交通，并阻止南北游击队勾通，在此设了一个据点，由丹阳派出一个小队驻扎在这里，并有伪军陆火如的一个大队。平时，他们白天出动，向外围村庄搜索是否藏有破坏铁路和用作渡河的工具，并抢劫杀人。一到天黑，他们就将运河上的船只全部收进镇里，不准再有人越过铁路，否则就开枪打死。他们龟缩在碉堡内，不时用探照灯向铁路和运河照射，一有动静，即向周围乱打枪。

敌人封锁虽然很严，但是我们仍旧来往自如，因为我们在铁路北侧和运河南面都设有交通站。

铁路北边的交通站设在徐庄，运河南面的交通站设在大景甲，由北站统一领导。站长酆大炳是个老同志，一九二七年的陵口党

支部书记，后调上海任秘密交通，不久又调天津工作，在天津被捕。抗战释放出狱后，返回家乡，和我取得联系。他的任务是保证南北交通畅通无阻，我给了他一个排担任掩护。这支小部队，都是本地人，道路熟悉。他们白天后撤，黑夜就靠近铁路，接送来往人员。新四军东来后，就把这交通站改为兵站，酆仍任站长。

渡口北面河坡上有个大王庙，庙中三间正屋，两间厢房，有个王道士。他在庙里开个茶馆，运河上商人路过，到庙里喝杯茶，歇歇脚再走。武进沦陷后，茶馆生意倒还是很兴旺，附近农民不敢进镇，大多在这里喝茶聊天，打听消息。酆大炳把王道士争取过来，派他到镇上伪军头子陆火如那里递了一个帖子，送数十元见面礼，请陆允许他在庙里开茶馆混碗饭吃，陆允许了。王道士就做了一名假汉奸真抗战的勇士。

为了便于渡河，两个交通站各做了三个大圆盆，两个洗澡盆。大圆盆可坐四人，洗澡盆可坐两人。过河人多用大圆盆，人少用洗澡盆。大圆盆平时藏放在离河较远的农民家里，过河的人较多时，即去抬来河边。这次大景甲分站的三个大圆盆全部抬来了。

在庙东墙脚下，钉了一个一尺多高的坚实木桩，河对面也钉有同样的木桩，平时都用土掩盖着。渡河时，用粗麻绳扣在河南北两个小木桩上，人坐在大圆盆里，拉着绳子过河，一般只需要一两分钟一趟，非常便当。

我和陈毅约好，晚上十时渡河。

这是初秋天气，晚风吹来有点凉爽之感。天黑以后，我们率领部队在秋虫唧唧声中，悄悄分别进到各个预定地点埋伏好。九时左右我到徐庄交通站。酆大炳带我越过铁路，到达大王庙里等候。夜色苍茫中，河边的情景依稀可见。河水安静地向东流去，虽有一点西风，但不会兴起什么浪涛。四周静悄悄的，大有“虫鸣夜更静，日落林无声”的意境。

我们就在庙东墙下等着。王道士向我汇报了陵口的情况，并说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安排妥贴。

通讯员报告，陈司令员一行三十余人已到大景甲，准十点钟到河边。我打着手电筒，掩着光，看看表，已近十点了。

河那边隐隐传来脚步声，由远而近，一群人很迅速地到了河堤下。我发现，陈毅就在其中。我迎到河边，双方扬手打了个招呼。

三个大圆盆先后放下水，一个同志指挥，请陈毅和另外两个同志先过河。陈毅蹲在木盆里，一个同志扶着扶手绳，这边同志拉收扣在木盆上的绳子，一把把拖过来，不到两分钟，就靠岸了。

陈毅着了一身军装，裹了绑腿，穿一双布草鞋，腰束皮带，挂着手枪。这副装束与平时略有不同，大概是要过封锁线的缘故吧！他跨上岸来，和我们一一握手，笑着说：“这样有趣的渡船，不用橹，不用桨，很快能过河，真是一大创造。”接着，其余警卫人员也很快过来了。陈毅笑着说：“我们在敌人的眼皮下走过来，他一点也不知道，这就是侵略者的悲哀。”

陈毅问道：“这样的渡点有几处？”

我回答：“有两处。”

他说，要多搞几个临时点，以防这两个地点遭破坏。这些渡点要准备搭隐蔽的活动桥，浮在水面上，大部队也可以过河。

队伍集合后，我问酆大炳：“可以走了吗？”酆阻止说：“等等，待探照灯照过以后再走。”

果然，不到两分钟，陵口镇上探照灯的一道白光射了过来，把河面照得通亮。我们的大木盆早已抬走了。我内心佩服交通站同志们的聪明、干练和利索。

探照灯在铁路上照的时间较长，对两旁的村庄只是闪一下就过去了。东面碉堡里的探照灯同时也射来，但距离远，效果不大。

探照灯照过后，我们告别王道士，就急速越过铁路。因运河离

铁路约有五百来米，中间全是开阔地，无处可以隐蔽，所以行动必须非常敏捷。

我们到达北面的徐庄附近的交通站，与酆大炳分手后，就跨上马背，徐徐向北而行。

一路静悄悄的，陈毅在马背上环顾四周沉睡的村庄，听着路旁秋虫的鸣唱，说道：“江南的夜景真美，使人留恋。”他不时向我提出一些问题，了解丹北地区的敌我情况。我们边走边谈，不觉到了访仙桥镇。

时已半夜，我们下马，到一家茶馆稍息片刻，喝口水，让同志们歇歇脚。然后到附近的陈家庄宿营。吃过夜餐，我们利用休息时间闲谈片刻。只听外屋里陈毅的警卫员和我的警卫员在谈笑。我走到外面，问他们为什么不安静些。我的警卫员说：“昨天晚上陈司令当了自己部队的‘俘虏’啦！”原来陈毅带了警卫排过来时，一路上想顺便了解一下部队的纪律、警惕性和战斗情绪。到丹阳东南的横圻附近时，天色已黑。村里驻有部队。村口哨兵闻到马蹄声，便轻拉枪栓，喝问：“什么人？站住！”警卫排同志正要答话，陈毅吩咐：“莫要作声，我来看一看。”他跳下马，慢慢走近村子。这时，村里的同志听到哨兵声音，已赶来查看情况。他们不认识自己的司令员，感到可疑，便将他扣下，送到排长那里，排长也不认识，送到连部。连长一见，是司令员来了，赶忙立正敬礼。那哨兵一看苗头不对，悄悄溜走了。陈毅对在场的连、排干部说：“今天我来，就想看看你们。刚才那个战士叫什么名字？很好，很尽职，要全连表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警卫员说完，我内心思忖：一个好领导，走路也做工作。我走进里屋，问陈毅：“昨天晚上你被哨兵扣起来啦？”他回答道：“现在斗争很复杂，我们是在敌人的梅花桩里穿来穿去，一定要保持很高的警惕性。否则，就要中国国民党的计，就会被敌人消灭。”



次日早餐后，陈毅命警卫员把皮包拿来，他从里面拿出一叠信，大约有二十多封，交给我：“你拿去看一看，不论真假，要十分慎重，切不可感情用事。隔一小时后，你再来我这里谈一谈。”

我拿着信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坐下来一封封地看，有的信上陈毅还加了批。显然，他将这批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我内心感到很愉快。但看完信后，我几乎气坏了。这些信大多是告我状，少数是告其他同志。说我们“杀人”、“放火”、“抢劫”、“敲诈”等等，完全是一派胡言，企图挑拨我们与新四军的关系。其中只有两封信是告对了的。一封是揭发做供给工作的某同志吸鸦片，这是真的。陈毅加批说：“如果情况属实，应即清除出部队。”另一封是告黑木桥税收机关某干部勒索商人三百银元。陈毅未加批语。后来查明情况属实，令其如数退回，此人畏罪潜逃。告发人全都匿名。以后陈毅问我那些信如何处理，我如实汇报了自己的看法。陈毅说：“不要生气，敌人总是这样诬陷我们，但我们必须慎重。有的问题确实是我们的毛病，我们要抱着有则改之的精神，予以处理。”为了防止我冲动报复，他将这批信件一概付之一炬。

这天上午，陈毅继续向我了解丹北地区的情况。有没有维持会？日军的情况怎样？国民党的情况怎样？一个个问题问得很详细，我都如实作了汇报。他肯定我们这边抓得早，夺取政权，委任县长，废除旧保甲制等做法。但也向我指出：“你们这里，据刘炎同志讲，群众发动还不够，党的建设还有关门倾向。今后要十分注意。”他还说：“日军内部情况，我们不大容易获得可靠情报，以后要想办法打进去才好。”

谈过丹北地区的情况后，陈毅就和我研究今后发展方向问题。他说茅山地区太小，活动困难，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我说应该渡江向北发展，或者向东去发展。我随即从皮包里取出一封朱渊给我的信递给了他。

他仔细看过信，琢磨了一下，说：“这意见很好嘛！”朱渊信中的意思，是早日渡江北上，拿下两淮。他认为如果控制了兩淮，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能处不败之地。信是文言文，写得很好。

陈毅很有兴趣地问我：“朱渊是何许人？”我说：“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前清秀才，军阀时代曾任省参议员，在江苏知识界很有影响。他对日寇切齿痛恨，也很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政策，曾以南宋比国民党，对我们党有一定认识。他儿子朱廉贻是我同学，很正派，有正义感，已参加挺纵工作。”陈毅问：“可否请朱渊来谈谈？”我说：“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又要过两道封锁线，来回得好几天。”他就说：“那末，就以后再说吧。不过，你一定要把此人的工作做好。他跟着我们，就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新旧知识分子倒向我们。”后来，日寇“扫荡”上党、泉州一带，逼朱渊出来当汉奸。朱渊坚决拒绝，怒斥敌人：“你们毁我山河，杀我人民，双手沾满了我同胞的鲜血，要我再助你们杀害自己的兄弟姐妹，除非太阳从西面出来。逼我当汉奸，万万办不到。你们这批畜牲，我恨不得食你肉，寝你皮……”敌人恼羞成怒，拔刀猛刺其腹部，朱渊当即壮烈牺牲。

第三天，陈毅一定要我带他到倪山看看我父亲。他善于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和我父亲谈得很投机、融洽。我父亲对他的人品和才学十分佩服。次年春，日军奔袭倪山，我父亲不幸逝世。当时我在江北检查部队工作，未能回去。陈毅特命刘培善代表他去吊唁，并派一个连送葬。此举对周围的统战人物影响很大。

午饭后，我把陈毅安排在我家书房休息。他对书爱不释手，向我要几本书，其中有《古乐府》、《李太白集》、《杜工部集注》、《稼轩长短句》、《剑南诗稿》等，还有老子的《道德经》。我说：“你对《道德经》还感兴趣？”他说：“老子有道理，他的书里有不少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我说：“只要你喜欢，你尽量拿去。横竖这屋子迟早要给鬼子烧掉的。”他望望书架说：“可惜，多了，我拿不动。”他叫警卫员

来，只拿走了挑选好的几函。这些书，他以后从江南挑到江北，都随身带着。

我请张震东、郭猛、梅嘉生、韦永义、管文彬、管寒涛等来，先后与陈毅见面。陈毅问过他们的情况后，转过来对我说：“这些同志都年轻有为，你要带好他们，团结好他们，要多多对他们帮助教育。我们总比他们大几岁，经历多一点，有这个责任。若干年后，他们都要担负起更大的任务。”

陈毅在访仙桥镇，还对汤铭新等几个小资本家做了不少思想工作。

陈毅又和我谈起东进和北进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冲破国民党的各种限制，大胆地向东向北发展，尽力壮大自己的力量。东进的任务准备交给叶飞同志的部队去执行，北进的任务就交给你纵队去执行。”

我把已掌握的苏北二李（李明扬、李长江）和韩德勤的情况，向陈毅作了汇报。他对我说：“我们应该使二李中立，如果能争取过来，那就更好。另外，还必须把苏北其他地方实力派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过来，或者使他们中立，这不仅是一个策略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

他深恐我不能领会这个战略意图，就列举出不少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加以说明。他说：

“战国时候，屈原主张联合齐、鲁抗秦，但楚怀王不采纳他的意见，主张楚秦和好。结果楚国灭亡，怀王被俘。

“三国时候，关羽自以为是，看不起孙权，破坏了诸葛亮联吴伐魏的战略。结果，自己兵败，丢了性命。这都是很好的教训。

“宋太宗赵光义北伐，有主张把镇守大同的杨业剿灭，宋太宗不同意，主张把杨争取过来。结果，杨业归顺了，这对巩固北宋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

“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争天下时，手下谋士中有人主张先打张士诚，朱元璋没有采纳，决定联张伐陈。结果朱元璋胜利了。当时，如果先打张士诚，雄心勃勃的陈友谅就会乘虚而入，朱元璋也就难以统一天下了。”

陈毅意味深长地说：“可见，战略问题要十分注意！现在的抗战，情况异常复杂。如果我们不把各界人士团结到抗日的旗帜下，他们就有可能被日寇或顽固派拉过去，那对我们是有很大的不利的。有些人搞关门主义，不要团结各界人士，如果照他们的意见办，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开明士绅，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关在门外，使自己孤立起来，最后必然落得一个惨败。就是同顽固派作斗争，我们也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地方实力派和顽固派内部有正义感的抗日分子，才能取得胜利。”

我知道，陈毅滔滔不绝地讲这些历史故事和道理，是为了帮助我懂得战略问题的重要性，以便今后在斗争中更好地贯彻执行他争取苏北二李的战略意图。

陈毅同志在开创茅山抗日根据地过程中，亲自做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的工作，尽力团结、争取包括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内的一切抗日阶层和社会上层人士，与我们合作抗日。有些地方知名人士如巫恒通、樊玉林、许维新等，在陈毅的教育下，后来相继加入了共产党，成了优秀的地方干部，为茅山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作用。以后，陈毅又对团结、教育苏北二李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我军北渡和黄桥决战的胜利。陈毅同志的确是我们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榜样。

陈毅这次在丹北住了一个多星期，以后，每隔个把月就来一次，每次来一定要详细询问争取二李的工作情况，并指示如何做他们的工作。

十一月间，陈毅去大港、大路镇一带检查部队的建设情况。回

来后，向我了解方钧的问题。他问我：“你对你部队干部的情况是否都了解？”我很不虚心地说：“我与他们共事已久，哪有不了解的。”

他立起身来，默不作声，停了一会，说：“二支队长方钧怎么样？”

我说：“现在看来没有什么问题，将来难说。”

他紧追一句：“你怎么晓得他现在没有问题？”

我说：“没有看出他有离开新四军的动向。”

“不！你刚才还提到他不赞成部队党化，这就是问题。他不肯把部队交给党，就是大问题。有人赞成抗日，今天同我们走一条路，明天国共分裂，他就反共！大革命时，有许多人站在我们党的周围，一失败，就倒向国民党。这个教训很深刻，我们不能忘记。现在情况虽和过去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不能不提高警惕。”陈毅十分严肃地说：“我们今天打天下，一定要识人。这是一个指挥员带好兵的关键问题。现在是游击环境，又是三角斗争，如果不识人，部队会被人拉跑的！”

陈毅又说：“我们用人主要依靠党，但党的用人还是要靠领导同志能识人呀。识人不是靠听他的话，也不是光靠部门同志的汇报，主要看他的表现，看他的所作所为，看他的全部历史表现。一定要到他所在的工作岗位上去了解，检查他的工作，听听群众对他的意见，切不要偏信。对阿谀奉承的人，要十分小心。经常向你提意见的人，大多是好同志。就是听人家的说话，也要注意，他是在老老实实谈问题，还是吹牛皮。没有知识的人最欢喜听阿谀奉承的话。说奉承话的目的是讨你喜欢，好升官发财。这些要十分注意。”他又叮咛说：“方钧这个人的问题，要及早处理。”对这个意见，我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方钧当我面多次表示过，要跟随首长抗战到底，决不变心。于是我就愚蠢地相信了他的话，把事情拖下

来了。

为了执行北进的任务，“挺纵”积极准备攻打扬中。扬中乃我军过江的一块理想的跳板，不打下扬中，就难以大规模渡江北进。扬中当时为国民党贾长富团盘踞着，此人坚决反共，经常派部队攻打我部，并用特务过江来暗杀我干部，做瓦解我部队的工作。在当地，他们也无恶不作，人民对其恨之入骨，纷纷过江来请求讨伐。我“挺纵”一支队在张震东、郭猛率领下，分两路进攻，收复老郎街和八字桥等地，又集中兵力解决三茅镇问题。部队进攻时，发现三茅镇是一座空城。我立即派通讯参谋到宝埝附近向陈毅报告攻克扬中的情况，同时赶到老郎街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发动群众起来抗日。但到会的绝大多数是老弱妇孺，我立刻警觉到有问题。

这时，通讯参谋急匆匆赶回，命令我们立即把部队撤过江去。原来陈毅听了情况报告，又问了通讯参谋许多细节，判断敌人可能有诈。又问：“你们打算怎么办？”通讯参谋根据我的交代回答：“准备先把县政府组织起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然后就在那里驻下来。陈毅把烟头一扔，立起身来说：“想得很美，敌人又不是在睡觉！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敌人马上就会将你们包围起来打。敌人不光是一个贾长富，还有张少华，韩德勤！你们是抵挡不住的。不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你们怎么能在扬中站住脚？你星夜赶回去，愈快愈好。部队全部撤回，等待时机，消灭他的主力，再占扬中！”

事情果然不出陈毅所料，狡猾的顽军知我军攻打扬中，事前就将部队分散隐蔽到三茅镇的乡间；韩德勤又命张少华带两个团会同保四旅一个团准备过江，待我军占领三茅镇后，就以四个团的兵力合拢包围，一鼓作气消灭我军。我们接到陈毅的命令，立即将部队撤回，刚到姚桥一带，顽军已经尾追而来。

一九三九年初，“挺纵”再次攻打扬中。这次，我们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在摸清贾长富团的兵力部署后，采取突然袭击，以一支队为主，二支队两个营配合，晚上出动，一支队的一个营包围驻扬中中部老郎街之敌，一个营解决八字桥之敌和乡间小股匪部；二支队两个营和一支队的一个营解决三茅镇顽国民党县政府和贾长富的团部。经一夜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战斗于拂晓前结束，全歼顽军两个多营，多数敌人逃散到乡间，陆续被肃清。国民党县长和县党部委员等逃往江北。事前我们曾经向部队交代，让他们逃走，不要抓，因为抓了不好处理。我们在扬中站住脚后，为北进准备了跳板。大约过了半月左右，陈毅来到扬中老郎街“挺纵”司令部，非常高兴，叮嘱我们一定要守住，不能丢失，并指示我们要把扬中的各界人士吸收到政权部门，切不可把他们排斥在外，要做好统战工作。我们遵照陈毅的指示，将国民党的县党部委员王兴、资本家左道成等，争取到抗日阵营这边，以后对苏北的国民党进步人士果然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们在扬中设立了类似县政府的办事处，由郭猛兼任主任，领导扬中政权工作。我“挺纵”第一次攻打扬中时，“挺纵”战地服务团进行了抗日宣传，已播下了一批种子。当地一些进步抗日青年，如金鉴、施光甲、施光前、施光华、林先之、韩九皋、唐明哲等已组织起来，受“挺纵”战地服务团李培根等同志联系领导。此次占领扬中后，发展了王德文、施光前等入党。这批当地的青年同志熟悉情况，发挥了作用。

我们在扬中站住脚后，即分兵一部北渡长江，到江都县沿江的嘶马、大桥一带，在周围二、三十华里的区域内，建立了北进的桥头阵地。

四月间，方钧企图带他的支队投靠韩德勤。幸而阴谋被及时发现，陈毅为防止韩顽出兵接应，命令老二团主力一部，协同“挺

纵”一、三、四支队，迅速收缴了方钧部的枪械，并接管其大桥、新老洲和扬中新坝等防地，方仅带其亲信数人，化装逃往兴化。韩顽大怒，将方关进了监狱。解决方钧部的战斗中，“挺纵”派往苏北指挥的政治部主任龙树林，不幸中弹牺牲。

龙树林同志，江西人，在苏联学过炮兵，对党忠诚，作风正派，谦虚谨慎，能听取不同意见，经常深入连队进行调查研究 and 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很受干部、战士们爱戴。他的牺牲，大家都感到十分悲痛。

方钧事件发生后，我既深深钦佩陈毅敏锐的眼力，而更为自己不能识人而懊恼。不久，有些同志对我用人不当提出尖锐的意见，陈毅非但未严厉责备我，反而自己出来承担责任，使我感动万分。事后，他诚恳地对我说：“老管，你对方钧处理迟了。上次我和你谈过，你本应立即把方钧调离部队。你没有及时处理，群众对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你要吸取教训。”

我向他作了检讨，他说：“经验的取得，往往要付出痛苦的代价，所以经验是宝贵的。”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更感到温暖，也很惭愧。类似这种情况，许多高级干部都遇到过。一旦工作中出了差错，陈毅总是出来承担责任，十分注意保护同志的积极性，并且一如既往地给予信任。即使批评你，也很讲究方法和效果，从来不叫你难堪，而是叫你心悦而诚服。

在用人问题上，陈毅十分注意因材施教。对于有爱国心，愿意抗日的人士，不论其出身、职业、信仰如何，都加以团结，给予信任，量材录用，发挥其专长。他对管有为的使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管有为，丹阳人。他家境贫寒，早年在上海以“奇门相术”为业混饭吃，自称“管半仙”。上海沦陷后，他不满敌人的侵略行径，回到家乡。因为他搞的是迷信活动，我从未想到可以用他，虽然他几



次找到过我家。

一次，我和陈毅随便谈到这个人，出乎我意外，他很感兴趣，要我找他来见见。

“管半仙”来了，陈毅和他打过招呼，问了他的经历，知道他主要是看手相的，就开玩笑说：“你看看我这个大老粗的‘手相’如何？将来能不能做个皇帝？”

管有为不知道跟前就是陈毅。他对陈毅的面孔仔细端详了一番，笑笑。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约七、八寸长的小尺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刻划着许多细纹。管有为叫陈毅把左手伸出来，用尺子在他左手沿小指下方仔细量了量长短，然后再把随身所带的一本相书翻了翻，查阅了一通，随即说出了陈毅的生辰（居然说中了！），又夸赞说：“你是大将人才，八面威风。”陈毅哈哈大笑，我和在场的张云、管寒涛等也都笑了。

“我有这么大的福份么？你是瞎猜的吧？哪有什么八面威风！”陈毅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从来不准摆威风的。摆威风，群众就要将他打倒。照你这么说，我将来是该被群众打倒的了。”几句深刻而诙谐的话，引得大家笑得前俯后仰。“管半仙”很不好意思，只说：“对不起，我是瞎说说的。”

我本来以为，事情到此就这样结束了。不料管有为告辞后，陈毅立即对我说：“此人有用，镇江敌人那边，需要有人去摸清情况，派管有为去，很合适。镇江日军的几个队长，都很迷信。管有为这套江湖魔术，他们可能相信，让他打进日本鬼子内部去，就可搜集到敌人的战略情报。江湖术士替我们做工作，敌人是不大注意的。”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陈毅见我明白了他的意图，进一步布置说：“所谓战略情报，就是敌人对国民党、对伪军以及对我军的方针、政策、兵力部署。至于敌人‘扫荡’、扩大伪军、追捕人犯和敌

伪顽矛盾情况，这些战术情报，可以另派专人去搞，不要管有为搞，因为搞这种情报最容易暴露。这点要和管有为说清楚，切勿大意。你和他保持单线联系，由参谋长或你直接负责，不准他与镇江我们的任何组织或个人发生关系。你们还可以给他一个秘密的官衔，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但绝对不能泄露。如有需要，可以把他的家属搬进城去，做点小生意。总之，要周密安排，一定不可以马虎。”

我根据陈毅的指示，把管有为找来。管有为虽比我大几岁，但按封建家族辈份是我的族孙，我以长辈的口气，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因为国家的需要，我们准备派你到镇江去做情报工作，你如能当此重任，以‘奇门相术’作掩护，条件十分有利，一定能够为国家和民族立功！”

管有为沉思了一会，他坦率地说：“这个事情弄得不好，是要杀头的。但是，为国为民，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顾惜不得啦！”于是他慨然允诺。我把秘密工作的方法，特别是如何应付敌人，个人行动需要注意的地方，向他作了交代，然后叫会计给他二百银元。他笑得合不拢嘴。

管有为到镇江后，在伪军的驻地附近挂上“管半仙”的招牌，重操旧业。很快，他的名声在镇江城里传了开来。起先，伪军士兵找他算命、相面，后来当官的去找他，日军翻译也去找他。消息传到日军那里，日军联队长是个十分迷信的家伙，也把“管半仙”找去了。他云天雾地地大扯一通，竟把这联队长骗得团团转，夸他的相术“大大的灵”，叫伪军把他留着。

日、伪军下乡“扫荡”，有时先叫“管半仙”算一算：什么时辰出动，朝哪个方向出动最为“吉利”。逢到这种机会，管有为即将敌伪军军事动向的情报设法送回。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他多次送来有价值的情报。有一次，我们根据他的情报，在镇江东面丁岗附近

伏击去埤城地区“扫荡”的日军四、五十人，歼其大部，打死小队长一名。日军对他发生怀疑，扣起来审讯，他始终未暴露真实身份，壮烈牺牲了。

对管有为的牺牲，我感到很沉痛。假如我能严格按照陈毅指示，把战略情报和战术情报分清楚，他的暴露也许可以避免。但是，他的牺牲是光荣的。如果不是遇到陈毅这样的领导人，他在旧社会里只能一辈子当个江湖术士，东飘西荡，然后默默无闻地死去。怎么可能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英勇地为国捐躯，成为永垂不朽的烈士？

是年十月初，陈毅从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视察工作回来，到达挺进纵队驻地姚家岱，又和我作了一次长谈。

他先谈到澄、锡、虞一带的情况，告诉我说，叶飞部队在东路斗争很艰苦。苏（州）、昆（山）、常（州）、太（仓）等地广大农村，在我军到达前，早被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占领。五月份叶飞和吴琨率部东进时，沿途都遭到忠救军的进攻，不得不与之连续作战。虽然在那里狠狠地打击了敌顽，改善了自己的装备，扩大了政治影响，但牺牲也不小，一支队参谋长吴发坚同志在武进南乡洛阳桥附近为梅光迪的部下暗害，六团副团长吴琨在江阴顾山镇附近，也遭反共军袭击而牺牲。南面冷欣，北面韩德勤都支持那里的地方反共势力，加上日军的不断“扫荡”，叶部两面作战，困难确实很大，急需休整。

陈毅继而谈到，他特地到了江阴。当时，叶部驻在江阴周庄一带，国民党忠救军的袁阿成部驻在其东南祝圻一带，挡住我东进部队的去路。我军忍无可忍，准备打掉这只拦路虎。此时得到情报，日军正拟配合顽固派消灭我军。一旦仗打了起来，日军即从镇江、常州、苏州几路出动，联合包剿。镇江之敌将东来占领武进西北之孟河、小河一带，切断我西归之路；常州之敌将从西石桥向东进逼；而苏州之敌则西来夹击，敌之海军也将出动封锁江面。陈毅为

此火速赶到江阴，说服部队放弃了原先的计划。他对我说：“我军在敌后作战，切忌暴露自己。不然，很容易被敌人包围而陷入重围。凡陷入重围，就会吃亏。”听着陈毅的谈话，我深深感到，在敌后作战力避陷入重围的问题，实在是一个很精深的战术原则问题，带兵者不能不深思。

接着，陈毅再次和我谈起北进的问题。他认为，在江南这块狭小地带内，河汉湖泊多，日寇据点多，封锁线多，大兵团行动回旋余地很小。加之顽固派冷欣沿着苏浙皖边区沿山一带重重设防，还有几个师驻在我军部附近，随时都有把我们前后方隔开分别吞噬的危险。北面又有大江拦住去路，逼得我们天天与敌人作战，天天拚消耗。久而久之，我们就可能被消灭。这是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

他问我：“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说：“你过去不是说过北进吗？你欣赏过朱渊的北进意见，中央又早有指示，精神讲得一清二楚。我看，我们就秘密渡江北上。”

陈毅点了点头，说：“情况明摆着，可是有人反对这样做。我同他们已经争议过好多次，得不到解决。不管他，我们还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坚决北进。”

陈毅命我再派人去通、如、海地区摸摸那边的情况，说我们迟早是要去的。他说：“不过，我们如果过了江，韩德勤马上就会全力扑过来，把我们赶回江南，势必要决战，要打大仗。”以后，苏北形势的发展，完全合乎他的估计。

那一夜，陈毅跟我谈了很多问题。

鸡叫了，陈毅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打开窗户，朝外看了看，把窗子重新关上，转过身来说：“看，天快亮了，弄点东西吃吃，明天再谈。”

我叫警卫员把事先热好的米粥和几个馍馍、鸡蛋端来。陈毅颇有感触：“我们谈了一个通宵，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已经不简单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困难到了极点，我们经常住在密林草丛中，整天吃不到一点东西。为了躲避白狗子的追赶，白天躲，晚上走，很少有机会能睡个安稳觉。现在好多了，我们有了根据地，部队生活比较舒服了。”我们吃完粥，陈毅就到房里睡了。他一躺到床上就睡着，接着便听见他的鼾声。

我带警卫员走到门外，夜凉如水，满天繁星，四周沉寂，只有远处偶尔传出几声犬吠。我走到司令部参谋室，询问有没有敌情，值班参谋回答：“没有。”我问：“群众是否知道陈司令员在这里？”他说：“没有人知道，机关内也是如此。”我叮嘱他们要继续做好机关保密和警卫工作。

我回到房间，东方已经发白了。

向北发展，是党中央既定的正确方针。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同志给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的电报中就明确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周恩来到新四军军部传达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陈毅排除干扰，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命令“挺纵”积极做好准备，尽早北渡。

“挺纵”北渡，做好苏北二李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一环。丹北抗日武装搞起来后，二李的交际处长季恺即过江与我私下联系，我方韦永义、惠浴宇等同志即多次过江，做二李及其部属的工作，建立了较好的统战关系。接受北渡任务后，我们加强了与二李的直接联系。陈毅同志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曾由我、惠浴宇同志分别陪同，几次进泰州城和二李会晤，晓以抗日大义，阐明我党的政策，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事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批转了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和主要经验的报告，说“中央和中

中央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因此转发“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这方面的统战策略，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

叶飞同志自从五月间奉命率老六团东进苏锡常地区，化名聂扬，以江抗二路的名义进行了很艰苦的斗争，解决了人、枪、款问题，扩大了政治影响后，于同年十月奉命西撤扬中休整，尔后即与“挺纵”合编，番号仍为新四军挺进纵队，任命我为司令员，叶飞同志为副司令员，张藩为参谋长，陈时夫、姬鹏飞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辖四个团：一团团长乔信明，二团团长徐绪奎，三团团长梅嘉生，四团团长韦永义。不几天，新四军老四团团长由陶勇（张道镛）率领一个营，经扬中北渡长江；后与“挺纵”三团合编为苏皖支队，陶勇为司令，梅嘉生为副团长，向仪征、六合、天长挺进。

十一月七日，为了保证坚持苏南敌后抗战和完成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一、二支队奉命合并，在溧阳县水西村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统一指挥苏南的军事行动。接着十二月在茅山地区建蔡圩召开了中共苏皖区党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苏皖区党委，以吴仲超、谭启龙、韦一平、章蕴、陈鸿、刘立人为委员，吴、谭分任正副书记。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再次强调要“陈毅部抽调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九日，中央又指示：“陈毅同志应自江南向苏北发展”。此时，正值日军三千多人，分数路进攻扬中，“挺纵”由张开荆参谋长带领少数部队（约一个加强连）留下坚持斗争，“挺纵”领导机关和主力已主动撤出，开往江北吴家桥一带。任命管寒涛为“挺纵”江南留守处主任，与丹北中心县委（苏皖区党委派章蕴同志来帮助召开党代会，丹北中心县委刚刚建立，周苏平为书记），共同坚持丹北地区之斗争。

我“挺纵”全部开至江北吴家桥一带后，部队又作了进一步整

编，干部也作了一些调整。军部重新任命我为司令员，叶飞同志为副司令员，张藩同志任参谋长，陈时夫、姬鹏飞同志仍为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陈毅又在负责同志间强调内部的团结，新老干部、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都要团结好。他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能战胜一切困难。你们必须十分注意这个问题！”

从此，我们的斗争又揭开了新的一章。

## 后 记

这是一部有关我早期参加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的回忆录。

这部回忆录，包括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若干内容。时间已经过去五、六十年，熟悉这段斗争历史情况的老同志日趋稀少。我撰写这些往事回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后人提供一点研究史料，并告诉青、少年一些当年斗争的真实情况，使之懂得革命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

半个世纪以前，我们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少革命斗争的必要经验和对马列主义的深刻理解，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给革命造成某种挫折和损失，但是，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要为人民负责的，因此，我们的党不怕错误和挫折，跌了跤就爬起来，犯了错误就坚决改。在那艰苦岁月中，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无私无畏，百折不挠地领导人民向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不仅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而且赢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实地反映历史。我将个人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如实地写下来，以便读者从这些侧面，更真切地了解我们党所走过的这段艰难的道路，并从中进一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在这部回忆录中所写到的恽代英、董亦湘、王若飞、黄竞西、夏霖、钱正表、袁世钊、徐家瑾、黄子仁等许许多多的革命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巨



的共产主义事业，前仆后继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无愧为共产党人的楷模。他们生前的革命业绩和光辉思想，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我写下他们的一些斗争情况，以表达我对先烈的崇敬和怀念。

这段历史，就我个人来说，也是一段艰难的道路。回首当年，我很幼稚。党犯过不少错误，我也跟着犯过这些错误。每当想到过去这些经历，总觉得有必要把它记录下来。孩子学走路，总会跌许多跤的，革命也是如此，所以说经验教训是宝贵的。

我的这段经历，解放后曾经受到一些同志的歪曲，搞了不少不实之词。当然，有些同志是由于不懂党的历史，而作了那些主观主义的判断。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是一直原谅他们的。一九八一年春，这些事情才得以澄清，党中央给我恢复了名誉，并恢复了我一九三八年以前的全部党籍。我感谢党中央对我的无比爱护。

这部回忆录，是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和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多次敦促和大力帮助下完成的。在搜集资料、写作过程中，得到郑乃臧同志的协助，他为此辛勤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劳动。

由于时隔久远，不少事情在记忆中日渐淡忘，我原先保存的一些笔记和历史资料在十年内乱中又损失殆尽，所幸的是档案馆和各地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部门尚保存一些资料可以查证，并帮助我回忆。即使如此，我所记述的事情也仍可能有挂一漏万的地方，或失之谬误的地方。谨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作者

1984年8月于紫金山麓